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

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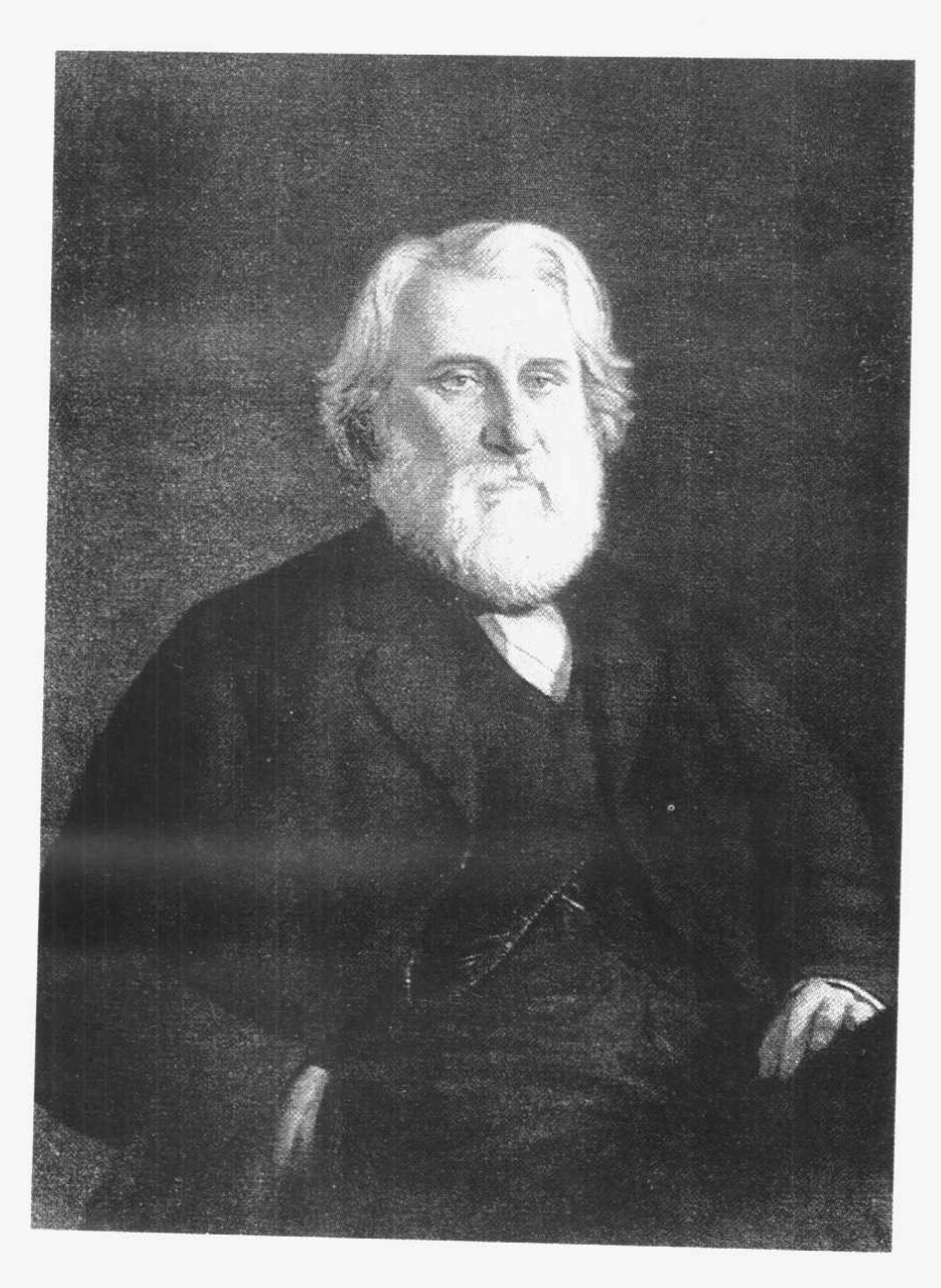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俄)屠格涅夫著;巴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ISBN　7-02-002310-X
Ⅰ.巴…　Ⅱ.①屠…　②巴…　Ⅲ.巴金-译文-全
集　Ⅳ.I5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5633号

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7.125印张　329千字
1997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9.50元



屠格涅夫

目　录

父与子

木木

普宁与巴布林

门 槛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著

《父与子》，一九四三年七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共印九版；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共印五版；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六二年七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印七版；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至二版（与《前夜》合为一册）。

纪　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一

“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① 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

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

“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

“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

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

① 客店：指可以停放旅客的车辆马匹的小客店。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 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 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 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 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虽然并没

---

① 里：这里指俄里。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下同。

② 亩：“这里指俄亩。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下同。

③ 指俄国抵御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④ 阿嘉忒（法语）：玛瑙的意思。

⑤ 照旧俄习惯，弥撒完毕后，每个人都到十字架跟前去吻十字架。

有丝毫勇武的表现，而且还得到了“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因为是一位将军的儿子，便不得不学他的哥哥巴威尔的榜样，也去报名入伍；可是就在他得到任命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坏了一只腿，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好起来时他却成了一个“瘸子”，那是一辈子医治不好的了。他的父亲只好从此断念，让他去做文官。等到他有了十八岁，父亲便带他到彼得堡去进大学。恰好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在近卫团里当了军官。父亲让这两弟兄租了一套房间住在一处，又托了他们的一位表舅偶尔来照应一下：那是一个高级的官员，名叫伊里亚·柯利雅津。以后父亲回到他的师里和他的妻子那儿去了，只偶尔给这两个儿子寄来一封信，大张的灰色信纸上涂满了粗大的文书体的字迹。他在信纸的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彼得·基尔沙诺夫，陆军少将”，还用心地在名字四周弯弯曲曲地描花。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学里得到学位毕了业，就在这一年，基尔沙诺夫将军因为阅兵成绩不好，给免了职，便带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刚在塔夫利奇花园[1]附近租了一所房屋，并且加入了英国俱乐部[2]做会员，就突然中风死了。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过不惯首都的那种沉闷无聊的日子；是免职闲居的痛苦把她折磨死了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在他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爱上了他的旧

① 塔夫利奇花园：位于彼得堡的住宅区，附属于塔夫利奇宫，花园的一部分在夏天开放，供人游览。塔夫利奇宫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七八三年为她的宠臣波将金公爵修建的。

② 英国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有钱的贵族和大官。

房东卜列玻罗文斯基(一个小官)的女儿,这桩事情给了他们不小的烦恼。那是一个美丽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谓有修养的女子。她喜欢读报纸上"科学"栏里的那些严肃的文章。他等着自己的丧服一满,立刻同她结了婚,并且辞掉他父亲生前给他在皇室领地管理局谋得的官职,同他的妻子马霞一块儿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们住在林业学院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处精致的小楼房(那房子有干净的楼梯和一个通风的客厅),最后他们又搬到乡下去,就在那儿定住下来,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尔卡狄。这一对年轻夫妇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平静;他们几乎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在一块儿看书,四只手同弹钢琴,唱着二重唱。她种花养鸡;他偶尔也出去打猎,料理田产上的事务。在这中间,阿尔卡狄也在快乐平静的环境中,渐渐地长大起来了。十年的光阴像梦一般地过去。一八四七年基尔沙诺夫的妻子去世。他差一点儿受不了这个打击:不到几个星期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了。他正要动身到国外旅行,希望借此消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接着来了[①]。他只得回到乡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什么事都不做,过着一种疏懒的生活;后来他对他的田地改革的事情感到了兴趣,便动手做起来。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儿子送进大学;他跟他的儿子一块儿在彼得堡过了三个冬天,他很少出门,只是竭力跟阿尔卡狄的一班年轻朋友结交。到第四年

---

①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主要国家大都卷在革命波涛中间。尼古拉一世害怕俄国人民受到影响,曾下令禁止人们出国。

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去彼得堡，所以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见他在这儿等候他儿子像他自己从前那样地得到学位毕业回来，——他的头发完全灰白，身子倒很结实，不过背显得有点儿驼。

那个听差由于礼节的关系，也许还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到大门口去，点燃烟斗抽起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埋下头，望着那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安稳地迈着黄色的肥腿严肃地一步一步向他走来；一只肮脏的猫装腔作势地蜷伏在栏杆上面，对他做出一种不高兴的神气。太阳晒得厉害，从客店的阴暗的过道中送出一股热的黑麦面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想得出神了。"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① ……"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他竭力要去想别的事情，可是这种思想又回转来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痛地喃喃说："要是她活到现在就好了。"一只肥的、深蓝色的鸽子飞到路中间来，急急地到井边一个水洼跟前去喝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刚在望它，可是他的耳朵已经听到了由远处驶近的车轮声。

"老爷，一定是他们来啦，"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跳起来，注意地顺着公路望去。一辆三匹马拉的四轮敞篷车出现了；他还看见车子里面一顶大学生制帽的帽檐，一个熟悉的亲爱的脸的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沙诺夫一面叫着，一面挥动

① 阿尔卡沙：阿尔卡狄的爱称。

两只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忽儿功夫，他的嘴唇便贴在一个年轻大学学士的无须的、带尘土的、太阳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爸爸，让我先拍一下身上吧，”阿尔卡狄说，由于旅途的辛苦，他的声音略有一点儿发哑，不过这还是孩子的声音，而且响亮悦耳，他高兴地回抱他的父亲：“我把你身上也沾上土了。”

“不要紧，不要紧，”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爱的笑容反复地说，他伸手在他儿子的大衣领子上拍了两三下，也把自己的外衣拍了两拍。“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让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说着，便往后退了几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忙忙地向客店的院子走去，口里嚷着：“这边，这边，快给我们套马。”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比他的儿子兴奋得多；他好像有一点儿慌张，又有一点儿胆怯。阿尔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说，“让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给你，我在信上常常提起他。他真好，居然肯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连忙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刚从四轮敞篷车上下来、穿一件宽大的带穗子的长外衣的高个子跟前，那个人停了一忽儿才把手伸给他，可是他仍旧紧紧地捏住那个人的没有戴手套的红色的手。

"您这次光临，叫我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感激，"他开始说，"……请教您的大名跟您的父名 。"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1]，"巴扎罗夫懒洋洋地可是声音响亮地答道；同时他翻下外衣的领子，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广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带绿色的大眼睛，淡茶色的下垂的连鬓胡子；一个安静的微笑使他的脸显得有生气，而且显出他的自信心和聪明来。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您在我们这儿不致于感到沉闷无聊，"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

巴扎罗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动，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举了一下帽子。他的又长又密的深黄色头发盖不住他隆起的头骨。

"那么，阿尔卡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又掉转身对他的儿子说，"要不要现在就套马，还是你们高兴休息一忽儿？"

"爸爸，我们还是回家休息吧。叫他们就套上马。"

"马上就走，马上，"父亲答应道，"喂，彼得，听见没有？赶快准备好，好孩子。"

彼得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听差，他并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远远地对他鞠一个躬，便穿过大门不见了。

"我是坐有篷轻马车来的，不过我另外给你的四轮敞篷车

① 叶夫盖尼是名字，瓦西里耶夫或瓦西里以奇是父名，意思是"瓦西里的儿子"。

预备了三匹马，"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唠叨地说，阿尔卡狄向客店女主人要了一铁勺子的水来，正拿到嘴边喝着；巴扎罗夫点燃烟斗，向那个正在卸马的车夫走去。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我的车里只有两个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样……"

"他会坐四轮敞篷车的，"阿尔卡狄低声打岔道，"请你不要跟他讲礼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朴素——你以后会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把马牵了出来。

"喂，转过身来，大胡子！"巴扎罗夫对四轮敞篷车的车夫说。

"米丘哈，听见没有？"另一个车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后面开的口里，"这位老爷怎样叫你？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丘哈不答话，只是把他的帽子轻轻往上一推，然后从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卸下缰绳来。

"快些，快些，伙计们，来帮个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嚷道，"一忽儿大家都有伏特加[①]喝！"

不到一忽儿功夫马都套好了；父亲和儿子坐在有篷轻马车里，彼得爬上了赶车的座位；巴扎罗夫跳进了四轮敞篷车，把头放在皮枕上，于是两部车就辘辘地跑走了。

---

① 伏特加：用黑麦（或译裸麦）做的俄国烧酒。

三

“你毕竟做了大学学士，回到家里来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一忽儿拍拍阿尔卡狄的肩头，一忽儿拍拍阿尔卡狄的膝盖，接着又说一句：“毕竟回来了。”

“伯父身体怎样？他好吗？”阿尔卡狄问道，虽然他心里充满了真诚的、而且带点儿孩子气的喜悦，可是他却愿意在这个时候尽可能少谈感情话，只说一些普通的家常话。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一块儿来接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久吗？”阿尔卡狄问道。

“哦，大约五个钟头吧。”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狄立刻欢喜地转过身去，在他父亲的脸颊上接了一个很响的吻。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轻轻地笑出声来。

“我给你预备了一匹多好的马，”他说，“你等着瞧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过了。”

“巴扎罗夫有一间屋子吗？”

“我们给他预备一间就是了。”

“爸爸，请你好好地待他。我没法跟你说得明白我多么看重他的友谊。”

“你跟他认识不久吧？”

“不久。”

“啊,难怪我去年冬天没有见到他。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专门科目是自然科学。不过他什么都知道。他明年还要去考医生呢。”

“啊!他还是念医科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不作声了。过一忽儿他又伸手指着前面问道:“彼得,那些赶车的是我们的农民吗?”

彼得朝他主人指的方向望去。几辆大车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跑过,拉车的马都没有加上马衔。每辆车上有一两个敞开羊皮衣服的农民。

“老爷,是的,”彼得答道。

“他们往哪儿去,——进城去吗?”

“我想一定是进城去。”彼得轻蔑地再加一句:“到酒馆去,”同时他微微地侧身向着车夫,好像在征求车夫的同意似的。可是车夫动也不动一下;他是一个旧式的人,并不赞成现代的新的见解。

“今年农民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接着对他的儿子说,“他们不肯缴租。你又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还满意那些雇来的长工吧?”

“还好,”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低声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动他们跟我捣乱;他们不肯多出力干活。他们把马具弄坏了。不过他们耕地还不错。只要时间一久事情就会上轨道的。你现在对田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家里没有一个荫凉地方,真可惜,”阿尔卡狄不回答他的

问话，却另外说。

“我在北面露台上搭起了一个凉棚，”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现在我们可以在露天吃饭了。”

“那么这会太像避暑的别墅了……可是这是废话。这儿空气真好！味道多么新鲜！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我们这儿草地一样香的！而且天空也……”

阿尔卡狄突然闭了嘴，偷偷地朝背后看了一眼，就不再说下去。

“不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接嘴说，“你是在这儿出世的，所以你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

“得啦，爸爸，一个人生在哪一个地方，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

“不，这绝对没有关系。”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看了他儿子一眼，车子又走了半里的光景，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讲话。

“我不记得我给你的信里提过没有，”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你的老奶妈叶哥罗夫娜死了。”

“真的？可怜的老婆婆！卜罗科非奇还在吗？”

“还在，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地一天叽哩咕噜。老实说，你在玛利因诺找不到多少改变的。”

“总管[①] 还是旧人么？”

---

① 总管：贵族家的管事和领地管理人。他还照料家务，并且管理全家的男女仆人。

"啊，这却换了人了。我决定：那些做过家仆的农奴解放以后，就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给他们做什么负责任的事情，"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看见阿尔卡狄望着彼得，便放低声音解释道："Il est libre, en effet,[①]不过，他只是一个当差。我现在用的总管是一个城里人，看起来倒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我给他一年二百五十卢布的薪水。可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到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额和眉毛，这在他向来是一种心里不安的表示，"我刚刚对你说过，你在玛利因诺找不到什么改变……这句话并不十分正确。我觉得我应当事先对你说明，虽然……"

他吐吐吞吞地过了一忽儿，然后用法国话说下去：

"也许一个严正的道学家会说我的坦白是不适当的；可是一来，事情隐瞒不了，二来，你也知道：我对于父子间的关系素来有一种特别的主张。当然，你也有权责备我。在我这样的年纪……一句话说完……那个……那个姑娘，你也许已经听见说过她了……"

"费涅奇卡吗？"阿尔卡狄顺口问道。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红了脸。

"请你不要大声提她的名字……唔，是的，……她现在跟我住在一块儿。我把她搬进我家里来了……占了两间小屋子。不过这是可以变动的。"

"啊，爸爸，为什么要变动呢？"

① 法语：的确，他是自由的。——原注

“你那位朋友要在我们家里作客……这有点儿不方便。”

“请你不用担心巴扎罗夫。他完全不管这种事情。”

“好的，可是对你也不便，”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又说，“最坏的是——我们那间小小的耳房又太糟。”

“得啦，爸爸，”阿尔卡狄打岔说，“你好像在道歉似的；你不害羞吗？”

“自然，我应当害羞，”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他的脸越发红了。

“得啦，爸爸，得啦；请你不要再说了！”阿尔卡狄温存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这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呢？”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于这位善良而软弱的父亲的一种带宽大意味的爱，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暗中以为自己优越的感觉。“请你不要讲了，”他再说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进步和解放而大为得意了。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还在擦自己的前额，这个时候便从手指头底下看了儿子一眼，心里一下子痛起来……可是他马上又责备他自己。

“这就到了我们的地了，”过了好一忽儿功夫他又说。

“我想前面就是我们的林子吧？”阿尔卡狄问道。

“是，是我们的。只是我把它卖出去了。今年他们就要来砍的。”

“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需要钱用；况且那片地也得分给农民。”

“是那些不缴租的农民吗？”

“那是他们的事情；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缴租的。”

“这林子很可惜，”阿尔卡狄说，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来。

他们所经过的田野够不上说是风景如画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连着，一起一伏地一直连到天边；有些地方可以看见小树林，还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峡谷，里面长满了稀疏的矮树，看起来就跟叶卡捷琳娜女皇[①]时代的旧式平面图上面绘出的一样。他们还经过一些两岸崩落的小河，狭堤分隔的小湖；他们又看见一些小村庄，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顶有好多都塌了一半，矮树编成围墙的谷仓倾斜了，它那荒废的打麦场也张开了脱落的大门。教堂中间有的是砖砌的，泥灰也剥落了；有的是木头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园里长满了荒草。阿尔卡狄的心渐渐地冷起来。好像故意似的，他们沿途遇见的农民都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弱可怜的小马，一棵一棵的柳树让人剥下树皮、弄断树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褴褛的乞丐；瘦小的、毛蓬蓬的、显然是饿着的母牛贪心地乱嚼着沟边的野草。它们好像刚从什么凶恶残暴的猛兽的利爪下面逃了出来似的；在明媚可爱的春天里面看见这些瘦弱的畜生的悲惨可怜的模样，使人想起那个充满风暴和霜雪的、漫长的、寂寥寡欢的严冬的白色魔影。……“不，”阿尔卡狄想道，“这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它给人的印象不是丰裕和勤劳；它不能够，不

① 叶卡捷林娜女皇：即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间的俄国女皇。

能够照这样下去,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可是怎样实行改革呢,又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阿尔卡狄这样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春天又恢复了它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绿色,那一切,树啊,矮林啊,草啊,正在灿烂地发光,并且在暖风的轻拂下广泛地、轻柔地荡漾;百灵鸟的嘹亮的歌声不绝地从四面涌来,田凫或是唱着歌在低的草地上盘旋,或者静静地掠过草坡飞去;白嘴鸦在长得不高的春麦田里昂首阔步,让这一片新绿衬出它们的乌黑;一忽儿它们又隐在已经变白了的裸麦中间,不时从那烟雾一般的麦浪中伸出它们的头来。阿尔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渐减淡,终于完全消失。……他脱下他的大衣,望着他的父亲,脸色显得十分高兴,而且带着孩子气,他的父亲便又把他拥抱了一下。

"现在已经不远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只要爬上那小山,就看得见宅子了。阿尔卡沙,我们在一块儿一定过得很好;倘使你不厌烦的话,你还可以帮忙我管理田产。我们现在应当多接近,应当好好地互相了解,你说对不对?"

"自然啦,"阿尔卡狄说,"可是今天天气真好!"

"这是特地欢迎你的呢,我的好孩子。这是春天的最好的日子。不过我赞成普希金的意见——你记得不记得,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①] 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你来了,给我带来几多忧愁,

① 《叶甫盖尼·奥涅金》: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候！

多么……

“阿尔卡狄，”巴扎罗夫的声音突然从后面的四轮敞篷车里叫起来，“给我递根火柴来，我没有东西点我的烟斗。”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停止了念诗，阿尔卡狄正带了惊讶（但也不是没有同情）地听着，这个时候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银的火柴匣子，叫彼得给巴扎罗夫送过去。

“你要不要一支雪茄？”巴扎罗夫又嚷道。

“给我也好，”阿尔卡狄答道。

彼得回到车里，除了火柴匣子以外，还带给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尔卡狄立刻点起烟来，于是在他身边散出了一种下等烟的又浓又辣的气味，使那个从小就不抽烟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不得不把鼻子掉开，不过他竭力不让他的儿子觉察到，他害怕这个举动会叫阿尔卡狄见怪。

一刻钟以后两部马车停在一所红铁皮屋顶、灰色墙壁的新的木头宅子的台阶前。这便是玛利因诺，它又叫“新邨”，农民却给它起了一个绰号“穷庄”。

四

并没有一大群家仆跑出来到台阶上迎接主人；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出现。在她的后面又从宅子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短号衣，衣上钉着刻了纹章

的白扣子，这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的听差。他不作声地开了有篷轻马车的门，又解开四轮敞篷车的暖帘。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同他的儿子，还有巴扎罗夫，三个人下了车，走过一间黑暗的、几乎完全没有家具的厅子（就在这儿门背后闪出一个年轻女人的脸），进了一间有着最新式陈设的客厅。

"我们现在到家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取下帽子，并且把头发往后一甩。"要紧的是现在应当吃晚饭，就好休息了。"

"吃点儿东西的确是不坏的，"巴扎罗夫说，他伸了一个懒腰，就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不错，不错，我们马上就开晚饭，"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无缘无故地跺脚说，"啊，卜罗科非奇来得刚是时候。"

进来一个六十岁光景的人：白头发，黑瘦的脸，身上穿了一件带铜钮扣的棕色常礼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淡红色的领巾。他笑嘻嘻地走过来，吻了阿尔卡狄的手，又对客人鞠了一个躬，便退到门口，反背着手立在那儿。

"他回来了，卜罗科非奇，"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毕竟回到我们这儿了。……啊，你觉得他怎样？"

"再好没有的了，老爷，"老人说着，又咧开嘴笑了笑，可是他马上皱起他的浓眉来，"您吩咐就开晚饭吗？"他郑重地问道。

"好，好，就开吧，"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回答着，又掉头向客人："您要不要先到您屋子去看看，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

“不要，谢谢；这倒用不着。不过请您叫人把我的手提箱拿到那儿去，还有，我这件衣服也带去，”他说着，便把身上那件外衣也脱下来。

“很好，卜罗科非奇，接住这位先生的大衣。”卜罗科非奇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气用双手接过了巴扎罗夫的衣服，把它捧得高高的，踮起脚走出房去。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又问他的儿子：“阿尔卡狄，你要不要到你屋子里去一下？”

“是的，我倒应该去洗洗脸，”阿尔卡狄答道，他向着房门走去，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人从外面走进客厅来。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国式衣服，系一条时髦的低领结，穿一双漆皮鞋。他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看起来大约有四十五岁。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头发正发着黝暗的光，像新的银子一样；在他那血色不好、但没有一条皱纹的脸上，五官十分端正，而且轮廓分明，就好像是用一把精巧的小凿子雕刻出来似的；这张脸上还留着当年那种惊人之美的痕迹，那一对明亮而漆黑的椭圆形眼睛尤其美。阿尔卡狄的伯父的整个外貌，在贵族的高傲和优雅之外，还保留着青春的和谐，以及一般过了二十岁的人所少有的那种超脱世俗的憧憬。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从裤袋里伸出他那有着粉红色长指甲的好看的手来，这只手给他那扣上单独一颗大猫眼石钮扣的雪白袖口陪衬着，显得更好看了。他把手伸给他的侄儿。他先行了欧洲式的 shake-hands[1]，以后他又照俄国规矩同侄

[1] 英语：握手。——原注

儿亲了三下，这就是说，他用他的洒了香水的小胡子在阿尔卡狄的脸颊上挨了三下，口里说："欢迎。"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把他介绍给巴扎罗夫：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稍微弯了一下他的柔软的身子，并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罗夫，他并不伸手给客人，反而把它放回他的裤袋里去了。

"我倒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他用一种愉快的声音说，亲切地耸了耸肩，同时露出他一嘴漂亮的白牙齿。"路上出了什么事吗？"

"一点儿也没有，"阿尔卡狄答道，"只是我们稍微耽搁了一下。不过我们现在饿得跟饿狼一样。爸爸，请催卜罗科非奇快开晚饭。我马上就回来。"

"等着，我跟你一块儿去，"巴扎罗夫突然从沙发上立起身来说。两个年轻人一路走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阿尔卡沙的朋友，据他说，倒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是不是到我们这儿来作客？"

"是的。"

"这个长头发的家伙吗？"

"唔，是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用他的指甲敲着桌面。

"我觉得阿尔卡狄 s'est dégourdi①，"他说，"我高兴看见

① 法语：活泼起来了。——原注

他回来了。"

在晚饭桌上大家很少讲话，尤其是巴扎罗夫，他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可是他吃得多。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叙述了他在自己所谓农庄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故，又讲起一些就要发布的政府的新法案[①]，还谈到各种委员会，选派代表，以及采用机器的必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饭厅里慢慢地来回走着(他向来不吃晚饭)，有时候他拿起酒杯尝一点儿红酒，偶尔还发出一两声"啊、呵哈！哼！"一类的惊叹。阿尔卡狄讲了一些彼得堡的新闻，可是他觉得有一点儿拘束(通常一个年轻人刚刚脱离小孩时期，又回到人们一向把他当作小孩看待的地方来，他就会有这样一种拘束的感觉)。他讲话故意把句子拉得非常之长，并且避开用"爸爸"这个字眼，有时候他还叫起"父亲"来，不过只是在牙齿缝里含糊地叫了一下，他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只顾把酒往自己的杯子里斟，虽然超过了他的酒量，他还是喝光了。卜罗科非奇不转眼地望着他，嘴唇不停地在嚼动。吃过晚饭大家马上散去了。

巴扎罗夫穿着睡衣坐在阿尔卡狄的床沿上，抽一支短烟斗，对阿尔卡狄说："你那位伯父真是个怪人。想不到在乡下居然有这样漂亮的装束！他的指甲，指甲，你应当把它们送到展览会去！"

"啊，你原来不知道，"阿尔卡狄答道。"他当时还是一个大交际家。哪一天我来把他的事情讲给你听。他从前是一个

---

① 新法案：指两年后即一八六一年公布的农奴解放的法令。

美男子，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女人。”

“啊，真有这回事！他原来在纪念他的过去的风流。可惜这儿没有一个可以给他迷倒的女人。我把他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他那漂亮的硬领就像大理石一样，他的下巴剃得真干净。可是，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

“也许是的，不过他实在是一个好人。”

“一个古董！可是你父亲倒不坏。他浪费时间去读诗，对田产管理的事情却懂得很少，不过他的心是好的。”

“我父亲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

阿尔卡狄摇摇头，好像在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局促不安的样子。

“这些上了年纪的浪漫派真古怪，”巴扎罗夫继续说，“他们拚命发展他们的神经系统……弄得自己老爱激动。可是，再见。我房间里有一个英国洗脸盆①，可是房门却锁不上。不过这究竟是值得鼓励的——英国洗脸盆，这代表着进步啊！”

巴扎罗夫走了。阿尔卡狄觉得非常快乐。睡在自己的家中，躺在睡惯了的床上，盖着一双亲爱的手（这也许是那个亲爱的老奶妈的手，那一双亲切的、温柔的、不知道疲倦的手）所做的被子，这是多甜蜜啊。阿尔卡狄又想起了叶哥罗夫娜，便

① 当时俄国的旧式洗脸盆，脸盆里没有塞子，顶上有一个贮水槽，放水时得踏动下面的踏板。

叹了一口气，祷祝她的灵魂在天上平安……可是他并不为他自己祷告。

阿尔卡狄同巴扎罗夫两个人不到一忽儿的功夫就睡着了，可是这家里还有一些别的人好久都没有睡着。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因为儿子回家，非常兴奋。他躺在床上，并不吹灭蜡烛，却用手支住头，反复地想了好久。至于他的哥哥，过了夜半有好久了，仍然坐在书房里的壁炉前面一张宽大的甘卜士[①] 制造的扶手椅上，壁炉里还有未燃完的煤在燃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还没有脱衣服，只是脚上的漆皮鞋现在换了一双红色的、没有后跟的中国拖鞋。他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Galignani[②]，可是他并不读它；他不转睛地望着壁炉，那儿有一股带蓝色的火焰闪起来，灭了，又再冒上来……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过他所想的并不单是过去的事情：他的脸上带着专注的、忧郁的表情，这就不是一个单单在回忆过去的人的表情了。在靠后面的一间小小的内屋里，一个穿浅蓝色长袖短棉衣的年轻女人坐在一只大箱子上面，她用一方白头帕包住她一头的黑发，这便是费涅奇卡，她一忽儿在倾听着什么，一忽儿在打瞌睡，一忽儿又抬起头看那扇开着的门，门里看得见一个小孩的摇床，还可以听见一个睡熟了的婴孩的均匀的

① 甘卜士(Gambes)：法国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彼得堡开设家具店，制造各种家具。

② 即《加里聂安尼报》，原名“The Galignani's Messager”，是意大利人G.A.Galignani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创办的自由主义的英文日报，有政治、文学、商业各栏。

呼吸。

五

第二天早晨巴扎罗夫起得比谁都早，就到外面去了。“啊，”他向四周望了一望，不觉想道，“这个小地方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把田分给他的农民以后，他只好在一块四亩大小的平坦的荒地上盖自己的新公馆。他修了一所住宅，还修了附属房屋和养畜场，另外又布置了一个花园，挖了一个池子，打了两口井；可是种的小树长得并不好，池子里也没有积多少水，井水又带了一点儿咸味。只有那个丁香和刺槐编的凉亭还长得不错；他们有时候就在这个亭子里喝茶吃饭。巴扎罗夫不到几分钟就走遍了园里的小径；他又看过了牛棚和马房，碰到了两个家仆的孩子，他立刻跟他们做了朋友，三个人一块儿到离这个公馆一里远的小水塘捉青蛙去了。

“老爷，你拿青蛙来做什么用？”一个小孩问道。

“我就要告诉你什么用处，”巴扎罗夫答道，虽然他对身份比他低的人从不放任，并且对待他们也很随便，可是他有一种容易得到那些人的信任的特殊本领，“我要把青蛙剖开，看看它的身子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我跟青蛙是一模一样，不过我们用脚走路罢了，那么我也就会知道我们身子里头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呢?”

“为了有一天,要是你生了病,请我去医治,我免得弄错。”

“那么你是一个医生吗?”

“对啦。”

“瓦司加,听见没有?老爷说你我都是跟青蛙一样的,真古怪!”

“我害怕它们,害怕那些青蛙,”瓦司加说,他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发白得像亚麻一样,光着脚,穿一件带硬领的灰色粗布宽上衣。

“干吗要害怕?难道它们还咬人?”

“得啦,小哲学家们,跳到水里去吧,”巴扎罗夫说。

这个时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也已经起来了,他去看阿尔卡狄,阿尔卡狄已经穿好衣服。父子两个走出屋子到露台上去,坐在凉棚下面;栏杆旁边,桌子上,几大束丁香花中间,一个茶炊[1] 正在沸沸地响。来了一个小姑娘,她就是昨晚在台阶上第一个来迎接他们的。她细声地说:

“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今天不大舒服,她不能够来;她叫我来问您,是您高兴自己斟茶,还是要她差杜尼雅霞来?”

“我自己斟,自己斟,”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连忙接嘴说。“阿尔卡狄,你茶里是放奶油,还是放柠檬?”

---

① 茶炊:俄国特有的铜制茶具,上面煮开水(作泡茶用),下面生火,中间有一根烟囱。

“放奶油吧，”阿尔卡狄答道，停了一忽儿他忽然询问地说：“爸爸？”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慌张地望着他的儿子。

“什么？”他说。

阿尔卡狄埋下眼睛。

“爸爸，要是我问话问得不得体，就请你饶恕我，”他开始说，“可是你自己昨天对我很坦白，所以我才敢坦白地讲话……你不会生气吧？……”

“你说吧。”

“你使我有勇气来问你……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所以费——所以她才不出来斟茶吗？”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稍微掉开脸。

“也许，”他末了说，“她以为……她不好意思。……”

阿尔卡狄急急地看了他的父亲一眼。

“她用不着不好意思。第一，你知道我的想法，（阿尔卡狄说这句话的时候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你想，我对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会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吗？而且我相信你挑选的人不会不好；你既然要她住在你家里来，那么她一定配得上你；无论如何，儿子总不是父亲的审判官——尤其是我，尤其是像你这样的父亲，你从来就没有限制过我的任何自由。”

阿尔卡狄的声音起初微微发颤：他觉得自己很宽大，不过同时他也知道他有一点儿像在教训他父亲似的；可是一个人的声音在他自己身上会发生很大的效力，所以阿尔卡狄说到

最后，声音更坚决了，简直说得有声有色。

“谢谢你，阿尔卡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声音含糊地说，他的手又伸上去摸他的眉毛和前额。“你的猜想实在不错。自然，这个女孩子要是不配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这不是我一时高兴的举动。我跟你讲这个也不大好讲；不过你会明白她实在不便出来见你，尤其是在你回家以后的第一天。”

“那么我去看她吧，”阿尔卡狄又激起一阵宽大的感情嚷道，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我去跟她说明白，她用不着在我面前不好意思。”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

“阿尔卡狄，”他说，“我求你……你怎么能……那儿……我还没有告诉你……”

可是阿尔卡狄并没有听他的话，已经跑出了露台。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望着儿子的背影，感到很窘，又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心跳得厉害。他这个时候是不是想到他们父子中间将来的关系会变得很古怪？他是不是觉得要是他一点儿也不提起这桩事情，阿尔卡狄会更尊敬他？他是不是在责备他自己的过错？——这是很难说的；这些感觉他心里都有，不过还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触，可是他的脸还红着，心也跳得更厉害了。

近旁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阿尔卡狄回到露台上来了。

“爸爸，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嚷道，脸上露出亲爱和得意的神情。“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今天真的不大舒服，她停

一忽儿还会来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一个弟弟呢？本来我昨晚上就该去亲他了，不用等到现在的。”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打算说什么话，他打算站起来，张开他的胳膊。……阿尔卡狄已经抱住了他的脖子。

“这是什么意思？又拥抱起来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从后面送过来。

他这个时候来得正好，父亲和儿子都高兴，因为有些叫人感动的场面是人们很难长久忍受的，他们倒愿意它尽快地结束。

“这有什么奇怪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很高兴地说。“你想一想我等了阿尔卡沙多少年了。……昨天起我还没有时间好好地看他一下。”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就是我自己，也并不是不想跟他拥抱。”

阿尔卡狄走到他的伯父跟前，他又感觉到他的脸颊给伯父的洒过香水的小胡子亲了一下。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他穿了一件很讲究的英国式的晨服，头上戴一顶小小的土耳其帽。这顶土耳其帽和那条随意结起来的小领结都表示着乡村生活的无拘束；可是他的衬衫（这衬衫的确不是白的，因为配着晨服，便穿了有条纹的衬衫）上的硬领还是像平日那样严正地衬出那个剃得很光滑的下巴来。

“你那位新朋友呢？”他问阿尔卡狄道。

“他不在家；他往常都是起得很早，就到外面去了。我们最好不要去管他；他不喜欢礼节。”

“不错，我也看得出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从容地在他的面包上涂着牛油。“他打算在我们这儿久住吗?”

“那要看他的意思怎样。他是打这儿经过，去看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这一省，离这儿有八十里。他在那地方有个小小的田庄。他以前作过军医。”

“哦，哦，哦，哦……怪不得我老是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听见过巴扎罗夫这个姓呢?’……尼可拉，你还记得我们父亲那一个师里头有一个军医巴扎罗夫吗?”

“好像是有的。”

“不错，不错，一定的。那个军医就是他的父亲了。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拉了拉他的小胡子，接着又不慌不忙地问道：“那么，现在这位巴扎罗夫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您问巴扎罗夫是一个怎样的人?”阿尔卡狄微笑道。“大伯，您要我告诉您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好侄儿，请讲吧。”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什么?”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问道，这个时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正拿起一把刀尖上还挑着小块牛油的刀子，也停住不动了。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阿尔卡狄再说一遍。

“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依我看，那

是从拉丁文 nihil(无)来的了;那么这个字眼一定是说一个……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 ?"

"不如说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巴威尔插嘴说,他又在涂牛油了。

"是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阿尔卡狄说。

"这不还是一样的意思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

"不,这不是一样的意思。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你觉得这是好的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插嘴问道。

"大伯,那就看人说话了。它对有一些人是好的,可是对另一些人却很不好。"

"原来是这样。我看,这不是跟我们一道的。我们旧派的人,我们以为要是一个人,照你的说法,不信仰一种'原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照法文读音轻轻地念这个字,把重音放在后面,阿尔卡狄却恰恰相反,把重音放在前面),那么连一步也走不通,一口气也吐不出来。Vous avez changé tout cela,①愿上帝保佑你们健康,给你们将军的官衔吧,② 我们将来只好来欣赏你们这些先生们……那叫做什么呢?"

"虚无主义者,"阿尔卡狄声音很清楚地说。

---

① 法语:你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原注

② 出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第二幕第五场。

"不错。以前是黑格尔主义者①,现在是虚无主义者。我们以后再来看你们怎样在真空中,在没有空气的空间中生存;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弟弟,请你按一下铃,现在是我喝可可茶的时候了。"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按了铃,大声唤着:"杜尼雅霞!"可是来的不是杜尼雅霞,费涅奇卡本人到露台上来了。她是一个二十三岁光景的少妇,白嫩的皮肤,浓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珠,孩子般微微鼓起的红嘴唇,还有一双细嫩的小手。她穿了一件细花布衫子,一条浅蓝色的新领巾松松地披在她的肥圆的肩头。她端着一大杯可可茶,放在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面前,带着十分羞窘的神情。她那美丽脸庞的细嫩皮肤上泛起一阵红晕。她埋下双眼,立在桌旁,指尖微微挨到桌面。她好像在害羞不该来,同时她又好像觉得她有权利到这儿来似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正色地皱紧了眉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露出忸怩不安的样子。

"费涅奇卡,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从牙缝里含糊地说了这一句。

"早,老爷,"她答道,声音不高,却相当清脆。她偷偷瞥了阿尔卡狄一眼,他对她和善地微微一笑,她静悄悄地走开了。她走起路来身子有点摇摆,可是连这一点也跟她相称。

---

① 黑格尔主义者:信仰黑格尔学说的人,有一个时期一般俄国青年都喜欢谈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1770—1831),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

露台上静了几分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喝着他的可可茶，忽然抬起头来。“虚无主义者先生光临了，”他低声说。

巴扎罗夫果然穿过花园踏着花坛走来。他的亚麻布衣裤上沾满了污泥；他的旧圆帽顶上挂着一根水塘里的水藻；他右手提着一个小袋子；袋里有活的东西在动。他很快地走近了露台，点一个头，说道：“各位，早安；对不起，喝早茶我来晚了。我马上就回来；我得先把这些俘虏安顿好。”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蚂蝗么?”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不，是青蛙。”

“您吃它们还是养它们?”

“拿来做实验用的，”巴扎罗夫顺口回答一句，就走进屋子去了。

“那么他是要解剖它们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不相信原则，却相信青蛙。”

阿尔卡狄带着怜悯的神情看他的伯父；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偷偷地耸一耸肩头。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觉得他的俏皮话失败了，便谈起农事和新的总管来，那个总管昨天跑来对他发牢骚，说一个叫做福玛的长工“放荡”，无可救药。他顺便说：“他是一个这样的伊索[①]：他到处对人说自己是个坏人，待上

① 伊索(前620—前560年左右)：著名的希腊寓言家；但在俄国旧时“伊索”这个名称用作讽刺语，用以表示言语费解而行为古怪的人。

一阵，他就会傻得好些。”

六

巴扎罗夫回来，坐在桌子旁边，匆忙地喝着茶。基尔沙诺夫两弟兄默默地望着他。阿尔卡狄在旁边一忽儿偷偷地看他的父亲，一忽儿又偷偷地看他的伯父。

“您出去走得很远吗？”末了，还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开口问道。

“走到白杨林子那边有个小水塘的地方。我惊起了五六只山鹬。阿尔卡狄，要是你，准可以打死它们。”

“那么您不打猎吗？”

“不。”

“您是专门研究物理学的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发问道。

“是的，物理学；一般的自然科学。”

“听说日尔曼人最近在这方面有大的成就。”

“不错，德国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老师，”巴扎罗夫随口答道。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日尔曼人”，不说“德国人”，明明带着讥讽的意味；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您居然把德国人看得这样高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故意装出过于客气的样子。他心里有点儿不高兴了。

他的贵族的气质受不了巴扎罗夫那种极端的随便。这个医生的儿子非但不知道拘谨，并且常常用粗鲁和不愿意的态度回答别人的问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粗野的、甚至近乎无礼的调子。

“那边的科学家都是些能干有用的人。”

“啊，啊。那么您对于俄国的科学家一定不这么看重了。”

“大概是这样的。”

“这倒是很值得人钦佩的谦虚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身子一挺，头向后仰，说道。“不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刚才明明对我们说过，您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那么您是不是相信他们呢？”

“为什么我要承认他们呢？我又应当相信什么呢？他们说的话有道理，我同意，这就完了。”

“那么德国人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脸上带着一种淡漠而疏远的表情，仿佛他已远远地退到云端去了。

“也不尽然，”巴扎罗夫答道，他打了一个短短的呵欠。显然他并不想继续辩论下去。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望了望阿尔卡狄，好像想对他说：“我应当讲，你的朋友真有礼貌。”

“至于我呢，”他勉强接着往下说，“我也许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不喜欢德国人。我讲的还不是俄国的德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一种东西。可是连在德国的德国人我也不喜欢。以前还有几个像样的；他们有过——譬如席勒，还有他叫

什么，……啊，歌德[①] ……我弟弟特别欣赏他们。……可是现在德国人中间全是些化学家和唯物主义者……”

“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诗人还有用，”[②]巴扎罗夫说。

“哦，原来是这样，”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应道，他好像快要睡着了似的，微微抬起他的眉毛来。“我看，您是不承认艺术的了？”

“赚钱的艺术或者‘医好痔疮’[③] 的艺术！”巴扎罗夫带着轻蔑的微笑说。

“啊，先生，啊，先生。我看，您真喜欢开玩笑。那么您一切都不承认了？好吧，那么您就只相信科学？”

“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什么都不相信；您所谓的科学是什么呢——是指那一般的科学吗？某一种某一门的科学是有的，就跟某一种行业，某一种职位一样；可是所谓一般的科学却并不存在。”

“很好，先生。那么对于其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业经公认的法则，您也是抱着同样否定的态度吗？”

“这是什么，是在审问么？”巴扎罗夫问道。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脸色略转苍白。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觉得他应当插进去讲话了。

“我们过些日子再跟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吧，亲爱的叶夫

---

① 席勒（1759—1805）及下文的歌德（1749—1832）：都是德国诗人。

② 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任何一个诗人都有用二十倍。”

③ 这是卖药广告。

盖尼·瓦西里以奇；我们要听听您的意见，我们自己也有些意见发表。拿我个人来讲，我知道您在研究自然科学，我非常高兴。我听见人说利比黑[1] 在田地施肥这方面有过很了不起的发见。您在农业方面是可以给我帮忙的；您可以给我一些有益的意见。"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我愿意效劳；可是利比黑离我们还远得很！一个人应当先学会了字母，然后才拿起书来念。我们现在连头一个字母都还没有念。"

"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心里想道。"不过还是请允许我随时向您请教吧，"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大声说；然后他又转身向他的哥哥："哥哥，我想，我们现在应当去跟总管谈话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他说，眼睛并不看什么人，"一个人离开了那些才智非凡的人，到乡下住了五六年，真是不幸极了！你立刻就变成傻子了。你竭力想不要把你学会的东西忘掉，可是——一转眼！——别人就会向你证明，那些都是废物了，他们还告诉你，有见识的人早已不弄这种无聊的东西，而且还说你是个落后的老顽固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年轻的人自然比我们聪明得多。"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开了；尼

① 利比黑(1803—1873)：德国化学家，他提出所谓植物的矿物营养原理并指出矿物肥料的作用。

可拉·彼得罗维奇跟在他后面。

“他老是这样的吗?”那两弟兄刚把房门掩上,巴扎罗夫若无其事地问道。

“我要说,叶夫盖尼,你对他太不客气了,”阿尔卡狄说。“你得罪他了。”

“怎么,难道要我去恭维他们,恭维这些乡下贵族吗!这不过是虚荣心、大交际家的派头和纨袴子弟的习气罢了。既然他是那样的脾气,他就该在彼得堡继续过他那种生活。……可是,不用去讲他了!我找着了一种很少有的水甲虫,Dytiscus marginatus[①],你知道它吗?我等一忽儿给你看。”

“我答应过把他的历史告诉你,”阿尔卡狄说。

“甲虫的历史吗?”

“啊,得啦,叶夫盖尼。是我伯父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他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他应当受人怜悯,不该给人嘲笑。”

“我不跟你辩驳;不过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

“叶夫盖尼,一个人要公平才好。”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结论?”

“不,听我讲……”

阿尔卡狄把伯父的历史告诉了他。这个,读者在下一章里就会找到。

---

① 拉丁文学名:榜螂。

七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最初和他的兄弟一样在家里念书，后来才进了贵胄军官学校①。他自小便以漂亮出名；而且他很有自信力，有点儿喜欢挖苦人，有时又爱发点儿不讨人厌的小脾气——因此他很能讨人欢喜。自从他获得军官官衔以后，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他处处受到欢迎，他尽情地放任自己，甚至流于放荡、荒唐，干出种种傻事，可是这些举动在他身上也增加了不少动人之处。女人为他着迷，男人称他为纨袴子弟，却又在暗中妒忌他。我们已经提过，他当时和他的兄弟同住在一处，他真心爱他的兄弟，虽然他们完全不像。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腿有点儿瘸，他那细小、和悦的面貌常带忧愁，他有一对小小的黑眼睛和一头稀疏的软发；他贪懒，但也喜欢读书，可是在交际场中却显得拘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没有一个夜晚在家；他的聪明和大胆出了名（他把体操介绍到一班贵族子弟中间，使它成为一种时髦的娱乐）；他至多读过五六本法文书。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上尉；一个光辉的前程在等待他。可是突然间一切都改

① 贵胄军官学校：校中学生名额限定一百五十人（大都是宫廷亲贵的子弟）。这个特权学校兼有两种性质，即有着特别权利的陆军学校，与直属于皇室的宫廷学校。毕业试验及格的人，可以到自己选择的联队或近卫军中作一个军官，并不管这个军队里有没有空额。

变了。

那个时期在彼得堡的交际场中偶尔可以看到一位P公爵夫人，她至今还没有让人忘记。她有一个教养高、有礼貌而略带愚蠢的丈夫，却没有儿女。她一忽儿出国远游，一忽儿又回到俄国，过着一种古怪反常的生活。大家都说她轻佻，喜欢卖弄风情，她对每一种娱乐都热心得不得了，跳舞跳到精疲力尽快要倒了下去，她喜欢跟年轻人一块儿尽情地笑闹，她通常总是在午饭时间以前在她的阴暗的客厅里[1]接待这些年轻客人；可是到了夜深，她便哭着，祷告着，一点儿也得不到安宁，常常痛苦地绞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到天明，或者脸色苍白，浑身发冷，坐在那儿读赞美诗集。可是一到白天，她又变成一位华贵的夫人；她又出去拜客，随处谈笑，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她稍稍解闷，她便投身到那里面去。她生得长短合度，一条金色的发辫像黄金那样沉沉地一直垂到膝边。可是她并不能说是一个美人：在她的整个面貌中只有一对眼睛是好的，而且连这一对并不算大的灰色眼睛也不是恰好的，但她的眼光却是敏速、深沉，而且随便到了大胆的程度，沉思到了悒郁的程度——这是一种谜样的眼光。即使她口里絮絮地谈着无聊的空话，她的眼中仍然闪着异样的光辉。她打扮得十分雅致。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一个舞会里遇到她，同她跳了一回玛组卡舞[2]，虽然在跳舞的时候她没有讲过一句正经话，他却热烈地

① 在彼得堡冬天下午三点钟天就黑了。

② 玛组卡舞：当时流行的一种波兰交际舞。

爱起她来。在爱情上他是常操胜算的，这一回他也是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可是他的轻易的成功并不曾减低他的热情。这反而把他更紧地，而且更牢地缚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就是在把整个身子交给他的时候，仍然有什么深藏着的、捉摸不到的东西保留着，那却是人所看不透的。她的灵魂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那只有上帝知道！她似乎受着一些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神秘的力量的支配，它们好像在任意玩弄她；她的有限的智力还不能够控制它们那种反复无常的脾气。她的一切举动不过是一连串的矛盾。她的唯一可以引起她丈夫疑心的几封信却是写给一个跟她并不熟的男人的，她的爱情里面带得有一种悒郁的成分；遇到她自己挑选的情人，她跟他在一块儿并不笑，也不闹着玩，她只是带着惊奇的神情望着他，听他讲话。有时候，往往是突然间，这种惊奇变成了寒冷的恐怖；她的脸上现出一种疯狂的、死一样的表情；她把自己锁在寝室里面，她的女用人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偷听，还听得见她那忍住的哭声。不止一次，基尔沙诺夫在幽会之后走回家去，他心里感到一种伤心、痛苦的烦恼，那是只有在无可挽救的失败以后才能够发生的。"我还希望什么呢？"他这样问他自己道，他的心一直在痛。有一回他送给她一只戒指，宝石上面刻着一个斯芬克司①。

"这是什么？"她问道。"斯芬克司吗？"

① 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

"是的，"他答道，"这个斯芬克司就是您。"

"我？"她问道，慢慢地抬起她那谜样的眼光望着他。"您知道这是大大的恭维吗？"她毫无用意地微微一笑，她的眼睛仍然闪着那奇异的光辉。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P公爵夫人爱他的时候，已经感到痛苦了；可是到她对他渐渐冷淡起来（这桩事情来得很快）以后，他差一点儿发了狂。他非常痛苦，又怀着满腔妒意，他不给她一点儿安静，老是跟在她后面。她终于受不了他这种无止息的追逐，便远去外国。他不听从朋友们的苦劝和长官们的忠告，辞去了军职，一直追她到国外；他在外国各处奔跑了四年光景，有时紧跟着她的踪迹，有时又故意让她跑开。他为他自己害羞，他恨自己软弱没有志气……可是毫无用处。她的面影，那个难理解的、差不多毫无意思的、但又是迷人的面影已经深深地藏在他的心中。在巴登他又跟她和好了，而且她似乎比以前更热情地爱他……可是不到一个月，一切都完了，火焰闪起最后的亮光，便归于永灭。他预料着分离不可避免，便想退一步跟她做一个朋友，他还以为跟这种女人做朋友是可能的事。……她秘密地离开了巴登，这以后便永远躲避基尔沙诺夫。他回到俄国，还想重过旧日的生活；可是他不能够回到从前的轨道上去了。他四处飘荡，好像是一个中魔的人；他仍旧到交际场中去；他仍旧保留着上流人物的那一切的习惯；他可以夸口他有了两三次新的恋爱上的成功；可是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存一点儿指望了，他什么事也不做。他渐渐地老了，头发也灰白了；每天晚上坐在俱乐部里，悒郁无聊

地消磨光阴，没精打采地参加独身者群的辩论，这成了他的必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好的现象。自然，关于结婚问题，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这样地过了十年，十年的无色彩、无结果的岁月——而且过得那么快，可怕地快。拿光阴飞去的迅速来说，可没有一个地方赶得上俄国；不过人说在监牢里光阴飞去得更快。某一天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俱乐部里吃午饭，听到了 P 公爵夫人的死讯。她半疯狂地病死在巴黎。他离开餐桌站起来，在俱乐部的屋子里踱了许久，又呆呆地立在牌桌旁边，可是他并不比往常更早地回家去。过了一些时候他接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他送给公爵夫人的戒指。她在斯芬克司上面划了两根像十字架的线，并且叫人转告他：谜语的答案就是——十字架。

这桩事情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年初，正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死了太太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自从他弟弟搬到乡下去以后就很少看见他；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结婚的时间刚巧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同公爵夫人初认识的时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从国外回来，去看他弟弟，他打算在他弟弟家里住两三个月，分享他弟弟的幸福，可是也只能勉强住了一个星期。这两兄弟的处境太不同了。在一八四八年，这种差异便减少了一些：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失掉了他的妻子，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失掉了他的回忆，自从公爵夫人死去以后他就竭力不去想她了。可是在尼可拉，却有一种并不曾虚度这一生的感觉，他眼看着儿子长大起来了；在巴威尔，跟这相反，他仍然是一个孤寂的独身者，如今正踏进了暗澹的黄昏时期，

也就是那个追悔类似希望、希望类似追悔的时期，这个时候青春已经消逝，而老年还没有到来。

这个时期对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比对于任何别一个人更难过：他失掉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一切。

"我现在不请你去玛利因诺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对他的哥哥说（他给他的村庄起了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的妻子），"我妻子活着的时候，你还嫌那儿枯燥无味，现在我想你一定会无聊死了。"

"我那个时候又傻又不安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从那回以后，我即使没有变聪明一点儿，也该变得沉静一点儿。现在恰恰相反，要是你答应让我去，我倒真打算到你那儿久住。"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用拥抱来回答他；可是又过了一年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才下决心实行他的计划。不过他在乡下住了下来，就不曾离开过，就连那三个冬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到彼得堡去和儿子同住的时候，他也依然留在乡下。他开始读书，读的大半是英文书；他的生活大体上也摹仿英国的方式，很少去拜访邻居，只有在选举[①]的时候他才出去参加，不过在会场上他也极少发言，只偶尔讲几句话，他那自由主义的言论就惹得那班旧式的地主又生气又害怕，可是他同年轻一代人的代表们却又并不接近。新旧两方面的人都给他加了一个"自高自大"的评语；不过两方面都尊敬他，为了他那优美

---

① 指选举首席贵族。

的贵族风度；为了他那恋爱上胜利的名誉；为了他一身穿得很漂亮而且总是住最好的旅馆、开最好的房间；为了他一向吃得很考究，而且有一次居然在路易·菲力浦[1] 的宫中与威灵吞[2]同席；为了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随身携带着一套真正银制的化装用具和一个旅行用的轻便澡盆；为了他的身上常常有一种特别好的“高贵的”香气；为了他打威斯特[3] 打得极好，却没有一回不输钱；末了，他们尊敬他也是为了他的绝对的诚实。太太们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忧郁病患者，可是他却不肯同她们往来。……

“你现在看出来了吧，叶夫盖尼，”阿尔卡狄把故事讲完以后又说，“你刚才批评我伯父的话是怎样地不公平了。我还不必说他不止一次帮忙我父亲渡过了难关，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我父亲（也许你还不知道他们并没有分家）；对不论什么人他都高兴帮忙，他还常常替农民讲话；固然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总是皱眉头而且时常闻香水……”

“不用说，神经过敏……”巴扎罗夫插嘴说。

“或许是，不过他的心是很好的。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傻。他给了我不少非常有益的劝告，尤其是……尤其是关于女人这方面的。”

“哈！哈！一个人让自己的牛奶烫伤了，看见别人的凉水

---

① 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国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逃往英国。

② 威灵吞（1769—1852）：英国将军，滑铁卢之役战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

③ 威斯特：四人成局的一种牌戏。纸牌五十二张，两人为一组。

也要吹两下，[1]我们都知道的！”

“总之，”阿尔卡狄继续说，“他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这是真话；要轻视他，是一桩罪过。”

“谁轻视他？”巴扎罗夫答道。“可是我应该说，一个人把他整个的一生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头赌博，那张牌输了，他就那样地灰心丧气，弄得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这种人不算是一个男子，不过是一个雄的生物。你说他不幸，你自然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脑子里那些糊涂念头还没有完全去掉。我相信他倒认真地觉得自己很能干，只是因为他有时候看看那种无聊的《加里聂安尼报》，而且每一个月替农民讲一回情，让他少挨一顿鞭子。”

“可是你要记住他的教育和他生活的时代，”阿尔卡狄说。

“教育吗？”巴扎罗夫反驳道，“每个人都应该教育自己，譬如就像我这样。……至于时代呢，我为什么要依靠时代？还不如让时代来依靠我。不，老弟，那全是浅薄、空虚！而且所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东西。你研究一下眼睛的解剖学：你刚才所说的谜一样的眼光是从哪儿来的呢？那都是浪漫主义、荒唐无稽、腐败同做作。我们还是去看甲虫吧。”

这两个朋友便到巴扎罗夫的屋子里去了，这间屋子里已经弥漫着一种外科医药的气味，还夹杂了一些廉价烟草的臭味。

---

① 俄谚：“给热牛奶烫了的人，见到冷水也要吹两下。”

八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他的兄弟跟总管讲话的时候，不过在旁边听了一忽儿。总管是一个瘦长身材的人，有着肺病患者的轻柔的声音和一对狡猾的眼睛，他对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无论什么话，总是回答着："是，老爷。知道，老爷。"他用尽方法把农民说成不是小偷，便是醉鬼。田产的管理最近算是采用了新的方法，可是行起来，却好像没有上油的轮子，老是轧轧地发响，又好像用湿木料自制的家具，时时咯吱作声。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并没有灰心，可是他常常叹气，老是想来想去；他觉得没有钱做不了事情，他的钱又差不多花光了。阿尔卡狄讲的的确是真话：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帮助他的兄弟并不止一次；好几回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看见他的弟弟绞尽脑汁在想办法，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他就慢慢地走到窗前，把手伸进袋子里，从牙齿缝里轻声说："Mais je puis vous donner de l'argent，"[①]把钱给了他；可是这一天他自己也没有钱，他觉得还是走开的好。田产管理上的琐碎事情使他厌烦了，而且他时常觉得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不管怎样热心，怎样勤劳，却总没有把事情安排得好，不过他也不能明白地指出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我的弟弟还是不够能干，因

① 法语：不过我可以给你些钱。——原注

此容易受人欺骗，”他这样猜想道。而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却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事务才干看得非常之高，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的日子大半是在乡野地方消磨了的，你见过不少的世面，来往的人也很多，不会没有一点儿经验，你看得透人，你有老鹰的眼光。”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回答只是掉转身子，可是他也并不反驳他兄弟的话。

这天他离开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书房，顺着那一条把宅子隔成前后两部分的走廊信步走着；他走到一扇矮矮的门前，便站住了，他迟疑了一忽儿，才拉一拉他的小胡子，轻轻地敲着门。

“谁呀？请进来，”这是费涅奇卡的声音。

“是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推开了门。

费涅奇卡正抱着她的小孩坐在椅子上，她立刻站起来，把孩子交给一个小姑娘，小姑娘马上抱着孩子出去了，她连忙拉直她的领巾。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并不看她，“我只是来求您，……好像今天有人进城去……请您吩咐他们给我买点儿绿茶。”

“是的，老爷，”费涅奇卡答道：“您要他们买多少呢？”

“我想半磅就够了。我看您这儿改了样了，”他接着说，匆匆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他的眼光也在费涅奇卡的脸上掠过。“这儿的窗帘，”他看见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解释道。

“哦，是的，老爷，这些窗帘，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给我的；可是也挂了好久了。”

“不错，我也有好久没有来看您了。现在您这儿收拾得很精致。”

“全亏得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照顾，”费涅奇卡小声地说。

“您在这儿比在从前住的那间耳房里舒服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客气地问道，不过他的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

“是的，老爷，舒服得多。”

“现在谁住在那儿？”

“洗衣女人住在那儿。”

“啊！”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不作声了。“他现在会走开吧，”费涅奇卡想道；可是他并不走，她像生根似地立在他面前，轻轻地扭着自己的手指头。

“您怎么把您的小孩儿打发走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末了说。“我喜欢小孩儿：给我看看吧。”

费涅奇卡又是窘，又是高兴，脸色马上通红。她平日害怕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他难得同她谈过话。

“杜尼雅霞，”她唤道，“请把米奇亚抱来。（费涅奇卡对宅子里的任何人都是很客气的。）可是等一下，他得先换一件衣服。”

费涅奇卡向着门走去。

“那没有关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

“我马上就回来，”费涅奇卡答道，便匆匆走出去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一个人留在房里，这次他特别注意地

向四周看了一忽儿。这间矮小的屋子倒是很清洁、很舒适的。可以闻到新油漆的地板的气味,还有一种甘菊和紫苏的味儿。靠墙放了一排有着古七弦琴样式的靠背椅子,还是那位去世的将军出征波兰的时候买来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小床,挂着一顶薄纱帐子,旁边放了一个有圆顶盖的铁箱。在对面的那个角里挂着一幅大的、颜色暗淡的“奇迹创造者”圣尼可拉的像,像前燃着一盏小小的灯;一条红带子系住一个小小的磁蛋,从圣像头顶的金色光轮上一直垂到胸前;窗台上有几个玻璃罐子发着绿光,里面盛着去年做好的蜜饯,罐口密密封着;封皮纸上是费涅奇卡亲笔写的大字:“醋栗”。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特别喜欢这一类的蜜饯。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根长绳子,挂了一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短尾巴的金翅雀,它不住地叫着跳着,笼子也跟着不住地摇来晃去,这其间一粒一粒的大麻子轻轻地落在地上。在两扇窗中间的一堵壁上,刚巧在一个带抽屉的小柜子上面,挂着几张照得不好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姿势不同的像片,是一个外来的照相师摄的;那儿还有一张费涅奇卡本人的像片,照得更不像样了;一个暗黑的框子里面有一张没有眼睛的脸,带着不自然的微笑,此外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了;在费涅奇卡的照片上头是叶尔莫洛夫将军① 的画像,他穿着一件毛大氅,怒容满面地望着远远的高加索山脉,一个鞋形的丝质小针垫正挂到他的前额上。

① 叶尔莫洛夫(1772—1861):参加过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

过了五分钟光景，听见隔壁房里衣服的窸窣声和细语声。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那个带抽屉的柜子上拿起一册带油垢的马沙尔斯基的《狙击手们》[①] 的残本，翻了几页。……门开了，费涅奇卡抱了米奇亚进来。她给他穿上一件领子上带花边的红衬衫，她还给他把头发梳光，脸洗干净；他跟所有的健康的小孩一样，呼吸声很响，全身都在动着，一双小手不停地在空中舞动。这件漂亮的衬衫在他身上显然发生了效力，他的整个圆圆的小脸上都带着愉快的表情。费涅奇卡也已梳好她的头发，把她的领巾也理得更好看些；其实她照原先那样也就行了。难道世界上真还有比一个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一个健康的小孩更动人的景象吗？

"多胖的小家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做出喜欢的样子说，一面用他的食指的长指甲尖搔米奇亚的双重下巴。小孩不转眼地望着金翅雀，吃吃地笑起来。

"这是伯伯，"费涅奇卡说，她俯下脸去挨他，轻轻地摇着他，杜尼雅霞把一支正燃着的香烛放在窗台上，下面垫一个小铜板。

"他有几个月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六个月了；到这个月十一便是七个月。"

"不是八个月吗，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杜尼雅霞略微胆怯地插进来说。

① 《狙击手们》：马沙尔斯基（1802—1861）作的历史小说，一八三二年出版。

“不，七个月；怎么说是八个月呢？”小孩又在吃吃地笑了；他对着箱子望了一忽儿，忽然伸起五根小指头抓住他母亲的鼻子和嘴。“顽皮的小东西，”费涅奇卡说，却并不把脸躲开。

“他像我的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

“不像他还能够像谁呢？”费涅奇卡想道。

“是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继续说，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似的，“实在像得很。”他注意地、而且差不多是忧郁地望着费涅奇卡。

“这是伯伯，”她又说一次，不过声音很轻。

“啊！巴威尔！原来你在这儿！”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来。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连忙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可是他的弟弟带了那么快乐、那么感激的表情望着他，他也不能不回答弟弟一个微笑。

“你这个孩子真不错，”他说，又看了看他的表。“我顺便进来讲一下买茶叶的事。”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装出淡漠的神情立刻走出了这间屋子。

“是他自己走来的吗？”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问费涅奇卡道。

“他自己来的，老爷；他敲了门，就进来了。”

“好的，阿尔卡狄又来看过你没有？”

“没有。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我是不是搬回耳房去好些？”

“为什么要这样?”

“我在想:是不是现在暂时搬一下要好一些。”

“不,”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摸着他的前额,吞吞吐吐地说。“要搬就该早搬。……喂,小胖子,你好呀!”他说着,忽然兴奋起来,走近小孩,亲他的脸蛋;随后他略略俯下身子,用力吻着费涅奇卡的手,这只手衬着米奇亚的红衬衫,越显得像奶一样地白了。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费涅奇卡轻轻地说,她把眼睛埋了下去,然后又慢慢地抬起来。在她埋着头、两眼偷偷地向上看的时候,她温柔地略带一点儿傻气地微笑着,眼睛的表情是十分动人的。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是这样跟费涅奇卡认识的。大约在三年前他有一回在一个远方小县城的客店里住了一夜。他住的房间很清洁,床上被褥也很干净,这使他大为惊奇。他想,这儿的女主人一定是一个德国人吧? 可是她却是一个俄国人,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太婆,衣服整齐干净,相貌端正,聪明懂事,讲话也很大方 。他在喝茶的时候同她谈了一阵话;他非常喜欢她。那个时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刚刚搬进了他的新家,不想把农奴留在宅子里使唤,他正要雇用仆人;而客店女主人又在抱怨来往客人的稀少和日子的艰难,所以他就请她到他家去当管家,她答应了。她的丈夫去世已久,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费涅奇卡。两个星期以后阿利娜·沙维希娜(这是新管家的名字)便带了她的女儿到玛利因诺来了,她们住在那间小小的耳房里。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果然没有看错人,阿

利娜把他的家收拾得很有条理。至于费涅奇卡呢，那个时候她已经十七岁[1]，没有人讲起她，也很少有人看见她；她安安静静地住在那儿，只有在星期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才在本区教堂里某一个角上看到她那张白净脸庞的秀美的侧面。一年多的时光就这样地过去了。

有一天早晨阿利娜来到他的书房，照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她问他有没有方法医治她的女儿，因为炉子里一粒火星爆进她的眼睛里去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和所有那些不常出门的乡绅一样，研究了一点儿医术，他甚至于买来了一个顺势疗法[2] 的药箱。他马上叫阿利娜把病人带来。费涅奇卡听见主人叫她去，她非常害怕；不过她还是跟着母亲来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把她引到窗前，双手捧起她的头。他把她的红肿的眼睛仔细诊察了一番，马上亲自给她配了一种眼药水，他又把他的一块手绢儿撕开，教给她怎样湿敷。费涅奇卡听完他的话，便要走了。"傻丫头，你还没有亲主人的手呢！"阿利娜对她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并没有把手伸给她，他一时慌张，反而自己在她那埋着的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吻了一下。费涅奇卡的眼睛不久就好了，可是她留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印象却没有这样快地消失。那个纯洁、秀丽的含羞微举的面颜时时闪进他的脑中；柔软的头发仿佛还留在他的掌上；在

---

① 作者在第五章里说费涅奇卡是"二十三岁的少妇"，这里又说"三年前……她已经十七岁"，显然把她的年龄算错了。事实上费涅奇卡或者只有二十岁，不然尼可拉便是在六年前看见她的。

② 顺势疗法：用健康人吃了会生一种病的药去医治同病的病人的治疗法。

他的眼前现出了那两片天真微启的嘴唇，两排珍珠似的牙齿在阳光里灿烂地发亮。以后在教堂里他便非常留心地看她，并且想法跟她谈话。起初她看见他总是害羞，一天傍晚她在麦田里一条行人走出来的窄小的路上遇到他，她连忙跑进长满矢车菊和苦艾的又高又密的裸麦丛中，免得同他见面。他在麦穗的金黄色的网眼中瞥见了她的小小的头，她正探出头来张望，就像一只小动物似的，他和蔼地对她大声说：

“晚安，费涅奇卡！我并不咬人啊。”

“晚安，”她低声说，却并不从藏身的地方站出来。

她渐渐地同他熟了，不过她在他面前仍然有点儿不好意思，可是她的母亲阿利娜忽然害霍乱症死了。费涅奇卡应当安置到哪儿去？她从母亲那儿得到那种喜欢整齐、谨慎、体面的性情；可是她太年轻了，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自己也很和善又会体贴……其余的就用不着说了……

“那么是我哥哥进来看你的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问她道。“他敲了门，就进来了吗？”

“是的，老爷。”

“啊，这很好。让我来把米奇亚摇一下。”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把米奇亚抛得很高，几乎碰到了天花板，使得小孩非常高兴，母亲十分着急，每一回孩子给抛起来，她就伸出手去接他的小小的光腿。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回到他的雅致的书房里去了，这儿的墙壁用漂亮的青灰色的纸糊着，壁上钉了一条彩色的波斯毛

毯，上面挂着一些兵器；家具全是胡桃木做的，还蒙上一层深绿色的天鹅绒；一个 renaissance①的书架是用老的黑橡木做的，华贵的书桌上面放了几个小小的铜像，还有一个壁炉。他坐倒在沙发上面，两手扶着后脑勺，一动也不动，差不多带了绝望的神情望着天花板。不知道他是想隐藏他脸上的表情，不让四周的墙壁看见呢，或者还是为了别的缘故，他站起来，把那厚厚的窗帘放下，便又倒在沙发上坐了。

九

就在这同一天巴扎罗夫也跟费涅奇卡认识了。他同阿尔卡狄一块儿在园子里散步，一面给他讲解为什么有一些树木，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橡树长得不好的道理。

"你们应该在这儿多种些白杨同枞树，菩提树也行，多加一点儿肥泥黑土。凉亭那边的花倒长得不错，"他又说，"因为那是刺槐同丁香；它们都是好孩子，那些树，它们并不要人照料。喂！那儿还有人。"

在凉亭里坐着的是费涅奇卡同杜尼雅霞，还有米奇亚。巴扎罗夫站住了，阿尔卡狄像一个熟朋友似地向费涅奇卡点了点头。

"那是谁？"他们刚刚走了过去，巴扎罗夫立刻问道。"一

① 法语：文艺复兴时代的式样。——原注

个多漂亮的美人儿!"

"你在讲谁?"

"你知道的;只有那一个生得漂亮。"

阿尔卡狄有点儿不好意思,简简单单地跟他说明白费涅奇卡是什么人。

"哈哈!"巴扎罗夫说,"你父亲的眼光的确不错。我喜欢他,你父亲,嘻嘻! 他倒真有本领。可是我也得跟她认识认识,"他说了最后一句,就转身向凉亭走去。

"叶夫盖尼!"阿尔卡狄惊慌地在后面唤道,"千万要小心啊。"

"你不要着急,"巴扎罗夫说,"我会知道怎样做——我又不是一个乡下人。"

他走到费涅奇卡面前,摘下了帽子。

"让我来介绍自己,"他说,客气地鞠了一个躬。"我是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的朋友,我是一个温和的人。"

费涅奇卡从凳子上慢慢地站起来,望着他不说一句话。

"多么出色的小孩儿!"巴扎罗夫继续说,"不要担心,我的眼光还没有给人带来过灾难。他的脸蛋为什么这样红? 他是在出牙吧?"

"是的,先生,"费涅奇卡说,"他已经出了四颗牙齿了,现在他的牙龈又肿起来了。"

"让我来看看,不要害怕,我是一个医生。"

巴扎罗夫把小孩抱了过来,小孩并不挣扎,也不害怕,费涅奇卡同杜尼雅霞两人都很奇怪。

“看见了，看见了……不要紧，都很好，他将来有一副很好的牙齿。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好了。您自己身体很好吗？”

“很好，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真的——那是很要紧的。您呢？”他转身问杜尼雅霞道。

杜尼雅霞，这个姑娘在主人的宅子里非常拘谨，出了大门就爱嘻嘻哈哈，她不答话，只是格格地笑。

“好，这很好。这儿是您的大力士①。”

费涅奇卡把小孩抱在怀里。

“他在您的手里倒是挺乖的，”她小声地说。

“小孩儿在我手里都挺乖，”巴扎罗夫答道：“我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们。”

“小孩儿也知道谁爱他们，”杜尼雅霞插嘴说。

“真是这样，”费涅奇卡同意说。“就是米奇亚，不论怎样他也不要有些人来抱他。”

“他要不要我抱，”阿尔卡狄问道，他远远地站了一忽儿，现在走到凉亭里来了。

他想把米奇亚哄到他怀里来，可是米奇亚把头一仰，哭起来了，弄得费涅奇卡很不好意思。

“下一回，等他跟我熟了再来抱他吧，”阿尔卡狄不在乎地说，这两个朋友便转身走了。

---

① 大力士：这里指俄国民间传说和史诗中的身高力大的英雄。

"她叫什么名字?"巴扎罗夫问道。

"费涅奇卡……费多西雅,"阿尔卡狄答道。

"她的父名呢? 我也得知道这个。"

"尼可拉叶夫娜。"

"Bene①。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并不太害羞。说不定会有人觉得她这一点是一个毛病。废话! 她为什么要害羞呢? 她是一个母亲——那她就不错。"

"她不错,"阿尔卡狄说,"不过我父亲……"

"他也不错,"巴扎罗夫打岔道。

"唔,不,我不这样想。"

"我想你不高兴多添了一个承继产业的人吧?"

"你怎么好意思想我会有那种心思!"阿尔卡狄生气地说,"我不是因为那个缘故说父亲不对;我以为他应该跟她正式结婚。"

"哼! 哼!"巴扎罗夫从容地回答道。"我们的器量真大! 原来你还把结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我倒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

这两个朋友默默地走了几步。

"你父亲的产业我全看过了,"巴扎罗夫又说。"牛是不好的,马也不中用。房屋东偏西倒,工人懒得没办法;只有那个总管究竟是一个傻瓜还是坏蛋,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你今天就专挑错处,叶夫盖尼·瓦西里叶维奇。"

① 拉丁文:好。——原注

“那些好心的农民毫无疑问地都在欺骗你的父亲。你知道有一句俗话：‘俄国农民连上帝也会欺骗的。’……”

“我现在倒有点儿赞成我伯父的意见了，”阿尔卡狄说，“你的确瞧不起俄国人。”

“那有什么关系呢！俄国人的唯一好处就是最瞧不起自己。重要的是二乘二等于四，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那么大自然也无关紧要吗？”阿尔卡狄说，他带了思索的表情望着远处颜色鲜丽的田野，落日的美丽柔和的霞光正照在那儿。

“你所理解的大自然的确也是无关紧要。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

这个时候，一阵大提琴的拉长的音调从宅子里飘到他们的耳边来。有人在奏舒伯特① 的《期待曲》，虽然不娴熟，却也能传达出一些情感。旋律带着蜜似的甜味在空中荡漾。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惊讶地问道。

“这是我父亲。”

“你父亲会拉大提琴吗？”

“是的。”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四十四。”

巴扎罗夫突然大笑起来。

---

①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浪漫主义的抒情歌曲、浪漫主义的交响曲和钢琴小型曲的创始者。

"你笑什么?"

"真的,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位 pater familias[①],在这个偏僻的小县——拉大提琴!"

巴扎罗夫一直笑着;阿尔卡狄平日虽然非常尊敬他的老师,可是这一次他却连笑脸也没有露一下。

一〇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的光景。玛利因诺的生活还是跟往常一样,阿尔卡狄整天闲着、玩着,巴扎罗夫认真地工作。宅子里每个人都跟巴扎罗夫熟了,他们也习惯了他那随便不羁的态度和他那简短的、不连贯的谈话。费涅奇卡尤其同他熟,因此有一个晚上她居然差人去叫醒他:米奇亚得了惊风症;他去了,还是像平日那样,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打呵欠,在她那儿过了两个钟点,把孩子治好了。在另一方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却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罗夫,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傲慢、无礼、爱挖苦人的平民;他疑心巴扎罗夫并不尊敬他,而且还有点儿轻视他——他,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也有点儿害怕这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还担心他给阿尔卡狄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好的;可是他很喜欢听他讲话,并且高兴去看他做物理的和化学的实验。巴扎罗夫带来一架

---

① 拉丁文:家长。——原注

显微镜，他一用显微镜，就是几个钟点。用人们也喜欢他，虽然他常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他究竟不是一个主人，却是他们的同类。杜尼雅霞常常要对他傻笑，她"像一只鹌鹑似地"跑过他身边的时候，还带着深意地偷偷看他；彼得是一个极端自负而又愚蠢的人，他永远皱着眉头，他全部的长处便是他外表很有礼貌，他还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出音来念书报，并且很勤快地刷他自己的衣服，——就是他，只要巴扎罗夫注意到他，他也立刻满脸堆笑，露出喜色来；家仆的小孩们简直像小狗一样地跟在这个"医生"后面跑。卜罗科非奇老人是唯一不喜欢他的人；他每回给他上菜，总要露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叫他做"屠户"和"骗子"，还说他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看起来倒像灌木丛中一口猪。卜罗科非奇，就他自己说，是有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一样多的贵族气味的。

一年里的最好的日子来了，这就是六月初旬。天气非常好；固然，远地方正闹着霍乱症，可是那一省的居民对于它的光临已经习惯了。巴扎罗夫起得非常早，出去走两三里，并不是去散步（他受不了那种毫无目的的散步），却是去采集草和昆虫的标本。有时候他约了阿尔卡狄同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常常发生争论，虽然阿尔卡狄话说得更多，可是往往是他失败。

有一天他们在外面耽搁得太久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到花园里去找他们，他走到凉亭前面，忽然听见两个年轻人的急促的脚步声和讲话声。他们在凉亭的那一面走着，不能够看见他。

“你还不够了解我父亲,”阿尔卡狄说。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便藏起来。

“你父亲是个好人,”巴扎罗夫说,“可是他落后了,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注意地听着……阿尔卡狄并没有回答。

这个“落后的人”静静不动地站了两分钟,才慢慢走回家去。

“前天我看见他在念普希金的诗,”巴扎罗夫继续往下说。“请你去对他讲,那是没有一点儿实际的用处的。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小孩儿:他应该把这种废物扔掉。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一个浪漫派有什么意思! 给他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去念吧。”

“我应该拿什么给他念呢?”阿尔卡狄问道。

“我想开头还是念毕黑纳尔的‘Stoff und Kraft’① 吧。”

“我也这样想,”阿尔卡狄同意地说,“‘Stoff und Kraft’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

“看起来你我,”这天吃过午饭以后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坐在书房里对他的哥哥说,“都是落后的人了,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唉! 唉。也许巴扎罗夫是对的;不过我承认有一件事情叫我伤心;我很盼望,尤其是现在,能够同阿尔卡狄多亲

① 德语:《物质与力》。——原注。毕黑纳尔(1824—1899),德国的生理学家,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者。《物质与力》在一八五五年初版发行,主张唯物论与无神论,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间很流行。

近些,可是事实上,我却留在后面,他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不能够彼此了解了。"

"他怎么走到前面去了呢?他在哪一方面超过了我们这么多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不耐烦地问道。"全是那个虚无主义者先生给他塞进脑子里去的。我讨厌那个学医的家伙;据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我相信,不管他解剖了多少青蛙,他对物理学也不会懂多少。"

"不,哥哥,你不应当这么说,巴扎罗夫不但聪明,而且博学。"

"他自大得叫人讨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

"是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是自大的。不过这好像也是免不掉的;这倒是我不明白的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总是尽力不落在时代后面: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庄,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研究,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哥哥,我现在也开始相信我的日子真是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

"我现在告诉你为了什么。今天早晨我坐着在念普希金的诗……我记得我正读到《茨冈》① ……突然,阿尔卡狄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出亲切的、怜悯的表情,他好像对待小孩儿一样,轻轻地把我那本书拿开,另外放了一本书在我面前——一本德文书……他对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把那

① 《茨冈》:普希金的长诗。

本普希金的诗也带走了。”

“真有这回事！他给你的是什么书呢？”

“它在这儿。”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从大衣的后面口袋里拿出那本第九版的毕黑纳尔的名著。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接过来翻了一翻。“哼，”他哼了一声。“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倒关心着你的教育呢。好，你到底念过它没有？”

“是的，我试了一下。”

“好，你觉得它怎样？”

“要不是我太笨，那么这本书就全是——废话。我想，一定是我笨。”

“是不是你的德文全忘了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啊，德文我是懂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这本书又翻了一忽儿，还偷偷地看他的兄弟。两个人都不做声。

“哦，还有，”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他显然想改换话题，“我收到柯利雅津的一封信。”

“玛特维·伊里奇么？”

“是的。他是来——这一省调查的。他现在是一个阔人了；他信上说，因为是亲戚，他很想跟我们见见面，他请你、我同阿尔卡狄一块儿到城里去。”

“你去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我不去；你呢？”

“不，我也不去。跑五十里路去吃点心也太费事。Mathieu[①] 不过想显显威风、摆摆阔，去他的！自然会有全省的人奉承他，我们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枢密顾问官[②] 官阶倒也不小，要是我当时一直在军界服务，一直干这种傻事，现在我也应当做侍从将军了。可是如今呢，你我都是落后的人了。”

“是的，哥哥；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要定做一口棺材，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的时候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叹一口气说。

“啊，我却不这么容易地投降，”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要跟那个学医的家伙打一仗。”

果然在这天傍晚喝茶的时候，就打了仗。这天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进客厅，他就已经准备好作战了，他很生气并且很坚决。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口实就向敌人进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巴扎罗夫照例在“老基尔沙诺夫”（他这样地称那两弟兄）面前不多讲话，那晚上他心里不痛快，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说一句话。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实在等得发火了；最后他的愿望毕竟实现了。

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附近的一个地主身上。“没出息的，下流贵族，”巴扎罗夫随便地说，他在彼得堡遇见过那个人。

“请问您一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的嘴唇在打颤，“照您看来，‘没出息的’和‘贵族’是一样的意思么？”

---

① 玛特维的法语念法。

② 枢密顾问官：帝俄时代的三等文官。

“我说的是下流贵族，”巴扎罗夫答道，懒洋洋地咽了一口茶。

“正是这样，先生；不过我觉得您对贵族也是和对所谓下流贵族一样看待的。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并不赞成您这个意见。我敢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而且拥护进步的人；可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留神记住，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听见这几个字便抬起眼睛望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请您留神记住，”他狠狠地再说了一遍，“我尊敬英国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一点儿也不肯放弃，因此他们也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要求别人对他们尽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也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英国的自由是贵族阶级给它的，也是由贵族阶级来维持的。”

“这个调子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了，”巴扎罗夫答道：“可是您打算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呢？”

“我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亲爱的先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动气的时候，他就故意在“这个”中间添插进一个音，念成“这么个”，虽然他明知道这种用法是不合文法的。这种时髦的怪癖可以看作亚历山大一世[1] 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当时那班纨袴子弟很少讲本国话，偶尔讲了几句，就随意胡乱拼字，不是说这么个，就是说这夥个，好像在说：“自然我们是道地的俄国人，我们同时还是上等人物，用不着去管那些学究

①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的俄国沙皇。

们定的规则。")我是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没有个人尊严的意识,没有自尊心——这两种情感在贵族中间极其发达——那么社会……bien public[1]……社会组织便没有强固的基础了。亲爱的先生,个性,——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譬如,我很知道您觉得我的习惯、我的装束、我的整洁都是很可笑的;可是这都是从一种自尊心,从一种责任心——是的,先生,的确,先生,责任心——出来的。我现在住在乡下,住在偏僻的地方,可是我不会降低我自己的身份。我尊重我自己的人的尊严。"

"那么让我问您一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巴扎罗夫说,"您尊重您自己,您只是袖手坐在这儿;请问这对于 bien public 有什么用处? 倘使您不尊重您自己,您不也是这样坐着吗?"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脸色马上变白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绝对用不着向您解释我为什么像您所说的袖手坐在这儿。我只打算告诉您,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阿尔卡狄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对他讲过那样的话,现在我再对您讲一遍。尼可拉,是不是这样的?"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点了点头。

"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巴扎罗夫在这个时候

① 法语:社会的福利。——原注

说："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那么，在您看来对俄国人什么才是有用的呢？倘使照您的说法，我们就是在人类以外，人类的法则以外了。可是历史的逻辑要求着……"

"可是逻辑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没有它也是一样地过日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您肚子饿的时候，我想，您用不着逻辑来帮忙您把一块面包放进嘴里去吧。这些抽象的字眼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摇着他的两只手。

"您这倒叫我不明白了。您侮辱了俄国人。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

"大伯，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阿尔卡狄插嘴道。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狄欢喜得红了脸。

“请让我来讲两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

“目前人民的状况正要求这个，”阿尔卡狄庄严地说，“我们应当实现这类要求，我们没有权利只顾满足个人的利己心。”

巴扎罗夫显然不高兴这最后的一句；这句话带了一点儿哲学气味，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气味，因为巴扎罗夫把哲学也叫做浪漫主义，不过他觉得用不着去纠正他那个年轻的门徒。

“不，不，”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突然用劲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先生们真正认识俄国人民；我不相信你们就能够代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望！不，俄国人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把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喜欢保持古风的；他们没有信仰便不能够生活……”

“我并不要反驳这一点，”巴扎罗夫插嘴说。“我甚至准备承认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那么倘使我是对的……”

“可是还是一样，什么都不曾证明。”

“正是什么都不曾证明，”阿尔卡狄跟着重说一遍，他充满着自信，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棋手，他早已料到对手要走一着看

起来很厉害的棋，因此一点儿也不惊慌。

“怎么还是什么都不曾证明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他倒奇怪起来了。“那么，您要反对自己的人民吗？”

“我们就反对了又怎样？”巴扎罗夫突然嚷起来。“人民不是相信打雷的时候便是先知伊里亚驾着车在天空跑过吗？那么怎样呢？我们应该同意他们吗？而且，他们是俄国人；难道我不也是一个俄国人吗？”

“不，您刚才说了那一番话以后，您就不是一个俄国人！我不能承认您是一个俄国人。”

“我祖父耕田，”巴扎罗夫非常骄傲地说。“您随便去问一个您这儿的农民，看我们——您同我——两个人中间，他更愿意承认哪一个是他的同胞。您连怎样跟他们讲话都不知道。”

“可是您一面跟他们讲话，一面又轻视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使他们应当受人轻视的话！您专在我的观点上挑错，可是谁告诉您，我的观点是偶然得来的，而不是您所拥护的民族精神本身的产物呢？”

“什么话！虚无主义者太有用了！”

“他们有用或者没用，并不是该我们来决定的。就是您也觉得自己并非一个没有用的人吧。”

“先生们，先生们，请不要攻击个人，”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一面叫着，就站起身来。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微微一笑，把手按住他弟弟的肩头，

叫他仍旧坐下。

"不要着急，"他说，"我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正因为我有着我们这位先生，这位医生先生，挖苦得不留余地的自尊心。"他又转过头来对巴扎罗夫说："请问一句，您也许以为您的学说是新发明的吧？您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您主张的唯物主义已经流行过不止一次了，总是证明出来理由欠充足……"

"又是一个外国名词！"巴扎罗夫打岔道。他有点儿动怒了，他的脸色变得发青，而且带着粗暴的颜色。"第一，我们并不宣传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习惯……"

"那么你们又干些什么呢？"

"我就要告诉您我们干些什么。前不久，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官吏受贿，我们没有公路，没有商业，没有公平的法庭……"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控诉派'① ——我想，就是这种称呼吧。你们的控诉里头有许多我也同意，可是……"

"后来我们也明白发议论，对我们的烂疮只空发议论，这是毫无用处的，它只会把人引到浅薄和保守主义上面去；我们看见我们的聪明人，那些所谓进步分子和'控诉派'不中用；我们整天忙着干一些无聊事情，我们白费时间谈论某种艺术啦，无意识的创造啦，议会制度啦，辩护律师制度啦，和鬼知道的什么啦。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我们每天的面包；我们让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股份公司处处失

① "控诉派"：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统治(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年)初期中参加当时一种文学运动的人的称呼。

败，只因为没有够多的诚实的人去经营；我们的政府目前正在准备的解放[1]，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农民情愿连自己的钱也搜刮去送给酒店，换得醺醺大醉。”

“是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插嘴说，“是的，你们相信了这一切，你们便决定不去切实地做任何事情了。”

“决定不做任何事情，”巴扎罗夫板起脸跟着说了一遍。

他因为无缘无故地对这位绅士讲了那么多的话，忽然跟自己生起气来。

“可是只限于谩骂？”

“只限于谩骂。”

“这就叫做虚无主义？”

“就叫做虚无主义，巴扎罗夫又跟着重说一遍，这次特别不客气。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略略眯起眼睛。

“原来是这样！”他用一种异常镇静的声音说。“虚无主义是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痛苦的，而且你们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英雄，可是你们为什么责骂别人呢，连‘控诉派’也要责骂呢？你们不是也跟所有别的人一样只会空谈吗？”

“不管我们有多少短处，我们却没有这个毛病，”巴扎罗夫咬着牙齿说。

“那么又怎样呢？请问，你们在行动吗？或者你们是在准备着行动吗？”

---

① 解放：这里指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

巴扎罗夫不回答。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控制了自己。

“哼！行动，破坏……”他继续说。“可是你们连为什么要破坏都不明白又怎样去破坏呢？”

“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阿尔卡狄说。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看看他的侄子，不觉笑了起来。

“力量是不负任何责任的，”阿尔卡狄挺起身子说。

“可怜的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了。“你会不会想到你们用你们这种庸俗的论调在俄国维持些什么东西！不，连一个天使也忍耐不下去了！力量！在野蛮的加尔梅克人[①]中间，在蒙古人中间，也有力量；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可宝贵的，是文明；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亲爱的先生，文明的果实对我们是可宝贵的。不要对我讲那些果实毫无价值：便是最不行的画匠，un barbouilleur[②]，或者一晚上只得五个戈比[③]的奏跳舞音乐的乐师，他们也比你们更有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文明，不是野蛮的蒙古力量，你们自以为是进步人物，可是你们却只配住在加尔梅克人的帐篷里头！力量！你们这些有力量的先生，请记住你们不过是四个半人，别的人数目却有千百万，他们不会让你们去践踏他们的最神圣的信仰，他们倒要把你们踩得粉碎！”

---

① 加尔梅克人：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

② 法语：画匠。

③ 戈比：俄国货币单位，一卢布的百分之一。

"他们要踩就让他们踩吧,"巴扎罗夫说。"可是您的估计并不对。我们人数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少。"

"什么?您真以为你们可以应付全体人民吗?"

"您知道整个莫斯科城还是给一个戈比的蜡烛烧掉的,"[①] 巴扎罗夫答道。

"是的,是的。第一是差不多撒旦一样的骄傲,其次是嘲笑——就靠了这个来引动年轻人,来征服一般小孩子的毫无经验的心!现在就有一个坐在您身边,他简直要崇拜您了。您欣赏欣赏他吧!(阿尔卡狄掉过脸去,皱起眉头来。)这种传染病已经传播得很广了。我听说我们的画家在罗马从来不进梵蒂冈[②] 去。他们把拉斐尔[③] 差不多看做一个傻瓜,就因为,据说,他是一个权威;可是他们自己却又没出息,连什么也画不出来;他们的幻想老是出不了《泉边少女》这一类画的圈子!而且连少女也画得不像样。照您看来,他们是出色的人物吧,是不是?"

"照我看来,"巴扎罗夫答道,"拉斐尔本来就不值一个钱;他们比他也好不了什么。"

"好!好!听着,阿尔卡狄……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这么讲的!想想,他们怎么不跟着您跑呢!在从前年轻人都不能不念书:他们不愿意让人家叫做粗野的人,因此不管他们喜欢

①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略俄国,俄国人焚烧莫斯科的事。

② 梵蒂冈:罗马教皇所在地,在罗马,内有图书馆、博物院,收藏的书画等等都很名贵。

③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三大家之一。

不喜欢，他们都不得不好好地用功。可是现在，他们只要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狗屁！'就成功了。一般年轻人都高兴极了。说老实话，他们先前本来是笨蛋，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虚无主义者了。"

"您自己那么夸口的自尊心已经动摇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阿尔卡狄却气得厉害，眼睛发火了。"我们的辩论扯得太远了；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我想，"他说着，便站起来，"只要您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里面，找出一个不需要完全地、彻底地否定的制度，到那时候我再来赞成您的意见。"

"像这样的制度，我可以举出几百万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嚷道："几百万！就譬如公社①。"

一个冷笑使得巴扎罗夫弯起嘴唇来。

"好，说到公社，"他说，"您最好还是跟令弟去讲吧。我想他到现在应该看明白，公社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它那连环保啦，它那戒酒运动啦，还有别的这一类的事情。"

"那么就拿家庭来说吧，我们农民中间的家庭！"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大声说。

"这个问题，我想您还是不要太详细分析的好。您没听说过扒灰的公公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听我的劝告，花两天的功夫去想一想吧；您马上好像不会想出什么来的。请您把我们俄国的每个阶级，一个一个的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同

① 公社：俄国的一种乡村自治组织。它的基础是土地共有。

时我和阿尔卡狄两个要……”

“去嘲笑一切事情,”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地说。

“不,我们去解剖青蛙。阿尔卡狄,我们走吧;先生们,一忽儿再见。”

两个朋友走了。弟兄两人留在这儿,他们起初只是默默地对望着。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终于开口说,“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原来是这样。”

“我们的下一代!”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着重说一遍,闷闷地叹了一口气。在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就像坐在热炭上面似的,他一声也不响,只是偷偷地用痛苦的眼光看阿尔卡狄。“哥哥,你知道我现在记起了什么吗?我有一回跟我们的亡故的母亲争论一件事;她发了脾气,直嚷,不肯听我的话。最后我对她说:‘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不同的两代人。’她气得很厉害,可是我却想道:‘这有什么办法呢?丸药是苦的,可是她必须吞进肚子里去。’你瞧,现在是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下一代人可以对我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吞你的丸药去吧。’”

“你真是太大量,太谦虚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相反的,我却相信你我都比这班年轻的先生们更有理,虽然我们口里讲着旧式的话,已经 vieille[1],而且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狂妄自大。……现在的年轻人多傲慢!你随便问一个年轻

① 法语:老了。

人:'你喝红酒还是白酒?'他便板起脸用低沉的声音答道:'我素来喝红的!'好像那一刻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的……"

"您还要不要茶?"费涅奇卡从门外探头进来问道。她听见客厅里还有争论的声音,便不能决定要不要进来。

"不要了,你叫人把茶炊拿走吧,"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站起来招呼她。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突然对他讲了一句"bon soir[①]",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

一一

半点钟以后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走到花园中他心爱的凉亭里去。他充满了忧郁的思想。他第一次看清楚了他跟他儿子中间的距离;他预料到这距离会一天一天地增加。那么他冬天在彼得堡念那些最新的著作所花去的整天整天的功夫都是白费的了;他用心去听那班年轻人高谈阔论所花去的时间也是白费的了;他白白地高兴:他有时候居然能够在他们热烈辩论的中间插进去说一两句话。现在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了。"我哥哥说我们是对的,"他想道,"而且撇开一切自尊心不谈,我自己也认为他们离开真理比我们更远,可是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另有一些东西却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他们在什

① 法语:晚安。——原注

么地方比我们强……这是青春吗？不，不只是青春。难道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比我们少些绅士的气派吗?"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没精打采地埋下头，他伸手在脸上摸了一下。

"可是排斥诗，"他又想道，"对艺术，对大自然没有感情……"

他向四周看了看，好像他想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对大自然没有感情似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太阳隐藏在离园子半里光景的小小的白杨林子后面，树影无边无际地躺在静寂的田野上。一个农民骑着白马在林边那条阴暗窄小的路上跑过去；虽然他在荫处，可是他的全身，连他肩头的补钉，都看得很清楚；那匹马正奋起蹄子飞似地往前跑着。远远地射来的太阳光线照在林子里，霞光透过繁密的枝叶，在白杨树干上涂了一层暖和的红光，使它们更像松树干；树叶差不多变成了蓝色，上面衬出一片微带霞红的浅蓝天空。燕子飞得高高的，风完全静了，误了时候的蜜蜂在丁香丛中懒懒地、带睡意地嗡嗡飞鸣，一群小蚊子像一根柱子似地在一枝突出的孤零零的树枝上面打转。"多美，我的上帝！"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想道，他平日喜欢的诗句快要跳到他的嘴上来了，他却记起了阿尔卡狄，记起了"Stoff und Kraft"，便不做声了；可是他依旧坐在那儿，依旧沉溺在孤寂思想的时悲时喜的变幻之中。他喜欢梦想；乡居生活助长了他的这种癖好。没有多久以前他坐在客店里等候他的儿子，他当时也曾这样地梦想过，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了；他们父子的关系在当时还

不明显，现在是确定的了——而且是怎样确定的啊！他又看到他的亡故的妻子了，可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他多年来跟她朝夕相对时看见的那个模样，并不是一个善于持家的、贤惠的主妇，却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有一对天真地好问的眼睛，一条编得紧紧的辫子垂在孩子似的脖子上。他记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他在他的住处的楼梯上遇见她，无意间碰了她一下，他正要道歉，刚刚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Pardon, monsieur,"① 她却俯下身子，微微一笑，忽然间好像吃了一惊似的，就跑开了，可是到了楼梯转角，她又回转头很快地看了他一眼，露着一种庄重的神情，红了脸。从这以后，起初是不大好意思的拜访，吞吞吐吐的谈话，忸怩的微笑和疑惑不安；后来是苦闷、热情，最后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欢喜。……这一切都消失在哪儿去了？她做了他的妻子，他享受了世界上少数人享受到的幸福。"可是，"他又想道，"这些甜蜜的最初的时光，为什么不能够永久不灭地存在下去呢？"

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分析清楚；可是他觉得他愿意用一种比记忆更有力量的东西来系住那一刻幸福的时光；他愿意再感觉到他的玛利亚回到他的身边，感到她的身体的热气和呼吸，而且他已经觉得仿佛在他的头上……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费涅奇卡的声音在他的近旁唤

① 法语："对不起，先生。"——原注。他应该说："对不起，小姐。"在慌张中他讲错了。

道："您在哪儿?"

他打了一个颤。他没有痛苦，也不觉得惭愧。……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的妻子同费涅奇卡有比较的可能，可是他感到遗憾费涅奇卡会想到在这个时候来找他。她的声音使他马上记起他的灰白色头发、他的老年和他现在的境况。……

他已经进入了的幻境，那个从过去的浓雾中间显露出来的幻境，动摇了——而且消失了。

"我在这儿，"他答道，"我就来，你去吧。"一个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又来了，绅士派头。"费涅奇卡不作声地把头探进凉亭看了他一眼，便不见了。他惊讶地发觉，他正在梦想的时候夜已经来了。四周都是黑沉沉的、静悄悄的。费涅奇卡的脸在他的眼前闪过去了，这么苍白，这么小。他懒洋洋地站起来，打算走回屋去；可是他那感伤的心不能够平静下来，他便在园子里信步走着，有时候沉思地看着脚下的土地，然后又抬起眼睛望那星星闪烁的天空。他走了好久，走得差不多疲乏了，而内心的烦扰，一种追求的、暗昧不明的、悒郁的烦扰依旧不曾平息。啊，要是巴扎罗夫知道这个时候他心里想些什么，他一定会笑他！连阿尔卡狄也会责备他。他，一个四十四岁的人，一个农业家，还是一家之主，流了眼泪，而且无缘无故地流了眼泪：这比拉大提琴更要糟一百倍了。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走着，还是不能够下决心走进宅子里去，走进那个和平、舒适的窝里去，虽然它的每一扇灯光明亮的窗户都在殷勤地招呼他；他没有力量离开这黑暗、这园子、这拂面的清新的空气，离开这悒郁、这烦扰……

在小路的转角，他遇见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你有什么事情？”巴威尔问他道，“你脸色白得像一个鬼，你不舒服吧；为什么不去睡觉？”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简单地对他说明了自己的心境，便走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到园子的尽头，他也在沉思，也抬起眼睛望天。可是在他那一对美丽的黑眼睛里却只映着星光。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那种所谓高雅地冷淡的、敏感的[1] 心灵，带了一点儿法国式的孤僻厌世的味道，是不能够梦想的。……

“你知道吗？”这天夜里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父亲今天说他接到你们一个阔亲戚的邀请。你父亲不要去，让我们到某地走一趟吧；你知道那位先生也请了你的。你看得见这儿的天气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正好坐车走走，到城里去看看。我们玩它个五六天就够了！”

“你还要回这儿来吗？”

“不，我应当到我父亲那儿去了。你知道那儿离某地有三十里。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我母亲了；我应当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们都是好人，尤其是我父亲；他是怪有趣的。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你要同他们住好久吗？”

“我不想久住。自然那儿的生活是沉闷乏味的。”

“那么你回来的时候还到我们这儿来吗？”

---

① 这里据 C. Garnett 英译本，原文作“热情的”。

“我不知道……等以后看吧。好吧，你觉得怎样？我们去不去？”

“照你的意思吧，”阿尔卡狄懒懒地答道。

他心里非常高兴他的朋友的提议，可是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他并没有白做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啊！

第二天他同巴扎罗夫一块儿到某地去了。玛利因诺的一班年轻人都舍不得跟他们分别；杜尼雅霞甚至哭了一场……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却感觉到呼吸畅快多了。

一二

我们的朋友们要去的某城，是在一个年轻省长的管辖下面，这个省长一方面是进步分子，另一方面又是专制官僚，这样的事在俄国倒是常有的。他就任不到一年，不但是跟本省首席贵族（那是一个退伍的近卫军骑兵上尉，养马专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起了冲突，甚至还跟他的下属们闹过意见。这种争执越闹越厉害，连彼得堡的部里后来也觉得必须派一个可靠的人来就地调查一下。当局选派了玛特维·伊里奇·柯利雅津，他就是基尔沙诺夫两弟兄从前住在彼得堡的时候父亲拜托来照应他们的那位亲戚柯利雅津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年轻人”，这是说他过了四十岁还不久，可是他已经在准备做一个大政治家了，他的胸前每一边挂着一颗宝星——说实话，其中一颗宝星是外国的，而且不是高级的。他同他正要

来查询的那个省长一样，也算是一个进步分子；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要人了，他却和大多数的要人不同。他把自己看得极高；他的虚荣心是没有边际的，可是他的举止简单、朴素，他喜欢用鼓励和赞许的眼光看人，听人讲话极虚心，而且常常笑得极其和蔼可亲，因此跟他初次认识的人甚至会把他认作“一个好极了的小伙子”。可是在紧要的关头他知道怎样，像俗话所说的，自吹自擂。“精力是很要紧的，”他在那种时候常说，“l'énergie est la première qualité d'un homme d'état；”[①]虽是这样，他却仍然常常受人玩弄，稍微有一点儿阅历的官吏便能够随便驾驭他。玛特维·伊里奇常常带着极大的敬意谈起基佐[②]；他竭力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不是一个循旧规办公事的、古板的人，也不是一个落后的旧官僚，而且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没有一个逃过他的注意。……这一类的话他已经讲得很熟了。他甚至还留心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过他的确是带一种随随便便的傲慢态度来留意的；好像一个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一队小孩子，他有时也会跟在他们后面走。玛特维·伊里奇其实并不比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政治家进步多少，那班人去参加当时住在彼得堡的斯威契娜[③] 的晚会之前，照例要在早

---

① 法语：精力是政治家的第一品质。——原注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和反动政客，一八四七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担任法国内阁总理。

③ 斯威契娜（1782—1859）：俄国斯威钦将军的夫人。她是一个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女作家，主要住在巴黎，她的客厅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政客文人聚会的地方。

晨念熟一页龚狄亚克① 的书;不过玛特维·伊里奇的方法不同,他的方法更新颖。他是一个圆滑的朝臣,一个很狡猾的人,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并不通晓事务,也缺乏才智,可是他知道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这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玛特维·伊里奇接待阿尔卡狄的时候,显出了一般开通的高级官员所特有的一种殷勤,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还带了开玩笑的态度。可是他听说他所邀请的两位表兄躲在乡下不肯出来,他就奇怪起来了。"你爸爸素来就是个古怪的家伙,"他说着,一面玩弄他那件华丽的天鹅绒晨衣的缨子,他忽然又转过身来向着一个把普通制服扣得整整齐齐的青年官吏,露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大声说:"什么?"那个年轻人因为沉默了好久连嘴唇也粘住了,便站起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长官。可是玛特维·伊里奇把他的下属窘了一下之后,就不去理会他了。我们的高级官员向例喜欢大窘他们的下属;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种类甚多。在那些方法中间下面的一种用得最多,用英国话说来,便是"is quite a favourite"②:一位高级官员忽然连最简单的话也不懂了,他装作耳朵全聋了。譬如说,他会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个下属便恭恭敬敬地报告:"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

① 龚狄亚克(1715—1780):法国启蒙哲学家。著有《感觉论》。

② 英语:最喜欢用的。——原注

“喂？什么？那是什么？您在讲什么？”这位高级官员非常注意地再问道。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人。”

“怎么？什么？星期五是什么？什么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一个星期里头的一天。”

“哼，什么，你想来教我吗？”

玛特维·伊里奇虽然自命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究竟是一位高级官员。

“我劝你去见见省长，我的朋友，”他对阿尔卡狄说，“你明白，我劝你去并不是因为我还有那种应当尊敬当权者的旧思想，却只是因为省长是一个好人；而且你也许愿意到这儿的社交界去见识见识吧。……我想，你不是一只熊吧？他后天要举办一个盛大的跳舞会。”

“您去参加吗？”阿尔卡狄问道。

“他是为了欢迎我举办跳舞会的，”玛特维·伊里奇差不多露出了怜悯的神情答道。“你跳舞吗？”

“我会跳，不过跳得不好。”

“多可惜！这儿有的是漂亮女人，一个年轻人不跳舞是可耻的事。我又应当说明，我讲这种话并不是因为什么旧思想在作怪；我一点儿也不以为一个人的才智是生在他的脚上的，不过拜伦主义① 是可笑的，il a fait son temps。②”

---

① 这里也许兼指拜伦跛脚，不善跳舞的事。

② 法语：这是过时的了。——原注

“可是舅舅，我并不是因为拜伦主义才……”

“我会把你介绍给这儿的太太小姐们，我会把你放在我的翅膀下面保护的，”玛特维·伊里奇打岔道，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会觉得它很暖和，嗯？”

一个听差进来报告，省税务局长来了。这是一个眼光温和的老人，嘴边有一些深的皱纹，他非常爱好大自然，尤其喜欢夏天里的，照他自己说来，在那个时候“每只忙碌的小蜜蜂从每朵小花那儿接收一点儿小小的贿赂”。阿尔卡狄便告辞出来。

他回到他们住的那个旅馆里，看见巴扎罗夫，他费了许多唇舌劝这个朋友跟他一块儿去见省长。“好，只好这样了，”巴扎罗夫最后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是来参观这儿的绅士的，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他们吧。”

省长很谦和地接见这两个年轻人，可是他并没有请他们坐下，他自己也不坐。他没有一刻不是慌慌忙忙的；早晨他喜欢穿一身窄小的普通制服，打一根特别紧的领结：他总是没有功夫吃饱、喝够，一直不停地发号施令。衙门里的人叫他做“布尔达路”，这个绰号并不是从那个有名的法国传教士① 来的，却是从“布尔达”② 这个字眼来的。他邀请基尔沙诺夫和巴扎罗夫参加他的跳舞会，过了几分钟，他又把邀请的话说了

① 法国传教士：指布尔达路爱(1632—1704)，法国部耳日耶稣会传道士，他的传道演讲于十九世纪初翻译成俄文。

② “布尔达”：一种浑浊无味的饮料。

一遍,他认为他们是两弟兄,把他们都叫作凯依沙罗夫。

他们从省长衙门里出来,路上忽然看见一个穿斯拉夫派[1] 爱穿的轻骑兵的短外衣[2] 的矮小男子,从一辆走过他们身边的出租的敞篷马车上跳下,口里嚷着:"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便朝巴扎罗夫奔来。

"啊,这是您,赫尔[3] 西特尼科夫,"巴扎罗夫说,他仍然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真想不到,完全偶然的事,"他答道,又转身向马车挥了五六下手,大声说:"跟着,跟着我们来!"然后他对巴扎罗夫说,一面跳过了小水沟:"我父亲在这儿有事情,所以他要我来。……我今天听说您到了,我已经去看过您了。……(这两个朋友回到旅馆里,果然看见一张折了角的名片,印着西特尼科夫的姓名,一面是法文,一面是斯拉夫文字。)我希望您不是从省长那儿来的吧?"

"不必希望了;我们正是从他那儿来的。"

"啊! 那么我也要到他那儿去一趟。……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把我介绍给您的……给这位……"

---

① 斯拉夫派: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断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因为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俄国的国家政权是同人民"融洽无间"的。斯拉夫派在农民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主张农民要有人身自由,赞成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且大力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护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

② 一种匈牙利的有细带的短外衣。

③ 德语:先生。

“西特尼科夫，基尔沙诺夫，”巴扎罗夫含含糊糊地说，并不停下来。

“荣幸极了，”西特尼科夫一面说，一面侧起身子走着，脸上带笑，而且连忙取下他那双过于漂亮的手套。“我听见讲起您好多回了……我是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的一个老朋友，还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我是靠了他才得到新生的……”

阿尔卡狄望着巴扎罗夫的学生。这张小而不讨厌的、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露出一种慌张而又愚蠢的表情；他那一对小眼睛看起来好像是给压进去了似的，它们注意地而且局促不安地望着人，他的笑声也是局促不安的——一种短短的、木头似的笑声。

“您会不会相信，”他接下去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头一回在我面前讲起不应当承认任何权威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好像我的眼睛又突然睁开了似的！我想我到底找到一个真正的人了！哦，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一定要去见见这儿的一位女士，她完全可以了解您，要是您肯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当作一桩了不起的喜事；我想，您已经听见人讲过她了？”

“这是谁？”巴扎罗夫不乐意地问了一句。

“库克希娜，Eudoxie①，叶夫多克西雅·库克希娜。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真正可以说是 emancipee②，一个进步

① 法语：艾夫多克西。——原注
② 法语：解放的女性。——原注

的女子。您知道吗？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儿去看她吧。她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步路。我们在她那儿吃早饭。我想你们两位还没有用过早饭吧？”

“还没有。”

“那么，好极了。您明白她已经跟她丈夫分居了；她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吗？”巴扎罗夫插嘴问道。

“唔……不，这说不上。”

“那么您叫我们去看她干什么呢？”

“啊，您真会开玩笑……她会给我们开一瓶香槟。”

“原来是这样。可见您真是一个实际的人。啊，您父亲还在干包税的事吗？”

“在干，”西特尼科夫连忙答道，又发出一阵尖声的笑。“好吧，我们去吗？”

“我实在不知道要不要去。”

“你是来观察人的，去吧，”阿尔卡狄小声说。

“您怎样呢，基尔沙诺夫先生？”西特尼科夫插嘴说。“请您也去；没有您，我们也不成。”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三个人一块儿突然跑到她那儿去呢？”

“不要紧！库克希娜是一个妙人。”

“真有一瓶香槟吗？”巴扎罗夫问道。

“三瓶！”西特尼科夫嚷道。“我可以担保。”

“拿什么来担保？”

“我自己的脑袋。”

“还是拿你爸爸的钱袋来担保的好。那么我们去吧。”

一三

阿夫多契雅(或叶夫多克西雅)·尼基契西娜·库克希娜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馆是在某城的一条新近火烧过的街上(我们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烧一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门上歪歪斜斜地钉着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拉铃的把手。来访的客人走进穿堂便遇到一个女人,她既不像一个用人,又不像陪伴女人①,头上还戴着一顶女人在家戴的小帽——这很明显地表示这家的主妇是有进步倾向的。西特尼 科夫问,阿夫多契雅·尼基契西娜是不是在家。

“是您吗,Victor②?”隔壁房里传出一个尖细的声音。“进来吧。”

戴小帽的女人马上不见了。

“我不只一个人,”西特尼科夫说,他大胆地看了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一眼,很快地脱下他的短外衣,下面露出一件又像背心又像西装上衣的衣服。

---

① 陪伴女人:寄食在贵族地主家里的一些穷贵族的妇女,靠女主人的恩惠生活。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日常工作。

② 法语:维克多。西特尼科夫的名字。

“不要紧，”声音答道。“Entrez①。”

三个年轻人走了进去。他们走进的屋子与其说是客厅，还不如说是工作室倒更恰当。文件、书信、一本一本厚厚的俄文杂志(一大半杂志的篇页都是没有裁过的)凌乱地堆在那些满是灰尘的桌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香烟头。一个年纪不大的太太斜靠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她一头淡黄色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干净的绸衫，短短的胳膊上戴着一串粗的镯子，一方挑花帕子包在她的头上。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拿了一件配着已经发黄的银鼠皮里子的天鹅绒小外套披在肩头，懒洋洋地说：“您好，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

“巴扎罗夫，基尔沙诺夫，”他学巴扎罗夫的样子简短地介绍道。

“欢迎，”库克希娜说，她的圆圆的眼睛望着巴扎罗夫，两只眼睛中间挂着一个孤零零的小而发红的朝天鼻子。“我知道您，”她又说，也跟他握了手。

巴扎罗夫皱起眉头。这个面貌并不好看、身材瘦小的解放的妇女并不怎样叫人讨厌；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给人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问她：“究竟有什么事？您饿了吗？还是厌烦吗？还是不好意思吗？您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的？”她和西特尼科夫一样，老是带一种心神不定的样子。她讲话、动作，都没有一点儿拘束，但同时又很笨拙；她显然认定

① 法语：进来。——原注

自己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可是她的一举一动都叫人觉得这并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像一般小孩所说的那样："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是说，既不朴实，也不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扎罗夫，"她又说了一遍（她也有着许多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太太们所特有的一种跟人初次见面就称姓的习惯）。"要不要抽一支雪茄？"

"雪茄当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说，他已经翘起脚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了。"可是请给我们预备点儿早饭吧。我们实在饿得很；并且请吩咐他们给我们开一小瓶香槟。"

"爱享受的人，"叶夫多克西雅说，她笑了（她笑的时候连上牙的牙龈也露了出来）。"巴扎罗夫，他是一个爱享受的人，对不对？"

"我喜欢生活的舒适，"西特尼科夫神气地说。"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这样，它妨碍的；它真妨碍的！"叶夫多克西雅大声说。可是她仍然吩咐女用人去预备早饭和香槟酒。她又转身向着巴扎罗夫，问道：

"您的意见怎样？我相信您赞成我的意见。"

"啊，不，"巴扎罗夫答道："就是从化学的观点讲起来，一块肉也要比一块面包好。"

"您是研究化学的吗？那正是我心爱的东西。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胶泥。"

"一种胶泥？您吗？"

"是的，我。您知道作什么用吗？做洋娃娃，它们的头就

不容易弄破。您看，我也是很实际的。可是还没有完全弄好。我还得念利比黑呢。哦，您念过基斯利雅科夫在《莫斯科新闻》[①]上发表的那篇论妇女劳动的文章吗？请您念它一遍。我想您对妇女问题一定感兴趣吧？您对学校也感兴趣吧？您这位朋友怎样？他叫什么名字？”

库克兴夫人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气，接连发出这一句一句的问话，也不等别人回答，好像娇养惯了的小孩对他们的奶妈讲话一样。

“我叫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基尔沙诺夫，”阿尔卡狄说，“我什么事也不做。”

叶夫多克西雅大声笑起来。“多漂亮！怎么，您不抽烟吗？喂，维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气呢。”

“为什么？”

“我听人说您又在恭维乔治·桑[②]了。她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女人，再没有别的！人怎么能够拿她跟爱默生[③]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学，她什么都不懂。我相信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胚胎学这个名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胚胎学怎么成呢？（叶夫多克西雅甚至张开两手舞起来。）叶利谢维奇关于这个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是一位天才的先生。（叶夫多克西雅习惯用“先生”来代替“人”的字眼。）巴

---

① 《莫斯科新闻》：官方报纸，一七五六年创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采取了最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②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中民主派的代表。

③ 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扎罗夫，坐到沙发上我旁边来。您也许不知道，我很害怕您。”

“为什么呢？请问。”

“您是一个危险的先生：您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批评家。上帝啊！多可笑，我讲话就像乡野地方的地主太太。不过我倒真是一个地主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产，您想一想，我那个管理人叶罗费是一种古怪的人，就跟库柏尔[①] 的拓荒者一样，他是个不用脑筋的粗人。我后来就在这儿长住下来了；这座城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座城同每座城一样，”巴扎罗夫冷冷地答道。

“这儿的人关心的都是那些极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总是到莫斯科去过冬天，……可是现在我那位宝贝丈夫麦歇[②] 库克兴住在那儿。而且莫斯科现在——呵，我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它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想到外国去；去年我差一点儿就动身了。”

“当然，是到巴黎去吧？”巴扎罗夫问道。

“到巴黎和海得尔堡[③]。”

“为什么要到海得尔堡？”

“对不起！唔，朋孙[④] 在那儿！”

---

① 库柏尔(1789—1851)：美国小说家，著有描写北美殖民地化的著名连续长篇小说，总书名叫做《皮袜子》，《拓荒者》是其中的一本，同时也是那本小说的主人公的别名。

② 法语：先生。

③ 海得尔堡：德国西南部巴敦州的城市，设有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④ 朋孙(1811—1899)：德国化学家。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八九年间在海得尔堡大学教书。

这句话叫巴扎罗夫回答不出来了。

“Pierre[①]·沙波日尼科夫……您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

“对不起! Pierre·沙波日尼科夫……他老是在丽季雅·霍斯达多娃家里。”

“我也不认识她。”

“唔,就是他答应陪我去。谢谢上帝,我是自由的;我没有儿女。……我说了什么:谢谢上帝!不过这是不要紧的。”

叶夫多克西雅用她那被烟草熏成棕色的手指卷好一支香烟,用舌头舐了一下,吸了吸,然后点燃它抽起来。女用人端了一个托盘走进来。

“啊,早饭端来了!你们要不要吃一点儿?维克多,开酒瓶;这是您的事情。”

“我的事,我的事,”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说,他尖声笑起来。

“这儿有什么漂亮的女人吗?”巴扎罗夫喝光了第三杯,问道。

“有倒是有的,”叶夫多克西雅答道:“可是她们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mon amie[②]奥津左娃就不难看。可惜她名誉有点儿……不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她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开阔的胸襟……什么都没有。整个教育制度需要改革。我已经把这个问题仔细地想过了:我们女人简直没有受

① 法语:彼也尔,即彼得。

② 法语:我的女朋友。——原注

到好教育。”

“她们简直无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说：“她们应当受人轻视，我就完完全全地瞧不起她们！（西特尼科夫平日只要有轻视别人的机会，无论是心里感到或口头说出，他都会觉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欢攻击女人，他决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命运会叫他拜倒在他妻子的脚下，只因为她是一个杜尔多列奥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们里头就找不出一个听得懂我们谈话的人；没有一个值得我们这种正派人口里讲起的。”

“可是她们完全没有必要来听懂我们的谈话，”巴扎罗夫说。

“您在讲谁？”叶夫多克西雅问道。

“漂亮的女人。”

“什么？那么您赞成蒲鲁东[①] 的意见吗？”

巴扎罗夫骄傲地挺起身子。“我不赞成任何人的意见；我有我自己的。”

“打倒一切权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很高兴现在得到了一个机会在他所崇拜的人面前痛快地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可是连马可来[②] 本人……”库克希娜说。

“打倒马可来，”西特尼科夫大声叫起来。“您要替那些无聊的女人辩护吗？”

---

①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反对妇女解放，主张妇女的天职是做母亲和管理家务。

② 马可来（1800—1859）：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主要著作有《英国史》（1848—1855）。

"我不是替无聊的女人辩护，我替女权辩护，我发过誓要流尽我最后一滴血来拥护女权。"

"打倒！"不过西特尼科夫马上又打住了。"可是我并不否认女权，"他又说。

"不，我明白，您是一个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一个斯拉夫派，不过当然……"

"不！不！不！您是一个斯拉夫派。您是《家训》[①]的信徒。您手里应当捏一根鞭子。"

"鞭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巴扎罗夫说："可是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滴了。"

"最后一滴什么？"叶夫多克西雅问道。

"最后一滴香槟酒，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契雅·尼基契西娜，是最后一滴香槟酒——不是您最后一滴血。"

"我听见人攻击女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漠不关心地听下去，"叶夫多克西雅继续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与其攻击女人，还不如去念米席勒[②]的《De l'amour》[③]。那是一本很好的书！先生们，我们还是来谈爱情吧，"叶夫多克西雅又说，她懒洋洋地把一只手放在压皱了的沙发垫子上面。

突然间大家都不做声了。

"不，为什么要谈爱情呢，"巴扎罗夫说，"可是您刚才讲起

---

① 《家训》：十六世纪的一本俄国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候的忏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无非教人怎样治家，男人怎样严厉对付妻子等等。

② 米席勒（1798—1874）：法国历史家。

③ 法语：《爱情论》，一八五九年出版。

一位奥津左娃，……好像您是这样地称呼她吧？这位太太是谁呢？”

“她是很娇美的，娇美的！”西特尼科夫尖声说。“我要给您介绍。聪明，有钱，又是一个寡妇。可惜她还不够进步；她应当多跟我们的叶夫多克西雅亲近。Eudoxie，为您的健康干一杯！让我们来碰碰杯！Et toc, et toc, et tin-tin-tin! Et toc, et toc, et tin-tin-tin!!!（嗳独，嗳独，嗳丁一丁一丁！嗳独，嗳独，嗳丁一丁一丁！！！）”①

“Victor，您是个坏东西。”

这顿早饭吃了很久。第一瓶香槟之后接着第二瓶，第三瓶，甚至第四瓶……叶夫多克西雅一直讲个不停；西特尼科夫附和着她。他们讨论得最久的问题是——婚姻究竟是一种偏见呢，还是一种罪行；人们是不是生来平等的；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等等。叶夫多克西雅后来喝得一脸通红，她的扁平的指尖打着一个音节失调的钢琴的键盘，她声音嘶哑地唱起歌来，起初唱着茨冈② 的歌子，以后又唱色摩尔-希弗③ 的抒情歌《瞌睡的格拉纳达睡着了》；西特尼科夫把一条围巾包在头上，扮着死去的恋人。她唱道：

你的嘴唇亲着我的，

① 这是用法国腔摹仿的碰杯的声音。

② 茨冈：或译吉卜赛人，源出印度，现在散居苏联、土耳其、匈牙利、西班牙等处的流浪民族。

③ 色摩尔-希弗：欧洲作曲家，钢琴家，十九世纪中期不止一次地到俄国举办演奏会。

接一个热烈的吻……

阿尔卡狄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诸位，这快要变成疯人院了，”他高声说。

巴扎罗夫这些时候只顾喝香槟，不过偶尔插进一句挖苦的话，他大声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也不向女主人告辞，就同阿尔卡狄一块儿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来，跟着他们出去。

“喂，怎样，喂，怎样?”他问道，一面讨好地在他们的左右两边跳来跳去。“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吗！我们得多有几个这样的女人！像她这种性质的女人实在是一个崇高道德的现象。”

“那么你爸爸那个铺子也是一个道德的现象吗?”巴扎罗夫指着他们正走过的一家酒铺说。

西特尼科夫又尖声地笑起来。他平素总觉得自己的出身很不体面，因此他对于巴扎罗夫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巴扎罗夫不用“您”却用“你”称呼他)，便不知道应该引以为荣呢，还是应该生气。

一四

几天以后省长家里的跳舞会举行了。玛特维·伊里奇是这个舞会的真正的“主角”。本省首席贵族逢人便说他只是为了尊敬玛特维才来的；而省长呢，就是在跳舞会中，虽然他动也不动一下，却仍然不停地“发号施令”。玛特维·伊里奇的态

度的和蔼同尊严相等。他对待所有的人都很殷勤，只是对某一些人带一点儿厌恶，对另一些人多一点儿尊敬罢了。他在太太小姐面前总是 en vrai chevalier français①献殷勤，他还时时发出一阵爽朗、响亮、干脆的笑声，这种笑声也是跟一位高级官员的身份相称的。他拍拍阿尔卡狄的背，高声唤他“亲爱的外甥”；对那个穿了一件相当旧的礼服的巴扎罗夫，他不过顺便赏赐一瞥心不在焉的、俯就的斜视，吐出一句含含糊糊的客气话，不过这全是喉音，只听得出“我”同“很”这两个字；他伸了一根手指给西特尼科夫，对他笑了笑，可是他的头已经掉向别处去了；便是对库克希娜（她参加跳舞会也没有穿上硬的撑裙，还戴一副脏手套，头发上戴了一只极乐鸟），他也说了一声“enchanté”②。到会的人很多，跳舞的男客也不少；文官大都挤在墙边，军官们跳得很起劲，特别是一个在巴黎住过六个星期的人，他学会了种种下流的感叹辞，如“Zut”，“Ah fichtrrre”，“Pst, pst, mon bibi”③等等。他念音非常准确，是纯粹的巴黎腔，同时他又把“si j'aurais”当作“si j'avais”用④；把“absolument”（绝对）当作“一定”解释，事实上他说的是那种大俄罗斯的法国土话，给法国人听见了，要是他们觉得用不着恭维我们说我们讲法国话跟天使一样，“comme des anges”⑤的话，他们

① 法语：像真正的法国骑士那样。——原注
② 法语：很荣幸。——原注
③ 法语：“讨厌”，“见鬼”，“嘘，嘘，我的小乖乖”。——原注
④ 把“倘使我有”的假定式当作过去进行式。
⑤ 法语：讲得十二分地好。——原注

是会捧腹大笑的。

我们已经知道阿尔卡狄不大会跳舞，巴扎罗夫却完全不会：他们两个人便站在一个角落里，西特尼科夫也到这儿来了。他的脸上带着轻蔑的冷笑，口里任意发出刻毒的批评，他傲慢地向四处张望，好像真正感到愉快似的。突然他变了脸色，转过脸向着阿尔卡狄，好像很窘地说："奥津左娃来了！"

阿尔卡狄掉头望去，看见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厅子门口。她的高贵的举止引起了他的注意。她那两只下垂的光洁的膀子给她的非常匀称的身体添了几分美丽；两三小枝吊金钟花跟着她那光泽的柔发优美地垂到微斜的肩头；一对明亮的眼睛在一个稍微突出的雪白的前额下露出来，带着一种安静的、敏慧的表情(这的的确确是安静的，不是若有所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留在她的嘴唇上。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亲切而温柔的力量。

"您认得她吗？"阿尔卡狄问西特尼科夫道。

"很熟。您要我给您介绍吗？"

"请您介绍吧……等这次四组舞跳完以后。"

巴扎罗夫也注意到了奥津左娃。

"这女人是谁啊？"他说。"跟别的女人完全不同。"

等着四组舞一停，西特尼科夫便带着阿尔卡狄去见奥津左娃；可是他并不像是同她很熟的样子；他窘得连话也说不上来了，她带一点儿惊讶地望着他。不过她听到阿尔卡狄的姓，脸上立刻现出高兴的神色。她问他是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儿子。

“正是。”

“我见过您父亲两次，又常常听见人谈起他，”她接着说：“我很高兴跟您认识。”

这个时候一个副官跑过来，要求她同跳四组舞。她答应了。

“那么您也跳舞吗？”阿尔卡狄恭敬地问道。

“是的，我跳舞。可是为什么您以为我不跳舞呢？您觉得我太老了吗？”

“哪儿的话，您怎么能够……那么我求您答应同我跳一次玛组卡舞吧。”

奥津左娃温柔地笑了笑。

“好，”她说，她看了阿尔卡狄一眼，眼里的表情并不能说是高傲，不过像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在看一个年纪很轻的弟弟那样。

奥津左娃比阿尔卡狄大不了几岁，她刚二十九岁，可是他在她面前，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学生，一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因此他们中间年龄的相差显得更大一些。玛特维·伊里奇带着庄严的神气和奉承的话走到她身边来。阿尔卡狄退在一边，可是依旧留心看她：便是在她跳四组舞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她。她跟她的舞伴讲话就像她跟那位大官讲话一样，态度非常自然，她轻轻地动她的头和眼睛，她轻轻地笑了两三次。她的鼻子跟差不多所有的俄国人的鼻子一样，略有一点儿肥大；她的肤色并不十分白净；可是阿尔卡狄不管这些，他仍然断定他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一个动人的女子。她

的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萦绕;连她的衣服的褶痕在她身上也跟在别的女人身上有些差别似的,在她身上便显得更调和,更飘逸,并且她的举止也是特别地从容而又自然。

玛组卡舞的曲子刚奏起来,阿尔卡狄在他的舞伴旁边坐下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有点儿胆怯;他早已准备好跟她谈话,可是他只有伸手去摸头发,找不出一句话来说。不过他的害怕和激动并没有延长多久,奥津左娃的安静也传染给他了;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他就毫无拘束地跟她谈到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以及他在彼得堡和在乡下的生活。奥津左娃带着客气的注意听他讲话,轻轻地张开或者阖上她的扇子;有时客人们来请她去跳舞,他那唠唠叨叨的话便中断了;单是西特尼科夫就来请过她两次。她回来,又在原处坐下,拿起她的扇子,她的胸脯也并不跳得更急;阿尔卡狄又谈起来,渐渐地感到在她身边,跟她谈话,看她的眼睛,看她的可爱的前额,看她那美丽、端庄、聪慧的脸,这是多大的幸福。她讲话不多,可是她的话里流露出她的生活的知识;从她的某一些话,阿尔卡狄便断定这个年轻女人已经感到并且想到很多了。……

"西特尼科夫先生带您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跟您站在一块儿的那个人是谁?"她问他道。

"您注意到他吗?"阿尔卡狄反转来问道。"他的相貌很不错,是不是? 他叫做巴扎罗夫,我的朋友。"

阿尔卡狄便谈起他的"朋友"来。

他讲得这样详细,这样热心,所以奥津左娃不由得掉过头向着他,注意地望了他。这时候玛组卡舞快完了。阿尔卡狄

惋惜着就要跟他的舞伴分开;他同她在一块儿过了差不多一个钟点,过得这么快乐! 固然他自始至终都觉得她好像是在俯就他,他好像应当感激她似的……可是这种感觉不会叫年轻的心痛苦。

乐声停止了。

"Merci①,"奥津左娃说,便站起来,"您答应了来看我的;那么把您的朋友也带来。我很想见见这位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省长走到奥津左娃面前,说晚餐已经预备好了,他带着有心事的面容把胳膊伸给她。她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阿尔卡狄最后地笑一笑,点一个头。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那闪着银灰色光辉的黑绸子裹身的体态在他的眼里显得多窈窕!),他心里想;"这个时候她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了。"他的心灵中有了一种高雅的谦卑的感觉。……

"喂,怎样?"阿尔卡狄回到巴扎罗夫的那个角落里,巴扎罗夫马上问他道。"你玩得好吗? 一个绅士刚刚跟我谈过,说那位太太是——哦—哦—哦! 不过我觉得那个绅士是一个傻瓜。依你看来,她真是——哦—哦—哦吗?"

"我不大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阿尔卡狄答道。

"什么! 多么天真!"

"那么,我就不懂你那位绅士了。奥津左娃很可爱——这是用不着争论的,不过她是那么冷,并且又是那么严肃,所

① 法语:谢谢。

以……"

"静止的水里① ……你知道!"巴扎罗夫插嘴说。"你说她冷,味道就在这里头。我想你喜欢冰淇淋吧。"

"也许是的,"阿尔卡狄喃喃地说。"我不能下一个判断。她想认识你,要我带你去看她。"

"我可以想象到你把我怎样地形容了一番。不过你干得很好。带我去吧。不管她是什么人——她只是一个外省的女王也好,或者像库克希娜那样的'解放的女性'也好,至少她那对肩膀是我好久没有看到的。"

巴扎罗夫的冷言冷语伤害了阿尔卡狄,可是事情往往这样,阿尔卡狄责备巴扎罗夫的地方却并不是他不喜欢巴扎罗夫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女人有思想的自由呢?"他低声问道。

"因为,小兄弟,据我看来,在女人中间只有一些怪物才自由地思想。"

他们的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吃过晚饭以后,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告辞走了。一阵神经质的、恶意的、但又有点儿胆怯的笑声跟在他们后面,那是库克希娜的;她的虚荣心大大地受伤了,因为这个晚上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过她。她在跳舞会里耽搁得最久,到早晨四点钟她还同西特尼科夫跳了一次巴黎式的波尔卡—玛组卡舞。这个有启发性的表演便是省长的舞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① 俄谚:"静止的水里有鬼。"意思是:表面正经心里坏。

一五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人物是属于哺乳动物的哪一种类，”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那个时候他们正走上奥津左娃住的旅馆的楼梯。“我的鼻子闻着这儿有点儿不对。”

“我想不到你会是这样！”阿尔卡狄大声说。“怎么？你，你，巴扎罗夫，会有狭隘的道德观念……”

“你真是古怪的家伙！”巴扎罗夫毫不在意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你不知道照我们的讲法，而且在我们这种人的中间，‘有点儿不对’就是‘有点儿对’的意思吗？这就是说，有好处。你今天不是对我讲过她的婚姻奇怪吗？不过据我看来，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反倒是很有见识的。我不相信城里一般人的闲话；不过我倒愿意承认，用我们这位高明的省长的话来说吧，这是不错的。”

阿尔卡狄并不回答，他敲起房门来。一个穿号衣的年轻听差把这两个朋友引进一个宽大的房间，这跟所有俄国旅馆的房间一样，陈设并不好；不过房里到处都是鲜花。不多久奥津左娃穿着一件朴素的早晨的便衣出来了。她在春天的阳光里看起来似乎年轻多了。阿尔卡狄介绍了巴扎罗夫，他暗暗吃惊地发觉巴扎罗夫好像有一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而奥津左娃却和前一天一样，非常安静。巴扎罗夫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局促不安，便生起气来。“这像什么话！——怕起女人来

了!”他想道,他居然像西特尼科夫那样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装出非常自然的神气谈起来,奥津左娃那对明亮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奥津左娃是谢尔盖·尼可拉叶维奇·洛克捷夫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美男子、投机家和赌徒,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足足出了十五年的风头,结果把财产输光了,不得不搬到乡下去住,不到多久他便死在乡下,留下一份很小的遗产给两个女儿——二十岁的安娜和十二岁①的卡捷林娜。她们的母亲是中落的赫公爵家里的一位小姐,她在她丈夫的全盛时期中病死在彼得堡。在父亲逝世以后,安娜的处境非常苦。她在彼得堡受的那种出色的教育并不适宜于料理田地和家务的琐事——更不宜于过乡间的无聊岁月。在这个地方她连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个她可以去商量请教的人。她的父亲活着的时候竭力避免跟邻舍来往;他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看不起他,各人有各人的道理。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并不慌张,她马上请了母亲的姊姊阿夫多契雅·司捷潘诺夫娜·赫公爵夫人来。这个刻薄、傲慢的老太太来的那天就把宅子里几间最好的屋子占据了,而且从早到晚,总是在骂人诉苦;不说出门,就是到花园里散散步,她也要叫她那个唯一的农奴跟随伺候,这个整天板面孔的听差穿一件破旧的、浅蓝色滚边的、豌豆绿的号衣,戴一顶三角帽。安娜

① “十二岁”恐是“九岁”之误,因为根据十四章和十六章来说,安娜比卡契雅实际上长十一岁。参看第一一八页注①。

耐心地忍受她姨母的一切的怪脾气，按部就班地安排她妹妹的教育；并且似乎已经死了心准备在偏僻的乡下过一辈子了……可是命运却给她安排了另一种生活。她偶然被一个四十六岁的大富翁奥津左夫看见了，那是一个古怪的忧郁病患者，身体肥胖，不灵活，性情固执，可是人并不愚蠢，脾气也不坏；他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他，他跟她一块儿生活了六年，临死把全部财产都遗留给她。在他死后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还在乡下差不多住了一年；后来她带着她妹妹到外国去游历，可是只到了德国；她厌烦了，便回到国内，住在她心爱的村子尼可尔斯柯耶，那地方离某城有四十里的光景。在那儿她有一所富丽堂皇、陈设精致的宅子，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园里修建了一些温室；她那个亡故的丈夫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方面是不惜花钱的。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很少进城，总是有事情才去，就是去了也住不久。省城里的人都不喜欢她；她跟奥津左夫结婚的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攻击，外面流传着种种关于她的谣言，说她曾经帮忙父亲在赌钱时作弊，说她到外国去也有特别的原因，她不得不出去掩饰那不幸的结果。① ……“您明白了吧？”那些愤怒的散布谣言的人最后结束道。“她是经过了水火的呢，”有些人这样批评她；省城里一个著名的爱讲俏皮话的才子常常加上一句：“也经过铜管呢。”② 这些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却当作没有听见似的，因为她有着独立的

① 大概是说她有了外遇，去外国生小孩儿。

② 俄谚：有“饱经沧桑”，“什么事都干过”的意思。

和相当坚决的性格。

奥津左娃靠在椅背上，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一面听巴扎罗夫讲话。他这天跟他往常的习惯相反，讲了相当多的话，而且显然想引起她的兴趣——这又是叫阿尔卡狄吃惊的。他并不能够断定巴扎罗夫有没有达到目的。从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脸上，他很难看出巴扎罗夫给了她什么样的印象：她脸上仍旧保持着亲切的、优雅的表情；她那美丽的双目因了注意而闪光，但这却是不动感情的注意。巴扎罗夫的不自然的态度起初给了她一种不好的印象，就像是一股不好闻的气味，或者一个刺耳的声音；可是她立刻明白他只是局促不安，因此她反而得意起来。她最厌恶庸俗，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庸俗来责备巴扎罗夫。这天阿尔卡狄接连地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他以为巴扎罗夫对着奥津左娃那样聪明的女人一定会谈论他的主张和见解了：她自己也表示过愿意听这个“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谈话的；可是巴扎罗夫并不谈那些，却只谈医学，谈顺势疗法，谈植物学。他们发觉奥津左娃并没有在孤寂中虚度她的光阴：她读了不少好书，而且会说一口正确、流利的俄国话①。她谈到音乐，可是看见巴扎罗夫不承认艺术，她又很自然地把话题拉回到植物学上面，也不顾阿尔卡狄已经开始在大谈民歌旋律的价值了。奥津左娃把阿尔卡狄当作一个弟弟；她似乎很喜欢他的温厚和年轻人的单

---

①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的人习惯讲法国话（其次是德国话），只有对家仆等等才完全说俄国话。

纯——但也就尽于此了。他们从容地、活泼地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而且话题时常变换。

最后这两个朋友站起来告辞。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亲切地望着他们，伸出她的美丽白净的手给他们，她想了一忽儿，便带着一种犹豫不决的、却又是愉快的微笑说：

"要是两位不嫌沉闷的话，先生们，请到尼可尔斯柯耶我那儿来玩吧。"

"哪儿的话，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阿尔卡狄大声说，"我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

"您呢，麦歇巴扎罗夫？"

巴扎罗夫只鞠了一个躬，还有最后一个惊讶在等着阿尔卡狄：他看见他的朋友脸红了。

"怎么样？"他在街上对巴扎罗夫说；"你还是照先前那种意见，说她是——哦—哦—哦吗？"

"谁知道？你瞧，她那态度多么冷！"巴扎罗夫答道；他停了一忽儿又说："她是一位完完全全的公爵夫人，一位女王。她只差衣服后面的长裾和头上的王冠罢了。"

"我们的公爵夫人讲俄国话也不会有这样好，"阿尔卡狄说。

"她是尝过生活的苦味来的，我的小兄弟，她也吃过我们吃的面包。"

"无论如何，她很可爱，"阿尔卡狄说。

"多么出色的身体！"巴扎罗夫接着说。"应当马上送到解剖教室去。"

"闭嘴,不要乱讲,叶夫盖尼!这太不像话了。"

"呵,不要生气,你这小孩子。我是说第一流的身体。我们一定要到她家里去住。"

"什么时候去?"

"好,就是后天吧。我们待在这儿又干些什么呢?跟库克希娜一块儿喝香槟吗?听你那位亲戚,那位自由主义的大人物吹牛吗?……我们还是后天走吧。而且,我父亲那个小庄子离那儿也不远。这个尼可尔斯柯耶是在某路上,不是吗?"

"是的。"

"Optime.[①]干吗还要耽搁呢?那是傻瓜,不然就是聪明人的事情。我跟你说,那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身体!"

三天以后,这两个朋友坐车到尼可尔斯柯耶去。天气很好,也不太热,几匹驿站的、喂得饱饱的马步伐整齐地跑着,轻轻地摇动它们的编成辫子的尾巴。阿尔卡狄望着大路,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微微笑起来。

"给我道喜吧,"巴扎罗夫突然嚷道,"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是我的守护天使的日子[②]。看他怎样来守护我。家里的人今天在等我回去,"他又放低声音说……"好,让他们等吧……这有什么要紧!"

① 拉丁文:很好。——原注

② 守护天使的日子:即命名日,和本人同名的天使的纪念日。

一六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庄子坐落在一座倾斜的、没有掩蔽的小山上，附近有一所黄色石头砌的教堂：它有绿的屋顶，白的圆柱，正门上面有一幅“意大利”风的《基督复活》的 al fresco①。在这幅画上，一个戴盔的、皮肤黝黑的武士伏在前面，他那肥圆的形状特别引人注目。教堂后面长长的拖着两排村里的房屋，茅草的屋顶上凌乱地竖起一些烟囱来。宅子的建筑和教堂同一个样式，就是我们所称为亚历山大式的；这所宅子也漆成了黄色，也有绿的屋顶，白的柱子，三角形的门楣上绘着这一家的纹章②。当初省城里的建筑师设计修建这两所房屋的时候，他曾得到去世的奥津左夫的赞许，这位奥津左夫，据他自己说，看不惯那些毫无用处的、随便弄出来的新花样。宅子两边长着古园的参天的乔木，大门外有一条剪过枝的枞树荫路。

两个穿号衣的、身材高大的听差在大厅上迎接我们这两位朋友，其中的一个立刻跑去通知管事③。那个身体肥胖的管事穿着一件黑色礼服马上出现了，他引着客人走上一条铺

① 意大利语：壁画。——原注

② 纹章：即用来表示宗谱的纹章图案。欧洲旧日贵族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

③ 管事：在地主宅子里管理家务的人。

着地毯的楼梯，到了一间特别的屋子，这里面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两张床和全副盥洗的用具。显而易见，宅子里是很有秩序的；什么东西都是干干净净，到处都有一种特别好闻的香味，这就像在各部大臣的会客室里一样。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请两位在半点钟以后下去相见，”管事通知说。“现在您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什么吩咐，”巴扎罗夫答道。“或者要麻烦您拿一杯伏特加来。”

“是，先生，”管事说，露出一点儿惊奇的神情，便退出了，他走起路来，只听见皮靴咯吱咯吱地响。

“好大的气派！”巴扎罗夫说。“你们那班人是这样说的吧，是不是？一句话说完，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就是了。”

“一位漂亮的公爵夫人，”阿尔卡狄回嘴说，“她见第一次面就把我们两位大贵族请到她家里来住了。”

“尤其是我，一个未来的医生，而是医生的儿子，教堂杂役的孙子……我想，你知道我是一个教堂杂役的孙子吧？……”

“就跟斯彼兰斯基① 一样。”巴扎罗夫停了一忽儿，又撇了撇嘴接着说下去。“无论如何，她是娇养惯了的；呵，这位太太是怎样地娇养惯了啊！我们还得穿上礼服吗？”

阿尔卡狄只是耸了耸肩，……不过他也有点儿局促不安了。

① 斯彼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政治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他为了巩固专制政体而提出一个温和的国家改革草案。他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

半点钟以后巴扎罗夫同阿尔卡狄一块儿走进了客厅。这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屋子，陈设相当富丽，可是趣味并不太高。一些笨重的、值钱的家具全照老规矩那样顺着墙壁安放，糊墙壁的花纸是棕色的，上面印着金花；这些家具还是奥津左夫生前托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代理人，一个酒商从莫斯科买来的。在一面墙壁的正中地方放着一张沙发，沙发上头挂着一个脸颊浮肿的、金黄头发的男人的像——他好像不高兴地望着客人。“一定是他了，”巴扎罗夫低声对阿尔卡狄说，他皱起鼻子，加上一句：“我们还是逃走吧？”可是这个时候女主人进来了。她穿了一件薄纱衫子。她的头发很光滑的梳到了耳朵后边，使她那纯洁、容光焕发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女的风韵。

“谢谢你们守约来了，”她说。“请你们在我这儿住些时候；这地方的确不坏。我要给你们介绍我的妹妹；她弹钢琴弹得好。您对这个是没有兴趣的，麦歇巴扎罗夫；可是您，麦歇基尔沙诺夫，我想您是喜欢音乐的。除了我妹妹以外，我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姨妈住在这儿，此外还有一个邻居有时候过来打打牌；我们这个圈子就只有这么几个人。现在我们坐下吧。”

奥津左娃发表这一篇短短的欢迎辞，发音吐字都非常准确清楚，好像她早记熟了似的；接着她就跟阿尔卡狄谈起来。她的母亲原来是跟阿尔卡狄的母亲认识的，并且阿尔卡狄的母亲跟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恋爱的时候，她的母亲还是阿尔卡狄的母亲的知心朋友。阿尔卡狄便热心地谈起他的亡母来；巴扎罗夫在翻看那些画片册子。“我变得多么驯良了，”他暗

暗想道。

一条戴着蓝色颈圈的漂亮猎狗跑进客厅里来，爪子拍着地板，它后面跟着一个十八岁的少女①：黑头发，浅褐色皮肤，一张相当圆的、讨人喜欢的脸，一对不大的黑眼睛。她手里提着一篮子的花。

“这是我的卡契雅，”奥津左娃说，她朝她的妹妹点一下头算是介绍。

卡契雅略微行一个礼，便坐在她姊姊身边，挑选她的花。那条猎狗名叫非非，它轮流地跑到两个客人跟前，摇摆尾巴，并且把它的冷的鼻子放在他们的手上。

“那都是你自己摘的？”奥津左娃问道。

“我自己摘的，”卡契雅答道。

“姨妈来喝茶吗？”

“她来。”

卡契雅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这笑容是很动人的、害羞的、坦白的；她又做出一种又滑稽又正经的样子偷偷望她的姊姊。她的一切都是非常年轻的，还没有成熟的：她的声音，她脸上的柔毛，粉红色的手带着白净的、起涡的掌心，略微瘦削的两肩……她不住地红脸，喘气。

奥津左娃掉头向着巴扎罗夫说：

---

① 作者在第十四章中说安娜二十九岁，在第十五章中说她们姊妹的父亲逝世的时候安娜只有二十岁，卡契雅十二岁，是安娜比卡契雅只大八岁，这里说卡契雅十八岁，那么安娜比卡契雅大十一岁了。“十二岁”恐是“九岁”之误。

“您是出于礼貌，才一个人看画片吧，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她开始说。“那不会使您发生兴趣的。您还是坐近我们，让我们来辩论什么吧。”

巴扎罗夫坐近了一点儿。

“您想要我们辩论什么呢？”他说。

“随您高兴吧。我警告您，我是个非常喜欢争论的人。”

“您？”

“我。好像这叫您诧异了。为什么呢？”

“因为照我的判断，您的性情是平稳的、冷静的。可是争论需要着热情。”

“您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明白了我的性情呢？第一，我性子急，又固执——您最好问问卡契雅；第二，我很容易激动。”

巴扎罗夫望着安娜·谢尔盖叶夫娜。

“也许，您知道得更清楚些。您既然高兴辩论——就请吧。我刚才在看您的画片册子里的萨克逊瑞士① 的风景，您说那不会叫我感到兴趣。您这样说，是因为您以为我没有艺术的理解，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可是从地质学的观点看来这些风景也许会引起我的兴趣，譬如说，从山脉构成的观点看来。”

“请您原谅；我以为做一个地质学家，就应当去念这一门学问的书籍、专著，不会去看图画的。”

“一本书用了整整十页的篇幅说明的事情，我只要看一幅图画立刻就清楚了。”

① 指德国南部萨克逊邦的群山，因风景优美，故又称萨克逊瑞士。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静了一忽儿。

“那么您连一点儿艺术的理解都没有吗?”她说,把肘搁在桌上,这样一来她的脸离巴扎罗夫更近了些。“您怎么能够没有它呢?”

“我倒要请教,要它来干什么呢?”

“它至少可以教您去了解,去研究人。”

巴扎罗夫笑了笑。

“第一,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做到那一点;第二,我告诉您,研究个别的人只是白费功夫。所有的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彼此相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同样构造的脑筋、脾脏、心、肺;便是所谓精神的品质也都是一样的;那些小的变异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有一个人来作标本,我们便可以判断所有的人了。人就像一座林子里的树木,没有一个植物学家会想起去把一棵一棵的桦树拿来分别研究的。”

卡契雅正在慢慢地一朵一朵地配着花,这个时候吃惊地抬起头来望巴扎罗夫,碰到了他那敏速的、随便的眼光,她连耳根都红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摇了摇头。

“一座林子里的树木,”她跟着他说了一遍。“那么照您看来,聪明人跟愚蠢人,好人跟坏人是没有差别的了?”

“不,有差别的:就像病人跟健康人的差别一样。一个害肺病的人的肺部跟你我的肺部情形不同,虽然它们的构造原先也是一样的。我们大概知道身体上的病是从哪儿来的;精神上的病却是从坏的教育来的,是从自小就塞满在人们脑子里的种种胡话来的,一句话说完,是从不健全的社会情形来

的。社会一改造,病就不会有了。"

巴扎罗夫说这番话的时候,看他的神情好像他自始至终都在对自己说:"信不信由您;在我都是一样!"他慢慢地伸起他那长长的手指去摸他的连鬓胡子,他的眼光就在几个角落里打转。

"那么您认为,"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只要社会一改造,就不会有笨人同坏人了?"

"无论如何,在合理的社会组织里面,一个人不管是愚蠢,是聪明,是坏是好,都是一样的。"

"是的,我明白;他们的脾脏都是一样的。"

"正是这样,太太。"

奥津左娃转身向着阿尔卡狄。"那么您的意见怎样呢,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

"我赞成叶夫盖尼的意见,"他答道。

卡契雅偷偷看了他一眼。

"您两位叫我吃惊,"奥津左娃说,"可是我们以后再讨论吧。现在我听见我姨妈过来喝茶了;我们不要在她面前谈这些话。"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姨母赫公爵夫人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一张干瘪的脸缩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拳头那样大,一对恶狠狠的眼睛在花白的假发下面注意地望着人,她走进屋子来,不大招呼客人,就在宽大的天鹅绒的扶手椅上面坐了。这把椅子是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坐的。卡契雅放了一个脚凳在她的脚下;这个老太太也不谢一声,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有她的

两只手在那差不多盖住她整个瘦小身子的黄色披巾下面微微地摇动。公爵夫人喜欢黄色，她的便帽上也束着浅黄色的丝带。

"您睡得怎样，姨妈？"奥津左娃提高声音问道。

"那条狗又在这儿了，"老太太喃喃地答道，她看见非非迟疑不决地朝着她走了两步，便叫道："去……去！"

卡契雅唤着非非，一面去给它开了门。

非非很高兴地跑出去，还以为是领它出去散步了；可是它看见自己孤零零的给关在门外，就开始用爪子抓门，叫起来。公爵夫人皱起眉头。卡契雅正打算出去……

"我想茶已经预备好了，"奥津左娃说。"请吧，先生们。姨妈，请您去喝茶。"

公爵夫人一声不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带头走出了客厅。他们全跟在后面进了饭厅。一个穿号衣的小用人从桌子那儿轧轧地拉出一把已经放上几个垫子的扶手椅来，这也是专给她一个人坐的椅子，她坐了下去；卡契雅来斟茶，给她端了第一杯茶过去，这个杯子上面也印着这一家的纹章的图案。老太太放了一点蜂蜜在茶杯里（她觉得喝茶放糖是罪过①，又是浪费，虽然事实上她自己从来没有在糖上花过一个戈比），她忽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伊凡公觉② 信里讲些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巴扎罗夫同阿尔卡狄立刻猜到，她

① 这是宗教上的迷信。

② 这里的"公觉"：即"公爵"，公爵夫人念得不清楚。

们对她虽然很恭敬,可是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她是给养来做幌子的,”巴扎罗夫想道,“只是为了她那贵族的身份。”喝过茶,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提议出去散一忽儿步;可是外面落起小雨来了,因此除了公爵夫人一个人以外全回到客厅里去了。那个爱打牌的邻居来了。他的名字叫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花白了,两腿很短,就像在车床上车出来的一样;他很有礼貌,又很爱笑。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仍然专同巴扎罗夫讲话,她问他是不是愿意同他们打一回旧式的“胜牌”①,巴扎罗夫答应了,他说他应当事先准备好去尽他那县城医生的职责。

“您得小心,”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同我两个会打败您的。你呢,卡契雅,你去弹点儿什么给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听;他喜欢音乐,而且我们也可以听。”

卡契雅不大乐意地走到钢琴前面去,阿尔卡狄虽然喜欢音乐,却也不大乐意地跟在她后面;他觉得奥津左娃好像在赶他走开似的,他跟所有的这样年纪的年轻人一样,已经感到一种朦胧的、折磨人的情感在他的心中涌起来了,这像是恋爱的预兆。卡契雅揭开钢琴的盖子,并不去望阿尔卡狄,她低声问道:

“您要我弹什么呢?”

“随您的意思吧,”他冷淡地答道。

① “胜牌”:一种类似“威斯特”的纸牌戏。

“您挺喜欢哪一种音乐呢?”卡契雅再问一句,并没有改变姿势。

“古典的,”阿尔卡狄仍旧用冷淡的调子回答。

“您喜欢莫扎尔特[①] 吗?”

“我喜欢莫扎尔特。”

卡契雅拿出莫扎尔特的C小调奏鸣曲中的幻想曲的谱子。她弹得很好,不过太严谨、太呆板一点儿。她挺起身子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眼光一直定在乐谱上面,嘴唇闭得紧紧的,只有在这奏鸣曲快完结的时候,她的脸才红起来,一股头发散垂下来,搭在她的黑眉上。

奏鸣曲的最后一部分叫阿尔卡狄特别感动,在那无忧无虑的旋律的醉人的欢乐中间突然闯进来十分悲惨的而且几乎是悲剧的痛苦。……可是莫扎尔特的音乐在他心中引起的思想却跟卡契雅没有一点儿关系。他望着她,心里不过在想:“哦,这位年轻小姐弹得并不坏,她长得也不难看。”

卡契雅弹完了奏鸣曲,两只手仍然放在键盘上,她问道:“够了吗?”阿尔卡狄回答说,他不敢再麻烦她了,便跟她谈起莫扎尔特来;他问她这奏鸣曲是她自己挑选的,还是别人介绍她的?可是卡契雅回答得非常简单:她藏起来了,缩回到她的壳里去了。她一遇到这种情形,就不轻易再出来;在这种时候她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种固执的、差不多是呆板的表情。她并不一定害羞,却是不相信人,而且有点儿让那个把她教育大了

① 莫扎尔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

的姊姊吓唬住了，这个事实不用说她的姊姊一点儿也没有想到。阿尔卡狄末了只好把非非(它已经回来了)叫到他跟前，他带着温和的微笑拍拍它的头。卡契雅又动手去理她的花。

这些时候巴扎罗夫接连输着。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打牌打得很精；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也能够保本，巴扎罗夫是输家，输的数目虽然不大，可是他已经有点儿不高兴了。吃晚饭的时候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又谈起植物学。

"明天早晨我们一块儿散步去吧，"她对他说，"我想请您教我那些野花的拉丁学名同它们的属性。"

"拉丁学名对您有什么用处呢?"巴扎罗夫问道。

"每样东西都应当有秩序，"她答道。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阿尔卡狄回到了这家女主人给他和他朋友预备好的屋子里，忍不住这样地嚷起来。

"不错，"巴扎罗夫答道，"一个有脑筋的女人。唔，她也见过世面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

"是好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好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相信她把她的田产管理得非常之好。可是了不起的并不是她，却是她的妹妹。"

"什么，那个浅黑色的姑娘吗?"

"不错，那个浅黑色的姑娘。她是新鲜的、纯洁的、害羞的、不大讲话的，并且还有这样那样，任你怎么说都可以。她是值得人关心的。你想把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造成

什么样的人;可是另一个呢——那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

阿尔卡狄并不回答巴扎罗夫,他们两个人上床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心思。

这个晚上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也在想她的客人。她喜欢巴扎罗夫,因为他没有那种对女人的殷勤,还因为他有那些锋利的见解。她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新的东西,而她又是一个好奇的女人。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她没有一点成见,也没有坚定的信仰,她遇着什么事情从来不退缩,但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她把许多事情看得十分清楚;她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兴趣,可是没有一样使她完全满足过;事实上她也不要求完全的满足。她的智力一方面想了解一切,同时对一切都很冷淡:她的怀疑从没有平息到使她忘怀的程度,它们也不曾发展到足以使她烦恼。要是她没有钱,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她也许会投身到斗争中去,而且会认识到什么是激情……可是她的生活太舒适了,虽然她有时候也感到厌倦;她一天一天地过着悠闲的日子,从来没有匆忙的时候,也难得有过激动不安。固然有时候在她的眼前也现过虹彩,可是在它们消逝以后她反倒呼吸得更自由,对它们并没有丝毫的惋惜。她的想象甚至于超过了一般的道德法规所认为可以容许的范围;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她的血液仍然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在她那非常匀称的、宁静的身子里循环流动。有时在香汤沐浴之后她浑身暖融融的没有一点力气,她便会想到人生的空虚、烦恼、艰苦、罪恶。……她的心灵中便会充满突如其来的勇气,而且涌起高

尚的渴望；可是只要有一阵风从半掩的窗户吹进来，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就会缩着身子、抱怨，而且差不多要发脾气了，那个时候她只有一个要求：这种可恨的风不要吹到她的身上。

她跟所有的没有真正恋爱过的女人一样，总是想望着什么东西，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想望的是什么。严格说来，她并不想望什么，可是她又觉得自己对什么东西都想望似的。她差一点儿忍受不了那个死去的奥津左夫（她嫁给他是为着生活打算，不过要是她不把他看作一个好人，她不见得就会答应结婚），因此她暗暗地怀着一种对一切男人的憎恶，她把男人都当作不干净的、粗笨的、懒惰的、软弱而讨厌的东西。有一回她在国外一个地方遇见一个年轻漂亮的瑞典人，带着一种骑士的风度，宽广的前额下配上一对诚实的蓝眼睛；他给她的印象很深，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她回到俄国来。

"这个医生是一个古怪的人！"她躺在华美的床上，枕着花边的枕头，身上盖一条薄薄的绸被子，心里这样想道。……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从她的父亲那儿多少继承到一点儿爱奢华的癖性。她很爱她那个虽然不务正业而心地善良的父亲。他也十分宠她，常常和善地跟她开玩笑，好像把她看作平辈一样似的；他非常信任她，什么事都跟她商量。至于她的母亲，她差不多忘记她了。

"这个医生真是一个怪人！"她又对自己说。她伸一伸腰，微微一笑，把一双手放在脑后，然后跑马似地看了一两页无聊的法国小说，便丢开书——睡着了，纯洁而冷静，清洁芬芳的衬衣裹住她那洁白的、冷冷的身子。

第二天上午刚刚用过早饭，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便陪巴扎罗夫去采集植物，在午饭时间才赶回来；阿尔卡狄没有出去，他跟卡契雅在一块儿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觉得她并不讨厌；她自动地把前一天弹过的奏鸣曲为他再弹了一遍；可是后来奥津左娃终于回来了，他看见她，心里马上难过起来。……她有些脚步疲乏地穿过花园走来；她两颊鲜红，一双眼睛在她那顶圆圆的草帽下面显得比平日更明亮。她的手指玩弄着一枝野花的细茎，那件薄薄的短外套滑落到她的肘上，帽上的宽丝带飘到她的胸前。巴扎罗夫走在她后面，还是他那跟往常一样的充满自信而又随便的态度，他的脸上虽然露出喜欢的、甚至亲切的表情，可是阿尔卡狄看见，心里并不高兴。巴扎罗夫含糊地从牙缝里吐出一声："早安！"便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奥津左娃心不在焉地跟阿尔卡狄握一握手，也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

"早安！……"阿尔卡狄心里想道。"难道我们今天还没有见过面吗？"

一七

人人知道，时间有时候像鸟一样地飞着，有时候像蛆一样地爬着；不过要是一个人连时间究竟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也不觉得，他便是很幸福的了。阿尔卡狄同巴扎罗夫正是这样地在奥津左娃家里过了两个星期。他们能够这样住下去，一半还是因为她在她的家庭同生活两方面都规定了良好的秩序。

她自己严格遵守这秩序，也叫别人不得不服从。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早晨整八点钟全家的人都聚在一块儿吃早茶；从早茶到早饭的时间里面，各人随意做自己的事，女主人便接见她的总管（她在田产管理上采用了收租的办法）、她的管事和她的女管家，处理一些事情。午饭前大家又聚在一块儿，或是谈话，或是看书；晚上不是出去散步，就是打牌，或者弄音乐；到晚上十点半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发出命令安排第二天的事情，然后上床睡觉。巴扎罗夫不喜欢日常生活中用这种有规律的并且带一点儿做作意味的守时刻办法，“就像在轨道上滚着一样”，他这样形容道；那些穿号衣的听差，那些讲究礼节的管事伤害了他的民主的情感。他说，既然讲究到这样程度，那么索性学学英国人的排场穿起礼服打上白领结吃午饭好了。他有一回明白地把这个意见对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讲了。她的态度是那样自然，因此在她面前谁也会毫不迟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听他讲完了话，然后对他解释道：“从您的立场看来，您是对的——也许在这一点上头我的太太气味太重了；不过一个人在乡下过日子，要不讲究秩序，那就会烦闷死了，”她仍然照样行她的办法。巴扎罗夫嘴里咕噜着，可是他同阿尔卡狄在奥津左娃家里过得这么舒适，主要的原因正是这宅子里的一切都是在“轨道上面滚着的”。虽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年轻人刚刚在尼可尔斯柯耶住了一两天，他们就都有了一点儿改变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虽然很少赞成巴扎罗夫的意见，但是她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而他却开始露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烦躁不安来：他很

容易发脾气，不乐意讲话，脸上常常带怒容，不能够静静地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渴望在推动他似的。阿尔卡狄呢，他自己后来断定是爱上了奥津左娃，渐渐地沉落在一种静静的忧郁里面了。不过这忧郁并不阻止他同卡契雅做朋友；它反而促成他跟她亲近要好。“她看不上我？也罢！……可是这儿还有一个好人，她倒不嫌弃我，”他这样想着，他心里又尝到宽大的感情的那种甜蜜味道了。卡契雅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跟她交往是想在这里面寻找一种安慰，她并不阻止他或者她自己去享受这种半含羞半知己的纯洁天真的快乐。他们当着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面并不交谈一句话；卡契雅在她姊姊的锋利的眼光下面一声也不响，把自己的内心完全隐藏起来；而阿尔卡狄像一个在恋爱的人所应有的情形那样，在他的恋爱的对象跟前，他不能够再注意到别的事物了；可是他同卡契雅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觉得快乐。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引起奥津左娃的兴趣；他单独同她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样安放手脚才好，她也觉得对他无话可说：在她眼里他太年轻了。在另一方面，阿尔卡狄在卡契雅面前却又觉得十分舒畅自然；他对待她的态度很迁就，并不阻止她对他讲出音乐、小说、诗和别的一些琐碎事情给她留下的印象，他自己却没有注意，也没有明白这些琐碎事情也正是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而卡契雅本人也没有想到给他驱除郁闷。阿尔卡狄在卡契雅的身边感到舒畅，奥津左娃在巴扎罗夫身边的时候也是这样，因此这四个人常常在一块儿过了一忽儿之后，便分作两对走开了，特别是在散步的时候。卡契雅赞美大

自然,阿尔卡狄也爱大自然,不过他不敢明白承认就是了;奥津左娃同巴扎罗夫一样,颇为漠视大自然的美。这两个年轻朋友常常分开的结果便是,他们中间的关系开始起了变化。巴扎罗夫不再对阿尔卡狄谈论奥津左娃,连她的“贵族的派头”也不骂了;诚然他仍旧像先前那样地称赞卡契雅,只劝阿尔卡狄去把她那感伤的倾向抑制些,可是他的称赞很匆促,他的劝告也枯燥无味,总之他跟阿尔卡狄讲的话比从前少得多了……他好像在躲避他似的,他好像不好意思同他在一块儿似的。……

阿尔卡狄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可是他却把他的观察藏在心里不讲出来。

这个“新现象”的真实原因就是奥津左娃在巴扎罗夫的心中唤起的感情,这感情使他痛苦,还使他愤怒,可是倘使有人对他隐约地提到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轻蔑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罗夫很喜欢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奇怪托更堡①同那一切恋爱诗人②和浪漫诗人③为什么不给

---

① 托更堡:席勒的长诗《骑士托更堡》(1797)中的主人公,他死在所爱的女人的窗下。

② 恋爱诗人:或译“吟游诗人”,是十二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中间德国的一派诗人,所著诗歌大半歌咏爱情和美人。

③ 浪漫诗人: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活动的浪漫的或恋爱的抒情诗人。

送进疯人院去。他常常说:“一个女人中了你的意,你就想尽方法达到你的目的;要是达不到目的——那你就掉过背走吧——世界大得很。”奥津左娃中他的意;那些关于她的谣言、她的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她那明显的对他的好感,这一切都于他有利;可是他不久便看出来,在她身上他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要说掉过背向着她吧,他自己很诧异地发觉,他也没有力量办到。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沸腾;固然他不难使他的血静下来,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盘据在他心上,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进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他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谈话的时候,他所表示的对一切带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的淡漠的轻蔑,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厉害;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跑到树林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不然他就会跑进仓房爬到干草堆上面,紧闭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睡去,自然他不容易就睡着。突然间他仿佛觉得那两只贞洁的手抱住了他的脖子,那两片高傲的嘴唇回答他的接吻,那一对明慧的眼睛温情地——是的,温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晕了,这一忽儿他忘记了自己,直到愤怒又在他心中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又发觉自己在想着种种“可耻的”思想,好像有一个魔鬼在戏弄他似的。有时候他觉得奥津左娃也有了改变了;她的脸上似乎带了一点特别的表情,也许……可是想到这儿他总是顿起脚来,或者咬紧牙齿,捏紧拳头跟自己生气。

然而巴扎罗夫也没有完全看错。他打动了奥津左娃的心;她对他感到了兴趣,她时常想到他。他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并不觉得乏味,她也不焦急地盼着他来,可是他一到,她马上显得兴高采烈了;她喜欢单独同他在一块儿,她喜欢跟他谈话,即使他得罪了她或者触犯了她的趣味和她的文雅的习惯,她也不见怪。她好像很想同时试探他,也试验她自己似的。

一天他同她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声音抑郁地对她说他打算不久回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她的脸色立刻变成苍白,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痛她的心,刺得这样痛,使她自己都觉得惊奇并且思索了好些时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巴扎罗夫说要走的话并非故意说来试探她,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他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那天早晨他会着了他父亲的总管季莫费以奇,那是在他小时候照应过他的人。这个季莫费以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精明能干的矮小的老头子,一头变了色的黄头发,一张风吹日晒的红脸,一对含着小颗眼泪的、眯起来的眼睛,他穿一件厚厚的青灰布的短外套,束一根皮条,穿一双柏油漆的长靴。他意外地在巴扎罗夫的眼前出现了。

"喂,老头儿,你好!"巴扎罗夫嚷道。

"您好,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少爷[①],"那个矮小的老头子说,他高兴地笑起来,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脸的皱纹。

"你来干什么?他们差你来叫我吗,喂?"

---

① 少爷:照原文直译应该是"小父亲",这是一种尊敬的称呼。

“哪儿的话，少爷，您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季莫费以奇结结巴巴地说(他记住他动身的时候他的主人是怎样郑重地吩咐过他的)。“我进城去给老爷办事情，听说您少爷在这儿，才特地弯过来看看您少爷……我是不敢来惊动您的。”

“得啦，不要撒谎了，”巴扎罗夫打断了他的话。“你说这是到城里去的路吗?”

季莫费以奇踌躇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父亲好吗?”

“谢谢上帝，少爷。”

“我母亲呢?”

“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也很好，谢谢主。”

“他们望我回去吧，我想?”

这个矮小的老头子把他那小小的脑袋偏在一边。

“啊，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他们怎么不望您呢? 上帝作证，我看见您那两位老人家就不由得心痛啊。”

“唔，好啦，好啦，闭嘴吧! 对他们说我就要回来了。”

“是，少爷，”季莫费以奇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他走出大门，用两只手把他那顶小帽戴在头上，一直盖到耳朵，然后爬进他留在门口的那辆破旧的、竞赛用的四轮敞篷车，打起马走了，可是并不是朝城里的方向跑去。

这天晚上奥津左娃同巴扎罗夫坐在她的房里，阿尔卡狄在厅子里踱来踱去听卡契雅弹琴。公爵夫人已经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她向来不耐烦客人，尤其讨厌这两个“新式流氓”，她这样称呼他们。在客厅、饭厅那些地方，她只有板起脸

生气；可是她回到自己房里，便在她的女用人面前大骂特骂，骂得连便帽和假发也都在她的头上跳起来了，这一切奥津左娃全知道。

“您怎么打算离开我们呢?”她说，“您答应我的话又怎样了?”

巴扎罗夫吓了一跳。“答应了什么，太太?”

“您已经忘了吗？您说过要教我一点儿化学呢!”

“太太，怎么办呢！我父亲望我回去；我不便再耽搁了。不过您可以读 Pelouse et Frémy, Notions générales de Chimie[①]；这是一本好书，写得很清楚。您要知道的东西那里面全有。”

“可是您该记得：您对我说过；一本书并不能够代替……我忘记您是怎样说的了，可是您明白我的意思……您还记得吗?”

“太太，怎么办呢?”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要走呢?”奥津左娃放低声音说。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头靠着扶手椅的椅背，她那两只一直露到肘边的膀子交叉地放在胸上。在那盏盖着穿孔纸罩的孤灯的微光底下，她的脸色显得更苍白了。她的身子完全藏在一件宽大的白衣服的柔软的褶纹里面；只有那双也是交叉着的脚稍微露了一点儿脚尖在外头。

“为什么要住下?”巴扎罗夫回答道。

---

① 法语：柏鲁日与弗列米合著的《化学概论》。——原注

奥津左娃略略转动一下头。

"您问为什么吗？您在我这儿不是住得很高兴吗？难道您想您走了就不会有人想念您?"

"我相信不会的。"

奥津左娃沉默了一忽儿。

"您这样想就错了。可是我不相信您的话。您这句话不会是认真说的。"巴扎罗夫仍然坐着不动。"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为什么不说话?"

"叫我对您说什么呢？一般的人都是不值得想念的，我更不值得。"

"为什么这样?"

"我是个实际的、乏味的人。我又不会讲话。"

"您在讨人恭维了，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

"那不是我的习惯。您难道不知道您那么看重的生活的优美的一方面，却跟我全不相干吗?"

奥津左娃咬着她的手绢儿的角儿。

"随您怎样想都可以，可是您走了以后我要觉得无聊了。"

"阿尔卡狄会留下的，"巴扎罗夫说。

奥津左娃略略耸了耸肩。

"我要觉得无聊了，"她又说了一遍。

"真的吗？无论如何这不会久的。"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您自己对我讲过，只有在您的日常生活的秩序打破了的时候，您才会感到无聊。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那么有规

律，叫人挑不出一点儿错来，那里面再没有地方来容纳无聊或者烦恼……容纳任何不愉快的情感了。”

“那么您以为我真是一点儿错也没有吗？……那是说，我把生活安排得那么有规律吗？”

“我应当这么想。这儿就有一个例子：再过几分钟，就要打十点了，我预先知道您就要赶我走的。”

“不，我不要赶您走，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多坐一忽儿好了。请打开那扇窗……我觉得有点儿气闷。”

巴扎罗夫站起来把窗推了一下。窗门发出响声，一下子就开了……他没有料到会开得这么容易；而且他的手有点儿发抖。柔和的黑夜带着它那差不多是黑色的天空，它那微微摇曳的树木，和那清凉的露天空气的芬芳，探头进屋子里来了。

“请把窗帘放下来，再坐一忽儿吧，”奥津左娃说，“在您离开以前我要跟您谈谈。给我讲讲您自己的事；您从没有谈过您自己的事呢。”

“我想同您谈些有用的事情，安娜·谢尔盖叶夫娜。”

“您太谦虚了。……可是我倒愿意知道一点儿您的事，还有您的家庭，您的父亲——您就是为了他要离开我们。”

“她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巴扎罗夫想道。

“那些都是毫无趣味的，”他大声说，“尤其是讲给您听；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您把我看作一个贵族了？”

巴扎罗夫抬起眼睛望着奥津左娃。

"不错，"他故意带着锋利的调子说。

她笑了笑。

"我看您知道我很浅，虽然您肯定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他们。以后我会找个时间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可是请您先讲您的吧。"

"我知道您很浅，"巴扎罗夫跟着说了一遍。"您也许是对的；也许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谜，就拿您来作个例子吧：您躲开交际社会，您觉得它讨厌，您却请了两个大学生到您这儿来住下。有着您这样的聪明，您这样的美丽，您却住在乡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什么？您说的什么？"奥津左娃急急地插嘴道。"像我的……美丽？"

巴扎罗夫皱皱眉头。

"不要去管那个，"他说，"我是说我不大明白您为什么要住在乡下？"

"您不明白。……可是您会照您的看法给您自己解释吧？"

"不错，……我认为您老是住在一个地方，是因为您让自己娇养惯了，因为您喜欢安乐、舒服，对别的一切事情都很冷淡。"

奥津左娃又笑了笑。

"您绝对不相信我也会有动感情的时候吗？"

巴扎罗夫从眉毛底下扬起眼光看了她一眼。

"是让好奇心鼓动的吧，也许有的；别的就没有了。"

“真的吗？好，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了；您看；您跟我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很谈得来……”巴扎罗夫声音有点儿沙哑地说。

“是的！……啊，我忘记您要走开了。”

巴扎罗夫站起来。灯光在这个幽暗、芳香、孤单的屋子的中央朦胧地摇晃；窗帘时时在动，从那缝里流进来一阵一阵沁人肌肤的、清凉的夜气，可以听见夜的神秘的细语声。奥津左娃连动也不动一下；可是她渐渐地让一种隐秘的激动控制了她。……这情感也传染到巴扎罗夫身上了。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单独地在一块儿……

“您到哪儿去？”她慢慢地问道。

他不答话，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您当我是一个平静的、柔弱的、娇养惯了的女人了，”她用同样的声音缓慢地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窗。“我却知道我自己很不幸福。”

“您不幸福？为着什么？自然您不会把无聊的闲话放在心上吧？”

奥津左娃微微皱起眉头，他把她的话这样地解释，使她烦恼。

“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种闲话，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太骄傲了，不会让它来扰乱我的心。我不幸福，因为……我没有生活的欲望，没有生活的热情。您带着不相信的神气望我，您以为这是一个坐在天鹅绒椅子上满身花边的‘贵族’讲的话。我并不隐瞒这个事实：我喜欢您所说的舒服，同时我又没

有多少生活的欲望。随便您怎样去解释这种矛盾吧。可是在您的眼里这都是浪漫主义。”

巴扎罗夫摇摇头。

“您身体健康，又是个独立的人，而且有的是钱；您还要什么呢？您要什么呢？”

“我要什么？”奥津左娃跟着说，她叹了一口气。“我很倦，我老了；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很久了。是的，我老了，”她把短外套的边儿轻轻地拉下来盖她那两只光膀子。她的眼光跟巴扎罗夫的碰到一块儿了，她微微红了脸。“在我后面已经拖了这么多的回忆：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财富，以后又是贫穷，然后是我父亲的死、我的结婚，再后是国外旅行诸如此类的事……这么多的回忆，却没有一桩值得记起的事；可是在我前面，在我前面——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却没有目的地……我真不想往前走了。”

“您就这样地灰心绝望么？”巴扎罗夫问道。

“不，可是我感到不满足，”奥津左娃慢吞吞地答道。“我想，要是我对一件什么事能够发生强烈的兴趣……”

“您想恋爱，”巴扎罗夫打断了她的话，“您不能爱；这就是您的不幸的原因。”

奥津左娃仔细地看她那件短外套的袖子。

“我真的不能恋爱吗？”她说。

“很难讲！我说那是不幸，就只犯了这点儿错。恰恰相反，一个人碰到这种把戏才真可怜呢！”

“碰到，碰到什么？”

"恋爱。"

"您怎么会知道那个呢?"

"我听见人说的,"巴扎罗夫生气地回答。

"你在卖弄风骚,"他心里想,"你烦闷,没有事做,便逗着我玩,可是我……"事实上他的心倒要碎了。

"并且您太苛求了,"他说,把整个身子俯下来,玩着扶手椅上面的缨子。

"也许是的。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则宁无。一个生命换一个生命。拿我的去,给你的来,没有后悔,没有回头。否则不如不要。"

"唔?"巴扎罗夫说,"那倒是公平的条件,我很奇怪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您要求的东西。"

"您以为把自己整个交给某一样东西是容易的事吗?"

"倘使一个人考虑起来,等待起来,而且给你自己定了价,我是说,把自己看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用考虑就把自己交出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

"人怎么能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呢?倘使我没有一点儿价值的话,谁还用得着我的忠诚呢?"

"那不是我的事;要找出来我值多少,那是别人的事情。主要的是能够献出自己。"

奥津左娃把身子离开了椅背。

"听您讲话,"她说,"好像您自己完全经历过了似的。"

"我不过顺口说说罢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知道那全不是我的本行。"

“可是您能够献出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吹牛。”

奥津左娃不说话,巴扎罗夫也不作声。钢琴的声音从客厅里传到他们这儿来。

“怎么这样晚卡契雅还在弹琴?”奥津左娃说。

巴扎罗夫站起来。

“不错,现在真晚了,是您睡觉的时候了。”

“等一等,您急着到哪儿去?……我还有一句话得跟您讲。”

“什么话?”

“等一等,”奥津左娃轻轻地说。

她的眼光定在巴扎罗夫的脸上;好像她在注意地观察他似的。

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忽然走到她身边,匆匆说了一声“再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他便走出去了。她把她的给捏痛了的手指放到嘴唇上,吹吹气,突然冲动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急急地向房门走去,好像她想把巴扎罗夫唤回来似的。……女用人端着一个银托盘,托了一个玻璃水瓶从外面进来。奥津左娃连忙站住,吩咐这女用人出去,她又坐下来,又在想什么事情。她的发辫散开了,像一条黑蛇似地垂在她的肩头。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屋子里好久都还点着灯,她动也不动地一直坐了很久,只是有时用手指头去摸她的光膀子,夜的寒气把它们刺得有点儿痛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巴扎罗夫回到屋子,他的皮靴给露水打

湿了，他的头发散乱，脸色难看。他看见阿尔卡狄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写字台前面，上衣紧紧扣着，一直扣到喉咙口。

“你还没有睡？”他带着一种像是烦恼的声音说。

“你今晚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坐得真久，”阿尔卡狄不回答他的话，却另外说。

“不错，你跟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在弹钢琴的时候，我都是跟她在一块儿。”

“我没有弹……”阿尔卡狄没有说完便打住了。他觉得泪水涌上眼睛来了，他不愿意在他这个爱挖苦人的朋友面前哭出声来。

一八

第二天奥津左娃下来吃早茶的时候，巴扎罗夫埋下头望着他的杯子坐了好久，随后他突然抬起头看她。……她掉过脸来对着他，好像他轻轻推了她一下似的；他觉得她的脸色在一夜的功夫更苍白了些。她不久就回到她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到吃早饭的时候才出来。这一天从大清早起落着雨；要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大家都聚在客厅里。阿尔卡狄拿了最近一期的杂志，大声念起来。公爵夫人照例在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好像他在做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一样，后来她就恶狠狠地瞪着他；可是他并不理睬。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请您

到我屋子里来。……我有话要问您。……您昨天提到一本参考书……"

她站起身子，向门走去。公爵夫人朝四周看了看，那神情仿佛在说，"瞧我，瞧我；瞧我多受惊！"她又瞪着阿尔卡狄；可是他提高了声音，并且跟坐在近旁的卡契雅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继续念下去。

奥津左娃急急地走进她的房间。巴扎罗夫迈着快步子跟在她后面，他的眼睛仍旧埋着，只有他的耳朵还听到她那绸衣服的轻微的旋转声和窸窣声在他前面轻轻飘过。奥津左娃坐的是她前一晚上坐的那把扶手椅，巴扎罗夫也坐在他的原位上。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她静了一忽儿以后问道。

"Pelouse et Frémy, Notions générales,① ……"巴扎罗夫回答。"不过我还可以介绍您读 Ganot,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physique expérimentale②。那本书里面插图比较清楚些，一般地说来，这本教科书……"

奥津左娃伸出她的手来。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请您原谅，可是我并不是请您到这儿来谈教科书的。我想把昨晚的话继续谈下去。您走得太突然了……这不会叫您厌烦吗？……"

"照您的意思办吧，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可是我们昨晚

① 参看第一三五页注①。

② 法语：加诺著的《实验物理学初阶》。——原注

谈的是什么呢?"

奥津左娃瞟了他一眼。

"我想我们谈的是幸福。我跟您谈我自己的事。哦,我提到了'幸福'这个字眼。那么请您告诉我,甚至于在我们,譬如说欣赏音乐吧,或者领略一个美好的黄昏,或者同有风趣的人谈话而感到愉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所感到的,仿佛是某种存在于别一个地方的无量幸福的暗示,并不是实在的幸福(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那种幸福)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 也许您没有那样的感觉吧?"

"您知道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巴扎罗夫答道:"您昨天对我说您感到不满足。事实上我从没有让这种思想进我的脑子里来过。"

"也许在您看来它们是可笑的吧?"

"不,可是它们并不跑进我的脑子里来。"

"真的? 您知道吗? 我倒喜欢知道您在想什么呢!"

"什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请听我说,我很早就想跟您坦白地说。我用不着告诉您——您自己是知道的——您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您还年轻——您前面有一个远大的前途。您究竟预备做什么呢? 您打算有一种什么样的前程呢? 我是说,您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您向着什么地方走呢? 您心里想些什么呢? 一句话说完,您是什么人呢? 您是什么呢?"

"您叫我莫名其妙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至于我是个什么人……"

“是的，您是什么人呢?”

“我已经跟您讲过，我是一个未来的县里的医生。”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做出一种不耐烦的动作。

“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自己并不相信它。阿尔卡狄可以这样地回答我，可是您不成。”

“为什么阿尔卡狄……”

“您不要再讲啦！您怎么可以拿这种卑微的工作自满呢？您不是常常说您不相信医学吗？您——您有那样的抱负——去做一个县城的医生！您不过拿这样的回答来敷衍我，因为您不信任我。可是您知道吗，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是能够了解您的；我也曾经穷过来的，我也像您那样有过抱负的；我也许还经历了您经历过的同样的艰苦。”

“这是很好的，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可是您得原谅我……我自来就不习惯谈论自己的事，而且您跟我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什么样的距离？您又在说我是一个贵族吗？不用再提啦，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以为我已经给您证明了……”

“就是除开那一点不说，”巴扎罗夫打岔道，“我们去谈论、去思索‘未来’有什么用处呢？‘未来’大半都不是能够由我们作主的。那个时候倘使我们有机会做一点儿事情，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倘使没有机会——至少我们还可以高兴自己并没有预先说了一堆空话。”

“您把友谊的闲谈当作空话吗？……还是您把我看成一个不值得您信任的女人？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们女人。”

"我并没有瞧不起您，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自己也知道。"

"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姑且假定：我明白您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您将来的活动；可是说到您心里现在究竟发生着什么……"

"发生！"巴扎罗夫跟着她说道，"好像我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似的！无论如何这是完全没有趣味的；况且难道一个人能够常常把他心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完全大声说出来吗？"

"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够把您心里的一切事情全说出来呢？"

"您能够吗？"巴扎罗夫反问道。

"能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稍微迟疑一下，才答道。

巴扎罗夫低下了头。

"您倒比我幸福。"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疑问地望着他。

"就算是这样吧，"她继续说，"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并没有白白地认识了一场；我仍然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我相信您的这种——叫我怎么说呢，紧张、矜持到后来终于会消失的。"

"那么您看出我的矜持……跟您所说的……紧张来了。"

"是的。"

巴扎罗夫站起来，走到窗前。

"您想知道这种矜持的原因吗，您想知道我心里发生着什么吗？"

“是的，”奥津左娃带着一种她当时还不明白的害怕再说了一遍。

“您不会生气吧？”

“不。”

“不？”巴扎罗夫背朝着她站在那儿。“那么让我告诉您吧，我像一个傻瓜，像一个疯子那样地爱着您……您到底逼我讲出来了。”

奥津左娃伸出她那一双手来，可是巴扎罗夫正把他的前额紧紧靠着窗上的玻璃。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他浑身颤栗。但这并不是年轻人的胆怯的打颤，也不是第一次表白爱情时候的甜蜜的惊惶；这是在他的心中挣扎着的强烈的、痛苦的激情——那种并非不像愤怒、也许还跟愤怒密切相关的激情……奥津左娃又害怕他，又怜悯他。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她说，她的声音里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温柔。

他连忙转过身来，用一种要把人吞下去的眼光望了望她，他突然抓起她的两只手，把她拉到他的胸前。

她并不马上挣脱他的搂抱；可是过了一忽儿，她便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望着巴扎罗夫了。他又向她奔过去……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她连忙惊惶地低声说。看她那个样子好像他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她就会喊叫似的。……巴扎罗夫咬着他的嘴唇，走出去了。

半小时以后一个女用人给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送来一张巴扎罗夫的字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是不是应该今天就走，

还是可以住到明天?”“为什么要走呢? 我没有了解您——您也没有了解我,”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这样回答他,可是她心里想道:“我也没有了解我自己。”

一直到午饭时候,她都没有出去,她把两只手放在背后,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在窗前站一忽儿,有时候立在镜子前面,用一条手绢儿慢慢地擦她的脖子,她觉得脖子上还有一个地方像火那样地在烧着。她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使她“逼”(照巴扎罗夫的说法)他吐露他心里的秘密呢,她是不是事前猜到了一点儿。……“这应该怪我,”她高声说道,“可是我不能够事先料到这个。”她又在思索了,她记起了巴扎罗夫向她跑过来时候脸上那种差不多带兽性的表情,不由得满脸通红。……

“或者?”她突然说,但又马上停止,摇了摇她的鬈发。……她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她那向后仰的头,同她那半开半阖的眼睛和嘴唇上的神秘的微笑,这个时候好像在对她讲一桩她自己也觉得羞愧的事。……

“不,”她最后下了决心说。“上帝知道这会引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是不可以轻易玩弄的;无论如何,世界上最好的还是平静。”

她的心境的平静并不曾动摇;可是她觉得忧郁,有一阵子她还掉了几滴眼泪,不过她不能够说这是为了什么——决不是为了受到的侮辱。她并不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她倒觉得错在自己。在各种不明显的情感(如对过去生活的感触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等)的影响下面,她强迫自己走到一定的界线上

去，强迫自己去望界线的那一边，她在界线那一边看见的并不是一个深渊，却是空虚……或者丑恶。

一九

奥津左娃的自制力虽然很强，她虽然从来不受任何成见的拘束，可是她走进饭厅吃午饭的时候，她还是觉得相当窘。不过这一顿饭也平平静静地过去了。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来了，讲了种种的故事；他刚从城里回来。在那些故事中间，有一件是，布尔达路省长下令叫他的担任特别差使的属员们都要在靴子上装好踢马刺，以便他随时差遣他们骑马到各处去办紧急差使。阿尔卡狄一面小声跟卡契雅讲话，一面又敷衍地装出在听公爵夫人说话的神气。巴扎罗夫板起脸，固执地不做声。奥津左娃看了他两三次——并不是偷偷地看，她正眼望着他的脸，他的脸上带着怒容，脸色很难看，眼睛埋着，整个脸上都是那种轻蔑的、坚决的表情，她想道："不……不……不。"午饭后她陪着大家到园子里去，她看见巴扎罗夫要跟她讲话，便朝旁边走了几步，停下来。他走到她身边，可是仍然不抬起眼睛来，他声音低沉地说：

"我应当向您道歉，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一定在跟我生气。"

"不，我并不生您的气，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奥津左娃答道："可是我很难过。"

“那更糟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够罚了。我的处境是很可笑的,您一定同意我这个说法。您写信给我说:‘为什么要走呢?’可是我不能住下去,也不想住下去。明天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走吗?”

“不,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这是迟早会发生的。因此,我必须走开。我只能想到一个使我能留在这儿的条件;可是那个条件永不会有的。因为,请您宽恕我无礼,您并不爱我,您也永不会爱我吧?”

巴扎罗夫的眼睛在他的黑眉毛下面闪动了一下。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并不回答他。“我害怕这个人,”这个思想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去。

“再见,太太,”巴扎罗夫说,他好像猜到了她的思想似的,随后他就走回屋子里去了。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她把卡契雅唤到身边来,她挽着卡契雅的膀子。她一直到天黑尽了都没有离开卡契雅。她不打牌,只是不断地笑着,可是这跟她的苍白、烦恼的脸色并不相称。阿尔卡狄非常奇怪,他像所有年轻人观察人的样子观察她——那就是说,他不断地问他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巴扎罗夫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他还出来喝茶。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想跟他讲几句亲切的话,可是她不知道怎样跟他讲起……

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她摆脱了窘境：管事进来报告，西特尼科夫到了。

这个年轻的进步分子像一只鹌鹑似地飞进屋子里来：那种古怪样子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来的。尽管他脸皮很厚，居然打定主意下乡来拜访一个他简直不熟、又从没有邀请过他的女人，只是因为他打听到那两个聪明而又跟他相熟的朋友住在她的家里，但他还是连骨髓也胆怯起来，他把事先背熟了的那些道歉和问候的话全忘了，却喃喃地说出一些无聊的话，譬如说叶夫多克西雅·库克希娜叫他来向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问安啦，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也一直对他大大地称赞她啦……说到这儿他就结结巴巴地讲不下去，心里又慌又急，竟然坐到自己的礼帽上面。不过也没有人把他赶出去，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还把他介绍给她的姨妈和妹子，因此他不久就恢复了常态，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庸俗的出现往往是生活中有益的事情：它能使过度的紧张得到松弛，它向自以为是或忘我的情感提醒它同它们的密切关系，使那些情感清醒过来。西特尼科夫一来，一切都变得好像比较迟钝，比较简单了；晚饭时候大家也多吃了些，并且比往常早睡了半小时。

"我现在可以用你从前对我讲过的话来问你了，"阿尔卡狄上了床对着那个也在脱衣服的巴扎罗夫说，"'你为什么这样不快活？你一定尽了什么神圣的义务吧？'"

在这两个年轻人中间近来发生了一种假装不在乎的互相挖苦的情形，这常常是暗中不快或心里猜疑的一种征候。

"我明天要到我父亲那儿去了，"巴扎罗夫说。

阿尔卡狄抬起身子，支在他的肘拐上。他一面觉得诧异，一面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觉得高兴。

“啊！”他说，“你是为了这个不快活吗？”

巴扎罗夫打了一个呵欠。

“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你就要变老了。”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怎样呢？”阿尔卡狄追问道。

“什么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怎样？”

“我是说她肯放你走吗？”

“我又不是她花钱雇的人。”

阿尔卡狄思索起来了，巴扎罗夫在床上躺下，脸向着墙壁。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

“叶夫盖尼！”阿尔卡狄突然叫起来。

“唔？”

“我明天跟你一块儿走。”

巴扎罗夫不答话。

“不过我回家去，”阿尔卡狄继续说。“我们同路到霍赫洛夫村，在那儿你可以向费多特雇马。我倒想认识你家里的人，可是我又害怕对他们同你都有些不便。你以后还要到我们家里来是不是？”

“我的东西全留在你家里呢，”巴扎罗夫说，他并不掉过头来。

“为什么他不问我干吗要走，而且走得像他那样地突然呢？”阿尔卡狄想道。“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走呢，他又为什么要

走呢?"他继续往下面想。他对自己的问话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他心里却充满了痛苦。他觉得要离开这种他已经过惯了的生活,是很可惜的;可是他单独留下来又显得有点儿古怪。"他们两个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推测道,"那么,他走了以后我还住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只有叫她更讨厌我;我连最后的希望也会失掉了。"他就在想象中描绘起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面貌来;以后另一个面颜渐渐地把这个青年寡妇的美丽的容貌掩盖了。

"我也舍不得卡契雅!"阿尔卡狄轻轻地对他的枕头说,已经有一滴眼泪落在那上面了。……忽然他把头发向后一甩,高声说道:

"西特尼科夫这笨蛋到这儿来干什么?"

巴扎罗夫起先在他的床上动了一下,然后说出下面的答话来:

"兄弟,我看你还是个傻瓜。我们少不了西特尼科夫这种人的。我——你得明白这个——我用得着像他那种傻瓜。不一定要天神才会烧罐子![1] ……"

"啊哈,哦!"阿尔卡狄心里想道。巴扎罗夫的深得没有底的傲慢就在这一瞬间现露在他的眼前了。"那么,你同我都是天神吗?这是说——你是一尊天神,那么我是不是一个傻瓜呢?"

"不错,"巴扎罗夫板起脸说,"你还是一个傻瓜。"

---

① 俄谚:傻瓜也用得着的意思。

第二天阿尔卡狄对奥津左娃说他要跟巴扎罗夫一块儿走的时候，她并不表示特别的惊讶；她好像心里有什么事情而且很疲倦。卡契雅只是默默地、严肃地望着他；公爵夫人却高兴得忍不住在披巾下面划起十字来，这连他也看出来了。可是同时西特尼科夫却着实地惊慌起来了。他穿了一套崭新的漂亮衣服(这一次不是斯拉夫派的服装了)，刚刚走来吃早饭；昨天晚上那个给派去伺候他的人看见他带了那么多的衬衣来，惊奇得了不得，现在突然间他的朋友们要撇下他走了！他急急地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跳来跳去，就像一只野兔给人赶到了树林边上那样，后来他突然差不多带着恐怖地、而且差不多要哭出声来地对女主人说他也要走了。奥津左娃并不挽留他。

"我这辆有篷轻马车很舒服，"这个运气不好的年轻人转身对阿尔卡狄说，"您可以坐我的车一块儿走，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可以坐您那辆敞篷车，这样倒更方便些。"

"可是对不起，您并不顺路，而且到我那儿去路还很远！"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时间多着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到那个方向去。"

"干包税的事吗？"阿尔卡狄非常瞧不起地问道。

可是西特尼科夫心里很不痛快，他也不像平常那样地发笑了。

"我给您保证，我的有篷轻马车是特别舒服的。"他喃喃地说，"容得下我们三个人。"

"不要拒绝麦歇西特尼科夫的好意叫他伤心吧，"安娜·谢

尔盖叶夫娜说。

阿尔卡狄看了她一眼，深深地埋下头去。

早饭后客人就动身了。奥津左娃跟巴扎罗夫分别的时候，她伸出手给他，并且说：

“我们还要再见的，是吗？”

“听您吩咐吧，”巴扎罗夫答道。

“那么我们还要再见。”

阿尔卡狄第一个走下台阶：他上了西特尼科夫的有篷轻马车。管事很恭敬地扶着他，可是他却觉得要把这个人打一顿，不然就自己哭一场才痛快。巴扎罗夫坐在四轮敞篷车里面。他们到了霍赫洛夫村，阿尔卡狄等着客店老板费多特换好了马，便走到四轮敞篷车那边，带着平日的微笑对巴扎罗夫说：“叶夫盖尼，带我去吧；我要到你那儿去。”

“坐下，”巴扎罗夫从牙缝里说。

西特尼科夫正绕着他的马车的轮子来回走着，起劲地吹口哨，听见这些话，他只好张了口望着；阿尔卡狄冷静地从有篷轻马车上面拿下了他的行李，坐在巴扎罗夫身边，向着他先前同车的友伴客气地点点头，叫一声：“走吧！”四轮敞篷车转动起来，过了一忽儿就看不见了。……西特尼科夫非常狼狈，他望着他的车夫，车夫正在用鞭子轻轻打着右边那匹马的尾巴玩。西特尼科夫跳进有篷轻马车，对两个过路的农民咆哮道：“戴上帽子，你们这些混蛋！”便往城里去了，他到得很晚，第二天他在库克希娜的家中痛骂这两个“可恶的傲慢的粗人”。

阿尔卡狄在四轮敞篷车里，坐在巴扎罗夫的旁边，他紧紧

地捏住巴扎罗夫的手，许久都不作声。巴扎罗夫对他的握手和沉默好像很了解，而且很珍视。巴扎罗夫前一个晚上整夜没有睡，他有几天没有抽烟，也几乎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在他那顶戴到眉毛上的帽子下面，他的已经瘦了许多的侧面显得更阴郁，更瘦了。

"喂，兄弟，"他终于开口说，"给我一支雪茄。你看看我的舌头是不是黄的？"

"是，是黄的。"阿尔卡狄答道。

"唔……雪茄也没有味道了。机器发生障碍了。"

"你近来的确有了改变了，"阿尔卡狄说。

"没有关系！以后就会好的。只有一桩事麻烦——我母亲心肠太软了；倘使你不把肚皮喂得鼓起来，一天不吃它十次东西，她就难过得不得了。我父亲倒没有毛病，他到处都走过，他什么都经历过来的。不，我抽不下去了，"他说着就把雪茄烟扔到大路上尘土中去了。

"到你的庄子是不是有二十五里？"阿尔卡狄问道。

"二十五。你问这位聪明人吧，"他指着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说，那是费多特雇用的人。

可是聪明人答道："谁能够知道呢？这一带的里又没有量过，"他又继续小声地骂那匹辕马"拿脑袋踢人"，这就是说，埋着头摇晃。

"不错，不错，"巴扎罗夫说，"这对你是一个教训，年轻的朋友，一个有益的例子。鬼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吊在一根细线上，在他的脚下随时都会裂开一个深渊，可是他仍

然给他自己制造出种种的烦恼，毁坏他的生活。”

“你指的什么？”阿尔卡狄问道。

“我并不指什么；我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两个都做了傻瓜。解释又有什么用！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实习的时候已经看到，一个人要是恼恨自己的病，——他一定会战胜这个病。”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阿尔卡狄说，“我倒觉得你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理由。”

“既然你完全不懂我的意思，那么让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宁可在马路上敲石子，也不要让一个女人来管住一根小指尖。那都是……”巴扎罗夫正要说出他爱用的那个字眼“浪漫主义”，但又制止了自己，另外说：“废话。你现在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你我跟女人交际过了，我们觉得这是很愉快的；可是人离开这种交际，就像在大热天泡进冷水里头一样。一个男人没有功夫去注意这些琐碎事情；西班牙的俗话说得好：男人应当凶。喂，你这个聪明人，”他又转头向那个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说，“我想你有个老婆吧？”

那个农民掉过他的眼睛近视的扁平脸来望这两个朋友。

“老婆？有的。我怎么会没有老婆！”

“你打她吗？”

“打我的老婆？这种事情是有的。无缘无故我并不打她。”

“很好。唔，那么她打你吗？”

那个农民拉了拉缰绳。

“老爷，您讲的什么话。您真喜欢开玩笑。……”他显然

有点儿不高兴了。

“你听见吧，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可是我们挨了一顿打了……这就是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下场。”

阿尔卡狄勉强笑了笑；巴扎罗夫转过脸去，以后一路上他就没有再开过口。

二十五里的路在阿尔卡狄看来好像有五十里那样远。可是后来在一个山岗的斜坡上终于出现了巴扎罗夫的父母住的小村庄。紧靠着这个小村庄，在一座年轻的桦树林子里露出一所茅草顶的小宅子。两个农民戴着帽子站在第一座农家茅屋的门前对骂。“你是一口大猪，”一个骂道，“比一口猪崽子还坏。”“你老婆是个巫婆，”另一个回骂道。

“从他们这种没有拘束的态度看来，”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从他们爱打趣的谈话的调子看来，你就可以猜到我父亲的农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压迫了。啊，现在他本人走出来站在宅子门口台阶上面了。他们一定听到了铃子声。这是他，这是他——我认得出来他那个样子。唉，唉，他头发这样花白了，可怜的人！”

二〇

巴扎罗夫从四轮敞篷车里探身出去；阿尔卡狄便从他的朋友的背后伸出头去望外面，他看见在这小小宅子门前的小台阶上站着一个瘦长的人，他有一头蓬松的头发，一根瘦削的

鹰鼻，身上穿着一件旧的军大衣，没有扣上钮扣。他正叉开腿站在那儿，抽着一根长烟斗，眼睛给阳光照得不停地霎动。

马站住了。

"你到底来了，"巴扎罗夫的父亲说，他仍然在抽烟，不过烟管在他的手指中间跳动起来了。"喂，下车来，下车来，让我来抱抱你。"

他拥抱起他的儿子来了。……"叶纽沙，① 叶纽沙，"一个女人的颤抖的声音叫着。门打开了，门口现出一个又肥又矮的老太太，头上戴一顶白帽子，身上穿一件花短衫。她一边叹气，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要是巴扎罗夫不把她搀住，她就会跌倒了。她那两只圆圆的小胳膊马上绕着他的脖子，她的头紧紧靠在他的胸上，这个时候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只听见她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

老巴扎罗夫深深地呼吸着，眼睛霎得比先前更厉害。

"啊，得啦，得啦，阿利霞！停住吧，"他说，一面跟那个站在四轮敞篷车旁边一动也不动的阿尔卡狄交换了一瞥眼光，连那个坐在驾车座位上的农民也把头掉开了；"这简直是用不着的！请停住吧。"

"啊，瓦西里·伊凡内奇，"老太太结结巴巴地说，"我多少年没有看见我的宝贝，我的好儿子，叶纽兴卡②了，……"她还不放松她的胳膊，只抬起她那张给泪水打湿了的、带着感动表情的起皱纹的脸，稍微离开巴扎罗夫，用幸福的、同时又可笑

①② 叶纽沙和叶纽兴卡都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的眼光把他望了一忽儿，随后她又扑过去将他搂住了。

“呵，是啊，这自然是合乎情理的，”瓦西里·伊凡内奇解释道，“不过我们还是到屋子里头去好些。还有一位客人跟叶夫盖尼一块儿来。请您原谅，”他掉转身子朝着阿尔卡狄把右脚向后移一下鞠一个躬说，“您明白女人的弱点；而且，啊，母亲的心……”

他的嘴唇和眉毛也在抽动，他的下巴也在打颤……可是他显然在竭力控制自己，勉强做出差不多淡漠的样子来。阿尔卡狄跟他行了礼。

“真的，我们进去吧，妈妈，”巴扎罗夫说，他把这个衰弱的老太太搀进里面去了。他让她坐在一把舒服的扶手椅上，又匆匆忙忙地跟父亲拥抱了一下，还把阿尔卡狄介绍给父亲。

“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您，”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不过请您包涵点：我们家里什么都简陋得很，完全是照军队里的办法。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请你安静点；怎么这样软弱！我们这位客人要看轻你了。”

“少爷，”老太太含着眼泪说，“我们还没有请教您的大名同父名……”

“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恭敬地低声对她说。

“请您原谅像我这样一个傻老婆子，”这个老太太擤一擤鼻涕，把头向右边一歪，又向左边一歪，小心地先擦干一只眼睛，接着又擦干另一只眼睛。“请您原谅我。您知道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见不到我的好……好……好……儿子了。”

"现在我们不是活着见到他了吗，太太，"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塔纽希卡，"一个十三岁的光脚小女孩穿着一件鲜红的印花布衫子，正怯生生地在门外探头张望，他便转身唤她道，"给你太太倒杯水来——放在盘子上端来，听见没有？——还有你们两位先生，"他带一种旧式的诙谐腔调说，"请你们两位到一个退伍老兵的书房里去坐坐吧。"

"让我再抱你一回，叶纽谢奇卡[①]，"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呻吟起来。巴扎罗夫俯下身子去就她。"啊，你长得多漂亮了！"

"啊，我倒不知道他漂亮不漂亮，"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可是他是一个大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屋门非'[②]了。现在我希望，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你已经满足了你做母亲的心，你得设法满足这两位贵客的肚皮吧，因为，你知道，夜莺不能够靠寓言充饥[③]。"

老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

"马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桌子就会摆好的。我要亲自跑到厨房里头去，叫人烧好茶炊，所有的东西都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啊，我已经三年没有看见他，没有给他弄过吃的、喝的了；这不是容易的事啊！"

"好啦，好太太，留神快点儿张罗吧，不要丢脸了；你们两

① 叶纽谢奇卡：也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② "屋门非"：俄国腔的法语 homme fait(成人)。
③ 俄谚。

位先生，请跟我来吧。啊，季莫费以奇来给你请安了，叶夫盖尼。他，我敢说，那老狗也很高兴的。喂，老狗，你高兴吗？请跟着我走吧。”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的破拖鞋一路上踢搭踢搭地响着。

他的房屋全部只有六间小屋子。这里面有一间，就是他现在带我们的朋友进去的那一间，是称作书房的。一张粗腿的桌子填满了两个窗户中间的地位，桌子上面堆满了给陈年的灰尘弄脏了、看起来好像是烟熏黑了的文件；墙上挂了几支土耳其枪，几根马鞭，一把指挥刀，两幅地图，几幅解剖图，一幅胡分南[①]的肖像，一幅嵌在黑框子里面、用头发编成的姓名缩写的花字，一张配着玻璃镜框的文凭，一张已经坐坏了、到处露了洞的皮沙发放在两口白桦木柜子的中间；架子上凌乱地堆满了书籍、盒子、鸟的标本、罐子、药瓶；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坏了的发电机。

“我已经告诉过您，亲爱的客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我们在这儿过的可以说是兵营的生活。”

“得啦，不要说了，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地方呢？”巴扎罗夫打岔道。“基尔沙诺夫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大富豪，你又没有宫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他安顿在哪儿？”

“叶夫盖尼，你不要着急，耳房里有一间很好的屋子：他住在那儿一定很舒服。”

---

① 胡分南（1762—1836）：德国学者。《长寿术》一书的著者。

“那么,你修了一排耳房了?”

“是啊,少爷,就是洗澡房那儿,少爷,”季莫费以奇插嘴道。

“我是说洗澡房旁边的那一间,”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解释道。“现在是夏天了。……我马上就到那儿去布置;季莫费以奇,你把他们的行李搬进来吧。你,叶夫盖尼,我当然把书房让给你用。Suum cuique。①”

“现在你看见他了! 一个多么有趣的老头儿,他人真好,”巴扎罗夫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去了,马上对阿尔卡狄说。“他恰恰和你父亲一样,是个古怪的人,不过是另外的一种。他讲话太多。”

“我觉得你的母亲太好了,”阿尔卡狄说。

“不错,她是个实心的女人。你等着看她给我们弄一顿什么样的午饭吧。”

“他们没有料到您今天回来,少爷,他们没有买牛肉,”季莫费以奇说,他正把巴扎罗夫的箱子拖了进来。

“没有牛肉我们也会吃得很好。没有也就罢了。俗话说得好:贫穷不是罪恶。”

“你父亲有多少农奴?”阿尔卡狄突然问道。

“这田产不是他的,是我母亲的;我记得,有十五个农奴吧。”

“一共二十二个,”季莫费以奇带着不满意的神情说。

① 拉丁文:各得其所。——原注

拖鞋拍地的声音又听得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了回来。

“再过几分钟，您的屋子就可以接待您了，”他得意地大声说，“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没讲错您的父名吧？这是伺候您的人，”他说，一面用手指着那个跟他一块儿进屋里来的短头发小孩，这个小孩身上穿一件两肘破烂的蓝色长外衣，脚上穿一双并不是他自己的皮靴。“他叫费季卡。啊，我儿子虽然叫我不要说，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请您包涵点，他做不了什么事。不过他知道怎样装烟斗。您当然抽烟吧？”

“我平常抽雪茄，”阿尔卡狄答道。

“您这个办法很好。我自己也喜欢抽雪茄，可是在这种偏僻地方，很不容易弄到雪茄。”

“得啦，不要再说穷诉苦了，”巴扎罗夫又打断了他的话。“你还不如坐在这儿沙发上，让我来好好地看你一下。”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笑着，坐了下来。他的面貌很像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前额低一些、窄一些，他的嘴稍微阔一些；他老是在动，时时耸动肩膀，好像他的衣服太紧，使他的膈肢窝下面很不舒服似的；他一忽儿眨眨眼睛，一忽儿咳嗽两声，一忽儿动动手指。他的儿子却一直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镇静。

“说穷诉苦！”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跟着说了一遍。“叶夫盖尼，你不要以为我想打动(就这么说吧)我们客人的同情心：说我们住在怎样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一个有思想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至

少我竭力不叫自己身上长满(就照一般人那样地说吧)青苔，不叫自己落伍。”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从他的袋里掏出一方新的黄色的细绸子手帕来，这是他匆匆忙忙地跑到阿尔卡狄的屋子去的时候顺便拿来的，他一面摇动手帕，一面继续说：“我这话并不是指，譬如说，下面的事实说的：那就是，我对我的农民实行纳租制度，把我的地给了他们，他们把一半的收成给我，在我自己这一方面，牺牲也不算小。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常识也命令我这样做，虽然别的地主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我现在是指科学，指教育来说的。”

“不错；我看见你这儿有一本一八五五年的《健康之友》[①]，”巴扎罗夫说。

“这是一个老朋友讲交情送给我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不过我们，譬如说，还知道一点儿骨相学，”他又说，这句话主要地是对阿尔卡狄说的，他一面指着柜子上面那个画得有编号的小方格的石膏人头，“就是勋奈林[②]的名字我们也并非不知道，还有拉德马黑尔[③]。”

“这个省里的人还相信拉德马黑尔吗？”巴扎罗夫问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咳一声嗽。

“这个省里……自然，先生们，你们知道得挺清楚；我们怎

---

① 《健康之友》：从一八三三年到一八六九年在彼得堡刊行的一种医学杂志。

② 勋奈林(1793—1864)：德国医生。

③ 拉德马黑尔(1772—1849)：德国学者、医生。

么能够赶上你们呢？现在该你们来替换我们了。在我那个时候有一位拥护体液病理学[1] 的霍夫曼[2]，还有布朗同他的活力论[3]，——我们觉得他们很可笑，可是在某个时期他们自然也享过大名来的。现在你们又有新的人来代替拉德马黑尔了，你们崇拜他，可是再过二十年人们又会笑他了。”

“我对你说，省得你心里不舒服，”巴扎罗夫说，“现在我们根本就看不起医学，我们对什么人都不崇拜。”

“那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不是要做一个医生吗？”

“不错，可是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中指插进烟斗里去，那里面还有一点儿燃着的热灰。

“好吧，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我不跟你辩论。我是什么呢？一个退伍的军医，渥拿都[4]，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农业家。”他又掉过头去对阿尔卡狄说：“我在您祖父手下[5] 做过事情，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当年也见过不少的世面。我进过各种社交界，接触过各种人物！我本人，现在站在您面前

① 体液病理学：一种陈腐的主观臆测的学说，它把所有疾病都解释为是机体体液失调的结果。

② 霍夫曼(1600—1742)：德国医生。

③ 布朗(1735—1788)：苏格兰内科医生。活力论是一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生命现象仿佛是由非物质的超自然力量或原则支配的。

④ 渥拿都：俄国腔的法语：voilà tout(如是而已)。——原注

⑤ 原文是“在您祖父的那一旅里头服过务”，因为当时阿尔卡狄的祖父还没有升任师长。

的这个人，也曾经给威特更席太因公爵和茹科夫斯基[1] 看过脉！那些参加过十四日[2] 的南军的人，您明白吧。(他说到这儿，便带着特别意味地紧闭他的嘴唇。)他们我全认识。唔，可是我的事情是另外的一种；你只要知道用你的柳叶刀就够了！您祖父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一位真正的军人。"

"你老实说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巴扎罗夫懒洋洋地说。

"啊，叶夫盖尼，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想一想……固然基尔沙诺夫将军不是一个……"

"得啦，不用提他了，"巴扎罗夫打岔道，"我坐车来的时候看见你那座桦树林子倒很高兴，它长得很漂亮。"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马上高兴起来。

"你瞧瞧我现在有一个多好的小花园！每棵树都是我亲手栽的。我有水果、草莓同各种各类的药草。不管你们年轻先生们怎样聪明，可是老巴拉塞尔赛司[3] 说出了神圣的真理：in herbis, verbis et lapidibus.……[4] 你知道，自然，我已经不行医了，可是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我还得重操旧业。他们来请教，我不能够把他们赶走。有时候贫苦的人跑来找我帮

---

① 威特更席太因(1768—1842)：俄国将军，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派诗人。

② 十四日：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大半是军官，分为南方协会与北方协会。

③ 巴拉塞尔赛司(1493—1541)：瑞士名医和化学家。

④ 拉丁文：在草、言语和石头里面。——原注。意思大概是：应当治病。

忙。这儿连一个医生也没有。这儿有一个邻居，一个退伍的少校，想不到他也在给人看病。我向人问过：‘他学过医没有？’他们告诉我：‘不，他没有学过；他行医多半是为了行善。’哈，哈！为了行善！啊，你觉得怎样？哈，哈！哈，哈！”

“费季卡，给我装好烟斗！”巴扎罗夫厉声说道。

“这儿还有一个医生，他去看一个病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带着一种扫兴的表情说下去，“那时候病人已经 ad patres[①]去了；用人不让医生进屋，只告诉他：‘现在用不着您了。’他没有料到这一层，慌张起来，就问道：‘唔，你主人临死前打嗝儿没有？’‘打的。’‘打得厉害吗？’‘厉害。’‘啊，很好，’他就转身回去了。哈，哈，哈！”

只有老人一个人在笑，阿尔卡狄勉强露出笑容。巴扎罗夫只是拚命地抽烟。谈话就这样地继续了一点钟的光景；阿尔卡狄还有时间到他屋子里去了一趟，那间屋子原来是洗澡房的外房，不过却是很舒服，很干净的。最后达纽莎进来通知，午饭已经预备好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第一个起身。

“走吧，先生们。要是我打扰了你们，那么请你们宽大地原谅我吧。我那位太太大概会叫你们满意的。”

午饭虽是匆匆准备的，却很可口，而且很丰富；只是酒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够味：这是一种差不多黑色的西班牙甜

① 拉丁文：到祖先那儿。——原注

酒，有一点儿像青铜又像松脂的味道，还是季莫费以奇从城里一家熟铺子里买回来的；还有苍蝇也非常讨厌。平日有一个农奴的小孩拿着一大枝绿树枝在旁边赶苍蝇；可是这一回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因为害怕年轻人批评，便把他打发走了。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已经换好了衣服：她戴着一顶有丝带的高帽，披着一条淡青色带花的披巾。她看见她的叶纽沙，忍不住又哭起来，可是这一次却用不着她丈夫来劝她：自己连忙揩干了眼泪，因为她害怕把她的披巾弄脏了。只有这两个年轻人在吃东西：主人同主妇早已吃过午饭了。费季卡在伺候开饭，他因为没有穿惯靴子，显然觉得很不舒服，还有一个男人相貌的独眼妇人在旁边给他帮忙，她叫安非苏希卡，平日兼做着管家、养鸡、洗衣的职务。在他们吃午饭的中间，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一直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脸上带了非常快乐的、甚至十分幸福的表情，谈论着拿破仑的政策和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问题① 所引起的严重的忧虑。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并不注意阿尔卡狄，也不劝他多吃；她把她的圆脸（她的丰满的樱桃色嘴唇，她的脸颊上和眉毛上的小黑痣使她的脸显得更和善）支在她的捏紧的小拳头上面，她的眼睛始终不离开她的儿子，而且一直不停地在叹气；她非常着急地想知道他这次回来要住多少时候，可是她又害怕问他。“要是他说只住两天又

---

① 意大利为摆脱奥国统治、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的问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引起俄国社会的注意，引起俄国报刊，特别是革命民主派杂志的《现代人》和《口笛》的热烈讨论。在意法奥战争中奥地利失败，但在签订威腊法郎加和约时拿破仑三世出卖了意大利，仍让奥地利保持对威尼斯的统治。

怎么办呢?"她想道,她的心就沉下去了。烤肉端上桌子以后,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不见了。过了一忽儿,他拿着半瓶开了塞子的香槟酒回来。"你瞧,"他叫道,"我们虽然住在乡僻地方,可是遇到喜庆事情,我们也有一点儿东西来助兴呢!"他斟满了三个高脚杯和一个小酒杯,提议祝"贵客们"的健康,便依照军人的规矩把酒一口喝光了;他还勉强阿利娜喝光她那一小杯酒。蜜饯端上来的时候,阿尔卡狄虽然不能吃甜的东西,也觉得他应当把那四种新做好的蜜饯每一样尝一点儿,尤其因为他看见巴扎罗夫坚决地一点儿也不吃就马上抽起雪茄来。然后茶同奶油、牛油、脆饼干一块儿送上来了;吃过了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去欣赏黄昏的美景。他们走过一条长凳的时候,他轻轻地对阿尔卡狄说:

"我爱在这个地方对着落日冥想: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隐士倒合适。那儿,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我栽了几棵贺拉西[①] 喜欢的树木。"

"什么树?"巴扎罗夫在旁边听见了便问道。

"啊,……刺槐。"

巴扎罗夫打起呵欠来。

"我想,现在是我们的旅客进莫尔非斯[②] 的怀里的时候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

① 贺拉西(前65年一前8年):罗马诗人。用颂歌和寄语歌颂在大自然怀抱中生活乐趣。

② 据罗马神话,梦神莫尔非斯是睡神的儿子。

"那是说，到了睡觉的时候了，"巴扎罗夫插嘴说。"这个意见不错。的确是时候了。"

他向他的母亲告辞的时候，他吻她的前额，她却拥抱他，又偷偷地在他背后划了三次十字，给他祝福。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阿尔卡狄带到他的屋子里去，并且盼望他"睡得好，就像我在您那幸福的年纪的时候一样"。阿尔卡狄在他那间洗澡房的外房里的确睡得非常好；屋里有一股薄荷味道；两只蟋蟀在灶后竞赛似地唱催眠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阿尔卡狄的屋子又到他的书房里去，他蜷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他儿子的脚边，准备跟他儿子谈一忽儿；可是巴扎罗夫说自己很瞌睡，马上把他打发走了，事实上巴扎罗夫一直到天亮才睡着。他睁大眼睛生气地注视着黑暗。童年的回忆在他心上并没有什么力量，而且他还不能够摆脱他最近的痛苦的印象。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先祷告到她自己满意了，后来又跟安非苏希卡谈了许久、许久的话，安非苏希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她主人面前，用她那只独眼死死地盯着她，鬼鬼祟祟地低声讲着她对于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的一切观察和意见。老太太的脑袋已经让快乐，让酒，让雪茄烟气味弄昏了：她的丈夫还想跟她谈话，也只好摇摇手扫兴地打住了。

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古时候的大家妇女：她应当早生两百年，生在旧的莫斯科时代[①]。她笃信宗

① 旧的莫斯科时代：指莫斯科做帝国首都的时期；在她这个时候俄国首都在圣彼得堡。

教，而且容易感动，她相信各种的兆头、占卜、咒语和梦；她相信圣痴① 的预言，相信家怪，相信树精，相信不吉利的相遇，相信凶眼，相信流行的丹方，相信星期四那天不吃盐②，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她相信要是复活节整夜礼拜的烛光不灭，荞麦的收成一定好；她又相信菌子要是让人眼看见了，就不会长大；她相信魔鬼喜欢有水的地方；她相信每个犹太人的胸口上都有一块血印；她害怕老鼠，害怕蛇，害怕青蛙，害怕麻雀，害怕蚂蝗，害怕雷，害怕冷水，害怕穿堂风，害怕马，害怕羊，害怕红头发的人，害怕黑猫，她把蟋蟀同狗当做不干净的生物；她从来不吃小牛肉、鸽子③、龙虾、乳酪、龙须菜、西洋野菜、野兔，她不爱吃西瓜，因为切开的西瓜使她想起了施洗的约翰的头④，她提起牡蛎就要打颤，她爱吃——可是严格持斋⑤；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她睡去了十小时，然而要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头痛，她就整夜不睡；除了《亚历克西或林中小屋》⑥ 外，她从没有读过一本书；她一年写一封，最多写两封信；可是处

① 当时旧俄一般迷信的人认为这种半疯的低能人得到了神的感召，能够跟神接谈，几乎把他们当作了预言家。

② 古时俄罗斯农村旧俗，星期四不吃盐。

③ 在从前，多数俄国人把鸽子看作圣灵的象征，不吃鸽子，也不杀鸽子。

④ 施洗的约翰：耶稣以前的传道者，被希律王锁在监里。希律根据他弟妇希罗底的要求，吩咐护卫兵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希罗底的女儿。（见《新约·马可福音》和《新约·马太福音》）

⑤ 持斋：即斋期中不吃肉的规定。

⑥ 《亚历克西或林中小屋》：法国小说家狄克烈—狄米尼尔（1761—1819）的一本感伤的小说，有俄译本。

理家务、做果干、做蜜饯，她却十分擅长，虽然她自己的手从来不沾一下，而且她往往一坐下来就不愿意再移动。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心肠很好，并且在她的范围内她也绝不是愚蠢的。她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种是主人，他们的职责是发命令，另一种是寻常老百姓，他们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因此她也并不厌恶卑屈谄媚和跪拜的礼节；可是她对待比她低下的人却很仁慈、温和；她从来不让一个乞丐空手回去；虽然她有时候也议论旁人；却从来没有讲过谁的坏话。她年轻时候很漂亮，会弹翼琴[①]，还讲几句法国话；可是自从她并不情愿地勉强跟她丈夫结了婚，跟他一块儿漂游了许多年以后，她的身子长胖了，也忘记了音乐和法国话。她很爱她的儿子，也很怕他；她把她的田产完全交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去管理——她自己现在一点儿也不过问；只要她的老伴跟她谈起那些快要实行的改革和他自己的计划，她马上就唉声叹气，接连地摇手绢儿表示不要听下去，而且吓得把眉毛越抬越高。她多疑善虑，老是觉得会有大难临头，要是她想起什么伤心的事情，马上就会痛哭起来。……像这样的女人现在是一天一天地少起来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为这桩事情高兴！

① 翼琴：一种有键的乐器，即钢琴的前身。

二一

阿尔卡狄早晨起来，打开窗，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个老年人穿了一件布哈拉[1]的宽睡衣，腰间束着一条手帕，正在起劲地挖他的菜园。他看见了他的年轻的客人，便把身子靠在锄头上，大声说：

“祝您健康！您睡得好吗？”

“非常好，”阿尔卡狄答道。

“您瞧我在这儿像新新纳塔斯[2]那样挖地种晚萝卜呢。我们现在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上帝！——人人都应当用自己的手来维持生活，靠别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总得自己劳动。现在看起来让·雅克·卢骚[3]究竟是对的了。要是在半点钟以前，我的亲爱的先生，您就会看见我在干一桩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肚子绞痛’——那是她的讲法，可是在我们却叫做痢疾，我……我怎么说才好呢……我给她服鸦片；我又给另一个女人拔了一颗牙齿。我劝

① 布哈拉：地名，在中央亚细亚。

② 新新纳塔斯（约前519—前439）：罗马的贵族和执政官，生活朴素，自己种地。

③ 让·雅克·卢骚（1712—1778）：法国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要著作是《论人们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他认为人的教育和幸福生活的条件之一是劳动。

这个女人上麻药……她却不肯。我干这些事都是 gratis[1]——安那马脚尔[2]。而且这也不足为奇；您知道我是一个平民，homo novus[3]，我不是世家出身，像我妻子那样。……您要不要在喝早茶以前到这儿荫凉处来，呼吸一点儿早晨的新鲜空气？"

阿尔卡狄便出去到了他身边。

"再欢迎一次，"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把手举到他头上那顶油腻的无边小帽旁边，行了一个军礼。"我知道，您过惯了阔的、快乐的日子，不过就是当代伟人也不致于不高兴在茅屋里头住上几天的。"

"啊哟，"阿尔卡狄叫起来，"您怎么把我比作当代伟人呢？我也没有过惯阔日子。"

"请原谅，请原谅，"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客气地笑答道。"虽然我现在是不中用的古董了，可是我也曾见过世面的——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为人。我多少也算得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观相家。要是我没有那种——我姑且大胆地说吧——本领，我早就完蛋了；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立不住脚的。我这样对您说并不是恭维您：我看见您跟我儿子的交情，万分高兴。我刚才看见他了；他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他这种习惯——到附近散步去了。请

① 拉丁文：免费的。——原注

② 俄国腔的法语：enamateur（业余的）。——原注

③ 拉丁文：新人。——原注

许我问一句——您跟我儿子认识很久吗?"

"从去年冬天起的。"

"不错,先生。请许我再问一句,——我们坐下来谈谈不好吗?请许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直爽地问您一句,您觉得我的叶夫盖尼怎样?"

"您的儿子是我所遇见的一个挺了不起的人,"阿尔卡狄起劲地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两只眼睛突然睁得很圆;两颊略微发红。锄头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那么您以为……"他说。

"我相信,"阿尔卡狄打岔道,"您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会给您的大名增光。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这样地相信。"

"这……这是怎样的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费力地慢慢说道。一个快乐的微笑使他的阔嘴张开了,那笑容一直留在他的嘴唇边。

"您要不要我告诉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要的……而且大概讲一下……"

阿尔卡狄便讲起巴扎罗夫的故事来,他这次比他跟奥津左娃跳玛组卡舞的那个晚上谈得更起劲,更热烈。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他一忽儿擤鼻涕,一忽儿把他的手帕放在两只手里搓成一团,一忽儿咳嗽,一忽儿又把头发搔得直立起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俯下头

去,在阿尔卡狄的肩头吻了一下①。

“您使我快乐极了,”他说,笑容一直没有消散。“我应当告诉您,我……崇拜我的儿子;我的老妻不用提了——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儿子是怎样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感情,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任何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对;许多人因为他的性格坚强,不满意他,认为这是骄傲、无情的表示,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来衡量的,不是吗?随便举个例子说,别的许多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成为他父母的累赘;可是他,您相信吗?从生下来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多花过一个戈比,上帝知道的。”

“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正直的人,”阿尔卡狄说。

“的确是没有私心的。可是我,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我不但崇拜他,我还拿他自豪,我的虚荣心就是:有一天他的传记里面会写上这样的几行:‘一个寻常的军医的儿子,不过这个父亲很早就看得出他的伟大,并且不惜花任何代价来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讲不下去了。

阿尔卡狄捏了捏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了一忽儿又问道,“他是不是会在医学方面得到您所预料的声名呢?”

“当然不是在医学方面,不过就是在这方面他也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那么在哪一方面呢,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

① 在帝俄时代,吻主人的肩头是农奴们的习惯。

“现在很难说，不过他会成名的。”

“他会成名的！”老人跟着说了一遍，他静静地思索起来了。

“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叫我来请你们进去喝茶，”安非苏希卡走来说，手里端着一大盆熟了的覆盆子。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吃了一惊。

“有没有凉的奶油来拌覆盆子？”

“有的，老爷。”

“记住，要冷的！不要客气，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多拿一点儿。怎么叶夫盖尼还不来呀？”

“我在这儿，”巴扎罗夫的声音从阿尔卡狄的屋子里送出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转过身去。

“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得太晚了，amice①，我跟他已经谈了好久了。现在我们得进去喝茶去：母亲在叫我们。哦，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个农民；他在害着 icterus② ……”

“是说黄疸病吗？”

“是的，一种慢性的、顽强的 icterus。我给他开了矢车菊和小连翘，叫他吃红萝卜，又给他苏打；可是这些都只是姑息

① 拉丁文：朋友。——原注

② 拉丁文：黄疸病。

剂；我们还想给他用点更有效的药。你虽然看不起医学，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给我一点很好的意见。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先进去喝茶。”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高高兴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口里哼着《洛伯特》① 里面的句子：

法则，法则，法则让我们自己来规定，

活……，活……，就是要活得快乐！

“好大的活力！”巴扎罗夫说着，就离开了窗口。

到了中午的时候。隐在一片连绵不断的浅白色薄云后面的太阳好像在燃烧一样。四周很静；除了公鸡在村子里挑衅般地对啼，让听见的人发生一种古怪的瞌睡和烦闷的感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顶上，有一只小鹰高高地在那儿连连发出哭唤似的哀鸣。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躺在一个小小的干草墩的荫处，身子底下垫了两三抱草，这虽是干了的草，并且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它们仍然带绿色，仍然有香味。

“那棵白杨，”巴扎罗夫开始说，“使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它长在土坑边上，那儿原先是个烧砖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土坑同白杨有一种特殊的法力；我在它们旁边，从来不觉得厌烦。我当时并不明白我之所以不厌烦，只因为我是一个小孩。

① 《洛伯特》：全名为《魔鬼洛伯特》，是德国作曲家麦耶伯尔（1791—1864）在一八三一年所作的歌剧。

唔，我现在长大了，法力也就没用了。"

"你在这儿一共住了多少时候?"阿尔卡狄问道。

"连续住了两年的光景;后来我们就出去旅行。我们过一种漫游的生活，老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搬来搬去。"

"这所宅子盖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盖的，就是我母亲的父亲。"

"你的外祖父，他是个什么人?"

"鬼知道。大概是个二级少校吧。他在苏沃罗夫[①] 手下干过事，他老是讲他那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故事——说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们客厅里挂了 一幅苏沃罗夫的像。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小宅子:又古老，又暖和;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灯油和苜蓿混在一块儿的气味，"巴扎罗夫打个呵欠说。"这些可爱的小宅子里的苍蝇……呸!"

"告诉我，"阿尔卡狄停了一下又说，"你小时候他们管束得严不严?"

"你看得见我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严厉的人。"

"你爱他们吗，叶夫盖尼?"

"爱的，阿尔卡狄。"

"他们多爱你啊!"

巴扎罗夫静了一忽儿。

---

① 苏沃罗夫(1729—1800):俄国统帅，于一七九九年在意大利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同年他统率下的俄罗斯军队在向瑞士进军中，完成了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后来把两只手托住后脑勺,问了这一句。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父母在世界上活得非常快乐。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到处跑来跑去,谈着姑息剂,给人治病,对农民厚道——一句话说完,他过的是称心如意的日子;我母亲也很快乐;各种各样的事务把她的时间全占去了,她一忽儿唉声,一忽儿叹气,她连想到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里,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

“让我来说一句,你这番话可以应用在一般人的身上……”

“你说得对,”巴扎罗夫打岔道。“我正要说,他们——我是指我的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感到厌倦和愤怒。”

“愤怒?为什么愤怒?”

“为什么?你怎么能够问为什么?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什么都记得,可是我仍然不承认你有愤怒的权利。你

不幸福，我承认，可是……”

“呸！那么你，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我看得出，你对爱情的看法是同一般新的年轻人一样了。你咯、咯、咯地唤着母鸡，可是等到母鸡走过来，你又跑开了！我不是这样的。可是用不着再讲这个了。再说那些没有办法的事，未免太可羞了。”他翻了一个身。“啊哈！这儿有一只勇敢的蚂蚁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带走它，兄弟，带走它！不要去管它怎样抵抗，你得利用这个事实：你作一个动物就有不承认怜悯心的权利，不像我们这些毁掉自己的人。”

“你不应该这样说，叶夫盖尼！你什么时候毁过你自己来的？”

巴扎罗夫抬起头来。

“这是唯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女人也不会把我毁掉。阿门[①]！现在完结了。关于那件事你不会听见我再讲一个字了。”

这两个朋友静静地躺了一忽儿。

“不错，”巴扎罗夫又说，“人是奇怪的生物。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亲们’在这儿过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不然；你不久就会感到苦闷了。你总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去跟他们吵架也好，总想跟他们来往。”

① 阿门：基督教祷告的结尾词，意即“心愿如此”。

“一个人应当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它每一刻的时光都过得有意义,”阿尔卡狄带思索地说。

“谁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错误,也是好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可以忍受……可是——无聊的闲话,无聊的闲话……这却是受不了的。”

“一个人只要不承认无聊的闲话,对他无聊的闲话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不过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说罢了。”

“什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譬如说教育是有利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可是要说教育是有害的,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了。它听起来好像更漂亮,其实是二而一的。”

“那么真理是在——哪儿,在哪一方面呢?”

“哪儿?我像回声那样地回答你:在哪儿?”

“今天你心里不痛快,叶夫盖尼。”

“真的?我想大概是太阳把我晒得太厉害了,而且也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覆盆子。”

“那么睡一忽儿午觉倒不坏,”阿尔卡狄说。

“好吧;只是你不要望我:每个人的睡相都是愚蠢的。”

“别人对你怎样想法,在你看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好。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应当顾虑这个的;对一个真正的人,别人用不着去议论他,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这倒古怪！我什么人都不恨，”阿尔卡狄想了一下说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个心肠又软、感情又脆弱的家伙；你怎么会恨人呢？……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么你呢，”阿尔卡狄打岔地说，“你相信你自己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吗？”

巴扎罗夫不响了。

“等到我遇着一个在我面前不低头的人，”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那么我再来改变我对我自己的意见。恨！不错，譬如，我们今天走过我们的管理人费立卜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又漂亮、又白的小屋，——你说，要是连最后的一个农民也有这样一所房屋的时候，俄国就到了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促成它的实现。……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民，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唔，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而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①；以后又怎么样呢？”

“得啦，叶夫盖尼……要是有人听见你今天讲的话，他会跟那班骂我们没有原则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讲话就同你伯父一样。一般地说，原则是不存在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只有感觉。一切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

① 意思是“在我的墓地上要长起牛蒡来”。

"就这样的。譬如拿我来说，我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那样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爱苹果——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肯对你说的，而且我下次也不会再跟你讲它。"

"什么？那么正直也是一种感觉吗？"

"我倒是这样想的。"

"叶夫盖尼！……"阿尔卡狄声音忧郁地说。

"啊？什么？这句话不合你的胃口吗？"巴扎罗夫打岔说。"不，兄弟。既然下了决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割下，就该把自己的脚也砍掉。可是我们也谈够哲理了。普希金说得好：'大自然送出睡梦的静寂。'"

"他从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阿尔卡狄说。

"好吧，倘使他没有说过，他既然是一个诗人，他就很可以说——而且也应当说这句话。我想，他一定在军队里头干过。"

"普希金从来没有做过军人。"

"对不起，在他的每页书上都是：'战斗去，战斗去，为了俄罗斯的荣誉！'"

"啊，看你乱编些什么！我要说这实在是毁谤了。"

"毁谤？事情太重大了！你想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不管你怎样去毁谤一个人，他实际上总要比你讲的坏二十倍。"

"我们还是睡一忽儿觉吧，"阿尔卡狄带着不痛快的调

子说。

"我非常赞成，"巴扎罗夫答道。

可是他们都睡不着。两个年轻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差不多仇视的情感。过了五分钟的光景，他们张开眼睛，默默地对望了一下。

"你瞧，"阿尔卡狄突然嚷道，"一片枯萎的枫叶离开了树枝，正朝地上落下来，它飘着就像一只蝴蝶在飞一样。这不奇怪吗？最悲惨的死的东西——却跟最快乐的活的东西一样。"

"呵，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巴扎罗夫大声说，"我求你一件事：不要用美丽的辞藻。"

"我会讲什么就讲什么。……你这真是专制了。我脑子里头有了一个思想，我为什么不该把它讲出来呢？"

"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该讲出我的思想呢？我觉得那种美丽的辞藻实在不好听。"

"那么什么话好听呢？骂人吗？"

"啊—啊！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后尘呢。要是那个白痴听见了你的话，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

"你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叫做什么？"

"我叫得非常恰当，他是一个白痴。"

"可是这叫人太难堪了！"阿尔卡狄嚷起来。

"啊哈！家族的情感在讲话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我早看出来这种情感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见；可是要他承认他那个偷手绢儿的兄

弟，这是随便举例说的，是一个小贼，——那就办不到了。老实说：我的兄弟，我的——不是天才……这是可能的吗？"

"是单纯的正义的感情在我心里讲话，一点儿也不是家族的情感，"阿尔卡狄热烈地答道。"不过你既然不了解那种感情，你既然没有那种感觉，你就不能够批评它。"

"换句话说，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只好低头不做声。"

"请你不要说吧，叶夫盖尼；我们结果会吵起来的。"

"啊，阿尔卡狄！给我一个恩典。我求你，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吵一回。"

"可是我们后来也许会弄到……"

"打架吗？"巴扎罗夫打岔地说。"好吧？这儿，在干草上面，在这种牧歌的环境里，离开世界和人们眼睛又远——那是不要紧的。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动手就会掐住你的咽喉。"

巴扎罗夫伸开他那瘦长的、结实有力的手指。……阿尔卡狄掉转身走开，玩笑似地做出准备抵抗的姿势。……可是他朋友的脸色在他眼里显得非常凶恶——在他那嘴唇上似笑非笑的微笑里，在他那发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恐吓的表情，他不由自主地觉得害怕起来。……

"啊！原来你们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老军医在年轻人的面前出现了，他穿一件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上衣，头上戴一顶也是自己家里做的草帽。"我到处找你们。……可是，你们倒挑选了一个很

好的地方，你们干得很好。躺在‘大地’上面，仰望‘天空’。……你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吗？”

“我除了要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天空，”巴扎罗夫嘟哝说，他又转过脸对阿尔卡狄小声说：“可惜他打了我们的岔。”

“唔，不要说了，”阿尔卡狄低声说，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就是再深的友情也不见得长久受得住这样的冲突。”

“我望着你们，我年轻的朋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在这个时候说，他把头摇了摇，两手交叉着按在他亲手做的弯曲得很好看的、柄上雕一个土耳其人头的手杖上头，——“我望着你们，我就止不住我的赞美。你们有多大的力量，精力最旺盛的青春，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简直是……加司托尔跟坡路克司[1]。”

“现在你瞧——他来卖弄他的神话学了！”巴扎罗夫说，“你一听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拉丁文学者了！啊，我好像记得你从前得过拉丁文作文的银牌奖章——是不是？”

“狄渥司苦利[2]，狄渥司苦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反复地说。

“啊，得啦，父亲；不要婆婆妈妈的了。”

“偶尔来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说。“不过先生们，

---

① 加司托尔、坡路克司：希腊神话中大神宙斯跟丽妲生的双生子。这里是指一对非常亲密的朋友。

② 狄渥司苦利：加司托尔和坡路克司二神的合称。

我并不是找着来恭维你们的；我是来，第一，告诉你们快开午饭了；第二，我要通知你一声，叶夫盖尼……你是一个聪明人，你通晓人情，你知道女人家的脾气，那么你会原谅的……你妈妈因为你回家来要做一次谢恩礼拜。你不要以为我来请你去参加谢恩礼拜——它已经做完了；可是亚历克赛神甫……”

“这儿的教士吗？”

“是的，那个教士；他要在我们这儿……吃饭。……我并没有料到，我也不赞成……可是也不知道怎样弄出来的……他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唔，而且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好的、明理的人。”

“我想他不会把我的一份午饭也吃掉吧？”巴扎罗夫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笑了起来。

“啊呀！这是什么意思！”

“好啦，我不再要求什么了。我不管同谁一桌吃饭都可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戴正他的帽子。

“我早就相信你不受任何偏见的拘束。就拿我来说吧，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了，我也没有偏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敢承认是他自己要做谢恩礼拜的。……他对宗教的虔诚不亚于他的妻子。）并且亚历克赛神甫很想跟你认识。你也会喜欢他的，你等一忽儿瞧吧。他并不反对打牌，并且有时候——这句话只有在我们中间讲——他还抽一袋烟呢。”

“好吧。我们吃过饭来打一圈‘杂牌’[1]，我会好好地赢他

① “杂牌”：一种类似“威斯特”的纸牌戏。

一场。"

"嘿！ 嘿！ 嘿！ 我们瞧吧！ 恐怕靠不住。"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手。"巴扎罗夫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青铜色脸颊上泛起一层局促的红晕。

"你不害臊吗，叶夫盖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的，我愿意在这位先生面前承认我年轻时候有过这种嗜好，——这是事实；而且我为它也受够苦了！ 啊，天气真热！让我跟你们坐一忽儿。我想，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啊，一点儿也不，"阿尔卡狄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呻吟一声，在干草上坐了下来。

"亲爱的先生们，"他说，"你们现在这个睡铺叫我想起了我从前在军队里的露营生活，包扎所也是在一个像这样的靠近干草堆的地方，而且就是这样的地方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他又叹了一口气。"我一生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说吧，要是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桩比萨拉比亚大瘟疫中的古怪事情。"

"你就是为了那桩事情得到符拉季米尔勋章吗？"巴扎罗夫插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挂在身上？"

"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没有偏见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结结巴巴地说（他刚刚在前一天叫人把红丝带从他的衣服上拆了下来），他接着就讲起瘟疫的故事来。"您瞧，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轻轻地说，又好意地眨了眨眼，

然后大声叫道:"叶夫盖尼! 起来,我们去吃午饭吧。……"

亚历克赛神甫生得魁伟、肥胖,一头浓发梳得很光,他那件淡紫色绸法衣上面束了一根绣花腰带,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圆滑知趣的人。他连忙先伸出手给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好像他预先知道他们并不要他祝福似的[1],他的举止大都是毫无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得罪别人;他偶尔也笑话神学校里教的拉丁文,却极力维护他的主教;他喝了两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尔卡狄的一根雪茄,并不马上抽它,说是他要带回家去。他只有一桩事叫人看了觉得不大舒服,就是他时时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伸起手去捉脸上的苍蝇,有几回居然把苍蝇压扁了。他坐在牌桌旁边并不显得十分高兴,结果他却从巴扎罗夫手里赢了两个半卢布的钞票(在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的家里,没有人会用银子计算)[2]。……她照旧坐在她儿子的身边(她是不打牌的),她照旧拿一只小拳头支住她的脸颊;她只有去叫人端一点儿新的吃食上来的时候才站起身子走开。她不敢去亲巴扎罗夫,他不给她一点儿勇气,也不鼓励她去亲他;而且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劝过她不要太把他"麻烦"了。"年轻人不喜欢那种事情,"他这样地跟她讲了好几次。(这儿用不着说那天的午饭是多么丰富;季莫费以奇大清早就亲自赶车去买一种特别的契尔卡

① 通常教士看见人不握手,只给他们祝福,他们便吻他的手。亚历克赛神甫知道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不会接受他的祝福,便先伸出手给他们。

② 当时银子的价值与钞票的价值不同,银子贵得多。这是尼古拉一世滥发钞票的结果。

赛的牛肉①;管理人到另一个方向去买淡水鳕、鲈鱼、龙虾;单是蕈子一样就给了那个乡下女人四十二戈比。)可是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巴扎罗夫,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与温情;那里面还有忧愁,也搀杂得有恐惧和好奇心;那里面还可以看出一种温顺的责备来。

可是巴扎罗夫却无心去分析他母亲眼里的那一种表情;他很少掉过脸去跟她讲话,不过偶尔问她一两句简短的话罢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一换"手气";她就静静地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怎样,"她等了一忽儿,问道,"有没有用处?"

"更坏了,"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答道。

"他打的牌太冒险了,"亚历克赛神甫好像表示惋惜地说,他一面抚摸他的漂亮的胡子。

"拿破仑的方法,好神甫,拿破仑的方法,"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他打出了一张"爱司"。

"可是它把拿破仑送到圣海伦那② 去了,"亚历克赛神甫说,他拿出王牌把"爱司"吃了。

"你要不要喝一点儿红醋栗水,叶纽谢奇卡?"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问道。

巴扎罗夫只是耸了耸肩。

---

① 这是上等的牛肉。

② 海伦那:南大西洋上一个英国海岛,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一世给放逐在这个岛上,他后来(1821)便死在这儿。

"不成!"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烦透了;我想工作,可是在这儿无法工作。我想再到你们的村子那儿去;我的实验标本也都留在那儿。在你们家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在这儿虽然我父亲老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书房让给你用——没有一个人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一步。我又不好意思把他关在门外。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听见她在隔壁不住地叹气,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没有话对她说。"

"她一定会很伤心,"阿尔卡狄说,"他也会那样。"

"我还要回来看他们。"

"什么时候?"

"唔,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的母亲。"

"为什么呢?是她请你吃饱了草莓吗,还是别的缘故?"

阿尔卡狄埋下了眼睛。

"你不了解你的母亲,叶夫盖尼。她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的确是很聪明的。今天早晨她跟我谈了半小时,谈的话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谈论我吧?"

"我们并不是单单谈论你。"

"也许;你作为旁观者看得清楚些。倘使一个女人能够谈得上半小时的话,那往往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我仍然要走。"

"可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也不是一桩很容易的

事。他们一直在议论怎样安排我们这两个星期里的生活。”

“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今天有什么魔鬼鼓动我去把我父亲挖苦了一顿；他前两天叫人把他的一个纳租的农民打了一顿鞭子，——他打得很对；不错，不错，你用不着这样生气地望着我——他打得很对，因为那个农民是一个惯贼，一个酒鬼；只是我父亲没有想到我，像一般人那样说的，‘已经知道了’这桩事情。他非常狼狈。现在我又要叫他格外伤心了……不要紧！他不久会好的。”

巴扎罗夫虽然说是“不要紧”；可是这一天已经过完了，他还不能够下决心把他的主意告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跟他父亲道过了晚安，他才假装打一个呵欠，说道：

“啊，……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明天请你差人把我们的马带到费多特那儿去换班。”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了一跳。

“基尔沙诺夫先生要走吗？”

“不错；我跟他一块儿走。”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也站不稳了。

“你要走？”

“不错……我一定得走。请你叫人把马预备好。”

“很好……”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去换班……好……只是……只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一定得到他那儿去稍微住一些时候，以后我还要回来的。”

“啊！稍微住一些时候……很好。”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掏出手帕来，擤了擤鼻子，身子差一点儿弯到地上了。“好吧……都会给你办妥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我们这儿……住长些。三天……分别了三年，这，这实在少；实在少，叶夫盖尼！”

“可是我对你说过，我马上就回来的。我一定要去一趟。”

“一定要。……那有什么办法呢？责任超过一切。那么得把马送去吧？很好。不用说，阿利娜和我都没有料到这个。她刚从一个邻居那儿讨了一点花来，预备给你装饰屋子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没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光着脚趿起拖鞋去找季莫费以奇商量，用他那打颤的手指掏出一张一张的破钞票，差遣季莫费以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他买好的饮食，买红葡萄酒，据他看来，这两个年轻人是极喜欢喝红葡萄酒的。）主要的是……自由；这是我的规则。……我不想妨碍你……不……”

他突然闭了嘴，向着门走去。

“我们不久会再见的，父亲，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并不掉转身来，他只是摇摇他的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寝室，看见他的妻子已经睡着了，他便轻轻念他的祷告辞，免得把她惊醒。可是她仍然醒了。“是你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问道。

“是的，妈妈。”

“你从叶纽沙那儿来吗？你知道不知道，我害怕他睡在沙发上不舒服？我叫安非苏希卡给他铺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头；我本来应该把我们的鸭绒被给他，可是我记得他不喜

欢睡太软的床。”

“不要紧，妈妈；你不要担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怜悯我们罪人吧①，”他又继续小声地念他的祷告辞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很可怜他的老妻；他不想现在就告诉她明天有一个多大的悲痛在等着她呢。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第二天便走了。从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满了忧郁、沮丧的气氛；安非苏希卡打碎了盘子、碟子；连费季卡也弄得糊涂起来了，结果他无缘无故脱掉了脚上的靴子。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惊扰过；他显然竭力装出勇敢、镇静的表情，大声讲话，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容显得消瘦，他的眼睛一直在避开他儿子的眼光。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轻轻地哭着；她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要不是她的丈夫在大清早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功夫劝她，她就会没法控制自己了。巴扎罗夫不止一次地答应他一定在一个月里头回来，最后他终于从他们的挽留的拥抱中挣脱了身子，坐上四轮敞篷车；马跑起来，铃子在响，车轮在转动，——他们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尘土定了下来，季莫费以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地爬进他的小房子去了；这所小小的宅子里就只有这一对老人，连宅子也突然显得老朽龙钟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前一忽儿还立在台阶上起劲地摇着手帕，现在他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头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丢开，丢开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丢开我们了；他不高兴同我们在一块儿。孤独，

① 这一句是他的祷告辞。

现在就像手指一样地孤独！”① 他接连念了几遍，每次他都把一只手伸出来，食指单独地举起。后来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走到他身边：把她的灰白的头靠着他的灰白的头，说道：“瓦西亚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子不再需要我们照管了。他就像一只鹰，高兴飞来就飞来，高兴飞去就飞去；你我却像生在树孔里的两朵蕈子，我们紧紧靠在一处，从来不移动一下。只有我对你永远不变，你对我也是一样。”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手从他的脸上取下来，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抱得紧紧地，比他年轻时候抱她还要紧些：在他悲痛的时候她安慰了他。

二二

我们的朋友除了偶尔交换几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以外，就闭上嘴，一直坐车到了费多特那儿。巴扎罗夫并不怎样满意自己。阿尔卡狄也不满意他。他也感到了那种只有很年轻的人才知道的无名的悲哀。车夫换好了马，爬上驾车座位，问道：“向右去还是向左去？”

阿尔卡狄打了一个颤。向右去的路是到城里去的，从城里便可以回家；向左去的路是到奥津左娃的家去的。

---

① 俄谚：孤孤单单的意思。

② 瓦西亚：瓦西里的爱称。

他望了一下巴扎罗夫。

“叶夫盖尼，”他问道，“到左边去吗？”

巴扎罗夫把脸掉开。

“这多愚蠢！”他喃喃地说。

“我知道这愚蠢，”阿尔卡狄答道。“可是这有什么害处呢？难道这是第一回吗？”

巴扎罗夫把帽子拉下来盖住前额。

“随你的意思办吧，”他末了说。

“向左去！”阿尔卡狄大声说。

四轮敞篷车便朝尼可尔斯柯耶的方向转动了。可是这两个朋友决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以后，反而比先前更不高兴开口了，他们都好像是在生气似的。

奥津左娃的管事在宅子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他那种态度使这两个朋友马上觉得：他们这次突然顺从了自己一时的冲动，是一种欠审慎的举动。这儿的人显然并没有料到他们会再来。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面貌，在客厅里坐了大半天。后来奥津左娃进来见他们了。她像平日那样亲切地接待他们，可是对他们这样快回来表示惊讶；并且从她那缓慢的举动和言语上看来，她是不大高兴他们回来的。他们连忙声明：他们只是路过这儿顺便来拜访她，三四小时以后他们就得动身进城去。她不过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她请阿尔卡狄代她问候他的父亲，随后就叫人去请她的姨母来。公爵夫人带着睡容出来了，这使她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显得更凶恶了。卡契雅

不大舒服，没有出来。阿尔卡狄忽然觉得他想见卡契雅的心至少是同想见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心一样迫切。四个小时在没有多大意义的闲谈中间消磨过去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不论听他们讲话，或者自己说话，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一直到他们告辞的时候，她从前的那种友情才似乎又在她的心中活动起来。

"我这一阵子脾气不大好，"她说，"不过你们千万不要介意，一半天请再来——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

巴扎罗夫同阿尔卡狄两个人默默地鞠躬回答，然后坐上车去，他们一路上也不再停留，让车子一直往玛利因诺跑去，第二天的傍晚他们就平安地到了那儿。在这长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提过奥津左娃的名字；尤其是巴扎罗夫，他很少开口，却带着一种冷酷的紧张表情不停地朝路旁边另一个方向望去。

玛利因诺的每一个人看见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因为儿子离家太久的缘故，心里开始有点儿着急，所以在费涅奇卡眼睛发亮地跑来告诉他"年轻先生们"回家的时候，他马上发出一声叫喊，摇摆着两腿从沙发上面跳起来；连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也多少感到一点儿愉快的兴奋，他跟这两个回家的游子握手的时候还露出谦和的微笑。接着是谈论和问询；阿尔卡狄谈得最多，尤其是在晚饭的时候，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叫人拿出几瓶刚从莫斯科送到的黑啤酒来；他也同他们一块儿喝酒，直喝到两颊通红，他不断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半小孩气的、半神经质的笑声。连用人们也都传染到了这种普遍的快乐。杜尼雅霞好像发了

疯似地、不停地跑来跑去：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彼得在早晨两点多钟还拿出吉他来弹一支哥萨克旋舞曲。琴弦在静寂的空气中发出一种哀婉的、悦耳的音调；可是除了开始的几下装饰音以外，这个有教养的听差就弹不出什么来了；他天生没有音乐才能，就同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才能一样。

在这个时候，玛利因诺的生活并不十分美满，可怜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处境很不好。田庄上的麻烦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都是些令人心烦的没有道理的麻烦。他雇的长工给他的麻烦简直是不能忍受的。有的人要求算清工钱，有的人又要求增加工资，还有一些人领了预支的工钱就带着跑了。马病了；马具好像是给火烧坏了似的；工作做得很草率；从莫斯科买来的一架打麦机因为太重不合用，另一架只用了一次就坏了；牛舍给烧去了一半，只因为用人中间有一个瞎眼老太婆在刮风天拿了一块烧着的木头去熏她自己的病牛……那个老太婆一口咬定说这个灾祸的起因是：主人想做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式干酪和各种牛奶食品。总管突然懒起来了，他开始在发胖，俄国人凡是得到舒服的位置的，都长得很胖。他只要远远地望见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就会丢一块木片去打一只在旁边走过的小猪，或者骂一个光着半身的小孩来表示他热心工作，可是在其余的时候他大半是在睡觉。那些佃农不但不按期纳租，还偷盗树林里的木材；看守人差不多每夜都在“农庄”的牧地上捉住几匹农民的马，有时候要经过一番争夺以后才能够把马带走。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本来规定了一笔罚金作为赔偿损失，可是每回的结果总是马白白吃了

主人的一两天草料，仍旧由原主领回家去。末了，又加上这样的事：农民中间发生了争执；弟兄闹着分家，他们的妻子不能够住在一处；突然间打起架来了，就好像听到谁的号令似的，一下子整个村子都惊动了，全村的人立刻跑到事务所的台阶前面，往往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有的人打得满脸伤痕，都围着主人要求公平裁断，他们中间闹的闹，叫的叫，还有女人的哭号，同男人的咒骂混在一块儿。主人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费力把打架的两方面的人拉开，他不得不把嗓子都叫哑了，虽然他自己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的解决。在收割的时候人手不够；附近地方一个单户农民[①] 做出极恳切的样子来商量，表示他愿意供给收割的人，讲定了两个卢布一亩的代价，结果他却用最无耻的手段把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骗了；他自己村子里的妇女要着从没有听见过的高的工钱，却让麦子落在田里；一方面收割的工作不能好好进行，另一方面监护院[②] 却逼他并且威吓他要他立刻把借款的利息付清……

“我已经用尽我的力量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不止一次灰心地说。“我自己不能够打架；要是叫警察来吧，又跟我的原则冲突；可是对付这班人：要是不用刑罚去吓唬他们，便什么都干不了！”

---

① 单户农民：十八至十九世纪占有一户的国家农民的等级之一。他的出身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在俄罗斯国家边境上的边防军中服役的下级人员。

② 监护院：帝俄时代管理照顾孤儿、寡妇和私生子的慈善机关，用它的基金放款生息。

“Du calme, du calme,”[1]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听见了，就会拿这样的话安慰弟弟，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免要哼几声，皱皱眉头，拉拉小胡子。

巴扎罗夫完全不管这些“无谓的争吵”，而且他是一个客人，也实在不便去干预别人的事情。他到玛利因诺的第二天就着手研究他的青蛙、纤毛虫同化合物，整天忙着这些工作。阿尔卡狄却跟他相反，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即使不给父亲帮忙，至少也得做出准备给父亲帮忙的样子。他耐心地听父亲讲那些事，有一回他还贡献了意见，他并没有想到要父亲采用他的意见，只不过借此表示他的关心罢了。田地上的事情他并不讨厌，他甚至高兴地幻想过将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脑子里却装满了别的思想。阿尔卡狄，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现在不停地想着尼可尔斯柯耶；要是前一些时候有人对他说，他同巴扎罗夫住在一个屋顶下面，而且是住在怎样一个——住在他父亲的屋顶下面，他会感到无聊的话，他一定只会耸耸肩头，可是现在他实在感到无聊，而且只想走开。他想出去散步，走到疲倦为止，可是这个办法也没有用。有一天他跟他父亲讲话，听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收藏着几封颇有趣味的信，是奥津左娃的母亲从前写给阿尔卡狄的母亲的，从此他就缠着父亲，不让父亲安静一忽儿，一直到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翻遍了二十个各种各样的箱子和抽屉，把信找出来交给他为止。阿尔卡狄拿到这些已经半腐烂了的信笺以

① 法语：安静点儿，安静点儿。——原注

后，他觉得心里安宁了，就好像看见了他现在应该去的目的地似的。“我是对你们两位说的，”他不断地低声念道，“这是她自己说出来的！我要去，我要去，管它的！”可是他记起上一次的拜访，她的冷淡的接待和他自己的狼狈的情形，他又胆怯了。到底是年轻人的“瞎碰”的精神，和那种碰碰自己的运气、不要人保护试试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私愿——最后得到了胜利。他回到玛利因诺以后不到十天，便借了研究星期学校①的机构的名义，坐车到城里去了。他从那儿又转到了尼可尔斯柯耶。他一路上不停地催车夫快跑，他没命地往那儿跑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军官奔赴战场一样：他又害怕，又高兴，又急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不该乱想，”他接连对自己说。他的车夫碰巧是一个雄赳赳的小伙子，见到酒店便停下车来问：“喝一杯吗？”或者“要不要喝一杯？”可是他喝过以后就不顾惜自己的马了。最后那所熟悉的宅子的高屋顶望得见了……“我是做什么呀？”这个思想突然在阿尔卡狄的脑子里动了一下。“好吧，现在不好转回去了！”三匹马步伐一致地向前飞跑；车夫对它们吆喝着，吹着口哨。一忽儿小桥在马蹄和车轮下面轰响起来了，一忽儿剪齐的枞树荫路过来迎接他们。……在深绿丛中露出了一个女人的粉红衣裳，一张年轻的脸从一把阳伞的细缨子下面望着他们。……他认出了卡契雅，她也认出他来。阿尔卡狄吩咐车夫拉住马，他跳下车来，走到她面前。“原来是您！”她说道，渐渐地整个脸都

① 星期学校：为一般做工的人开办的补习学校。

红了;"我们去找姊姊去,她就在花园里,她一定高兴看见您的。"

卡契雅领着阿尔卡狄走进花园。他觉得他遇到她正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预兆;他很高兴见到她,仿佛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似的。一切都很顺利:不用管事,不用通报。在一条小路的转角他看见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她背朝着他立在那儿。她听见脚步声,便静静地转过身来。

阿尔卡狄又发慌了,可是她的第一句话就使他马上放下心来。"您好,逃亡的人!"她用她那平静而亲切的声音说,一面走过来迎接他,她脸上带笑,同时又眯起眼睛避开风和阳光。"卡契雅,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来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他说,"您一定料不到的。……"

"您带了您自己来了,这比什么东西都好。"

二三

巴扎罗夫带着讥讽的怜悯送走了阿尔卡狄,他还让阿尔卡狄明白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一点儿也没有瞒过他,随后他一个人关起门来:一阵工作的热狂占有了他的心。他现在不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争论了,尤其是因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他面前过分地摆起贵族架子,而且不大用字句来表示意见,却常用一些声音。只有一次他们谈到当时算是很时髦

的关于波罗的海各省贵族的权利的问题[1],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这个虚无主义者争论起来;可是他忽然自己打住了,冷冷地客气地说:"不过,我们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至少我没有了解您的荣幸。"

"当然啊!"巴扎罗夫嚷道。"一个人什么都能够了解——以太怎样颤动啦,太阳上面发生了什么啦;可是别人擤鼻子怎么能够跟他擤鼻子不一样,他就不能够了解了。"

"什么,这是一句俏皮话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便走到一边去了。

然而他有时候也要求巴扎罗夫允许他参观他的实验,有一次他还把他那张用上等化妆品洗得很干净而且擦得香喷喷的脸挨近显微镜,去看一只透明的纤毛虫怎样吞下一小粒绿色灰尘,又怎样用它的喉咙里那些非常灵活的类似拳头的小东西咀嚼它。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到巴扎罗夫的屋子里去的次数比他哥哥多得多;要是没有田地上的事情绊住他,他一定会天天去,照他自己的说法,"学习"了。他并不打扰这个青年自然科学家:他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专心望着,偶尔发出一句小心谨慎的问话。在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也往往设法把话题转到物理学、地质学,或者化学上面去,因为他知道所有其他的题目,连农业也包括在内,更不用说政治了,要不引起

① 波罗的海沿岸贵族们对农民的肆无忌惮的剥削,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末就有萨马林在他的《里加来信》里予以揭露。这些书信以手稿的形式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二地广为流传。从一八五六年起波罗的海沿岸贵族们在农奴问题上采取的反动立场不止一次在报刊上遭到批评。

冲突，至少也会引起彼此的不痛快。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料到他的哥哥对巴扎罗夫的憎恶并没有减少。在许多事情中间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的猜想不错。附近一带发现了霍乱症，连玛利因诺这个村子里也给它“拉去”了两个人。有一天夜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忽然有了相当厉害的病象。他熬了一整夜的痛苦，可是他并不去请巴扎罗夫给他医治。第二天他们见到面，巴扎罗夫问他：为什么不叫他去看看，他回答道：“啊，我好像记得您自己说过您不相信医学。”他的脸色还很苍白，但已经仔细地梳洗过而且刮过脸了。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巴扎罗夫毫不懈怠地、但又闷闷不乐地做他的研究工作……这个时候在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宅子里头还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对她吐露过胸怀，可是他却高兴跟她谈话……这个人就是费涅奇卡。

他遇见她的时候大半是大清早，在花园中或者在院子里；他从不到她的屋子里去看她，她也只有一次到过他房门口来问他——应不应该给米奇亚洗澡？她不但信任他，不但不怕他，并且她在他面前反而比在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举动更自由，更随便。要说明这个原因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她无意识地感觉到巴扎罗夫没有一点儿贵族气派，没有一点儿那种既引人神往又叫人害怕的高贵气派。在她的眼睛里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又是一个朴实的人。她当着他的面毫无拘束地照应她的孩子；有一次她忽然头晕接着又头痛，还从他的手里喝过一调羹药。在尼可拉·彼得罗维奇面前她好像在躲开巴扎罗夫：她这样做并不是在作假，却是为了尊重礼俗。

她比从前更害怕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了;最近一些时候他开始在暗中观察她,有时候他会突然在她背后出现,就像是从地底下跳出来似的,穿一身英国式样的衣服,带一张没有感情的、又好像在侦察什么似的脸,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好像淋了你一身的冷水似的,"费涅奇卡对杜尼雅霞抱怨道,杜尼雅霞的回答是一声长叹,她想着另一个"无情的"人。巴扎罗夫自己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竟成了杜尼雅霞心里的残酷的暴君了。

费涅奇卡喜欢巴扎罗夫;巴扎罗夫也喜欢她。他跟她谈话的时候,连他的脸也变了样子了: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愉快的、而且差不多是和善的表情,他平日那种毫不在乎的态度现在也换上了一种开玩笑的关心。费涅奇卡长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轻女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期她们会像夏天的蔷薇一样忽然开花吐艳;费涅奇卡现在到了这个时期了。一切都给她添了美丽,连这个时候的七月的暑气也是这样。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衣衫,显得她自己更白净,更轻盈了;太阳并没有把她晒黑;可是这种她躲避不了的炎热在她的脸颊上和耳朵上轻轻地染了一层浅红,这炎热使她全身感染到一种软软的慵懒,给她的美丽的眼睛添一种睡梦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不能够做事情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地滑到膝上。她连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带着那种可笑的无可奈何的样子整天唉声叹气。

"你应当多洗澡,"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对她说。

他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干掉的水塘上搭了一个帐篷,把水

塘改做了浴池。

“啊，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走到池子那儿，人就要死了，再走回来，又要死一次。您瞧，园子里头就没有一个荫凉地方。”

“真的，园子里头没有荫凉地方，”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摸自己的前额。

一天早晨七点钟，巴扎罗夫散步回来，在丁香凉亭里遇见费涅奇卡。丁香花早谢了，可是枝子上还是浓密的一片绿色。她坐在一张凳子上，照旧在头上搭着一条白帕子，身边放了一大堆还带着露水的红色的和白色的蔷薇花。他跟她道了早安。

“啊！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她说，稍微揭起包头帕子的边儿来望他，她举起手的时候，那只膀子连肘也露出来了。

“您在这儿做什么？”巴扎罗夫说，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您在扎花束吗？”

“是的；预备早饭桌上用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喜欢花。”

“可是现在离早饭时间还很远呢。这大堆的花！”

“我现在摘了它们，只是因为过一忽儿天就热起来了，我也不能够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还透得过气。天热起来我就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害怕我是不是要生病了。”

“您真想得古怪！让我来摸摸您的脉。”巴扎罗夫拿起她的手来，摸了摸她那跳得很均匀的脉搏，可是他连脉动的次数也不去数就放下她的手来，说：“您要活一百岁呢！”

“啊，您不要乱说！”她嚷道。

“为什么？您不想长寿吗？”

“好啦，可是一百岁！我们祖母活到八十五岁——她受了多少活罪！又脏，又黑，又聋，又驼背，又是不停地咳嗽；她只是自己的一个累赘。这算是什么生活！”

“那么，还是年轻好？”

“可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年轻好呢？告诉我吧！”

“您怎么能够问为什么呢？我现在在这儿，我年轻，我什么事都能够做——来来，去去，拿这个，拿那个，用不着求别人帮忙……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在我看来，年轻年老都是一样的。”

“您怎么说——都是一样的呢？像您说的那样是不可能的。”

“那么，您自己判断吧，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我的青春对我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这一直是由您自己决定的。”

“这完全不由我！我倒希望有个人可怜我。”

费涅奇卡瞟了巴扎罗夫一眼，不过并没有讲什么。

“您拿的是什么书？”她停了一忽儿问道。

“这个吗？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很难念的。”

“您老是在用功吗？您就不觉得厌烦吗？我猜您已经什么都懂得了。”

“好像并不什么都懂得似的。您试着念念看。”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懂。这是俄文吗?”费涅奇卡问道,她双手接过这本封面很重的书。“这本书真厚!”

“不错,这是俄文。”

“这还是一样的;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懂。”

“我并不要您懂它。我想看您念书的样子。您念书的时候,您那小小的鼻尖动得非常好看。”

费涅奇卡随手翻到论《木焦油》的一章,便低声拼着念起来,她忽然笑了,把书丢开……书从凳子上滑到地上去了。

“我也爱看您笑的样子,”巴扎罗夫说。

“不要讲了!”

“我爱听您讲话。就好像溪水在淙淙地流着似的。”

费涅奇卡把头掉开。“您真古怪!”她说,又动手挑选花去了。“您怎么肯听我讲话?您是跟那些聪明的太太小姐们讲惯了的。”

“啊,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聪明的太太小姐们也抵不上您这小小的肘子。”

“是啦,您编出一套话来了!”费涅奇卡合起两只膀子,低声说。

巴扎罗夫从地上捡起那本书来。

“这是一本医书,您为什么把它丢开?”

“医书?”费涅奇卡跟着说了一遍,她又转过脸向他。“您知道吗?自从您给了我那点儿药以后,您还记得吗?米奇亚就睡得很好了!我不知道要怎样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说实话，医生是要酬报的，”巴扎罗夫微笑道。“您一定知道，医生都是贪心的人。”

费涅奇卡抬起眼睛望巴扎罗夫，她的上半边脸上正照着一片白色的反光，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乌黑了。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笑话。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是很高兴的……不过我得问问尼可拉·彼得罗维奇……”

“为什么，您以为我要钱吗？”巴扎罗夫打断了她的话。“不，我并不要您的钱。”

“那么要什么呢？”费涅奇卡问道。

“要什么？”巴扎罗夫跟着说了一遍。“您猜猜看！”

“我怎么猜得着呢？”

“好吧，我来告诉您；我要……一朵这样的蔷薇花。”

费涅奇卡又笑了，她甚至拍起手来，她觉得巴扎罗夫的要求有趣极了。她一边笑，一边又很得意。巴扎罗夫不转眼地望着她。

“好的，好的，”她末了说，便俯下身子去挑选凳子上的花。“您要哪一种——红的还是白的？”

“红的，却不要太大。”

她又坐直了。

“这儿，您拿去吧，”她说了，可是立刻又缩回她那只伸出去的手，咬了一下她的嘴唇，看看凉亭的入口，又侧耳听了一忽儿。

“怎么啦？”巴扎罗夫问道。“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吗？”

“不。……老爷① 到田上去了……而且我也不怕老爷……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大老爷②到这儿来了。不……并没有人。您拿去吧。”费涅奇卡把蔷薇花给了巴扎罗夫。

“您为什么要害怕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我看见大老爷就害怕。话——他倒不说什么,却总是很古怪地望着我。我知道您不喜欢他。您该记得您在先老是跟他吵架? 我不知道您跟他吵些什么,可是我看得出您把他弄得团团转。……”

费涅奇卡用她的手做出在她看来巴扎罗夫怎样摆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样子。

巴扎罗夫微微笑起来。

“可是倘使他把我打败了呢,”他问道,“您肯来给我帮忙吗?”

“我怎么能够给您帮忙呢? 可是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您。”

“您这样想吗? 可是我知道有一只手只要它愿意,就可以用它的一根指头把我打倒。”

“这是什么样的手?”

“什么,您真的不知道吗? 您闻闻看您给我的这朵蔷薇花多香。”

费涅奇卡伸过她的脖子来,把她的脸凑近这朵花。……

①② 原文作“他们”,是尊称。

包头帕子从头上滑到肩头了；她那一头柔软的、乌黑的、发光的、略微蓬乱的浓发露了出来。

"等一下；我要同您一块儿闻，"巴扎罗夫说。他俯下头来，在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

她吃了一惊，连忙用她的一双手推他的胸，可是她的力气不够，他还可以再亲一个时间较长的吻。

丁香后面发出一声干咳。费涅奇卡马上移到凳子的另一头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出现了，微微弯一下身子，带着一种含恶意的忧郁的表情说："你们在这儿，"便走开了。费涅奇卡立刻将花全收拾起来走出凉亭去了。"这是您的不是了，叶夫盖尼·瓦西里叶维奇。"她走开的时候低声对巴扎罗夫说。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出来她是真的在责备他。

巴扎罗夫记起了最近的另一个情景，他一边觉得惭愧，一边又感到傲慢的遗憾。可是他马上又摇摇头，带着讥讽的口气庆贺他自己"认真扮演了赛拉东[①] 这个角色"，便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出了花园，慢慢地走到树林那边。他在那儿耽搁了好一忽儿；他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关心地问他，他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发黄疸病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① 赛拉东：法国小说家狄尔非（1568—1625）的长篇小说《阿斯特列》中的男主人公，是个一般人所谓的"风流少年"。

安静地答道。

二四

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去敲巴扎罗夫的房门。

“请原谅我打扰您的科学研究,”他说,就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撑住一根精致的带象牙柄的手杖(他出门的时候通常是不带手杖的),“可是我不得不要求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不会再多的。”

“我的全部时间都听凭您支配,”巴扎罗夫说,他看见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跨进门槛,脸色马上有了一点儿改变。

“我只要五分钟就够了。我有一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一个问题?关于什么的?”

“请您听我讲吧。您初到我弟弟家来住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弃跟您谈话的快乐,我领教过了您对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可是我回想起来,您不论跟我讲话,或者在我面前讲话,都没有提到打架和一般的决斗的问题。现在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巴扎罗夫先前站起来迎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现在就在桌子边上坐下了,交叉着两只胳膊。

“我的意见是这样,”他说,“从理论上讲起来决斗是很荒谬的;可是从实际上讲起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您是在说,不管您在理论上

对决斗的意见怎样，在实际上您受了别人的侮辱一定不肯白白地放过了？”

“您完全猜准我的意思了。”

“很好，先生。我听见您这样说心里很高兴。您的话可叫我免掉疑惑了。”

“您是想说，免掉踌躇吧。”

“这都是一样的，先生；我只要讲得让别人了解就成了；我……不是神学院里的耗子①。您的话替我省掉了一桩不愉快的手续。我决定了要跟您决斗。”

巴扎罗夫睁大了他的眼睛。

“跟我？”

“的确是跟您。”

“为着什么？请许我问一句。”

“我可以对您说明理由，”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据我看来，您在这儿简直是多余的；我忍受不了您；我看不起您；要是您还觉得不够……”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发亮了。……巴扎罗夫的眼睛也在闪闪地发光。

“很好，先生，”他同意说。“用不着再解说了。您倒忽然异想天开，要在我身上试试您那骑士精神来了。我本来可以不给您这种愉快的，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我很感谢您，”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那么我可以盼

① 意思是：我不是钻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的。

望您接受我的挑战，用不着我采取激烈的手段了。”

“那就是，直截了当地说，用这根手杖吗？”巴扎罗夫冷静地说。“这是很对的。您用不着再侮辱我了。老实说，那种办法对您也不是很安全的。您可以保留您那‘尖头曼’① 的面子。……我也像一个‘尖头曼’似地接受您的挑战。”

“那就很好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便把他的手杖放在角落里。“我们再简单地谈一谈我们的决斗的条件；可是我倒想先知道，您是不是以为我们应该正式吵一次架，作为我挑战的借口呢？”

“不；最好不要什么形式。”

“我也这样想。我还以为我们不必去找我们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们彼此不能相容。这还不够吗？”

“真的，这还不够吗？”巴扎罗夫讥讽地跟着他说。

“至于决斗的条件，我们只好不要公证人，——因为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到哪儿去找公证人呢？”

“那么请容许我向您提出下面一个办法：决斗在明天大清早举行，就定在六点钟吧，地点在林子后面，武器是手枪，距离定为十步……”

“十步吗？好吧；我们在这样一个距离，是可以你恨我，我恨你的。”

“那么八步也可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

① “尖头曼”：英语 gentleman（绅士）的译音。

“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

“每人放两枪;而且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每个人的袋子里先放好一封信,说是自寻短见。”

“这一点我不大赞成,”巴扎罗夫说。“这未免带了一点儿法国小说的气味,有点儿不像是真的了。”

“也许是的。不过您一定同意:犯了杀人的嫌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我同意了。可是也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罪名。我们不要公证人,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见证人。”

“请问找谁呢?”

“那么找彼得吧。”

“哪一个彼得?”

“您弟弟的听差。他是一个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峰的人,他会‘郭米尔浮’[①] 尽他在这种场合中应尽的职责。”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了,亲爱的先生。”

“一点儿也不。您要是把我这个提议仔细想一想,您就会相信这是很合理的,而且很平常的。袋子里藏不住锥子[②];不过我得负责把彼得准备妥当,好带他上战场去。”

“您还是在开玩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就从他坐的椅子上站起来。“不过承您很客气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没

① “郭米尔浮”:即法语 comme il faut,意思是“适当地”。巴扎罗夫故意用俄国腔把它念了出来。

② 俄谚:不能把事情长久隐瞒起来的意思。

有权利再向您要求什么了……这样一切都讲定了。……啊，也许您没有手枪吧?”

“我怎么会有手枪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我又不是军人。”

“那么我把我的借给您用。您可以相信我已经有五年没有用过手枪了。”

“这倒是个叫人放心的消息。”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拿起他的手杖来……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现在我只有对您表示谢意，再没有别的了;我不再打扰您的工作了。请允许我向您告辞吧。”

“到明天我们有幸运碰头的时候再见吧，我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说，他把他的客人送到了门口。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出去了，可是巴扎罗夫还在门前站了一忽儿，他忽然嚷起来:“呸，好吧，见鬼!多漂亮，多傻!我们演了多出色的喜剧!就跟训练过的狗用后腿站着跳舞一样。可是要拒绝也不行;唔，我相信他会打我的，那么……(巴扎罗夫想到这儿脸都变白了;他的骄傲一下子都引起来了)那么我就会掐死他，就像掐死一只小猫一样。”他回去看他的显微镜，可是他的心跳得厉害，而且从事观察的时候所必须有的平静的心境已经失去了。“他今天看见我们了，”他想道，“可是他真的是在帮忙他的弟弟吗?接个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还有别的缘故。呸!说不定他自己也爱上她了?一定的，他爱上她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想起来多么复杂!……真糟!”他最后断定说。“不管你怎样看法，总之很

糟。第一，要把问题摊开，而且无论如何得走开；还有阿尔卡狄……同那只瓢虫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这事情很糟，非常之糟。”

这一天过得特别静，特别沉郁。世界上好像就没有费涅奇卡这个人似的；她同洞里的老鼠一样整天守住她的小屋子。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带着一种焦虑的神气。他刚刚听见人说他的麦子生了黑穗病，他对他的麦子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那种冷冰冰的礼貌把每个人，连卜罗科非奇在内，都吓坏了。巴扎罗夫给他父亲写信，却又把信笺撕掉，丢在桌子下面。“要是我死了，”他想道，“他们会知道的；不过我并不会死。不，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一阵子呢。”他吩咐彼得第二天天一亮就到他的屋子里来办一件重要事情。彼得还以为他要把他带到彼得堡去。巴扎罗夫睡得很迟，整夜做着乱梦……在这些梦里奥津左娃老是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她同时又是他的母亲，她后面还跟着一只生黑髭须的小猫，这只小猫却是费涅奇卡；然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变做一座大树林出现了，可是他仍然不得不跟他决斗。彼得在四点钟就来把他叫醒；他马上穿好衣服同彼得一块儿出去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清凉的早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飘起鱼鳞似的彩色小云片，晶莹的露珠撒满在草茎和树叶上面，蜘蛛网上沾了露水，银子似地闪闪发光；润湿的黑土上仿佛还留着玫瑰色晨曦的余痕；百灵的歌声漫天地撒下来。巴扎罗夫到了树林那儿，就在林边树荫里坐下来，这个时候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情跟彼得讲明白了。这个文明的当差吓得不得了；可

是巴扎罗夫安慰他说，并不要他做别的事，他只要站在远处望着他们就成了，并且他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同时，”巴扎罗夫又说，“你想一想你扮的是多重要的角色！”彼得摊开两只手，埋下头，身子靠在一棵桦树上，吓得脸都发青了。

从玛利因诺来的路是绕着这座树林的；路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尘土，昨天以来还不曾有车轮或者脚步踏过。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顺着这条路望去，他摘了一片草放在口里嚼着，一面不停地对自己说：“多么傻！”清晨的寒气使他打了两三次冷噤……彼得垂头丧气地望着他，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微微笑着，他并不害怕。

路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一个农民从树背后转了出来。他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他走过巴扎罗夫面前的时候，有点儿奇怪地望了望他，并没有谄媚地摘下帽子，这又叫彼得不安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吉的预兆。“还有一个也起得很早的人，”巴扎罗夫想道，“可是他 至少是起来工作的；而我们呢？……”

“好像大老爷来了，先生，”彼得忽然低声说。

巴扎罗夫抬起头，看见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他穿一件薄的方格子上衣，配一条雪白的裤子，急急地顺着路走过来；他胳肢底下挟了一个用绿布包着的匣子。

“对不起，我想你们等了好久了，”他说，先向巴扎罗夫鞠了一个躬，然后又向彼得鞠一个躬，他认为彼得此刻带有几分公证人的性质，所以也向彼得行礼。“我不愿意弄醒我的听差。”

“没有关系，先生，”巴扎罗夫答道，“我们也是刚刚到的。”

“啊！那就更好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朝四下望了望。“这儿看不见一个人，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我们可以动手吗？”

“我们动手吧。”

“我想您不要什么新的解释吧？”

“不，我不要。”

“您高兴装子弹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他从匣子里取出手枪来。

“不；您装吧，我来量步数。我的腿要长些，”巴扎罗夫带笑地说。“一，二，三……”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彼得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他像发寒热似地浑身在打颤），“随便您怎么说，我要走开了。”

“四……五……走开，小兄弟，走开；你还可以躲在一棵树后面，塞住你的耳朵，只是不要把眼睛闭上就成了；倘使谁倒下了，你就跑去扶他起来。六……七……八……”巴扎罗夫站住了。“够了吗？”他转身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要不要我再加两步？”

“随您办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第二颗子弹也塞进了。

“好吧，我们就再加两步，”巴扎罗夫用他的靴尖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这儿就是界线。啊，我们每个人要从这道界线往后退多少步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昨天并没有讨论过。”

“我想，十步吧，”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把两支手枪都递给巴扎罗夫。“您肯费神挑选一支吗？”

“我肯费神的。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得承认我们的决斗真是古怪到了可笑的程度了。您只要看看我们的公证人的脸色。”

“您老是爱开玩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我并不否认我们这次的决斗是古怪的，可是我认为应当警告您，我是准备认真跟您交手的。A bon entendeur, salut! ①”

“啊！我们两个都下了决心要消灭对方才罢手，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可是为什么不要笑笑，把 utile dulci②联在一起呢？您对我讲法国话，我就对您讲拉丁文。”

“我是在认真地跟您交手，”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说了一遍，就走到他的位置上去了。巴扎罗夫也从界线起数了十步，站住了。

“您好了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好了。”

“我们可以彼此走近了。”

巴扎罗夫慢慢地往前走，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左手插在裤袋里也向着他走来，渐渐地举起了枪口。……“他瞄准我的鼻子，”巴扎罗夫想道，“他多么注意地眯起眼睛，这个流氓！这种感觉可不舒服。我来望他的表链吧。”有什么东西嘶的一

① 法语：对会听话的人不用多说！——原注

② 拉丁文：有用同愉快。——原注

声在他耳边擦了过去，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听见了，可见并不要紧，”这个思想在巴扎罗夫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再走一步，并不瞄准，就扳了枪机。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微微抖了一下，用手按住他的大腿。顺着他的白裤子流下一股血来。

巴扎罗夫丢下手枪，跑到他的对手身边。

“您伤了吗？”他说。

“您有权叫我回到界线上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伤是不要紧的。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每人还可以再放一枪。”

“好吧，可是，对不起，下一次来吧，”巴扎罗夫答道，他连忙扶住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这位先生的脸色渐渐变成惨白了。“现在，我不是一个参加决斗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得先验一验您的伤。彼得！到这儿来，彼得！你躲到哪儿去了？”

“全是废话。……我用不着别人帮忙，”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吞吞地小声说，“我们应当……再……”他要拉他的小胡子，可是他的手不听他的指挥了，眼睛模糊了，他失去了知觉。

“这倒是桩新事情！他昏过去了！又该怎么办！”巴扎罗夫不由自主地大声说，他一面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放到草地上。“来看看伤口怎样吧。”他掏出一方手帕，揩去血迹，摸了摸伤口的四周。……“没有碰到骨头，”他从牙齿缝里说，“枪弹进去不深，一条筋，vastus externus[①] 擦伤了。不到三个星

① 拉丁文：股外巨筋。

期他就可以跳舞了。……可是他昏过去了！啊，这些神经质的人！真是，多嫩的皮肤！”

“他给杀死了吗，先生？”彼得的颤抖的声音在他背后响了起来。

巴扎罗夫回头去看。

“快去拿点儿水来，小兄弟，他还要比你我活得久呢。”

可是这个改良的听差似乎不懂他的话，他动也不动一下。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要死了！”彼得低声说，他在自己的胸口上划起十字来。

“您说得不错。……多傻的一副脸相！”受伤的“尖头曼”勉强露出微笑说。

“去拿水去，笨蛋！”巴扎罗夫叫道。

“不用。……这是一种短时的 vertige[①]。请帮忙我坐起来……这就好了。……现在只消用什么东西把伤口包扎起来，我可以走回家去，不然您可以替我叫一辆出租马车来。要是您同意的话，我们的决斗也用不着再来了。您做得很光明、豪爽……我是说今天，今天——请注意。”

“过去的事情用不着再提了，”巴扎罗夫答道，“说到将来呢，您也用不着操心，因为我打算马上就走了。现在等我来给您把腿包扎好；您的伤势并不重，可是最好要止住血。不过我还得先把这个家伙弄醒转来才成。”

巴扎罗夫抓住彼得的领子，要他去叫一辆马车来。

① 法语：头晕。——原注

"当心不要惊动我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对他说，"不要去对他讲什么。"

彼得飞跑去了；他跑去叫马车的时候，这两个仇人就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讲。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努力不去看巴扎罗夫；他无论如何不肯跟巴扎罗夫和解；他为他的高傲、为他的失败害羞，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整个事件害羞，虽然他心里想这样的结束是再好没有的了。"至少，他不会待在这儿讨嫌了，"他拿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这一点倒是我应该感谢的。"他们一直沉默着，这是一种痛苦的、烦恼的沉默。他们两个人心里都不痛快。每个人都明白对方看透了他的心。这种感觉在朋友中间是愉快的，在仇人中间却是不愉快的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既不能解释明白，又不能彼此分开。

"我没有把您的腿绑得太紧吧？"巴扎罗夫最后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非常好，"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过了一忽儿他又说："我弟弟是瞒不过的；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为了政治问题吵起来的。"

"很好，"巴扎罗夫说。"您可以说我把所有的亲英派全痛骂了。"

"那好极了。您想，那个人会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指着旁边一个农民继续说，那个人在决斗前几分钟赶着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走过巴扎罗夫面前，这时候他又打原路走回来，他望见了"老爷们"便摘下帽子，往一边走开了。

"谁知道！"巴扎罗夫答道，"倒好像他什么都不想似的。

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未知数，拉德克立甫夫人[1]已经讲得很多了。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

“啊！您又来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突然嚷了起来：“您瞧您那个傻瓜彼得干的好事！我弟弟现在坐车赶来了！”

巴扎罗夫掉过头来，正看见坐在马车上的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的惨白的脸。他不等车停就跳下车来，跑到他哥哥的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带着激动的声音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请告诉我，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他们用不着惊动你的。我跟巴扎罗夫先生有过一番小小的争论，我受到了一点儿惩罚。”

“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吧！”

“我怎么跟你讲好呢？巴扎罗夫先生讲起罗伯特·皮尔爵士[2]的时候，态度很不恭敬。我得赶快声明一句，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巴扎罗夫先生的举动很光明。是我向他挑战的。”

“哎哟，你一身都是血！”

“那么你以为我血管里流的是水吗？不过这样流一点儿血对我倒也有好处。医生，您说对不对？搀我上马车去，不要

① 安·拉德克立甫(1764—1823)：英国女小说家。她的小说在俄国流行过一个时候，大都是带着幻想的恐怖和神秘的性质的。

② 皮尔爵士(1788—1850)：英国政治家，保守党的领袖。

只管愁闷。我明天就会完全好了。就是这样;很好。走吧,车夫。"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在马车后面;巴扎罗夫正打算待在后面……

"我得请您照应我哥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等到我们从城里请了医生来的时候。"

巴扎罗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小时,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已经躺在床上了,他的腿包扎得很妥帖。全家的人都给惊动了;费涅奇卡很不好过。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不声不响地扭自己的手,可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却在笑,讲笑话,特别跟巴扎罗夫开玩笑;他穿一件细麻布衬衣,罩上一件很漂亮的短晨衣,头上戴了一顶土耳其毡帽,他不许人拉下窗帘,他用诙谐的口吻抱怨那种不许他吃东西的办法。

到了傍晚他就发起热来,头也痛了。城里的医生也来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没有依他哥哥的话,真的,连巴扎罗夫也劝他不要听从;巴扎罗夫在自己的屋子里坐了一整天,脸色黄黄的,带着一脸的怒容,他去看病人的时候总是竭力不多耽搁;他碰见费涅奇卡两次,可是她害怕地避开了。)新来的医生主张进一点儿清凉饮料;不过他也赞成巴扎罗夫的意见,说是并没有危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对医生说,他的哥哥不小心地打伤了自己,医生的回答只是一个"哼!"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二十五个银卢布,便又说:"是这样吗!啊,这样的事的确时常发生的。"

这晚上宅子里没有一个人上床睡觉，也没有一个人脱衣服。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不断地踮起脚到他哥哥的屋子里去，又踮起脚走出来；他的哥哥迷迷糊糊地睡着，轻轻地在呻吟，对他用法语说："couchez-vous[1]，"并且要水喝。有一回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差费涅奇卡送了一杯柠檬水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注意地望着她，把一杯水都喝光了，连一滴也不剩。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他的热度稍微高了一点儿，他还讲起胡话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起初说了些不连贯的话，后来他忽然睁大眼睛，看见他弟弟站在床前，俯下身子焦虑地望着他；他便说：

"尼可拉，你是不是觉得费涅奇卡有点儿像奈利吗？"

"哪一个奈利，巴沙[2]？"

"你怎么还要问？P公爵夫人。尤其是上半边脸。C'est de la même famille.[3]"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没有回答，可是他暗暗地惊奇一个人的旧情会这样地深长。

"这下子我明白了，"他想道。

"啊，我多么爱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呻吟地说。"我不能够让随便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去挨……"过了几分钟他又轻轻地说。

---

① 法语：您睡吧。——原注

② 巴沙：巴威尔的爱称。

③ 法语：这是一家的人。——原注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只是叹气;他一点儿也没有疑心这些话指的是谁。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巴扎罗夫来见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并且把他的青蛙、昆虫、鸟儿全放走了。

“您是来告别的吗?”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迎着他说。

“是的,先生。”

“我了解您,我完全赞成您。自然我那可怜的哥哥是不对的:他已经受了罚了。他自己对我说是他逼着您那样做。我相信您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决斗,那是,……那大半是由于你们两位平日的见解老是冲突的缘故。(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讲得连他自己也有点儿糊涂了。)我哥哥是一个旧式的人,脾气躁,又顽固。……谢谢上帝,事情就这样地了结了。我已经布置好了,不让这件事情声张出去。……”

“我把我的地址留给您,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巴扎罗夫随随便便地说。

“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很抱歉,您在我家里作客会得着这么的……这么一个结局。更使我痛苦的是阿尔卡狄……”

“我想,我会见到他的,”巴扎罗夫答道,他素来只要听到“解释”“抱歉”一类的话就觉得不耐烦。“要是我见不到他的话,我求您代我问候他,并且让我道歉吧。”

“我也求您……”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一面答礼一面说。可是巴扎罗夫不等他讲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听说巴扎罗夫要走了，他表示他想跟巴扎罗夫见一次面，握一握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巴扎罗夫还是像冰一样地冷冷的；他知道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想表示自己的大量。他没有能够向费涅奇卡告别：他只是隔着窗子跟她对望了一眼。他觉得她的脸色很不好看。“她说不定给毁掉了，”他暗暗地想道，“不过她总会捱过去的！”彼得心里很难过，他居然俯在巴扎罗夫的肩头哭了，直到巴扎罗夫问他：他的眼睛是不是水做的，才把他阻止了；杜尼雅霞不得不跑到林子里去，免得在人前哭出来。那个引起这一切悲痛的人坐上了一辆大车，抽着一支雪茄，大车走完了三里，到了转弯的地方，基尔沙诺夫的田庄同它的新宅子像一根线似地最后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只吐了一口唾液，喃喃地骂了一句：“可恶的小绅士！”他用外衣把身子裹得更紧了。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好起来了；可是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他耐心地忍受这种他所谓的囚禁生活，不过他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化妆上，而且不停地叫人洒香水。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常常读报给他听；费涅奇卡照常地伺候他，给他端肉汤，端柠檬水，送半熟鸡蛋，送茶；可是她每次走进他的屋子来，她心里总是怀着一种恐怖。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出人意外的举动把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吓着了；费涅奇卡吓得比别人更厉害；只有卜罗科菲奇一个人不觉得惊奇；他向人解释，在他年轻的时候老爷们是时常打架的，“不过只有老爷跟老爷打，至于像那样的贱人，要是有什么无礼的举动，叫

人把他拉到马房去打一顿鞭子就完事了。”

费涅奇卡的良心并不怎么责备她；可是她有时候想起了这次吵架的真正原因，心里就难过起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是那么古怪地望着她……就是她背对着他的时候，她也觉得他的眼睛盯在她身上。这种一直没有停止的内心的不安使她渐渐地消瘦了，但是又照例地使她变得更动人了。

有一天——这件事情是在早晨发生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觉得身子好多了，从床上起来躺到沙发上去，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他哥哥这天好多了，便出去到打麦场去了。费涅奇卡送了一杯茶进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她正要退出去，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留住了她。

“您这样匆忙地到哪儿去，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他问道。“您还有事吗？”

“不，大老爷。……是，大老爷。……我得去倒茶。”

“您不去，杜尼雅霞也会倒的；您陪我这个病人坐一忽儿吧。啊，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说。”

费涅奇卡默默地在一把扶手椅的边沿上坐了下来。

“听我说，”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拉拉他的小胡子说，“我很久就想问您：您好像怕我似的？”

“您说我怕您，大老爷？……”

“是的，您。您从来不看我，好像您的良心有点儿不安似的。”

费涅奇卡红了脸，可是她正眼望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她觉得他有点儿古怪，她的心开始跳得厉害了。

“您的良心清白吗?”他问她道。

“它为什么不清白呢?”她低声说。

“谁知道为什么！而且您会对不起谁呢？我吗？那是不会有的。这宅子里的别的什么人吧？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会是我弟弟吗？可是您爱他,不是吗?”

“我爱他。”

“用您的整个灵魂,用您的整个心吗?”

“我用我的整个心爱尼可拉·彼得罗维奇。”

“真的？望着我,费涅奇卡。(他第一次这样地唤她……)您知道,说谎是一桩很大的罪过。”

“我并没有说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要是我不爱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以后我就不该再活下去!”

“您决不会抛弃他去爱别人吧?”

“我抛弃他去爱谁呢?”

“真的去爱谁呢！那么刚离开这儿的那位先生怎样?”

费涅奇卡站起来。

“啊,我的上帝,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您做过了什么错事吗？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费涅奇卡,”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忧郁地说,“您知道我看见了……”

“您看见了什么,大老爷?”

“在那儿……在凉亭里。”

费涅奇卡脸红得连耳朵和发根都红起来了。

“那怎么是我的过错呢?”她吃力地说。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坐了起来。

"您没有过错吗？没有吗？一点儿也没有吗？"

"在世界上我只爱尼可拉·彼得罗维奇一个人，而且我要永远爱他！"费涅奇卡突然用力大声说，她的咽喉让抽泣哽住了。"至于您看见的那件事，就是在最后裁判① 的那一天我也要说，我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过错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过错的；要是有人疑心我背了我的恩人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做出那种事情，我马上就死……"

可是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哑了，同时她觉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抓起她的手紧紧地捏住。……她望着他，呆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更惨白了；他的眼睛发光，最叫人惊奇的，是一大滴孤寂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费涅奇卡！"他用一种古怪的低声说，"爱吧，爱我的弟弟吧！他是一个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不要抛弃他去爱世界上任何别一个人；不要去听任何别一个人的话！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爱一个人而得不到人爱更可怕的事！永远不要离开我那个可怜的尼可拉！"

费涅奇卡的眼睛干了，她的恐怖消失了，——她非常惊讶。可是她看见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本人把她的一只手贴在他的嘴唇边，头朝着她的手埋下去，他并不吻它，只是偶尔发出痉挛的叹息，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有什么

① 最后裁判：信奉耶稣教的人相信世界末日会到来，那个时候所有的灵魂都要从坟墓里出来，受上帝的裁判。

样的感觉。……

“主啊，”她想道，“是不是他的病又发作了？……”

这个时候他的整个毁掉了的生命在他的内心里激荡了。

楼梯在急速的脚步下面格格地响起来。……他推开她，把自己的头放倒在枕上。门开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带着高兴的样子，精神健旺，脸色红红的。米奇亚跟他父亲一样气色很好，也是红红的脸，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他父亲的怀里跳跳蹦蹦，还用他那光着的脚趾去捉他父亲那件乡下外套的大钮扣。

费涅奇卡马上朝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把他同他儿子一块儿抱着，拿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吃了一惊，费涅奇卡，这个平日害羞的、谨慎的费涅奇卡，从没有在第三个人面前跟他亲热过的。

“什么事？”他说，他又望了他哥哥一眼，便把米奇亚递给她。“你不觉得不舒服吧？”他走到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前问道。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脸藏在一张细麻布手帕下面。

“不……这……没有什么。……相反的，我倒觉得好多了。”

“你搬到沙发上太急了，”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说，他转过头去向费涅奇卡问了一句：“你到哪儿去？”可是她已经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我抱了我的勇士来给你看；他吵着要他的伯伯。她为什么把他抱走了呢？可是你有什么事吗？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闹了什么事情？”

“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庄严地说。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大吃一惊，他有点儿害怕起来，可是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故。

“弟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又说，“答应我你要照我的要求做一桩事。”

“什么要求？你说吧。”

“这是很重要的；照我看来，你一生的幸福都靠着它。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我这些天来已经想了好久了。……弟弟，尽你的责任，尽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的责任。你原本是一个最好的人，不要再让自己受到诱惑，不要再让你这个不好的榜样继续存在下去！”

“巴威尔，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跟费涅奇卡结婚。……她爱你；她是你儿子的母亲。”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拍起手来。

“你这样说吗，巴威尔？我一向以为你是最不赞成这种婚姻的！你这样说！可是你也许不知道，正因为尊重你的缘故，我才没有尽了你说得很对的我的这个责任！”

“在这种场合中尊重我，你就错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带了一种忧郁的微笑答道。“我渐渐觉得巴扎罗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了。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面子，也不要再去管人们怎么讲法：我们如今老了，心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尽我们的责任吧；瞧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来幸福。”

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跑过去拥抱他的哥哥。

“你毕竟把我的眼睛打开了！”他大声说。“我常常说你是

世界上最聪明的、心肠最好的人，果然没有错，现在我又知道你明白事理同你心地高贵的程度一样。”

“轻点儿，轻点儿；”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不要弄痛你这个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他快到五十岁的年纪还像一个准尉似地跟人家决斗呢。那么事情已经决定了；费涅奇卡要做我的……belle-soeur[①]了。”

“我亲爱的巴威尔！可是阿尔卡狄会怎样说呢？”

“阿尔卡狄？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这句话！结婚是违反他的原则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观念却可以满足了。而且，老实说，社会的地位 au dix-neuvième siècle[②]还有什么意义呢？”

“啊，巴威尔，巴威尔！让我再亲你一次吧。不要怕，我会小心的。”

弟兄两个又拥抱了一下。

“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现在就该把你的意思让她知道？”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答道。“是不是你们已经谈过了？”

“我们已经谈过了？Quelle idée![③]”

“好啦，那就对了。第一你得先好起来，而且那桩事情不

---

① 法语：弟媳。——原注

② 法语：在十九世纪。——原注

③ 法语：什么想法！——原注

会逃掉的。我们应当仔细地想一下，商量商量……”

“可是你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自然，我已经决定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你。我现在要走了；你需要休息；任何的兴奋对你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讨论。好好地睡吧，好哥哥①，上帝保佑你恢复健康。”

“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感谢我？”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他弟弟走了以后一个人想道。“好像这不是由他作主似的！他结了婚，我马上就走开，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或者德累斯顿②，或者佛罗伦萨③，我要一直在那儿住到我死的时候。”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用香水打湿他的前额，闭上了眼睛。他的美丽的消瘦的头承着鲜明耀眼的白日的光辉，静静地放在雪白的枕头上，好像是一个死人的头。……他的确是一个死人了。

二五

在尼可尔斯柯耶，花园里一棵很高的梣树荫下，卡契雅同阿尔卡狄正坐在一个长凳形的草土墩上面；非非躺在他们近

① 原文作“我的灵魂”。

② 德累斯顿：德国的城市。

③ 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城市。

旁的地上，它的瘦长身子带了一种猎人们所谓的“兔伏式”的漂亮的曲线。阿尔卡狄同卡契雅都不作声；他手里拿着一本半打开的书，她在一个篮子里捡起剩下来的一点儿白面包屑，丢去喂一小群麻雀，它们不失它们那种又害怕、又大胆的本性，只顾在她的脚边吱吱喳喳地跳来跳去。一阵微风在梣叶丛中吹过，使得阴暗的小径上同非非的黄色的背上那些淡金色的光点慢慢地来回移动；匀静的树荫罩着阿尔卡狄同卡契雅的全身，只是偶尔有一线日光在她的头发上亮起来。两个人都不讲话，可是他们不讲话和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样子正可以表示他们的互相信任的亲密：他们两个人似乎谁都不去注意身边的同伴，可是同时谁都暗暗地高兴这个同伴在自己身边。他们的面貌，自从我们上次跟他们分手以后，也有了改变了：阿尔卡狄看起来更安静些，卡契雅更活泼些，更大胆些。

“您不觉得，”阿尔卡狄说，“俄国人给梣树起的名字很好吗；再没有一种树的叶子在空中是这么轻，这么‘鲜明的’[1]。”

卡契雅抬起眼睛向上望了望，说声：“是”，阿尔卡狄便想道：“这一位并不责备我用了美丽的辞藻。”

“我不喜欢海涅[2]，”卡契雅望了一下阿尔卡狄手里拿的那本书说，“不管是他笑的时候，或者哭的时候；只有在他沉思和忧郁的时候我才喜欢他。”

“我却喜欢他笑的时候，”阿尔卡狄说。

---

① “梣树”原文是 Ясенъ；“鲜明”原文是 ясно，两个字同一词根。

②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这是您那种爱讥讽人的脾气的痕迹。(“痕迹!”阿尔卡狄想道——“要是巴扎罗夫听见了怎样?”)等着吧,我们要把您改造的。”

“谁要改造我? 您?”

“谁? ——姊姊;还有波尔非利·卜拉托雷奇,您现在已经不跟他吵架了;还有姨妈,您前天还陪她到礼拜堂去的。”

“我不能说不去啊! 至于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不记得,她在好些地方都是跟叶夫盖尼一样的意见吗?”

“我姊姊那个时候受了他的影响,就跟您一样。”

“跟我一样? 那么让我问一句,您是不是看出我现在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了?”

卡契雅不答话。

“我知道,”阿尔卡狄接着说下去,“您从来就不喜欢他。”

“我不能够评论他。”

“您知不知道,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我每回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就不相信。……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是我们谁都不能够评论的! 这只是一种遁辞罢了。”

“好吧,那么我告诉您,我……不能说是我不喜欢他,不过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类的人,我跟他也不是一类的……您跟他也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我怎么跟您讲呢? ……他是猛兽,您同我却是驯服了的。”

“我也是驯服了的?”

卡契雅点了点头。

阿尔卡狄搔了搔他的耳朵。

“我对您说吧，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您知道，这是一种侮辱。”

“那么您喜欢作猛兽吗?”

“不是作猛兽；却是要坚强、有力。”

“这样的事并不是可以想望到的。……您瞧，您的朋友并不想望这样，可是他做到了这样。”

“哼! 那么您以为他对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有很大的影响吗?”

“是的。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支配她的，”卡契雅低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她很骄傲……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她把她的独立看得很重要。”

“谁又不看重独立呢?”阿尔卡狄问道，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闪过了一个思想:“独立有什么好处?”“独立有什么好处?”卡契雅也这样想着。年轻人时常亲密地在一块儿谈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起同样的念头。

阿尔卡狄笑了笑，他挨近卡契雅轻轻地说:“老实说，您有点儿怕她吧?”

“怕谁?”

“怕她，”阿尔卡狄带着深意地说。

“那么您怎样呢?”卡契雅反过来问他道。

“我也怕；您注意，我说：我也怕。”

卡契雅伸一根手指威吓地指着他。

“我倒觉得奇怪，”她说，“我姊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待您好的；比您头一回来的时候好多了。”

“真的？”

“怎么，您没有注意到吗？您不觉得高兴吗？”

阿尔卡狄想了一忽儿。

“我靠了什么取得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好感呢？是不是因为我把您母亲的信带了给她呢？”

“这是一个原因，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不说。”

“什么原因？”

“我不说。”

“啊，我知道：您是很固执的。”

“我是这样。”

“并且会观察人。”

卡契雅瞟了阿尔卡狄一眼。

“也许是这样的；这叫您生气吗？您觉得怎样？”

“我奇怪您从哪儿学会了这样观察人的。您这么怕羞，不相信人；您跟谁都不接近。……”

“我一向都过着孤独的日子；这叫人不得不想得很多。可是我真的跟谁都不接近吗？”

阿尔卡狄感激地望了卡契雅一眼。

“那固然很好，”他说，“可是处在您的地位的人，我是说，处在您的环境的人，很少有这种观察的能力；他们就跟帝王一

样，不容易知道真理。”

“可是您知道，我并没有钱。”

阿尔卡狄愣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懂卡契雅的意思。“不错，事实上财产都是她姊姊的！”他突然明白了；这个思想并没有使他不高兴。

“您说得多么好！”他说。

“什么？”

“您说得很好；简单明白，并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做作。我说，我常常想，一个人知道并且说出来自己是个穷人，他的感情里头一定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一种骄傲吧。”

“靠了我姊姊的好心，我倒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我刚才提到我的环境，也只是顺口讲出来的。”

“好的；不过您得承认您也有一点儿我刚才所说的骄傲的。”

“请您举一个例子吧？”

“例如，您——原谅我问您这句话——您不肯嫁一个有钱人吧，是不是？”

“要是我很爱他的话……不，我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不肯嫁给他。”

“啊！您瞧！”阿尔卡狄大声说，停了一下又说：“您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

“因为歌子里面也唱过不平等的婚姻了。”

“大概您喜欢支配人，不然……”

“啊，不！为什么我要这样呢？刚刚相反，我倒愿意顺从

别人;只有不平等才是难受的。一个人尊重自己,顺从别人,那是我能够了解的;那是幸福;可是一种依赖的生活……不,我已经过够了。"

"过够了,"阿尔卡狄跟着卡契雅说了一句。"是的,是的,"他接着往下说:"您并没有白做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妹妹;您跟她一样,是喜欢独立的;不过您不肯讲出来罢了。我相信,不管您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多么神圣,您一定不肯先表示出来。……"

"那么您以为应该怎样呢?"卡契雅问道。

"你们是一样地聪明;您的性格纵使不比您姊姊的强,至少也是跟她一样。……"

"请您不要拿我跟我姊姊相比,"卡契雅连忙打岔道,"那是对我很不利的。您好像忘记了我姊姊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尤其是您,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不应该说这种话,不应该做出这种正经的脸色。"

"您说'尤其是您',是什么意思——您怎么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自然,您是在开玩笑。"

"您这样想吗?可是要是我真相信我说的话呢?要是我认为我还没有把我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呢?"

"我不懂您的话。"

"真的吗?好吧,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把您的观察力估得太高了。"

"怎样呢?"

阿尔卡狄不回答，却把脸掉开了，卡契雅在篮子里找了几粒面包屑，向着麻雀抛去；可是她挥手的时候用了太大的劲，那群麻雀没有啄面包屑就飞走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阿尔卡狄突然说道，“也许在您看来，都是一样的；可是让我告诉您，我不但把您看得比您姊姊高，而且还把您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高。”

他站起来，很快地走开了，好像他嘴里吐出来的话把他自己吓跑了似的。

卡契雅让她的两只手同篮子都落在膝上，她垂下头，把阿尔卡狄的背影望了许久。渐渐地一片红晕透出她的脸颊来了；可是她的嘴唇并没有笑，她的乌黑的眼睛露出一种惊惶的跟一种没法说明的感情。

“你一个人在这儿？”她听见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声音在她的身旁说，“我还以为你跟阿尔卡狄一块儿到园子里来的。”

卡契雅慢慢地抬起眼睛望她的姊姊（姊姊打扮得很雅致，甚至可以说是很讲究，站在小径上，用她那撑开的阳伞的伞尖去搔非非的耳朵），慢慢地答道：

“是的，我一个人。”

“那我也看见的，”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微笑地说，“那么他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

“是的。”

“你们在一块儿念书吗？”

“是的。”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托着卡契雅的下巴把她的脸抬起来。

“我盼望，你们没有吵嘴吧?”

“没有，”卡契雅说，她轻轻地推开了她姊姊的手。

“你回答得多么正经！我以为可以在这儿找到他，打算约他出去散步。他说了好几次要我跟他出去散步了。城里给你送来了皮鞋；你快去试试看；我昨天已经注意到你那双皮鞋实在太旧了。你对这些事情总不大留心，其实你倒有一双漂亮的小脚！你的手也不错……不过稍微大一点儿；所以你得特别注意你这双小脚。可是你又是一个不爱打扮的人。”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顺着小径走了，她那身漂亮的衣服一路上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卡契雅从凳子上站起来，拿起那本海涅的诗集，也走了——可是并不去试她的皮鞋。

“漂亮的小脚！”她想道，一面慢慢地、轻轻地走上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露台的石级；“你说漂亮的小脚。……唔，以后他要跪在这双脚跟前的。”

可是她马上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跑上楼去了。

阿尔卡狄经过走廊朝他的屋子走去；管事从后面追上来，通知他说，巴扎罗夫先生在他的屋子里等他。

“叶夫盖尼！”阿尔卡狄差不多带一种害怕的样子喃喃说。“他来了好久了吗?”

“刚刚到，他吩咐不用通知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一直领他到您的屋子里去。”

“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阿尔卡狄想着，急急忙忙跑上了楼梯，推开了房门。他看见巴扎罗夫的脸色，马上放了心，其实这位不速之客的脸上虽然是照常地精神饱满，但

也已经消瘦些了，一个经验多一点儿的人可以从那张脸上看出一种内心不安的表征来。他的肩头披了一件满是尘土的大衣，头上戴了一顶便帽，他正坐在窗台前；就是在阿尔卡狄大声欢呼着扑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站起来。

"真想不到！什么好运气把你带来了？"阿尔卡狄反复地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像那种自以为、而且也想让人看见自己很高兴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吧，人人都好吧？"

"你们家里一切都顺遂，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好，"巴扎罗夫说。"不要多讲话，叫人给我倒一杯克瓦斯[①]来，你坐下，听我用几句我想是直截了当的话把事情给你讲明白。"

阿尔卡狄静了下来，巴扎罗夫便讲了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决斗。阿尔卡狄大吃一惊，而且很伤心，不过他觉得用不着把这种感情表露出来；他只问他伯父的伤是不是真的不重；他听到巴扎罗夫这样回答：伤倒是很有趣的，不过不是从医学方面来说，他也勉强笑了笑，可是他心里却很难过，又觉得惭愧。巴扎罗夫好像知道了他的这种心事。

"不错，兄弟，"他说，"你瞧，这就是跟封建的人物住在一块的结果。你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封建人物，去参加他们的骑士的比武了。好吧，先生，所以我现在动身回'父亲们'那儿去了。"巴扎罗夫这样地结束了他的故事："我顺路弯到这儿来……把这桩事情全部告诉你，我要说，要是我不把无用的谎话

① 克瓦斯：俄国汽水，一种清凉的饮料。

当做傻事的话。不，我弯到这儿来——鬼知道为了什么。你知道，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就像从菜园地里拔起一根萝卜似的，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事；这就是我最近做的事情。……可是我又想再看一下我刚刚丢开的东西，看一下我在那儿生长的菜园地。"

"我盼望这些话不是指我说的，"阿尔卡狄发急地说，"我盼望你不是想丢开我吧？"

巴扎罗夫掉转眼睛注意地、而且差不多要看透对方的心似地望了阿尔卡狄一眼。

"这会叫你这么难过吗？我觉得你早已把我丢开了。你看起来气色多好，多整齐漂亮……你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事情一定进行得很顺利了。"

"你说我同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什么事情？"

"怎么，你不是为了她才从城里到这儿来吗，小鸡儿？哦，那儿的星期学校调查得怎样了？难道你不爱她吗？或者你已经到了该说话审慎的时期了？"

"叶夫盖尼，你知道我一向对你是很坦白的；我可以对你明说，我可以对你发誓，你弄错了。"

"哼，从前倒是没有这样说过，"巴扎罗夫低声说。"可是你也不用着急，这事情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浪漫派会说：'我觉得我们的路开始分岔了，'可是我只说我们彼此讨厌了。"

"叶夫盖尼……"

"好朋友，这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情。我们这一辈子讨厌的

东西不是很多吗？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分手了，是不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以后，我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就像我读了果戈理写给卡卢加省长夫人的信[1] 似的。而且，我并没有吩咐他们把马解下来。”

“我敢说，这是不行的！”

“可是为什么？”

“我不讲我自己；可是这对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未免太失礼了，她一定想看见你。”

“啊，那你就错了。”

“刚刚相反，我相信我并不错，”阿尔卡狄答道。“你为什么要装假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那么我问你，你自己不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吗？”

“那也许是的，可是你总错了。”

可是阿尔卡狄并没有错。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想见巴扎罗夫，差了管事来请他去。巴扎罗夫去见她之前还换了衣服；原来他预先把新衣服放在箱子里容易拿到的地方。

奥津左娃接待他的地方，不是在他那次突然表白他的爱情的屋子，却是在客厅里。她恳切地把她的指尖伸给他，可是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局促的表情。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巴扎罗夫连忙说，“我第一件事就得使您放心。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早已恢复了他的理

---

① 这里指的是果戈理在一八四一年六月四日写给斯米尔诺娃的信。题目是《什么是省长夫人》。

性、并且希望别人也忘记了他的傻事的人。这次我离开的时间要很长；您会承认，尽管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想到您对我仍旧怀着厌恶的心思的时候，我就是走了，心里也会难过。”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一个人刚刚爬到了高山顶上似的，一个微笑使她的脸显得更漂亮了。她第二次伸出手给巴扎罗夫，而且在巴扎罗夫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也把他的手握了一下。

“过去的事不用提了，”她说。“我尤其不愿意提它，因为凭我的良心说，我那个时候也有错，倘使不算挑逗，至少也是别的东西。一句话说完，让我们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做朋友吧。那是一场梦，不是吗？谁记得梦里的事情呢？”

“谁记得它们？而且，爱情……您知道，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真的吗？我听了很高兴呢。”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是这样地说，巴扎罗夫是这样地说，他们都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他们的话果然是真的，完全真的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者更不知道了。可是他们接着又谈下去，好像他们彼此完全信任似的。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问了巴扎罗夫一些话，也问起他在基尔沙诺夫家中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差一点儿就要讲出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决斗的事了，可是他想到她也许会疑心他是想显露显露自己，便忍住不说了，他只回答她说，他这些时候都在做他的研究工作。

“我呢，”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我起初很忧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您想不到，我还准备到外国去呢！……后来又好了，您的朋友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来了，我又回到旧轨道上去。我扮起我擅长的脚色了。”

“什么脚色呢，我可以问吗？”

“姨妈、女教师、母亲一类的脚色——随便您怎么说都可以。哦，您不知道我从前总不大明白您怎么会跟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成了亲密的朋友；我觉得他实在平凡得很。可是现在我知道他比较清楚一点儿，也看出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主要的是他年轻，他年轻……不像您同我，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

“他在您面前还是那么害羞吗？”

“他是那样吗？……”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她想了一忽儿又说下去：“他现在跟我熟悉多了；他常常跟我谈话。他从前老是躲开我。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想找他谈话。他跟卡契雅非常要好。”

巴扎罗夫觉得不耐烦了。“自然一个女人总免不掉要骗人的，”他想道。

“您说他老是躲开您，”他冷笑地说，“可是也许您已经明白他爱着您吧？”

“怎么！他也？”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顺口说了出来。

“他也是的，”巴扎罗夫恭敬地鞠了一个躬，跟着她说。“难道您会不知道，难道我告诉您的还是新的消息？”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埋下她的眼睛。

“您错了，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

“我不这样想。可是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个。”随后他又暗暗地在自己心里说：“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耍狡猾吧。”

“为什么不该呢？可是我以为您这样一来未免把那个过眼即逝的印象看得太重了。我现在开始疑心您是喜欢夸张的了。”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它吧，安娜·谢尔盖叶夫娜。”

“为什么呢？”她回答道；可是她自己就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她跟巴扎罗夫在一块儿仍然觉得有点儿拘束，虽然她已经对他说过，并且还叫她自己也相信，过去的一切事情全忘记了。她跟他谈着最简单的话的时候，甚至于在她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她也还感到一阵轻微的恐惧。就好像航海的人无忧无虑地在轮船上谈笑，跟在陆地上完全一样；可是只要发生了一点儿最小的故障，只要有了一点儿不寻常的征象，他们每个人的脸上立刻会现出特别惊惶的表情，这证明出来：他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个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跟巴扎罗夫并没有谈多久的话。她开始露出沉思的样子来；她答话的时候也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气，后来她提议他们一块儿到厅子里去，他们在那儿看到公爵夫人同卡契雅。“可是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到哪儿去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问道；她听说他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便差人去请他来。人们找了好一忽儿才把他寻到；他藏在花园里树木繁茂的地方，两只手交叉地支着下巴，坐在那儿出神。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严肃的，却并不是忧郁的。他知道安

娜·谢尔盖叶夫娜跟巴扎罗夫单独在一块儿，并不像以前那样地感到妒嫉；相反的，他的脸上渐渐地发出光彩；他似乎在同一个时候又是惊奇，又是快乐，而且决定了一桩事情。

二六

奥津左娃的亡故的丈夫生前并不喜欢新奇的东西，可是他也不反对“某种高尚趣味的活动”，因此他在花园里面、温室和池塘的中间，用俄国砖修了一座类似希腊柱廊式样的建筑物。奥津左夫在这个柱廊或者画廊的后山墙上，造了六个壁龛，预备安置他在外国定购的六座石像。这六座石像代表着孤独、静默、沉思、忧郁、羞耻和敏感。其中的一个，就是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的静默的女神，已经运到而且安置好了；可是当天便有几个农家孩子把她的鼻子打坏了；虽然附近一个泥水匠给她补上了一个“比先前的还要好过一倍的”新鼻子，奥津左夫还是叫人把她搬开，她现在还立在打麦仓的角落里，已经放了好些年了，引起一般乡下女人对她的迷信的恐怖。柱廊的正面早已被繁茂的矮树掩盖了；只有那些圆柱顶还在浓密的绿叶丛中露出来。在这个柱廊里便是在正午时候也是很凉爽的。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自从在那个地方看见一条蛇以后便不喜欢到那儿去了；可是卡契雅还常常来坐在一个壁龛下面的宽石凳上。在这个地方，在树荫和清凉中，她不是念书，便是做别的事情，再不然便是沉浸在完全宁静的感觉里面，这

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知道，它的好处就在于：半意识地静听着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

巴扎罗夫来到以后的第二天，卡契雅坐在她心爱的石凳上，阿尔卡狄又坐在她的旁边。是他求她带他到“柱廊”这儿来的。

这个时候离早饭时间还有一小时的光景；带露的清晨已经变做炎热的白天了。阿尔卡狄的脸上还保留着前一天的表情，卡契雅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她的姊姊刚刚用过早茶便把她叫到姊姊的屋子里去，起先跟她亲热了一下，姊姊的这种举动常常叫卡契雅害怕，接着姊姊就劝她待阿尔卡狄要小心一点儿，尤其不要单独跟他谈话，因为她的姨妈同全宅子的人好像已经在注意了。而且在前一天晚上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不高兴；卡契雅也觉得心里不安，好像她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她这次答应阿尔卡狄的要求的时候，她对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他带一种不大好意思的从容说，“自从我有幸跟您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以后，我跟您谈过许多事情；可是还有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提过。您昨天说过我在这儿有了改变了，”他继续说下去，他一面去望卡契雅的盯在他脸上的询问的眼光，一面又躲避这眼光。“我的确大大地改变了，您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实在是靠了您才有这个改变的。”

“我……靠了我？……”卡契雅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初来时候的那个自命不凡的少年了，”

阿尔卡狄接着说。“我没有白活了二十三年；跟从前一样，我愿意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真理；可是我不再到我从前寻觅理想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理想了；理想自己来找我了，……就在我的身边。在今天以前，我并没有认识我自己；我要我自己去做一些我没有力量担任的工作。……我的眼睛最近才睁开了，这是靠了一种情感……我没有把话讲得十分清楚，不过我盼望您会了解我……”

卡契雅不回答，可是她也不再望阿尔卡狄了。

“我以为，”他用了更激动的声音接下去说，在他的头上有一只碛鹨藏在桦树叶中间无忧无虑地唱起歌来，“我以为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对那些……对那些……一句话说完，对那些跟他亲近的人讲真心话，所以我……我打算……”

可是说到这儿，阿尔卡狄的雄辩就接不上来了，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终于不得不停止一忽儿。卡契雅仍然不抬起她的眼睛。她好像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用意，仿佛还在等着什么似的。

“我料到我的话会叫您吃惊，”阿尔卡狄鼓起勇气又说，“尤其因为这个情感多多少少……多多少少，请留心听着，——跟您有点儿关系。您还记得吧，您昨天责备我不够严肃认真，”阿尔卡狄说，看他的神情，他好像是一个走进了沼地里的人，明知道自己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可是他仍然急急往前走去，总希望他能够尽快地跨过这块沼地；“那种责备的话是常常对付……常常落到……年轻人身上的，即使他们已经不应当受责备了；要是我的自信力大一点儿的话……（“来帮

忙我，帮忙我吧！”阿尔卡狄十分着急地想道；可是卡契雅仍然跟先前一样，不掉过她的头来。）要是我能够希望……”

“倘使我能够确实相信您所说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清朗的声音。

阿尔卡狄立刻不做声了，卡契雅的脸色变成了苍白。在这一丛遮住柱廊的矮树旁边有着一条小路。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同巴扎罗夫一块儿正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卡契雅同阿尔卡狄不能够看见他们，却听见了每一句话、她的衣服的窸窣声、连呼吸也听见了。他们走了几步，好像故意地在柱廊前面站住了。

“您瞧，”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继续往下说，“您同我都错了；我们两个人都不算太年轻了，尤其是我；我们都是生活过来的，我们都倦了；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还要客气呢？——都是聪明人；起先我们对彼此都感到了兴趣，打动了好奇心……可是后来……”

“后来我就变成枯燥乏味的了，”巴扎罗夫插嘴说。

“您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的分开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不需要，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们两个人……我怎么说好呢？……相同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起初还不曾明白这一点。反而，阿尔卡狄……”

“您需要他么？”巴扎罗夫问道。

“不要讲啦，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告诉我说，他对我不是没有好感的，我自己一向就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他的姨妈了，可是我不瞒您说，我近来也常常想他。

在那种年轻的、新鲜的情感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形里通常是用‘魔力’这个字眼的，”巴扎罗夫打岔道；在他那平静而低沉的声音里听得出一股怨气。“昨天阿尔卡狄在我跟前好像隐藏着什么似的，他没有讲起您，也没有讲您的妹妹，……那是一个重要的征候。”

“他像哥哥一样地待卡契雅，”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我喜欢他的这种地方，不过我也许不该让他们这样地亲近。”

“您这话是从……做姊姊的心里发出来的吗？”巴扎罗夫把声音拉长地说。

“自然是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老是站住呢？我们走吧。我们谈得多奇怪，不是吗？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跟您谈这些话。您知道，我怕您……同时又信任您，因为您实在是一个好人。”

“第一，我一点儿也不好；第二，我对您已经是毫不重要了，您还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这好比把一顶花冠戴在死人头上一样。”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们并不是常常能够控制自己的……”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说；可是一阵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地响起来，把她后面的话吹走了。

“您知道，您是自由的，”隔了一忽儿巴扎罗夫的声音说。

其馀的话听不清楚了；脚步声远去了……这周围又没有声音了。

阿尔卡狄掉头去望卡契雅。她还是像先前那样地坐着，只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

“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他把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声音打颤地说，“我永远爱您，不会改变，而且除了您我再也不爱别人。我想告诉您这个，想知道您对我的意见，而且向您求婚，因为我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我准备为您牺牲一切。……您不回答我？您不相信我？您以为我是随便说的吗？可是请您回想最近这几天的情形吧！难道您这许久还不相信所有——请您听明白我的话，——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早已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吗？望着我，对我说一个字也好。……我爱……我爱您……相信我！”

卡契雅用了一种又严肃又高兴的眼光望着阿尔卡狄，她迟疑了好一忽儿，才带了一点儿笑意地说一声：“是。”

阿尔卡狄从石凳上跳了起来。

“是！您说了‘是’，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爱您，您相信我。……或者……或者……我不敢说下去了……”

“是，”卡契雅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明白她了。他抓起她那双大而美丽的手按在他的心上，他欢喜得快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儿站不稳了，他只能够反复地叫着：“卡契雅，卡契雅……”她却天真地哭起来，又暗暗地笑自己流了眼泪。谁要是没有见过自己所爱的人眼中这样的泪水，他就还不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在害羞和感激的陶醉中能够快乐到怎样的程度。

第二天大清早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差人把巴扎罗夫请到

她的书房里去，她勉强笑了笑，把一张摺好的信笺递给他。这是阿尔卡狄写的信，他求她答应她妹妹的婚事。

巴扎罗夫把信匆匆地看了一遍，努力控制自己，不让他心里突然发生的幸灾乐祸的情感表露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说，"好像您在昨天还以为他像哥哥似地爱着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呢。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您以为我该怎么办呢？"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仍然带笑问道。

"我以为，"巴扎罗夫也带笑答道，其实他和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一样，心里很不高兴，没有一点儿想笑的心思。"我以为您应该给这一对年轻人祝福。从各方面看来这是美满的婚姻；基尔沙诺夫的境况还不坏，他是他父亲的独养子，他的父亲又是个好人，不会反对他的。"

奥津左娃在屋子里来回踱着。她的脸色一忽儿红一忽儿白。

"你这样想吗？"她说。"为什么不呢？我也觉得没有障碍。……我替卡契雅高兴……也替阿尔卡狄·尼可拉叶维奇高兴。自然我要等他父亲的回信。我要差他自己去见他父亲。可是这桩事情就证明我昨天对您说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的话是对的了。……我怎么早没有看出来呢？这倒怪了！"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又笑了起来，她连忙把头掉开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变得很狡猾了，"巴扎罗夫说着，也笑了起来。"再见吧，"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希望您把这桩事情解

决得很圆满；我在远处也会高兴的。”

奥津左娃连忙回过脸来向着他。

“难道您要走吗？为什么您现在不住下来呢？住下吧……跟您谈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好像人就在悬崖的边上走着似的。起先觉得害怕，可是走下去胆子就大了。您住下吧。”

“谢谢您留我住下，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而且称赞我的谈话的本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在不是我自己的圈子里耽搁得太久了。飞鱼能够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去；请您也答应我回到我自己原来的环境里去吧。”

奥津左娃望了望巴扎罗夫。他的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这个人爱过我的！”她想道，她可怜他，便带着同情地伸出手给他。

可是他了解她的意思。

“不！”他说，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别人的周济。再见吧，太太，请您保重。”

“我相信我们这次并不是最后的见面，”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带了一种无意的动作说。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巴扎罗夫答道，他鞠了一个躬走出去了。

“那么你想给你自己造一个窠了，”巴扎罗夫当天蹲在地板上收拾他的箱子的时候，对阿尔卡狄说。“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很好的事。可是你用不着装假。我还以为你打的是另一

个主意呢。说不定连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我的确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狄答道，“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装假，说这是‘很好的事’呢，好像我不知道你对于婚姻的见解似的。”

“啊，好朋友，”巴扎罗夫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看见我在干什么：我的箱子里头有一个空的地方，我正在塞点儿干草进去；在我们的人生的箱子里头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塞点儿东西进去，倒比让它空着好。请你不要动气：你一定还记得我一向对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的意见吧。有些年轻小姐得到了聪明的名声，只是因为她叹气叹得很聪明，可是你的那一位是站得稳的，的确她站得那样稳，因此她将来一定会把你抓在她的掌握中，不过这是应该的。”他砰的一声关上了盖子，从地板上站起来。“现在在临别的时候，让我再跟你说一遍……因为我们欺骗自己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这次是永别了，你自己也觉得……你的举动很聪明；你不宜于过我们这种痛苦的、清寒的、孤单的生活。你没有锐气，没有愤恨，不过你有的是青年的勇敢，青年的热情。你不宜于做我们的事。像你们这一类的贵族至多不过做一些高贵的顺从或者高贵的愤慨的举动，那是没有用处的。譬如说吧，你们不肯战斗——却以为自己是好汉——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啊，好吧！我们的灰尘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我们的污泥会把你的身上弄脏，可是你没有长到我们那样地高！你不知不觉地在自我欣赏，你喜欢骂你自己；可是我们讨厌这些——我们要压倒别的人！我们要去改变别的人的性格！你是个很好的人；不过你是一个

软软的、自由派的少爷——借一句我父亲常说的话：爱渥拉都①。”

“你是跟我永别吗，叶夫盖尼？”阿尔卡狄忧郁地说，“你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吗？”

巴扎罗夫搔他的后脑勺。

“不错，阿尔卡狄，不错，我还有别的话跟你说，不过我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又是浪漫气味——那是说，有点儿肉麻。你赶快结婚吧，造好你的窠，多养几个孩子。他们一定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生得正是时候，跟你我不一样。啊哈！我看马已经预备好了。时候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辞过行了。……现在怎样？喂，拥抱一下吗？”

阿尔卡狄跑过去抱住他从前的导师和朋友的脖子，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

“这就是青春！”巴扎罗夫平静地说。“可是我把我的希望放在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的身上。你瞧吧，她会很快地把你安慰好的！”

“再见，老弟！”他坐上了大车以后，对阿尔卡狄说，又指着一对并排蹲在马房屋顶上的寒鸦说道，“这是你的榜样！照着办吧。”

“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卡狄问道。

---

① 爱渥拉都：用俄国腔念出来的法国话 et voilà tout（如是而已），参看第一六七页注④。

“怎么？你对博物学的知识就这么浅，还是你忘了寒鸦是一种最可尊敬的家禽呢？这是你的一个榜样！……再见，西乌尔①。”

车子辘辘地响着走了。

巴扎罗夫说对了。这天晚上阿尔卡狄跟卡契雅谈话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他的导师。他已经开始服从卡契雅了，卡契雅也觉察到这个，她并不惊奇。他得在第二天动身回玛利因诺去见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并不去管束这一对年轻人，只是为了礼俗的关系才不让他们长久单独地在一块儿。她很大量地把公爵夫人跟他们隔开，老公爵夫人听见他们就要结婚的消息，只气得流着眼泪乱发脾气。起初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还担心自己看见他们的幸福会觉得难过，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她看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感到兴趣，后来她居然感动了。这件事情叫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一面高兴，一面又不愉快。“巴扎罗夫果然说对了，”她想道，“那原不过是好奇心，就只是好奇心，贪舒服，自私自利……”

“孩子们！”她大声说，“爱情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情感吗？”

可是卡契雅跟阿尔卡狄连她的意思也不懂。他们常常躲开她；他们在无意中偷听到的谈话还时常萦绕他们的心。可是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不久就使他们心安了；这在她并不是难事：她自己已经心安了。

---

① 西乌尔：用俄国腔念出来的意大利字 Signor：先生。

二七

巴扎罗夫的年老的双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回家来，因此他们看见他的时候更加欢喜得不得了。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非常兴奋，不停地在家里来回地跑着，惹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她比做一只“母鹧鸪”；她那件短短的衫子后面拖着短短的下摆，使她的确有点儿像一只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自己也只是唔唔地哼着，咬着他的长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手指抓住他的脖子，把脑袋往左右转动，好像他要试一下他的脑袋是不是装得很牢，随后他忽然又张开他的阔嘴，发出一阵没有声音的笑。

“我回来在你这儿整整住六个星期，老爸爸，”巴扎罗夫对他说。“我要做我的工作，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记了，我也不会来打扰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他果然守约。他像上次那样把他儿子安顿在他的书房里以后，他竭力躲开他儿子，并且还阻止他的妻子对儿子作不必要的慈爱的表示。“好妈妈，叶纽沙上次回来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们吵得他有点儿厌烦了：这回我们应当聪明些。”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同意丈夫的话，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她的儿子，而且现在她简直不敢跟他讲话了。“叶纽兴卡，”她有时候会唤他，可是不等

他回过头，她就玩弄她的手提袋的绳带，支吾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这是——”随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手支着脸颊，跟他商量说：“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叶纽沙今天午饭高兴吃什么——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他呢？”“他会讨厌我的！”

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他到客厅里喝茶，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菜园里来回走着，一声不响地跟他父亲一块儿抽烟；有一回他还问起亚历克赛神甫来。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起先很高兴这种改变，可是他的快乐不久就没有了。“叶纽沙真叫人担心，”他偷偷地对他妻子诉苦道，“他并不是不满意或者不高兴，那倒还不要紧；他心里难过，他不快活——那是可怕的。他老是不讲话，只要他肯骂我们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来，他的脸色也不好看。”“主啊，主啊！”那个老妇人低声说，“我想在他的脖子上挂一道护身符，可是他自然不会答应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几次极小心地转弯抹角向儿子打听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阿尔卡狄的近况。……可是巴扎罗夫的回答却是勉强的，顺口说出来的；有一次他觉察到他父亲渐渐用话套他讲出什么来，他就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讲话老是像踮起脚在我周围绕圈子？这个办法比从前的更坏。”“啊，啊，我没有什么用意！”可怜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他又发挥政治的意见，

这也得不到结果。有一天谈到就要实行的农奴解放，他便谈起进步来，希望用这个引起他儿子的共鸣；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冷淡地答道："昨天我走过院子篱笆那儿，我听见本地农民的小孩在唱歌，他们不唱从前的歌子，却哼着：'正当的时候来了，我的心里感到爱了。'……这就是你的进步。"

有时候巴扎罗夫走到村子里去，用他平日的揶揄的口吻跟随便一个农民谈起话来。"喂，"他对农民说，"老兄，把你们的人生观讲给我听听；你瞧，他们说，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和将来都是捏在你们手里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要由你们来开创——我们的真正的语言同我们的法律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农民不是不回答，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出几句这样的话来："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是……要看我们的，譬如说，结果。""你给我讲讲你们的'米尔'是什么东西，"巴扎罗夫打岔说："是不是就是那个站在三条鱼背上的'米尔'①？"

"少爷，大地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那个农民就用他那种家长式的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答道："可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米尔'上面，老爷的意志是很有势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亲。主人的规矩越严，农民越高兴。"

巴扎罗夫有一回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便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转身走了。农民也慢慢地走回家去。

---

① "米尔"：俄文"米尔"（мир）这个字除了乡村自治组织外，还有一个意义是"世界"，旧俄传说世界是放在三条鱼背上的。

“他在讲些什么?”另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农民问道,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茅草房门口,远远地望着巴扎罗夫跟这个农民谈话。“讲欠租的事情吗?”

“什么欠租的事,老兄,”头一个农民答道,现在他讲话没有一点儿家长式的单调声音了,却反而有一种毫不在乎的粗暴的调子。“啊,他这样那样地乱讲了一忽儿,他大约舌头发痒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懂得什么呢?”

“他哪儿懂得什么呢!”另一个农民说,接着他们推了推帽子,又拉了拉腰带,两个人就去商量他们自己的工作和需要去了。唉! 这位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自以为懂得怎样跟农民谈话的巴扎罗夫(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争论的时候这样夸过口的),这位自信心很强的巴扎罗夫却从来没有疑心过在他们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

巴扎罗夫后来终于给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有一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他面前给一个农民包扎受伤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发颤,他不能够扎好绷带;他的儿子给他帮了忙,从此以后巴扎罗夫便时常帮忙他父亲给人治病,虽然他同时又不断地嘲笑他自己向父亲推荐的治疗法,嘲笑马上采用这个治疗法的父亲。可是巴扎罗夫的讥笑并没有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心里有一点儿难过,它们反而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用两根手指把他那件染着油渍的便衣提起来,提到肚皮那儿,一面抽他的烟斗,一面高兴地听巴扎罗夫讲话;巴扎罗夫的俏皮话越刻毒,他那好脾气的父亲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齿全露出来了。他甚至于把儿子的那些无味的或者毫无意义的俏

皮话，常常放在自己嘴里说来说去，譬如说，有好几天他不论对题不对题都说一句：“并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①”只因为他儿子听说他去做早礼拜，用了那一句话讲他。“谢谢上帝！他的郁闷已经过去了！”他悄悄地对他的妻子说：“他今天还这么挖苦过我的——真是好极了！”而且，他想起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助手，便喜欢得不得了，心里充满了骄傲。“是的，是的，”他把一瓶古拉药水或一罐白油膏拿给一个穿粗布男大衣、包着有角的头帕的乡下女人的时候，就对她说，“因为我儿子住在我家里，你应当时时刻刻感谢上帝，好女人，现在可以用最科学的、最新的方法来给你治病。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御医也并不比他好。”那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浑身刺痛”（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听见他的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在怀里掏出了包在一幅毛巾角上的四个鸡蛋。

巴扎罗夫有一次还给一个过路的布商拔了一颗牙；这虽是一颗很平常的牙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却把它当作古董似地保存起来，而且把牙齿拿给亚历克赛神甫看，口里不住地说：

“您瞧，多长的根！叶夫盖尼的力气真不小。那个卖布的差一点儿跳到半空中去了。……我看，就是一棵橡树，也会给拔起来的！……”

“很值得佩服！”亚历克赛神甫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也不

---

① 原文是一句土话：“这是第九件事。”

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位高兴得不得了的老年人对付过去，末了只好这样说。

有一天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带了他的兄弟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家里来看病，病人害的是伤寒。这个可怜的人躺在一捆干草上面快要死了；他满身都是黑点子，他早就失掉了知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惋惜地说，为什么早没有人想到来找医生看病，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果然这个农民还没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车子上死了。

三天以后巴扎罗夫走进他父亲的屋子，问他父亲有没有硝酸银。

"有的，你要来做什么用？"

"我得用它来……烧一个伤口。"

"谁的伤口？"

"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的！为什么有伤口？是什么一种伤口？在什么地方？"

"这儿，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个村子里去，你知道，就是那个害伤寒的农民的村子。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正要解剖他的尸首，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这种手术了。"

"后来？"

"后来，我请求县医让我来动手；我就割伤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成灰白，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跑进书房里去，立刻拿了一块硝酸银回来了。巴扎罗

夫正要拿起它就走。

“看在上帝的份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让我给你弄吧。”

巴扎罗夫笑了笑。

“你真喜欢做医生！”

“不要开玩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给我看。伤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压紧一点儿，不要怕。”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止了。

“叶夫盖尼，你以为怎样，是不是用烙铁来烧一下更好些？”

“那是应该早弄的；可是现在连硝酸银，其实也不中用了。倘使我受到传染，现在已经晚了。”

“怎么……晚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差不多讲不出话来了。

“那是没有疑问的！已经隔了四个多小时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又把伤口烧了一忽儿。

“那个县医就没有硝酸银吗？”

“没有。”

“怎么能够呢，我的上帝！一个医生连这样一件万不可少的东西也没有！”

“你倒没有看见他的柳叶刀，”巴扎罗夫说着便走开了。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第二天又一个整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断地找了种种的口实到他儿子的房里去；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提起伤口，甚至于找了一些极不相干的话来谈，他却牢

牢地望着他儿子的脸，他那么惊惶地望他的儿子，所以巴扎罗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气地嚷着要他走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应他的儿子，以后不再惊忧了，在他这方面，也得这样办，因为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他自然没有让她知道那件事情)开始担心地盘问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有什么心事。整整两天里面他都坚持下去了，虽然他还是偷偷地留心看他的儿子，觉得他儿子脸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罗夫埋着头，什么都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叶夫盖尼?”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我觉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吗? 你的头怎样?”他胆怯地说，“痛不痛?”

“痛。为什么不头痛呢?”

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坐直了身子，注意地听他们讲话。

“不要生气，叶夫盖尼，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继续说，“你肯让我给你按按脉吗?”

巴扎罗夫站起来。

“我用不着按脉，就可以告诉你；我发热。”

“有没有发寒颤呢?”

“有点儿发寒颤。我去躺一忽儿，你可以给我送点儿菩提花茶来。我一定着凉了。”

“怪不得我昨晚上听见你咳嗽，”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说。

“我着凉了，”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忙着预备菩提花茶，瓦西里·伊凡

诺维奇便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不声不响地拉他自己的头发。

这天巴扎罗夫就没有再起床，他整夜都是在一种沉重的、半昏迷的睡眠状态中。早晨一点钟光景他勉强睁开了眼睛，看见灯光底下父亲的苍白的脸正俯下来望他，他叫他父亲出去；他父亲说声请他原谅便走了，可是马上又踮起脚走回来；半个身子藏在柜门背后，不转眼地一直望着儿子。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也没有睡，她让书房的门开着一点儿，她不停地到门口来听听"叶纽沙呼吸怎样"，又来看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只能够望见他那一动也不动地俯着的背，可是就是这个也叫她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清早巴扎罗夫挣扎着起来了；他觉得一阵头晕，鼻子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默默地伺候他；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进来看他，问他觉得怎样。他答道："好些了，"便翻身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对他的妻子摇着双手，要她出去；她咬着嘴唇免得哭出声来，便走开了。整个宅子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四周静得出奇；院子里一只爱叫的公鸡让送到村子里去了，它好久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巴扎罗夫仍然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试着拿种种的问题去问他，可是巴扎罗夫厌烦了，老人便回到扶手椅上坐下，动也不动一动，只是间或拉拉自己的手指节发出响声。他到花园里去了几分钟，像一座石像那样地立在那儿，仿佛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惊惶(惊惶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然后又回到他儿子的房里，竭力避开他妻子的询问。她最后抓住他的胳膊，痉挛地、几乎是威胁地

问道："他害什么病?"他连忙定一定神，勉强回答她一笑；可是叫他自己也害怕的是：他发出的不是微笑，却是一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狂笑。他在这天天刚亮就差人去请医生了。他觉得应该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儿子，免得他儿子生气。

巴扎罗夫突然在长沙发上翻过身来，用那对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他的父亲，讨着水喝。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拿了一点儿水给他，便趁势摸了一下他的前额。烧得跟火一样。

"老爸爸，"巴扎罗夫声音嘶哑地慢慢说，"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传染了，过几天你就得埋葬我。"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都站不稳了，好像什么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叶夫盖尼!"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你吧! 你着凉了! ……"

"得啦，"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打岔说。"医生是不可以这样说的。一切传染的征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传染的征候……在哪儿，叶夫盖尼? ……哪儿的话!"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说，他挽起他衬衫的袖子，给他父亲看他的胳膊上发出来的那些显示着凶兆的红斑点。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得浑身打起寒颤来。

"我们假定，"他末了说，"我们假定即使……即使有点儿像……传染……"

"脓毒血症，"他的儿子提醒说。

"啊，是……一种……流行病……"

“脓毒血症，”巴扎罗夫声音清楚而严厉地说，“你难道忘了你的笔记本吗？”

“啊，是的，是的——随你怎样说好了……无论如何，我们要治好你的病！”

“得啦，这是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也不必争论这个。我没有料到会死得这么早；老实说，这是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亲你们两位应当利用你们的坚强的宗教信仰了；现在是试验它的好机会了。”他又喝了一点儿水。“我想求你办一桩事，……趁现在我的脑子还清醒的时候。明天或者后天，你知道，我的脑筋就要辞职了。就是现在我也没有十分把握我讲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躺在这儿，我老是觉得有些红狗在我周围跑，可是你暗中注意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只山鸡似的。我好像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吗？”

“哪儿的话，叶夫盖尼，你说话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跟我说过你已经差人去请了医生。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你自己……你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个送信人去……”

“到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那儿去吗？”老人插嘴道。

“阿尔卡狄·尼可拉以奇是谁？”巴扎罗夫说，好像他不大明白，在思索似的。“啊，不错！那只小鸟儿！不，不要去动他；他现在成了一只寒鸦了。不要怕，这还不是说胡话呢！差一个人去见奥津左娃，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她是一位地主太太……你知道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点点头。）就说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差人来问候她，并且来告诉她：他要死了。你肯

办吗?"

"我就去办。……不过你真会死吗,叶夫盖尼? ……你自己想一想! 要是你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公道呢?"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请你差一个人去。"

"我马上就差人去, 我自己给她写信。"

"不,为什么要你写呢? 只说我差人问候她;不用再讲别的。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红狗那儿去了。奇怪! 我集中我的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总没有用。我看见一个斑点一样的东西……再也没有别的。"

他又很吃力地翻过身去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了书房,勉强支持着走进妻子的睡房,立刻跪倒在神像面前。

"祷告吧,阿利娜,祷告吧,"他呻吟地说,"我们的儿子快死了。"

医生,就是那个没有硝酸银的县医,来了,他给病人看了病,劝他们安心等待病势的变化,他还说了几句可望痊愈的话。

"您见过病得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极乐国土去的吗?"巴扎罗夫问道,他突然抓住长沙发旁边一张笨重桌子的腿,摇了摇桌子,就把它推开了。

"还有力气,还有力气,"他说,"力气全在,可是我就得死了! ……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从容地跟生命分离,可是我……好的,去试一试否认死吧。死就来否认你,这就够了!

谁在这儿哭?”他停了一下又说。“母亲吗? 可怜的人! 她那出色的红菜汤以后又给谁吃呢? 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像你也哭了。啊,要是基督教不能给你帮忙,你就做一个哲学家,一个斯多噶派[①] 好了! 怎么,你不是夸口说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我是个什么哲学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呜咽地说,眼泪顺着两颊直流下来。

巴扎罗夫的病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更沉重了;病进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失掉知觉,他可以懂别人对他讲的话,他还要挣扎。“我不愿意说胡话,”他捏紧拳头,喃喃地说,“多无聊!”他马上又说:“唔,八减十,还剩多少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像发了疯似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起先主张用这一种治法,然后又想用另一种,末了他只是不停地拉被子盖上他儿子的脚。“得用冷布单包缠……呕吐药……肚皮上贴芥末膏……放血,”他紧张地说。那个让他挽留下来的县医赞成他的意见,给病人喝柠檬水,自己却一忽儿要烟斗来抽,一忽儿又要点儿“添暖加力的东西”,那就是说伏特加。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坐在门口一个矮凳上,只偶尔出去祷告一忽儿。几天以前,她梳妆用的小镜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打碎了,她一向把这种事情当作凶兆;就是安非苏希卡也找

---

① 斯多噶派:希腊哲学的一派,又称淡泊学派。这派学者以坚忍、刻苦、勇毅诸德为做人处世的标准。

不到话来安慰她。季莫费以奇到奥津左娃那儿去了。

夜里巴扎罗夫很不好。……高烧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时候他稍微好了一点儿。他请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给他梳一梳头发，他亲了一下她的手，喝了两口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恢复了一点精神。

“谢谢上帝！”他不住地说，“转机来了，转机到了。”

“喂，现在就这样想吗？”巴扎罗夫说，“一个字眼有多大用处！他找到它了；他说‘转机’，就得到安慰了。真奇怪，一个人还相信一些字眼。譬如说，人家讲他是个傻瓜，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要难过；人家要是叫他聪明人，即使不给他一个钱，他也非常满意。”

巴扎罗夫的这篇小小的演说，大有他从前讲的“俏皮话”的风味，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大地感动了。

“好啊，说得真好，真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样子。

巴扎罗夫悲哀地笑了笑。

“那么，据你看来，”巴扎罗夫说，“究竟是转机过了呢，还是它正来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来的，这就使我高兴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唔，很好；高兴总是不坏的。不过去她那儿，你还记得吗？你差人去了吧？”

“我当然差人去了。”

病人的这种转好的现象并没有继续多久。病又沉重起来

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坐在巴扎罗夫的身边。这个老人心里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痛苦似的。他几次要讲话——却又讲不出来。

"叶夫盖尼!"他终于说出来了,"我的儿子,我的宝贝的,亲爱的儿子!"

这种不寻常的称呼在巴扎罗夫的心上发生了效力。他稍微转过头来,显然在挣扎着要把那个正压在他心上的昏迷的力量甩开,他终于吐出声音:

"父亲,什么事?"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接着往下说,他在巴扎罗夫面前跪了下来,虽然巴扎罗夫已经闭上眼睛,看不见他了。"叶夫盖尼,你现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安慰安慰你母亲和我,尽一次基督徒的责任吧! 我跟你讲这种话,是很可怕的;不过更可怕的是……永久,叶夫盖尼……想一想吧,怎样的……"

老人讲不下去了,他儿子虽然仍旧闭上眼睛躺着,可是他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要是这桩事情可以给你们安慰的话,我就不拒绝,"巴扎罗夫末了说,"不过我想不必这样着急。你自己还说我好些了。"

"好些了,叶夫盖尼,好些了;可是谁知道呢,一切都得看上帝的意思,你尽了这个责任……"

"不,我要等一忽儿,"巴扎罗夫打岔说。"我赞成你的话,转机已经来了。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的话,那也不要紧!

你知道，失掉知觉的人也可以领圣餐的。”

“叶夫盖尼，我求你……”

“我要等一忽儿，现在我想睡了。不要打扰我。”

他把他的头放回在原地方。

老人站起身来，坐在扶手椅上，捏住他的下巴，咬起他自己的手指来……

他突然听到一阵有弹簧的马车的声音，① 这声音在乡下偏僻地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轻快的车轮越滚越近，现在连马的鼻息声也听得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跳起来，跑到窗口去。一辆用四匹马拉的两个座位的马车正跑进他这小小住宅的院子里来。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只感到一种糊里糊涂的快乐，一口气跑到台阶上去了。……一个穿号衣的听差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一位穿黑大衣、戴黑面纱的太太来。……

“我是奥津左娃，”她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还活着吗？您是他的父亲吧？我请了一位大夫来了。”

“恩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声说，他抓起她的手，战战兢兢地放在他的嘴唇上。这个时候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请的医生，一个有德国脸型、戴眼镜的、矮小身材的人，不慌不忙地从车上走下来了。“还活着，我的叶夫盖尼还活着，现在他有救了！妻啊！妻啊！一位天使从天上下降到我们这儿来

① 当时乡下路坏，所以乡下的马车大都没有装弹簧。

了……"

"这是什么一回事,好上帝!"老妇人从客厅里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她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就在穿堂里跪在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的脚跟前,像一个疯婆子似地亲起她的衣裾来。

"您这是做什么! 您这是做什么!"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接连地说;可是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并不去理会她,而同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住地说:"一位天使! 一位天使!"

"Wo ist der Kranke?[1]病人在哪儿?"末了医生有点儿生气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醒悟过来了。"在这儿,这儿,请跟我来,威尔结斯结尔·黑尔·郭列加[2],"他记起了从前学过的东西,便加上这么一句。

"啊!"德国人带着苦笑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他们引进了书房。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奥津左娃请的大夫来了,"他弯下身子凑近他儿子的耳朵说,"她本人也在这儿。"

巴扎罗夫突然睁开他的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奥津左娃在这儿,她带了一位大夫来看你。"

巴扎罗夫动动眼睛朝四处望。

---

① 德语:病人在哪儿? ——原注

② 俄国腔的德国话:最可尊敬的同事先生。——原注

"她在这儿……我要见她。"

"你就会看见她的,叶夫盖尼;可是我们得先跟大夫谈谈。现在既然西多尔·西多利奇(这是那个县医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得把你这病的历史详细讲给他听,我们要稍微商量一下。"

巴扎罗夫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好吧,就请快点儿谈,只是不要用拉丁文;你知道,我懂得 jam moritur①的意思。"

"Der Herr scheint des Deutschen mächtig zu sein,"②这个爱司枯拉皮亚司③ 的新弟子转过脸对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以黑……加伯④……我们还是讲俄国话吧,"老人说。

"啊,啊! 原来是这样,⑤ ……好吧……"

他们就商量起来。

半小时以后,安娜·谢尔盖叶夫娜由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陪着,走进书房里来。医生已经暗暗地告诉她:病人没有好的希望了。

她望了巴扎罗夫一眼……就在房门口站住了,她看见那张发红的、同时又带死气的脸同那对盯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惊。她只觉得害怕,是一种冰冷的、难堪的害怕;她马上

① 拉丁文:已经要死了。——原注

② 德语: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国话。——原注

③ 爱司枯拉皮亚司:罗马神话中的医疗神。

④ 俄国腔的德国话:我曾经。——原注

⑤ 德国腔的俄国话。

想道，要是她真的爱过他的话，她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谢谢您，”巴扎罗夫用力地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这是慈善的行为。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正如您所答应的。”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父亲，请你出去一忽儿。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您允许吗？好像，现在……”

他把头动一下，指点着他那睡倒的无力的身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去了。

“好，谢谢您，”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这是皇族的派头。据说沙皇也要去看垂死的人。”

“叶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

“啊，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让我们说实话吧。我是完结了。我掉在车轮下面了。所以显然也用不着想到将来了。死是一种古老的玩笑，可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很新鲜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害怕……不过我就要失掉知觉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没有力气地摇摇他的手。）啊，我应当对您讲什么呢？……说我爱过您吧！那句话以前就没有意思，现在更没有意思了。爱是一种形体，我自己的形体已经坏了。我不如说，您生得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这儿，这么美……”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不要紧，不用担心……在那儿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我的病是传染的。”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很快地穿过屋子走了过来，坐在巴扎

罗夫躺的长沙发附近的一把扶手椅上。

“高贵的心肠！”他低声说，“啊，多么近，又是多么年轻，鲜艳，纯洁……在这间不干净的屋子里！……好，永别了！祝您长寿，这是比什么都好的事情，趁着您还年轻的时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时间。您瞧，这是一个多么难看的景象，虫子给压得半死了，可是它还在蠕动。您瞧，我也想过：我还要办好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有使命，因为我是一个巨人！现在这个巨人的全部使命就是：怎样才死得体面，虽然在旁人看来这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摇尾乞怜的。”

巴扎罗夫闭了嘴，伸手去摸他的杯子。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拿了一点儿水给他喝，却并不取下她的手套，而且胆怯地不敢多吸一口气。

“您会忘掉我的，”他又说，“死人不是活人的朋友。我父亲会对您说，俄国要失掉一个怎样的人了。……那是废话，不过请您不要打破老年人的幻想。您知道……无论用什么玩具哄小孩都行。①……还请您安慰安慰我母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你们的上流社会里就是白天点起火去找也找不到。……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屠户……卖肉……屠户……等一下，我有点儿糊涂了……那儿有一座树林……”

巴扎罗夫把他的手按在额上。

---

① 俄谚：“只要小孩不哭，玩什么都好。”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俯下身去挨近他。

"叶夫盖尼·伊凡诺维奇,我在这儿……"

他马上拿开手,撑起半个身子来。

"永别了,"他突然用力说,他的眼睛射出最后的光。"永别了。……请听着……我那个时候没有亲您。……吹一下快尽了的灯,让它灭了吧……"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把嘴唇挨了挨他的前额。

"够了!"他说,头落回到枕上去了。"现在……黑暗……"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轻轻地走了出去。

"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低声问道。

"他睡着了,"她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巴扎罗夫就没有再醒过。快到傍晚时候他完全失了知觉,第二天他就死了。亚历克赛神甫给他做了临终前的宗教仪式。在行最后涂油礼的时候,圣油涂到他的胸上,他的一只眼睛睁开了,没有生气的脸上现出一种类似恐怖的战栗,好像因为看见穿法衣的教士、烟雾缭绕的香炉和神像前的烛光的缘故。最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声哭起来,这个时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突然充满了愤怒。"我说过我要抗议,"他嘶声叫着,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变了相,他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好像在威吓什么人似的;"我抗议,我抗议!"可是阿利娜·符拉西叶夫娜带着满脸的眼泪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两个人一齐跪倒在地上。安非苏希卡后来在用人房里对人说:"他们并排地埋着他们的脑袋,就像正午时候的一对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热过去了,接着来的是黄昏同黑夜,人又回

到了那个静寂的安身处，在那儿，疲劳的、痛苦的人可以得到安适的睡眠。……

二八

六个月过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它带来的东西多着呢——晴朗无云的严寒的冷寂，轧轧作声的积雪，树枝上浅红色的霜花，浅绿色的天空，烟囱上袅袅的浓烟，门突然打开时候冲出来的一阵阵的热气，还有行人的好像让寒气刺伤了的通红的脸，和冻得打战的马的飞奔。正月里的某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静止的空气中更觉刺骨，血红的夕阳又匆匆地逝去。在玛利因诺宅子的窗里正是灯烛辉煌的时候，卜罗科菲奇穿了一件黑礼服，戴了一双白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餐桌上摆了七份餐具。一个星期以前在本地区的小礼拜堂里静悄悄地举行了两对夫妇的婚礼，几乎连证人也没有——这是阿尔卡狄同卡契雅，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同费涅奇卡的婚礼。在这一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替他的哥哥饯行，他的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谢尔盖叶夫娜却在参加了婚礼、并且送了一份厚礼给这对年轻夫妇以后，马上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在三点钟的时候，大家围着餐桌坐下来。米奇亚也占了一个座位，旁边有一个包着锦缎头帕的奶妈照应他，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坐在卡契雅同费涅奇卡的中间；两位“新郎”便

挨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们这两位朋友近来都有点儿改变了，他们都长得更漂亮，而且更有男子气概了；只有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比从前瘦了一点儿，这反而给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添了优雅和大贵族气派[①]……费涅奇卡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新绸衫，头发上扎了一条宽的天鹅绒带子，脖子上挂了一副金链子，她坐在那儿，恭恭敬敬地一动也不动，她对她自己，对她周围的一切，都很恭敬，她老是微笑，好像要说："请你们原谅，我并没有错。"不只是她——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在微笑，好像也都带着抱歉的样子；他们都觉得有一点儿拘束，有一点儿惋惜，其实都很高兴。他们带着近于滑稽的殷勤互相周旋，仿佛他们全同意来表演一出天真的喜剧似的。卡契雅算是这些人里面最镇静的了：她安心地朝她的四周看；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已经非常喜欢她了，这是看得出来的。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尼可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脸向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说，"当然，不会久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对你说，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唔，挺糟的是，我们不会演说！阿尔卡狄，你说吧。"

"不，爸爸，我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好像我就准备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我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让我们来拥抱你一下，祝你万事顺遂，盼你尽快地回

① 这里含有讽刺意味。

到我们这儿来!"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跟每个人都亲过了,自然连米奇亚也在内;对费涅奇卡,他还亲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还没有学会把手伸给别人去亲呢;他喝干了第二次斟满的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祝你们快乐,朋友们! Farewell! ①"这最后一句英国话谁也没有注意到;② 不过大家都很感动。

"巴扎罗夫的纪念,"卡契雅在她丈夫的耳边轻轻地说,她跟他碰了碰杯。阿尔卡狄用热烈的握手来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声提出祝饮的话。

这好像应该完结了吧?可是也许有一两位读者想知道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人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愿意让他们满意。

安娜·谢尔盖叶夫娜最近嫁了人,她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却只是出于聪明的考虑。她的丈夫是一个俄国未来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处世常识丰富、意志坚强、而且有惊人辩才的法学家——年纪不大,脾气好,冷得像冰一样。他们处得极和睦,可能有一天会达到幸福吧……可能会产生爱情吧。赫公爵夫人死了,她一死,马上就让人忘记了。基尔沙诺夫父子一直住在玛利因诺;他们事业的情况也开始

① 英语:永别了。——原注

② 巴威尔不说"再见",却说"永别了",可见他不打算再回到他们中间来了。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好转了。阿尔卡狄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做了调解官①，他拿出全力来办事，他不停地在他那个区里奔走，发表长篇演说（他以为农民应当给"教导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说，应当对他们把一套话反复地说许多遍，讲到他们累得哑口无言为止）；可是说实话，不但一班有教养的乡绅对他并不十分满意，那班绅士讲起"解放"这个字眼来，时而讲得漂亮干脆，时而忧郁凄凉，故意把 эмансипапия（解放）的第一个字母念掉了（而且念 ман 音的时候还带了很重的鼻音）；还有一班没有受过教育的乡绅也不大喜欢他，那班人常常毫不客气地咒骂"那么个解放"（那个解放）。这两种乡绅都说他心肠太软了。卡捷林娜·谢尔盖叶夫娜生了一个儿子，叫柯立亚；米奇亚整天高兴地到处乱跑，话也讲得清楚流利了。费涅奇卡·费多西雅·尼可拉叶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奇亚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妇，要是她的媳妇弹起钢琴来，她便高兴地整天坐在媳妇的旁边。我们顺便讲一讲彼得。他越长越傻，也越是神气。他讲起话来把所有 е 的音都念成 ю，他把"现在"（"杰别儿"）念成了"久比忧儿"，可是他也结了婚，并且得到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他的妻子是城里一家菜园主人的女儿，曾经拒绝了两个很好的求婚者，只因为他们没有表；彼得不但有表——他还有一双漆皮鞋。

---

① 调解官：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以后新设的一种官职；专门调解地主和农民中间关于土地的争执。

在德累斯顿的布吕尔台地① 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中间——那是最时髦的散步时间——您可以遇见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他好像害着关节炎似的，可是他的相貌仍然很漂亮，衣服也很讲究，而且举止间还带了一种特别的风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会里生活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这就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他从莫斯科到外国去休养，就在德累斯顿住了下来，在这儿他喜欢跟英俄两国的游客来往。他待英国人没有架子，差不多到了谦虚的地步，不过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他们觉得他有点儿枯燥乏味，可是尊敬他是一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a perfect gentlenman"②。他待俄国人比较自由，没有拘束，他随意发脾气，常常挖苦他自己，又挖苦他们，不过他始终保持着极和蔼的、而且随便的态度，没有一点儿失礼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见解，谁都知道在上流社会里这是被认为 très distingué! ③他从来不念俄文书报，可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银质的烟灰碟，形状就像一只俄国农民穿的树皮鞋。我们的游历家都喜欢去拜望他。玛特维·伊里奇·柯利雅津有一个时期失势（他自己说是处在暂时的反对派的地位）出国，到波希米亚的温泉去的时候经过这儿，很堂皇地拜访了他一次；他跟本地人很少来往，可是他们非常崇拜他。倘使要找宫廷乐队演奏会、戏院等等的门票，没

① 布吕尔台地：在易北河上德累斯顿旧要塞墙上；布吕尔（1700—1763）是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图斯的首相。

② 英语：一位十足的绅士。

③ 法语：很出色的。——原注

有一个人能够比 der Herr Baron von Kirsanoff[1]更容易、更快的了。他尽力做一些好事，他还逐渐得到一点儿声名；他并没有白做大社交家啊；可是生活对他是一个负担……这个负担比他自己所料想的还重得多。……我们只消看他在俄国教堂里面，靠在墙边，想着什么事情，许久都不动一动，只是痛苦地咬自己的嘴唇，随后忽然醒悟过来，差不多叫人看不见地用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库克希娜也到外国去了。她现在住在海得尔堡，不研究自然科学，却研究建筑学了，据她自己说，她在建筑学上已经发现了新的法则。她仍然跟一班大学生常常来往，特别是跟那些研究物理学和化学的俄国青年来往，在海得尔堡有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初到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的见解常常叫朴直的德国教授们吃惊，可是后来他们的完全无用与极端懒惰又叫这些教授惊奇了。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城里跑来跑去，那些化学家连氧气跟氮气也分不清楚，可是装满了一肚皮的否定和自尊心，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叶维奇也同他在一块儿，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大人物了，据他自己说，是在继续巴扎罗夫的"事业"。外面传说他新近让什么人打了一顿，可是他对那个人也报了仇：在一份没有名气的小报上一篇没有人注意的小文章里面，他露了一点意思说打他的人是一个胆小鬼。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是像从前那样地虐待他，他的妻

① 德语：基尔沙诺夫男爵阁下。——原注

子当他是一个傻瓜……和一个文人。

在俄国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差不多跟所有我们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它四周的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头十字架也倒下来了，在它们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全移动过了，好像有什么人从下面把它们抬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自由自在地在坟上面来来去去。……可是这些坟中间有一座却没有让人碰过，也没有给畜类践踏过；只有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小鸟在坟上唱歌。坟的四周围绕着铁栏；它的两边种了两棵小枞树。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就埋在这座坟里面。从附近的小村子里常常有一对非常衰老的夫妇来上这座坟。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来；他们走到铁栏跟前，就跪在地上，伤心地哭上好久，他们长久地注意地望着那块不会讲话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睡在它底下；他们谈了几句简短的话，揩去了石头上的尘土，整理一下枞树的枝子，便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他们好像跟他们的儿子离得更近，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离得更近。……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都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它们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

附 录

关于《父与子》*

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一八六〇年八月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怀特岛上的文特诺镇洗海水澡；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失去了——而且好像是永远地——俄国的年轻一代人对我的好感。我不止一次地听见说，而且也在批评文章里看到，别人说在我的作品里我如果不是“从观念出发”，便是“就观念发挥”；有些人因此称赞我，相反地，另一些人却责备我；在我这方面，我应该承认：倘使我没有找到一个在他身上各种适当因素逐渐孕育、而且配合得很好的活人（而不是观念）来做依据，我绝不会想到去“创造形象”。我没有任意发明的伟大天禀，所以我始终需要一个使我能够站稳脚跟的基础。我写《父与子》的时候也正是同样的情形；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范本是一个使我十分感动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在这位非常人物的身上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没有长成、日后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原素。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异常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

* 本篇及以下四篇都是屠格涅夫作。

不能够明白地理解他，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查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使我不安的是这件事：我好像在到处都看见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儿暗示也看不到；我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疑惑：难道我追求的不会是幻影吗？——我记得有一个俄国人跟我同住在怀特岛上，他对于已故的阿波龙·格利戈里耶夫[1] 所谓的时代"精神，具有极锐敏的眼光和异常的敏感。我把那萦绕在我的脑子里的思想告诉他，可是他的意见叫我十分惊奇，他说："你好像想出了一个类似……罗亭的典型，是吗？"我哑口无言了：他说的什么话？罗亭跟巴扎罗夫是同样的典型吗？

这几句话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极力避免想到我计划中的那部作品；然而我回到巴黎以后，又开始计划它——情节渐渐地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冬天我写好了头几章，到第二年七月，我在俄国乡下写完了这部中篇小说。秋天我把它读给几位朋友听过，又修改和补充了几个地方，到一八六二年三月《父与子》便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

摘译《文学与生活回忆录》第五篇，第一节。
（一八九八年圣彼得堡版《屠格涅夫全集》
第十二卷）

① 格利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

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

我很感谢您的来信,我即刻拿起笔来回答您,亲爱的斯鲁切夫斯基①。年轻人的意见是不可以不重视的;无论如何,我很希望我的意图不致于让人误解。我把我的回答逐条写在下面:

一、第一个责备使我记起果戈理和别的作家所受到的责难,那就是——没有在坏人中间安置一些好人。巴扎罗夫毕竟把小说中别的人物全压倒了(卡特科夫② 认为我把他写成了《现代人》③ 所祀奉的神明)。他所赋有的品质并不是偶然的。我想把他写成一个悲剧的人物:这儿不需要温情。他是正直、诚实,而且彻头彻尾地民主的。您就看不见他的好的方面吗?他推荐《物质与力》也不过把它当作一本通俗化的书,一本没用的书罢了。我写出他跟巴威尔·彼得洛维奇的决斗,

---

① 斯鲁切夫斯基(1837—1904):俄国诗人,屠格涅夫的朋友。他写信告诉屠格涅夫,说《父与子》给了海得尔堡大学俄国学生不好的印象。屠格涅夫便写了这封回信。

②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

③ 《现代人》:杂志,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创刊,在彼得堡出版。普希金死后由普列特涅夫接办。一八四七年起由诗人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编辑,一八六六年被政府查封。

只是为了用一种可笑的夸张手法证明高等贵族骑士精神的空虚无用。他怎么能够拒绝这场决斗呢？不然，巴威尔·彼得洛维奇会打他的。据我看来，巴扎罗夫每次跟巴威尔·彼得洛维奇争论的时候，他都是胜利的，他从没有失败过。倘使他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

二、关于阿尔卡狄的话，关于"父亲们"恢复名誉等等的话，只证明一件事——对不起——：人们并没有了解我。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请您看清楚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巴威尔·彼得洛维奇和阿尔卡狄这几个人物，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我顺从自己的审美感觉挑选出贵族方面的好的代表人物来更真确地证明我的主题。倘使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要是我挑选官僚、将军、强盗之类，那就会是粗俗的，——Le pont aux ânes[1] ——而且也会是靠不住的了。

我所认识的真实的否定者，没有一个例外（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司比也涅夫等），都是出身于比较好的、清白正直的人家。这个事实有重大的意义：它使这班活动家，这班否定者不致于让别人攻击他们有私人的怨愤和仇恨。他们走这条路，只是因为他们更关心人民生活的要求。沙里亚斯伯爵[2] 说像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和巴威尔·彼得洛维奇这样的人是我们的祖父，他说得不对。尼可拉·彼得洛维

① 法语：笨人难过的桥，即笨人难解的问题，意思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② 法文译文作沙里亚斯伯爵夫人。

奇是我，是阿加略夫①，和别的上千的人；巴威尔·彼得洛维奇是司托立宾，叶沙科夫，洛谢特② 和别的跟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是贵族里面比较好的人，我特地挑选他们出来让人看见他们的精神的平庸无力。我一方面介绍了受贿的人物，另一方面介绍了一个理想的青年——让别的人来绘这幅图画吧。我的目的比这个高得多：我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就是海得尔堡的同学们认为是更成功的典型的阿尔卡狄说："你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然而即使他是个一万倍坏的勒索敲诈的人，你除了高贵的服从跟愤慨以外，也不会有别的办法，因为你是一位贵族少爷。"（这一段因为审查的缘故已经让我删去了。）

三、啊呀！照您看来，库克新娜这幅讽刺画比所有别的人物都成功。这是用不着回答的。奥津左娃并不爱巴扎罗夫，也不爱阿尔卡狄：您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的那种贪舒服、爱幻想、好奇心重却又十分冷静的享乐惯了的太太，我们的贵妇人的代表。沙里亚斯伯爵夫人③ 了解这个人物非常清楚。奥津左娃起先想抚摸狼（巴扎罗夫）的毛，免得他咬她，后来她又想抚摸一个少年的披着鬈发的头，可是她身子洗得干干净净，躺在她那把天鹅绒长椅子上面不起来。

四、沙里亚斯伯爵夫人称巴扎罗夫的死为**英雄的**死，因此她又非难它。在我看来他的死应当是他那悲剧的形象的最后

① 阿加略夫（1813—1877）：俄国的进步诗人。

② 司托立宾、叶沙科夫和洛谢特都是屠格涅夫的贵族方面的朋友。

③ 沙里亚斯伯爵夫人（即叶夫金尼亚·杜尔，1815—1892）：女作家，常和自由主义的年轻人来往。

一笔。您那班年轻人，他们却把它看作一件意外的事情！

最后我要说这样的话：尽管巴扎罗夫怎样粗暴、无情，尽管他缺乏怜悯心对人冷淡而严厉，倘使读者不喜欢他，我再说一遍，倘使读者不喜欢他，这是我的错，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Flatter comme un caniche①我不愿意，虽然照这样做我一定可以把年轻人马上拉到我这一面来；可是我不情愿拿这一类的让步来收买人心。与其用欺诈取胜，我宁愿输（而且我相信我已经输了）。我幻想着这样一个人：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我幻想着一个奇怪的跟普加乔夫 Pendant②。可是我那些同时代的年轻人却摇着头对我说：“老兄，你在闹笑话了！你欺侮了我们。你的阿尔卡狄要好得多，可惜你在他身上还没有花够力气！”我只好照茨冈人的歌子里面唱的那样：“揭下我的帽子，深深地鞠躬。……”在这个时候只有两个人明白我的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特金③。

我正设法寄给您一本我的中篇小说，不过现在这 basta④。

---

① 法语：像狮子狗那样地谄媚，这句法文是别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的，但是在我所见到的原文里却没有。原文是：“然而像巴扎罗夫所说的‘肉麻’……。”

② 普加乔夫：十八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一七七四年被捕，一七七五年一月在莫斯科被处死刑。Pendant，法语，相等的人。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波特金（1811—1869）：俄国批评家，起初跟别林斯基等人接近，后来在六十年代中开始拥护“纯艺术”的理论。这一句话是俄文原文里所没有的。

④ 意大利语：够了。

……我不会经过海得尔堡，可是我很想见见那边年轻的俄国侨民。虽然他们认为我落后，还是请您代我问候他们。请转告他们说，我求他们，多等待一忽儿才来宣读他们对我的最后判决。您可以把这封信给那些想看它的人看。我紧紧握您的手，祝您一切顺遂。工作吧，工作吧，不要忙着做总结……

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四日于巴黎。

——第一次根据巴甫罗夫斯基(I. Pavlovsky)一八八七年版《回忆屠格涅夫》“Sonvenirs sur Tourgueneff)中的法文转译。

第二次根据一九五〇年《中学丛书》版《父与子》附录中的原文重译。

给非罗索佛娃[1] 的信

……怎么？您，您也说我描写巴扎罗夫，有意给年轻人绘一幅讽刺画。您重复着这种……请原谅我的无礼的直说——愚蠢的责难！巴扎罗夫——这个我心爱的孩子，为了他的缘故，我跟卡特科夫吵了架，而且在他的身上我用尽了我所能使用的颜色。巴扎罗夫——这个聪明人，这个英雄——会是一幅讽刺画?!？可是显而易见地——我也无法可想了！……他们硬派定我有意用讽刺画来伤害年轻人。我很早就瞧不起这种毁谤中伤了；不过我没有料到：我读了您的来信，我的这种情感又给引起来了……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六日。

——从《中学丛书》版《父与子》附录中译出。

① 非罗索佛娃：有着自由思想的俄国贵妇，妇女运动者。

给某夫人的信

亲爱的女士,您的信写得太客气了,叫我不能不回信。您直捷了当地谈到巴扎罗夫,我也就从他谈起。您在现实生活里寻找巴扎罗夫,您不会找到他。我告诉您:为什么缘故。时代已经大大改变了。现在像巴扎罗夫那样的人是不需要的了! 未来的社会工作并不需要非凡的才能,也不需要杰出的人物,不需要伟人、学者,不需要太发挥个性的人。需要的是忍耐,是对工作的热爱;需要的是:能够无声无臭、不求出名地牺牲自己;需要的是:能够谦虚,而且不轻视一件小的、没有人注意的、却又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我用"不可缺少的"这个形容词,是照它的真正意义来解释的。例如,教农人认字念书,帮助农人,在乡下开办医院等等,难道还有比这些事更不可缺少的吗? 做这些事用得着多大的才能,多大的学问? 需要的倒是一颗能够完全放弃自私自利的心……还有责任心,这是一种真正的、好的爱国的情感,——需要的就是这些。然而巴扎罗夫却是一个典型,一个先驱者,一个温和的大人物,多少有一些威信,也不是完全没有头上的光圈。这些都已经过了时了。……

根据巴甫罗夫斯基著《回忆屠格涅夫》中的法文译文转译。

跟巴甫罗夫斯基谈《父与子》

“……我写作的时候，我不需要跟人们交际；我隐居在我的领地上。在我那些屋子中间有一间小屋子，它有点儿像农人的小屋，屋子里就只有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把椅子。我就在这儿努力地工作了几个整月。我常常有兴致来做些文学上的恶作剧。我写《父与子》的时候，我一方面记着巴扎罗夫的日记。倘使我读到一本新书，倘使我遇着一个有趣味的人，或者当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事件，我就依据巴扎罗夫的观点把这些全记在那本日记里面。结果写成了厚厚的一大本，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可惜我把它失掉了。有人借了它去看，却始终没有把它还给我。”

“伊凡·赛尔该也维奇，说您给巴扎罗夫照了相，这是真的吗？”我（巴甫罗夫斯基）问道。

“不，这不是真的。那个典型很早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一八六〇年，有一次我在德国旅行，在客车上遇到一个年轻的俄国医生。他有肺病。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黑头发，皮肤带青铜色。我跟他谈话，他那锋利而独特的见解使我吃惊。在两个钟点以后，我们就分别了。我的长篇小说完成了。我花了两年的功夫来写它，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工作。

这不过是埋头去写一部已经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罢了。也许您已经注意到我的巴扎罗夫是金黄色头发的。这便是我喜欢他的最好的证据。在我的著作里面，凡是引起我的同情的主人公都有金黄色的头发。我从我的观察里得到结论：金黄色头发的人总是比棕色头发的人值得人同情的。例如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别的人……”

——摘译巴甫罗夫斯基著《回忆屠格涅夫》，第六节。

解　　说

布罗茨基[①]

这部小说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一八六二年第二期上面。单行本也在这一年出版，卷首印着“纪念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的献辞。作者在一八六〇年八月中开始想到写这部小说。据屠格涅夫自己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根据一个年轻的外省医生（狄米特立也夫）的性格特征来复制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的形象（屠格涅夫用“虚无主义者”这个名词来指革命者）和整个小说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据当时的人说，像这样的情况是以前任何一部小说所不曾有过的。

批评家安东诺维奇在论文《现代的阿斯莫德》[②]（《现代人》杂志一八六二年第三期）中认为这部小说是对于现代青年的“毁谤”，“对于年轻一代人的无情的和有害的批评”，“最恶毒的讽刺画”；皮沙烈夫[③] 在论文《巴扎罗夫》《俄语》杂志一

---

① 布罗茨基(1881—1951)：著名的文学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

② 阿斯莫德：古经《托比书》中的一个色魔。后来西班牙小说家格瓦拉用这个名字称他的小说的主人公，那也是一个通晓世事的魔怪。

③ 皮沙烈夫(1841—1868)：俄国文学批评家。

八六二年第三期)中,对巴扎罗夫表示过同情,他在屠格涅夫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进步青年的典型。斯特拉禾夫在《时代》杂志(一八六二年四月号)中承认巴扎罗夫(这个"现代人"学校的学生)的典型性……屠格涅夫在《关于〈父与子〉》的文章(一八六九年)里列举了一些同时代人对他这部小说的最分歧的(对立的)意见。他自己把巴扎罗夫叫做"心爱的孩子"(一八七四年),"所有(他的)人物中最引人同情的"(一八七六年)。在一八六二年他写信给斯鲁切夫斯基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一八七六年他承认:"在我过去的整个文学生活中我有理由喜欢这部中篇小说。"

"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者"这样的名词,后来用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是当作革命原理的名称的,不问任何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全包括在内;当时在西欧那班外国评论家,政治活动家,文学作家写到、讲起俄国革命者的时候,喜欢用"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者"的名词,而且是照上面那个意思来使用的。

——从一九四六年版《屠格涅夫选集》译出。

后　记*

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一八五五年开始的二十一年中间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作者自己称为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好的一部就是《父与子》。这是六部小说中的第四部。一八六〇年冬天作者开始写《父与子》，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完成。小说发表、出版于一八六二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它这样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的。

作者怎样想起写这部小说呢？据他自己说：

"我最初想到写《父与子》还是一八六〇年八月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怀特岛上的文特纳尔洗海水澡……"①

"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医生的性格(他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

---

* 本篇系为《父与子》一九七八年新版所作，后未用入该书。

① 引自作者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怀特岛是英国南海岸外的海岛。文特纳尔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

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①

“那个典型很早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一八六〇年，有一次我在德国旅行，在车上遇见一个年轻的俄国医生。他有肺病。他是一个高个子，有黑头发，皮肤带青铜色。我跟他谈话，他那锋利而独特的见解使我吃惊。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分别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我花了两年的功夫来写它……这不过是埋头去写一部已经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罢了。”②

标题《父与子》就说明小说的内容。作者写的是父亲一代和儿子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写的是具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和标榜自由主义却不肯丢开旧传统的贵族之间的斗争。在新旧两代的斗争中，作者认为他的同情是在年轻人的方面。

可是完全和作者的预料相反，小说引起了那么多互相矛盾的批评和那么长久激烈的争论，小说给作者招引来那么多的误解。保守派抱怨他把“虚无主义者”“捧得很高”，进步人士却责备他“侮辱了年轻的一代”。年轻人愤怒地抗议他给他们绘了一幅“最恶毒的讽刺画”。上了年纪的人讥笑他“拜倒在巴扎罗夫的脚下”，在彼得堡发生大火灾的时候，一个熟人遇见作者就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使作者感到最痛心的是：“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

① 转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② 译自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第六节。

……感到痛苦。"①

作者痛苦地说："这部中篇小说使我失去了（而且好像是永远地）俄国的年轻一代人对我的好感。"②这对作者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寂寞地死在法国。

我在一九七八年校阅我这个旧译本。③ 再过五年便是屠格涅夫逝世的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多年前的激烈争论早已平息，对作者的种种误解也已消除。九十五年前作者在法国病逝，遗体运回彼得堡安葬的时候，民意党人曾散发传单，以俄罗斯革命青年的名义向死者致敬，这是最大的和解了。

说到《父与子》，我同意屠格涅夫的话。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身上，作者的确"用尽了"他"所能使用的颜色"。他对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感到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预言家，一个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固然他写了巴扎罗夫的死，但他是把巴扎罗夫看作一个生在时代之前的人④，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中，使他显得很孤单，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过早死亡的结局。而且他写到巴扎罗夫死的时候，还流过眼泪。他甚至说巴扎

①② 引自屠格涅夫的《回忆录》（蒋路译）。

③ 《父与子》初译稿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完成。第二次的译稿于一九五三年在上海出版，一九七八年我只作了一些小的改动。

④ 这个说法也值得考虑，因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旧虚无主义者"就是巴扎罗夫这样的人，他们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他们并不孤单，而且他们给七十年代的新人开辟了路。

罗夫是他的"心爱的孩子"。这都不是假话。然而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改良派,西欧派。他不会真正理解巴扎罗夫,也不可能真正地爱巴扎罗夫。他只是凭着自己对俄罗斯社会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凭着他的艺术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定要压倒过去的一代人物。他称巴扎罗夫为"虚无主义者"。他创造了这个词。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释道:"虚无主义者——这就是革命者。"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来称呼一切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民意党人司捷普尼雅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罗斯》(1882)的开头就说"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名声自然将由他的著作而长存于后代,但是只靠一个词他也可以不朽了。他就是第一个使用'虚无主义'这个词的人。"

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时候,巴扎罗夫这个新人刚刚产生,一般人对他还很生疏。但是不久,这样的新人便大量出现,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厂"、"拉斐尔没有一点用处"这一类话已经成了"虚无主义者"常用的警句。他们是严肃地相信这一切,并且准备为它们献身的。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就让位给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间去"的"民意党的英雄"们。然后又出现了同工人紧密结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远在法国的衰老的屠格涅夫已经无法理解而且也来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是在一八七六年脱稿的。他把年轻的涅日达诺

夫(《处女地》的主人公)几乎写成了像他自己那样的人。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处女地》后记中写的那一段话："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当时存在的一切。"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民意党人在散发的传单上所说的："也许他甚至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只是一个诚恳的'渐进主义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里的真挚的思想为俄罗斯革命服务过，他爱护过革命青年。"①

屠格涅夫"想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加以典型的艺术概括②，"他的六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出了数十年间③ 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④。"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新人巴扎罗夫早已归于尘土，可是小说中新旧两代的斗争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对于这个斗争屠格涅夫是深有体会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亲(短篇《木木》中的地主婆)斗争了一生。但是她母亲所代表、所体现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经化成灰烬，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即使作者描写了新人巴扎罗夫的死亡，也改变不了这个真理。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仰加强了。

巴　金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

---

①②④ 引自《俄国文学史》下册(蒋路、刘辽逸译)。

③ 数十年间：指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木　木

〔俄〕屠格涅夫 著

《木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迄一九五五年八月，共印七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及一九五九年四月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各印一版。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这所宅子有白色圆柱，有阁楼[1]，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从前有一位太太住在这儿，她是一个寡妇，周围还有一大群家奴[2]。她的儿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她的女儿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只是在家孤寂地度她那吝啬的、枯燥无味的余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

在所有她的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人物是那个打扫院子的人盖拉新，他身长十二维尔肖克[3]，体格魁伟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他生来就又聋又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来，在村子里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跟他的弟兄们不在一块儿，在太太的缴租农人[4]中间，他算是最信实可靠、能按时

① 阁楼：指一层和二层当中的阁楼，或宅子正中部分的楼顶小屋。有时也可译作“中二楼”。

② 家奴：指在地主家听使唤的农奴。

③ 维尔肖克：俄国旧制长度中的寸，十二维尔肖克将近两米了。

④ 缴租农人：指耕种地主田地而按时纳租的农奴。

缴租的一个。他生就了惊人的大力气，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他动手做起事来非常顺利。而且在他耕地的时候，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用不着他那匹小马帮忙，他一个人就切开了大地的有弹性的胸脯似的，或者在圣彼得节① 里，他很勇猛地挥舞镰刀，仿佛要把一座年轻的白桦林子连根砍掉一样，或者在他轻快地、不间断地用三俄尺长的连枷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叫人高兴。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农人，要不是为了他这个残疾，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他。……可是盖拉新给带到莫斯科来了，人家还给他买了靴子，做了夏天穿的长裾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又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根铁铲在他的手里，派他当一个打扫院子的人。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他自小就习惯了种田，习惯了乡村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一直跟人群隔离，长大起来，又聋又哑，而且力气很大，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一棵树。……他给人带进城市以后，倒不明白该怎么办了，他发闷，发呆，就好像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这头牛在那块茂密的青草长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嚼草，忽然让人牵走了，放在铁路的货车上，啊，它的结实的身体一下子让煤烟和火花包住了，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没了它，它给拖着向前飞奔，跟着隆隆声和尖锐声飞奔，飞奔到哪儿去呢

① 圣彼得节：即俄历六月二十九日，新历七月十三日。

——只有上帝知道！盖拉新自来作惯了农人的苦工，所以他把这个新职务需要他干的活并不当作一回事；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就干完了，他便又站在院子中间，张开嘴，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好像他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或者他就突然跑到某一个角落里，把手里的扫帚和铁铲掷得远远的，自己头朝着地扑下去，在地上躺几个钟头，连动也不动一下，仿佛是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可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盖拉新后来也习惯城里的生活了。他的工作并不多，他的全部职务不过是，把院子打扫干净，每天分两次取两桶水，运柴、劈柴给厨房和整个宅子使用①，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守夜。应当说，他的确热心执行了他的职务。院子里从来不曾有过一片木屑，也没有见过一点垃圾；遇到下雨路烂的时候，带着桶去取水的老马在路上什么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动了，他只用肩头一推，不单是车子，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会发出玻璃似的响声，木片、木块会朝四面八方飞散。至于生人呢，自从某一天晚上他捉住了两个小偷，把两个脑袋在一块儿狠狠地碰了几下(碰得那样厉害，简直用不着再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以后，附近这一带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即使在白天，有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贼，不过是陌生人罢了，看见像他这样一个可怕的打扫院子的人，他们连忙向他挥手、叫喊，就

① 从前莫斯科居民用水都是用马拖了水桶到河里或公共喷水池那里取来的。那时做饭取暖都用桦木柴。

好像他能够听见他们的叫声似的。盖拉新同这个家里男女仆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讲话,他都明白,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全照样做了,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一般地说,盖拉新的性情是严厉的、一本正经的,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连公鸡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楣了! 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个十来回,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也养得有鹅;可是鹅是出名的一种尊贵的、懂道理的家禽;盖拉新尊敬它们,他照料它们,他喂它们;他自己就像是一只很神气的雄鹅。他们分派了一间厨房上面的顶楼给他;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这间屋子,他用橡木板做了一张床,床脚是用四个木头墩子做的——这真是一张民间传说中大力士睡的床了;它载得起一百普特① 的重量,不会塌下去;床底下放了一口坚固的木箱;一个角落里立着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只脚的椅子,椅子非常结实、矮小,所以盖拉新常常把它举起来,又丢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这顶楼是用挂锁锁住的,锁的形状倒像"卡拉奇"②,不过它是黑色的罢了;盖拉新总是拿这把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走进他的顶楼去。

就这样地过了一年,在这年的年尾盖拉新遇到了一桩小

① 普特:俄国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

② "卡拉奇":圆弧形的白面包。

小的意外事情。

那位老太太(盖拉新就是在她的宅子里当打扫院子的人)对什么事情都遵照古法办理,她养了一大群用人:在她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女人、缝衣女人、细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等等,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他也兼作兽医,并且还要给用人看病,宅子里另外有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的家医;此外还有一个鞋匠,叫作卡皮统·克里莫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克里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认识他的真正价值,他原本是一个有教养的京城[1] 里的人,不应当连一个职业也没有,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住下来。要是他喝酒(他自己这样说,而且在说话的时候还时常停顿,用手打他自己的胸膛),那就是在借酒消愁。有一天太太跟她的管家[2] 加夫利洛谈到他的事情(加夫利洛是这样一个人:单从他那对又黄又小的眼睛和他那个鸭嘴般的塌鼻子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在惋惜卡皮统的堕落,刚巧前一个晚上还有人看见他醉倒在路旁。

“啊,加夫利洛,”她突然说,“要是我们给他配个亲,你觉得怎样?也许他就会安分起来。”

“是啊,为什么不给他配个亲呢,太太?是可以的,太太,”加夫利洛答道,“这会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太太。”

“对,只是把谁配给他呢?”

---

① 京城:指圣彼得堡,旧俄的首都。

② 管家:指地主家的老仆,他照料家务,并管理全家的仆人。

“自然啦，太太。不过，随您的意思罢，太太。无论如何，他可以有点用处；放在十个人里头挑，他是不会落选的。”①

“我看他好像喜欢塔季雅娜？”

加夫利洛正要回答，却又把嘴唇闭紧了。

“对！……把塔季雅娜配给他罢，”太太决定说，她高兴地闻了闻鼻烟，“你听见吗？”

“听见了，太太，”加夫利洛应道，就退了出来。

加夫利洛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这是耳房，屋子里差不多装满了用铁片包的箱子)，先把老婆支开，然后坐在窗前，细细地想起来。女主人这种意料不到的命令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了。他终于站了起来，叫人去找卡皮统。卡皮统来了。……不过在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向各位读者转述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卡皮统要娶的那个塔季雅娜是什么人，而且为什么太太的命令叫管家感到头痛。

塔季雅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女人中间的一个(不过她是一个能干的熟练的洗衣女人，所以她只管上等的细衣服)，她是一个二十八岁光景的女人，瘦小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俄国人认为左边脸颊上的痣是凶兆——是苦命的预兆。……塔季雅娜不能说自己的运气好。她自小就受虐待：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从来没有受到人怜爱；她穿得很坏，而且只拿到极少的工钱；亲戚呢，她可以说一

① “他并不比别人差”的意思。

个也没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管事①，说是不中用给开除了，丢在乡下，这个人是她的远房叔父，另外还有几个叔父、舅父，都是些农人——再也没有别的了。她从前也算是一个美人，可是她的漂亮很快地就过去了。她的性情极柔顺，或者更可以说是懦弱怕事；她完全不关心她自已的事情，害怕别人却怕得要命；她只想到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做完她的工作，从来不跟谁谈话，只要听见人提起太太的名字就发抖，其实太太看见她也不见得会认出来。盖拉新从乡下给带进城的时候，她看见他那个庞大的身形差一点儿给吓得晕过去，她想尽一切方法避免跟他见面，碰到她从宅子里出来到洗衣房去，在他跟前跑过的时候，她甚至于眯起了眼睛。盖拉新起初并不特别注意她，后来她走过他跟前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然后他开始出神地望着她，最后他就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他喜欢她，究竟是因为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呢，还是因为她那种畏怯的举动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了！有一回她偷偷地在院子里走过，伸开手指头小心地提着太太的一件浆过的短衫……忽然有人使劲地捉住她的胳膊肘；她回过头来，不觉尖声大叫；盖拉新就站在她后面。他傻笑，发出怜爱的叫声，送给她一只姜饼做的小公鸡，鸡的翅膀上和尾巴上都贴着金箔。她想不接受，可是他把姜饼硬塞在她的手里，摇摇头走开了，随后又回过头来，再对她发出一些非常亲密的叫声。从那天起

① 管事：这里指专管食物和食器室，以及贮藏食物、饮料等的地下室的家仆。

他就不让她安静了：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就会跟到哪儿去同她见面，对她微笑，发出叫声，摇他的手，或者突然间从怀里拉出一根彩带放在她的手上，或者拿他手里的扫帚扫去她面前的尘土。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应付，怎样做才好。很快地整个宅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打扫院子的哑巴的鬼把戏了；嘲笑，打趣，挖苦，一齐落到塔季雅娜的头上。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取笑盖拉新：他不喜欢人开玩笑；所以人们当着他的面不去麻烦塔季雅娜。不管这个女人愿意不愿意，她是在他的保护下面了。他跟每个聋哑的人一样，非常机敏，只要是有人在取笑他或者她的时候，他马上就完全明白。有一回在吃中饭的时候，塔季雅娜的上司，那个管衣服女人①，照一般人的说法，在挑三挑四地逗她，而且闹得很厉害，叫那个可怜的女人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儿看好，差一点儿要恼得哭起来了。盖拉新突然站了起来，伸出他的大手，把它放在管衣服女人的头上，并且非常凶恶地望着她的脸，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面。众人都不做声。盖拉新又拿起他的调羹继续喝他的白菜汤。"看，这聋哑的魔鬼，这个树妖！"众人低声喃喃说。管衣服女人站起来，回到女用人房间去了。还有一次，盖拉新看见卡皮统（就是我们刚刚讲起的那个卡皮统）跟塔季雅娜谈话谈得很亲密，他便向卡皮统招手叫他过来，把他带到马车房去，拿起一根立在墙角的车杆，捏紧它的一头，轻轻地然而很有意思地用这车杆威胁他。从那个时候起就再没有一个人跟塔季雅娜

① 指专管主人衣服的女用人。

谈话。这一切并没有给盖拉新带来任何的麻烦。固然那天管衣服女人跑进女用人房间就晕倒了，而且她用很巧妙的方法让太太在同天就知道了盖拉新的粗暴的行为；可是这位喜怒无常的老太太只是笑笑罢了，并且好几次弄得管衣服女人非常难堪，她逼着她一再说明：例如，“他怎样用他那很重的手把你的头弯下去，”第二天她就赏了盖拉新一个银卢布，她认为他是一个忠心的、气力大的看守人，很赏识他。盖拉新倒很害怕她的女主人，可是他仍然盼望着她给他恩惠，他正打算去求她答应他跟塔季雅娜结婚。他只等着管家答应过他的那件新的长裾外衣，想打扮得干干净净去见太太，可是这位太太却突然想到把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了。

读者们现在容易明白加夫利洛在跟女主人谈过话以后为什么会感到为难了。他坐在窗前想着：“女主人不用说喜欢盖拉新（这一层加夫利洛倒是很清楚的，因此也很纵容他）。可是他究竟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东西。我可不能报告女主人说盖拉新爱上了塔季雅娜。而且这也是公平的，他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丈夫呢？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上帝饶恕我——树妖要是知道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他会把宅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捣毁的，一定的。你没法跟他讲道理；他这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①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对的！……”

卡皮统的出现打断了加夫利洛的思路。那个轻浮的鞋匠

① 加夫利洛认为自己提到魔鬼就有了罪。

走了进来,把两只手搁在背后,很随便地靠在门旁一个突出的墙角,右腿架在左腿的前面,摇晃着头,仿佛在说:“我在这儿。您有什么事?”

加夫利洛望着卡皮统,一面拿手指敲窗台。卡皮统不过把他那沉浑无光的眼睛稍微眯细一点,他并没有低下它们。他居然微微地笑了起来,还伸手去抚摩他那朝四面八方竖起来的带白色的头发,仿佛又在说:“喂,是的,我,我啊。你在看什么?”

“你倒好,”加夫利洛说,他又不作声了。“你倒好,没有什么说的!”

卡皮统只是扭扭他的瘦小的肩膀。“那么,请问,你比我更好吗?”他心里想道。

“哼,你看看你自己,哼,你看看,”加夫利洛带责备地往下说:“哼,看你自己像个什么?”

卡皮统从容地仔细看他那脱了线的破礼服和打补钉的裤子,他特别注意地看他那双穿了洞的靴子,尤其是他的右脚很文雅地放在靴头上的那一只,然后他又把他的眼光停留在管家的脸上。

“先生,什么事?”

“先生,什么事?”加夫利洛跟着他说。“先生,什么事?你还说:先生什么事?你简直像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你就像那个样子。”

卡皮统很快地眨着眼睛。

“你咒骂,你咒骂,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心里想道。

“不用说，你又喝过酒了，”加夫利洛说，“你又喝过酒吗？嗯？喂，回答我。”

“我因为身体弱的关系，的确喝了含得有酒精的饮料，”卡皮统答道。

“因为身体弱的关系！……你鞭子挨得太少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还在彼得堡做过学徒……你学到的真多！你就只是白吃面包不做事。”

“讲到这件事情，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我就只有一个审判官：那就是上帝，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只有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我是不是白吃面包。至于您对我喝醉酒的看法，我觉得讲到那件事情，我也不错，倒不如说是我一个朋友的错；他引诱我喝上了酒，就扔下我，一个人走了，可是我……”

“你就像鹅一样地给扔在街上了。啊，你这个放荡的家伙！啊，现在的事情倒不是这个，”管家继续说下去，“却是这样的事。太太……”说到这儿他又停了一下，“太太高兴要你讨老婆。听见吗？她以为你讨了老婆就可以安份了。你明白吗？”

“我怎样会不明白呢，先生。”

“嗯，好的。照我看，还是揍你一顿好些。嗯，不过那是太太的事情。怎么样？你同意吗？”

卡皮统露出牙齿笑了笑。

“讨老婆，对男人说，是一桩很好的事，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至于我呢，在我这方面，我是非常满意的。”

“嗯，好的，”加夫利洛答道；他一面在心里暗想：“不用说，这个家伙倒讲得很对。”他接着大声说：“只是有一桩事，新娘子挑得不合适。”

“那么她是谁呢，请宽恕我多问……”

“塔季雅娜。”

“塔季雅娜？”

卡皮统睁大了眼睛，离开墙角走出来一点。

“你为什么这样吃惊？难道她不中你的意？”

“怎么不中我的意，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这个姑娘是没有说的，她是个工作勤劳、性情温和的好姑娘……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那个树妖，那个草原的妖精看上了她，您知道……”

“我知道，伙计，我全知道，”管家烦恼地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知道……”

“啊，上帝保佑啊，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会杀死我的，我敢说他会的，他会像打死苍蝇一样地打死我。啊，他有手，只消请您看看他的手是怎样的手啊；这简直是米宁和波查尔斯基[①] 的手。他是一个聋子，他打起人来自己却听不见！他挥舞他的大拳头，就好像他在做梦一样。简直不可能阻止他；为什么呢？因为您自己知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是个聋子，而且他蠢得像脚后跟一样。您看，他还是一种野兽，

① 米宁和波查尔斯基：前者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市民；后者为亲王，一六一二年他们领导俄国人民抵抗波兰军队的侵略，并将波军逐出俄境。

一个邪教的偶像，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比邪教的偶像还要坏……他是一块白杨木头！为什么我现在应该受他欺负呢？自然，我现在已经毫不在意了：我变得柔顺了，我学会忍耐了，我在自己身上涂了油，就像一个发亮的科隆纳[1]的水罐，——可是我究竟是一个人，无论如何，我实在不是一个不值钱的水罐。"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多讲下去了……"

"主，我的上帝啊！"鞋匠热烈地接着说下去，"末日在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啊，主啊！我是个可怜人，一个悲惨的可怜人！这是命运，我的命运啊，您想想看！在小时候我挨惯了德国师傅的打，长大了又挨同胞们的打，最后在壮年时期，您看又要弄到什么样的结果……"

"呸，你这个软弱不中用的家伙，"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说。"你为什么只顾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真是！"

"你讲'为什么'吗？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我并不害怕挨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要是碰到一位老爷，他可以关起门打我，不过在人面前还得跟我打招呼，我究竟还算是一个人啦，可是现在我碰到的是什么人呢……"

"喂，不要讲了，"加夫利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克里莫夫掉转身子，慢慢地走了。

"喂，要是他那方面没有问题，"管家还在后面大声问道，"你本人答应吗？"

---

① 科隆纳(城)：位于莫斯科河岸，属莫斯科省。

"我完全同意,"卡皮统答道,就走出去了。

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没有失掉他的口才。

管家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

"好吧,现在把塔季雅娜叫来,"他最后说。

不多久,塔季雅娜就静悄悄地来了,她站在房门口。

"您有什么吩咐,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她小声地说。

管家注意地望着她。

"喂,"他说,"塔纽沙①,你愿意嫁人吗?太太给你找到了一个新郎。"

"知道,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她又吞吞吐吐地加了一句:"她给我挑的新郎是谁呢?"

"卡皮统,那个鞋匠。"

"知道,先生。"

"他是一个荒唐的人,那倒是事实。不过在这方面太太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

"知道了,先生。"

"可是还有一桩麻烦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聋子盖拉新爱上了你。你究竟是怎样地迷住了那头熊的?可是你知道,他要杀死你,恐怕他会的,他这样的一头熊。"

"他会杀死我,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他一定会杀死我。"

"他会杀死你。……哼,我们等着瞧罢。你怎么说:他会杀死你。难道他有权杀死你吗?你自己判断一下吧。"

---

① 塔纽沙:塔季雅娜的爱称。

“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

“你是个怎样的女人啊！我想你总没有允许过他什么吧……”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先生？”

管家停了一会儿，心里想：“你真是个柔顺的女人！”

“嗯，好的，”他大声说：“我以后再跟你谈这桩事，现在你走罢，塔纽沙；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个肯听话的女人。”

塔季雅娜掉转身子，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就走出去了。

“说不定太太明天就会忘记这桩亲事，”管家想道，“为什么我这样担心呢？我们把这个坏蛋绑起来；要是他闹出什么事情，我们就报告警察……”

“乌斯季尼雅·费约多罗夫娜，”他大声唤他的妻子道，“把小茶炊预备好，我的好女人。”

这一天塔季雅娜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起先她哭了一阵，随后揩干眼泪，又跟先前一样地做工作了。

卡皮统和一个面貌阴沉的朋友在酒馆里一直坐到夜深，他对那个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从前跟一位老爷同住在彼得堡，那位老爷什么都比人强，只是他爱守秩序，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太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呢，凡是勾引女人的本领，他都有。……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只是点头答应；可是等到后来卡皮统声明他由于某种情况必须在明天自杀的时候，他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才注意到应当回去睡觉了。他们

就闷声不响地分别了。

同时，管家的指望并没有成为事实。太太非常惦记卡皮统的婚事，她甚至在夜里跟她的一个陪伴女人[①]就只谈这桩事情，这种陪伴女人是她养着专门在她夜里失眠的时候陪伴她的，她们同值夜班的车夫一样在白天睡觉。第二天早茶以后加夫利洛进去见她报告家务的时候，她的第一句问话就是："我们那桩婚事怎样了？"他自然回答说，进行得很好，卡皮统今天要来见她谢谢她的恩典。太太身体不大好：料理事情并不久。管家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召开了一个会。这桩事的确需要特别的考虑。塔季雅娜自然不反对，可是卡皮统当着众人表示，他只有一个脑袋，并没有两个、三个……盖拉新凶恶地、迅速地轮流望着每一个人，不肯离开女用人房间的台阶，他好像已经猜到了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大家聚在一块儿商量（他们里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伺候吃饭的用人绰号"尾巴叔叔"的，大家总是带着敬意地找他出主意，虽然他老是回答他们："有个办法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议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为着安全起见，先把卡皮统锁在放滤水器的贮藏室里头，然后郑重地仔细考虑这桩事情。要用武力解决，自然很容易；可是上帝啊，这不行！要闹出事来，太太会不开心——那就该倒楣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又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他们有好多次看出来盖拉新很讨厌喝醉的人。……他坐在大门口，每次看见什么人

① 陪伴女人：参看第九三页注①。

喝得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帽檐盖在一边耳朵上面的时候，他总是生气地掉开头。他们便决定叫塔季雅娜假装喝醉，一偏一倒地走过盖拉新的面前。那个可怜的女人好久都不肯答应，可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她；而且她自己也看出来她只有用这个办法才可以摆脱那个爱她的人。她去了。他们把卡皮统从贮藏室里放了出来；因为这桩事究竟跟他有关系。盖拉新正坐在大门口的边石上，拿他的铁铲在地上戳来戳去。……每一个角落后面，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地望他……

这个诡计完全成功。盖拉新看见塔季雅娜，起先还是像往常那样一边发出怜爱的叫声，一边对她点头；然后他注意地望着她，丢开铁铲，跳起来，走到她跟前，把自己的脸挨近她的脸……她吓得摇晃得更厉害了，紧紧闭上了眼睛。……他捉住她的膀子，拉着她一块儿飞跑过这个大院子，一直跑进那间开会的屋子，把她推到卡皮统的身上去。塔季雅娜完全晕过去了。……盖拉新站在那儿，望着她，挥他的手，笑了笑，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他的顶楼去了。……整整一天一夜他都没有出来。马夫① 安季卜卡后来对人说，他从墙板缝里看见盖拉新坐在床上，一只手贴住脸颊，时时发出轻轻的有规律的叫声，他悲声哼着，那就是说，他把身子摇来摇去，闭着眼睛，晃着脑袋，往常车夫或者拉船人唱他们那种悲歌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安季卜卡害怕起来，他就离开墙板缝走了。盖拉

① 旧俄贵族的马车总是套四匹或六匹马（套成一排或两排等），有两个车夫，一个坐在台座上，另一个坐在前一排左边的马上。安季卜卡属后者。

新第二天走出了他的顶楼，他身上并没有现出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只是脸色更阴沉，而且完全不去注意塔季雅娜和卡皮统了。当天晚上，塔季雅娜和卡皮统每个人胳膊底下挟一只鹅一块儿到太太那儿去谢恩，①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结婚了。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盖拉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空着手从河边回来：他在路上不知道怎样把水桶弄破了；夜间他在马房里拚命洗擦马身，弄得那匹马像草给风吹着似地摇摆起来，在他的铁拳下面它有点站不稳了。

这一切都是春天里发生的事情。又一年过去了，这中间卡皮统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干什么事都不中用了，所以他得到吩咐带着妻子坐上大车，给遣送到遥远的乡村去了。在动身的那一天，他起初还鼓起很大的勇气，公开表示，不管他们把他遣送到哪里去，就是到乡下女人洗衬衫把捣衣杵放在天上的地方②，他也不会给毁掉的；可是后来他又颓丧起来，抱怨说他们把他送到未开化的人们中间去了，最后他萎靡到连自己的帽子也戴不上了。有个好心人把帽子扣在他的额上，对正了帽檐，从上面敲一下，把帽子给他戴稳了。等到一切都弄好了，乡下人已经把缰绳捏在手里只等着说出“上帝保佑”③ 便动身的时候，盖拉新从他的小屋子里出来，走到塔季雅娜跟前，送给她一方红棉布头巾做纪念品，这头巾还是他

① 指他们一同带了礼物去见太太，求太太为他们的结婚祝福。

② “就是走到世界的尽头”的意思。

③ “上帝保佑”：出发前应说的一句话。

在一年前为她买的[1]。塔季雅娜，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对她一生所遭遇的悲欢离合都是非常淡漠地忍受了的，可是到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淌了眼泪，她上车的时候，还照基督徒的礼节跟盖拉新接了三次吻。他原想把她一直送到城门口，而且起初还在她的车子旁边走了一会儿，可是走到克里米亚浅滩他忽然停了下来，挥了挥手，就顺着河边走去了。

时候快到黄昏。他望着河水，慢慢地向前走。他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岸边淤泥里面打滚。他俯下身子，看见一条带黑点子的白毛小狗，不管它怎样努力，它始终不能够爬到水外面来，它一直在挣扎、滑跌，它那个打湿了的瘦小身子抖得厉害。盖拉新望着这条不幸的小狗，用一只手把它抓起来，放在自己的怀里，大踏步走回家去。他走进自己的顶楼，把救起来的小狗放在床上，用他的厚厚的绒布外衣盖住它，先跑到马房去拿了些麦秸，然后到厨房去要了一小杯牛奶。他小心地摺起厚绒布外衣，铺开麦秸，又把牛奶放在床上。这条可怜的小狗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星期，它的眼睛睁开并不多久，看起来两只眼睛还不是一样的大小。它还不能够喝杯子里的东西，它只是在打颤，在眨眼睛。盖拉新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捉住它的脑袋，把它的小鼻子浸在牛奶里面。小狗突然贪馋地舐起来，一面吹吹鼻息，浑身打颤，而且时时呛着。盖拉新在旁边望着，望着，忽然笑了起来。……他整夜都在照应它，安排它睡觉，擦干它的身子，最后他自己也在它的旁边安静地、

① 当时的民间风俗，向姑娘求婚时须赠以一方红布手帕(或头帕)。

快乐地睡着了。

盖拉新看护他这个“养女”小心得超过任何一个看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小狗原来是一条母狗)。起初“她”很弱,很瘦,很丑,可是“她”渐渐地强壮起来,好看起来,靠了“她”的恩人不懈怠的照料,过了八个月的光景,“她”居然变成了一条很漂亮的西班牙种狗,有一对长耳朵,一条毛茸茸的喇叭形的尾巴,和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她”多情地依恋着盖拉新,从不离开他一步,总是摇着尾巴,跟在他后面。他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哑巴们都知道他们那种含糊不清的叫声常常引起别人对他们的注意,——他叫“她”作木木。宅子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她”,也叫“她”作小木木。“她”非常聪明,跟每个人都要好,可是“她”只爱盖拉新一个人。盖拉新疯狂地爱着“她”……他看见别人抚摩“她”,他就会不高兴:他是在替“她”担心,还是由于单纯的妒忌,这只有上帝知道!“她”常常在早上拉他的衣角叫醒他;“她”常常口里衔住缰绳把运水的老马牵到他跟前,“她”跟那匹老马处得十分和好;“她”常常脸上带着庄重的表情跟他一块儿到河边去;“她”常常看守着他的扫帚和铁铲,绝不让一个人走进他的顶楼去。他特地为“她”在他的房门上开了一个洞。“她”好像觉得只有在盖拉新的顶楼里“她”才是十足的女主人,所以“她”走进屋子,就马上带着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去。夜里“她”一直不睡,但也绝不像某种愚蠢的守门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叫,那种狗提起前脚坐着,鼻子朝天,眼睛眯细,只是为了无聊的缘故对着星星乱叫,而且总是连续地叫三回,——不!木木的细小声音从来不会无

缘无故地响起来：除非有生人走到篱笆跟前来，不然就是在什么地方有了可疑的响动，或者沙沙声。……一句话说完，“她”是一条很出色的看家狗。说实话，除了“她”以外院子里还有一条老公狗，“他”一身黄毛带着褐色的斑点，名字叫陀螺。可是“他”一直给铁链锁住，就是在夜里也不放松。而且“他”自己也因为太衰老了的缘故，完全不想争取自由了——“他”整天躺在“他”的狗窠里，身子蜷缩在一块儿，只是偶尔发出一声嘶哑的、几乎是无声的狗叫，而且“他”马上就把这叫声咽了下去，好像“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叫声并没有用处似的。木木从来不到太太的宅子里去，每逢盖拉新搬柴到上房各处去的时候，“她”总是留在后头，不耐烦地在台阶上等他，只要门里有一点轻微的声音，“她”便竖起耳朵，把脑袋忽左忽右地掉来转去。……

这样地又过了一年。盖拉新仍旧在担任他那个打扫院子的职务，而且非常满意他自己的命运，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在夏天里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太太和她那一群寄食女人[1]正在客厅里来回地闲踱着。她的兴致很好，她在笑，又在讲笑话；寄食女人们也在笑，也在讲笑话，不过她们并不觉得特别快乐。宅子里的人并不太喜欢看见太太高兴，因为在那个时候，第一，她要所有的人立刻而且完全跟她一样地高兴，倘使某一个人的脸上没有露出喜色，她就要

① 寄食女人：和陪伴女人相类似，都是靠阔亲戚生活的妇女，在贵族地主家里做些琐事，陪女主人玩和为她们解闷。

发脾气；第二，这种突然的高兴是不会久的，通常总是接着就变成一种阴郁不快的心情。在那一天她早上起身好像很吉利；弄纸牌的时候她拿到了四张“贾克”，这表示着“她的愿望可以实现”的兆头（她总是在早上用纸牌占卜她的运气），喝茶的时候她又觉得茶特别香，那个女用人因此得到了夸奖，而且还得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太太的起皱纹的嘴唇上带着甜蜜的微笑，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又走到了窗前。窗外便是花园①，就在花园正中那个花坛上面，一丛玫瑰底下，木木正躺在那儿仔细地啃一根骨头。太太看见了“她”。

“上帝啊！”她突然叫了起来，“这是什么狗啊？”

让太太问到的那个可怜的寄食女人慌张得不得了，一般处在寄食地位的人，遇到弄不清楚主人的叫喊有什么意思的时候，通常就有这种焦急不安的情形。

“我不……不……不知道，太太，”她结结巴巴地说，“好像是哑巴的狗。”

“上帝啊！它是一条漂亮的小狗啊！”太太打断了她的话。“叫人把它带到这儿来。他养了它好久吗？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看见它？……叫人把它带到这儿来。”

那个寄食女人马上就跑到前厅里去。

“来人啦，来人啦！”她大声嚷着。“把木木立刻带到这儿来！‘她’在花园里头。”

“那么‘她’的名字叫木木了，”太太说：“很好的名字。”

① 这里的“花园”其实是屋前种有花木的小庭院。

“啊，很好的，太太，”寄食女人回答道。“司捷潘，快去！”

司捷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的职务是跟班。听到吩咐，他马上跑到花园里去捉木木；可是“她”很敏捷地从他的手指中间滑脱了，“她”竖起尾巴，飞跑到盖拉新跟前去。盖拉新这时正在厨房里拍打水桶、抖落桶上的尘土，把水桶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就当它是一个小孩玩的小鼓一样。司捷潘在后面追“她”，就要在“她”的主人的脚跟前把“她”抓住了；可是这条机灵的狗不肯让生人的手捉住“她”，“她”一跳就逃掉了。盖拉新带了微笑看这一切的纷扰；最后司捷潘恼怒地站起来，连忙做手势对他解释明白，说：太太吩咐把你的狗带到她那儿去。盖拉新有点吃惊，可是他唤着木木，把“她”从地上抱起来，交给司捷潘。司捷潘把“她”带到客厅里去，放在镶木地板上。太太用亲切的声音唤“她”到她身边去。木木一辈子没有到过这么富丽堂皇的房间，因此惊惶得不得了，“她”回头就朝门口跑去，可是让那个会拍马屁的司捷潘赶了回来，“她”颤抖着，紧紧地挨着墙壁。

“木木，木木，到我这儿来，到太太这儿来，”女主人说，“来，蠢东西……不要害怕……”

“来，来，木木，到太太这儿来，”那些寄食女人也都跟着说，“来啊。”

木木张皇不安地朝四面看了看，“她”并不动一下。

“给‘她’拿点吃的东西来，”太太说。“‘她’多蠢啊！‘她’不肯到太太这儿来。怕什么呢？”

“‘她’还不习惯，怕生，”一个寄食女人鼓起勇气用了胆怯

的、柔顺的声调说。

司捷潘拿来一小碟牛奶，放在木木面前。可是木木连闻也不闻一下，“她”仍旧像先前那样地在打颤，在朝四面看。

“啊，你是个怎样的东西啊！”太太说，她走到“她”跟前，弯下身去，正要抚摩“她”，可是木木猝然掉转头来，露出“她”的牙齿。太太连忙缩回了她的手。

接着是一阵短时间的沉默。木木轻微地哀声叫着，好像“她”在诉苦，而且在请求原谅似的。……太太皱着眉头，走开了。狗的突然的动作吓坏了她。

“呀！”屋子里所有的寄食女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她’没有咬着您罢，但愿没有这样的事！”（木木一辈子从没有咬过任何人。）“呀，呀！”

“把‘她’带出去，”老太太改变了声调说。“讨厌的小狗，‘她’多坏啊！”

她慢慢地掉转身子，朝她的内房走去。寄食女人们胆怯地互相望着，她们正要跟随她去，可是她却站住了，冷冷地望着她们，说：“你们这是为着什么？我并没有叫你们。”她就走出去了。

那些寄食女人垂头丧气地朝司捷潘挥手；他抓起木木，尽快地把“她”往门外一丢，正巧丢在盖拉新的脚跟前；半点钟以后，宅子里就非常清静了，老太太坐在她的沙发上，脸色比打雷时候的浓云还要阴沉。

大家想想看，这样小的事情，有时候也能够弄得人神经失常的！

太太一直到晚上都不快活，她不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打牌，她一夜都不舒服。她觉得她们给她用的花露水并不是平常给她的那一种，而且她的枕头有肥皂的气味，她叫那个管衣服女人把所有的被褥床单都闻过一遍，——总之她心里烦，而且气得不得了。第二天早上她叫人去通知加夫利洛比往常早一个钟头来见她。

“请你告诉我，”等到加夫利洛心里慌慌张张地跨进她内房门槛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在我们院子里叫了一整夜的是什么狗？它弄得我一夜不能睡！”

“一条狗，太太……什么样的狗，太太，也许是那个哑巴的狗，太太，”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不知道这是哑巴的狗，还是别人的狗，只是它弄得我不能睡觉。我奇怪我们养那么大一大群狗做什么！我倒要问个明白。我们不是有一条守门狗吗？”

“是的，太太，我们有的，太太。陀螺，太太。”

“那么，为什么还要多的呢，我们还要更多的狗做什么？只是增加纷扰罢了。宅子里没有管事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哑巴养狗干什么？谁准许他在我的院子里养狗？昨天我走到窗前，看见它躺在花园里头，它拖了什么东西进来在啃着——可是我的玫瑰花就种在那儿……”

太太停了一会儿。

“今天就把它弄走……听见吗？”

“听见了，太太。”

“就在今天。你现在就去。我以后会叫你来报告家务。”

加夫利洛走了。

管家走过客厅的时候，他为了维持秩序起见，把一个叫人铃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子上面；他偷偷地在大厅上擤了擤他那根鸭嘴鼻子里的鼻涕，然后走进前厅去。司捷潘正睡在前厅里一把长椅[1] 上；他睡着的样子倒很像战争图画中一个战死的军人：他那两只光腿从那件当作毯子盖在他身上的大衣底下伸出来。管家把他一推，小声地在他耳边吩咐了几句，司捷潘用半笑、半打呵欠来回答。管家走了，司捷潘从长椅上跳起来，穿上他的长裾外衣和靴子，走了出去，就站在台阶上。不到五分钟盖拉新来了，背上背了一大捆柴，身边跟着那个和他形影不离的木木（太太吩咐过她的睡房和内房就是在夏天也得生火）。盖拉新到了门前，就斜着身子，用肩膀推开了门，然后背着他那捆重东西摇摇晃晃地走进里头去了。木木像平常那样留在外面等他。司捷潘就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突然向“她”扑过去，像兀鹰抓小鸡似地，拿他的胸膛按“她”在地上，两只手抱起“她”来，抱在怀里，连帽子也不戴上，抱着“她”跑出了院子，碰到第一辆出租马车就坐上去。他一直坐到了家禽市场[2]。他在那儿很快地找到了一个买主，拿“她”卖了半个卢布，不过讲定买主至少得把“她”拴一个礼拜。他马上动身回家；可是还没有回到宅子，他就从马车上跳下来，绕过了院子，走到后面一条小巷，翻过篱笆跳进院里，因为

① 长椅：一种状似柜子，座位相当宽的长椅，作睡觉用。

② 家禽市场：以前莫斯科的一条主要大街，当时在那里曾有这样的市场。

他害怕打耳门[1] 进去，——怕的是碰见盖拉新。

然而司捷潘的担心倒是不必要的；盖拉新并不在院子里面。他从宅子里出来，马上发觉木木不见了；他从不记得“她”有过不在屋外等着他回来的事，于是他跑上跑下，到处去找“她”，用他自己的方法唤“她”。……他冲进他的顶楼，又冲到干草场，跑到街上，这儿那儿乱跑一阵。……“她”丢失了！他便回转来向别的用人询问，他做出非常失望的手势，向他们问起“她”来；他比着离地半俄尺的高度，又用手描出“她”的模样。……有几个人的确不知道木木的下落，他们只是摇摇头，别的人知道这回事情，就对他笑笑，算是回答了。管家做出非常严肃的神气，在大声教训马车夫。盖拉新便又跑出院子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从他那疲倦的样子，从他那摇摇不稳的脚步，从他那尘土满身的衣服上看来，谁都可以猜到他已经跑遍半个莫斯科了。他对着太太的窗子默默地站着，望了望台阶，六七个家奴正聚在那儿，他便掉转身子，口里还叫了一次“木木”。没有木木的应声。他走开了。大家都在后面望他，可是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讲一句话。……第二天早上那个爱管闲事的马夫安季卜卡在厨房里讲出来，说哑巴呻吟了一整夜。

第二天盖拉新整天没有出来，所以马车夫波塔卜不得不代替他出去运水，这桩事情是马车夫波塔卜很不高兴做的。

[1] 耳门：装在大门上的耳门或边门。

太太问过加夫利洛，她的命令是不是已经执行了。加夫利洛答道已经执行了。下一天早上盖拉新从他的顶楼里出来，照常地做他的工作。他回来吃中饭，吃完中饭，又出去了，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他的脸色一向是呆板的，所有的聋哑人都是这样，现在他的脸好像完全变成石头的了。吃过中饭以后，他又走出院子去，可是不多久就回来了，他立刻上干草场。

夜来了，是一个清朗的月夜，盖拉新躺在那儿，唉声叹气，不停地翻身，忽然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他的衣角；他吃了一惊，然而他并不抬起头来，而且他还把眼睛眯紧些，可是什么东西又在拉他的衣角，而且这一次拉得更用力；他跳了起来……木木就在他面前，颈项上还系着一节绳子，“她”在他跟前直打转。一个拖长的喜悦的叫声从他那哑巴的胸中发出来。他捉住木木，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一口气在舐他的鼻子、眼睛、唇髭和胡子。……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小心地从干草堆上爬下来，朝四面看了看，他确定了并没有人看见他以后，平安地回到了他的顶楼。在这以前盖拉新已经猜到他的狗并不是自己走失的，一定是太太叫人捉走了；仆人们做手势对他说明，他的木木向太太咬过，这时他决定使用他自己的处置办法。起初他喂了木木一点面包，把“她”爱抚了一会儿，放“她”到床上去，然后想着他怎样可以把“她”藏得更好；他花了一整夜的工夫想这桩事情。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整天留在顶楼里面，他只是偶尔进去看看“她”，夜里才把“她”带出来。他用他那件旧的厚绒布外衣把门上开的洞严严地塞住，天才刚刚亮，他就已经在院子里了，好像并没

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他甚至于保留着（天真的狡猾啊！）脸上那种忧郁的表情。这个可怜的聋子连想也不会想到，木木会拿“她”的叫声把自己暴露出来：事实上宅子里所有的人很快地就全知道哑巴的狗已经回来，给关在他的顶楼里面了，不过因为他们同情他，也同情“她”，而且或许一半也因为他们害怕他的缘故，他们并不让他知道他们已经发见了他的秘密。只有管家一个人搔着他的后脑勺，摇着手，好像在说：“嗯，上帝跟他同在！也许太太不会知道的！”不过哑巴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热心地劳动过：他把整个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小草拔得一根也不留，又用自己的手把花园篱笆上面的柱子一根一根地拔起来，看看它们够不够结实，随后又用手把它们敲进去，——一句话说完，他奔跑、劳动得那么起劲，连太太也注意到他的勤快了。在这一天中间，盖拉新两次偷偷地去看他的囚徒[①]；天黑了以后，他便跟“她”一块儿躺下来睡觉，就在他的顶楼里面，不是在干草场内，只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中间的时候，他才带“她”出来在新鲜空气中散步一阵。他跟“她”一块儿在院子里走得相当久了，他正打算转身回去，突然间就在篱笆背后，从巷子那一面传过来一种沙沙的声音。木木竖起耳朵，叫起来，“她”走到篱笆跟前，闻了一闻，便发出了响亮的刺耳的叫声。原来有一个喝醉的人正想在那儿躺下睡过这一夜。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太太正发过了一阵相当长久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刚刚睡着了：她这种紧张的毛病每逢她晚饭

① 囚徒：指木木。

吃得太饱的时候就会发作一回。突然的狗叫把她惊醒了，她的心卜卜地跳着，它就要停止跳动了。

“丫头，丫头！”她呻吟道。“丫头！”

那些吓坏了的女仆跑进她的卧室里来。

“哦，哦，我要死啦！”她说着，痛苦地举起她的两只手。“又，又是那条狗。去请医生来，他们要把我杀死了……狗，又是狗！ 哦。”她把头朝后倒下去，这应当是晕倒的表示了。

人们连忙跑去请医生，这就是说，去请家医哈利统。这个郎中的全部本领就在于穿软底靴；他摸脉很慎重；他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睡去十四个钟头，在剩下来的时间里他老是在叹气，而且不断地让太太服月桂水。——这个郎中立刻跑来了，他用烧焦的鸟毛熏屋子①，等到太太睁开了眼睛，他马上端给她一杯圣水，这是用小玻璃杯盛着，放在银茶盘上面的。太太喝了圣水，马上又用含泪的声调抱怨狗，抱怨加夫利洛，抱怨自己的命运，她诉苦道，她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大家都抛弃了她，没有一个人可怜她，大家都希望她死。这些时候那个不幸的木木一直在叫着，盖拉新要引“她”从篱笆那儿走开，也没有办法。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又来啦，”太太呻吟道，她的眼珠又在朝上翻了。

郎中跟一个女仆小声地讲了几句话，她立刻跑到前厅去，摇醒了司捷潘，司捷潘又跑去叫醒加夫利洛，加夫利洛一生

① 旧时俄国民间一种救治晕倒者的方法。

气，就吩咐把整个宅子里的人都叫了起来。

盖拉新正转过身，他看见窗里亮光和影子在移动，感觉到祸事要来了，便把木木挟在胳膊底下，跑进了他的顶楼，锁上了门。几分钟以后，五个人来捶他的房门，可是他们觉得有门闩抵住，也就停止了。加夫利洛慌慌忙忙地跑了上来，吩咐他们全在门口等着，一直守到天亮；他自己却跑到女仆室去，叫那个年纪最大的陪伴女人柳包芙·柳比莫夫娜(他常常跟她一块儿偷茶叶、糖和别的杂货①，还造假帐)代他回禀太太说，不幸那条狗又从什么地方跑回来了，不过"她"不会活到明天的，请太太开恩不要动气，请她安静下来。太太本来也许不会这样快就安静下来，可是郎中在忙乱中把原定的十二滴月桂水弄成整整的四十滴让她喝下去了；月桂水的药性发生了效力——过了一刻钟太太又稳又熟地睡着了；盖拉新脸色惨白地躺在他的床上，紧紧地捂住木木的嘴巴。

第二天早上太太醒得相当迟。加夫利洛等着她醒来，好发命令向盖拉新的掩蔽部作决定性的进攻，同时他又准备着自己去忍受那一阵大雷雨②。可是雷雨并没有来。太太躺在床上叫人把那个年纪最大的寄食女人③找了去。

"柳包芙·柳比莫夫娜，"她用了又轻又弱的声音说；她有时候喜欢装作一个受压迫的、无依无靠的苦命人的样子；不用

① 杂货：这里指可作食物用的面粉、白糖等。

② 指挨太太的痛骂。

③ 前面说柳包芙是陪伴女人，这里说她是寄食女人，可见二者是一类人物。但寄食女人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在白天睡觉，夜里陪女主人闲谈解闷。

说，在那种时候宅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了，“柳包芙·柳比莫夫娜，您看看我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我的亲人，您到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那儿去，跟他讲一下：难道在他眼里随便一条恶狗都比他女主人的安宁，他女主人的性命更宝贵吗？我不愿意相信这个，”她又露出感动的表情添上了后面的一句话。“您去罢，我的亲人，请您做点好事，到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那儿去一趟。”

柳包芙·柳比莫夫娜到加夫利洛的屋子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话，可是过了不多久，就有一大群人走过院子，朝着盖拉新的顶楼的方向走去；加夫利洛走在前头，虽然这时并没有起风，他却拿一只手按住他的帽子；他的旁边便是跟班和厨子；尾巴叔叔站在窗里朝外面望，他在发号施令，这就是说，他不过举举手罢了；最后是一群小孩，他们一路上跳着，做鬼脸，他们里头有一半是从外面跑进来的生人。在那一段通到顶楼去的窄楼梯上坐着一个守卫；还有两个拿木棍的站在门口。他们开始走上楼梯，把楼梯全堵住了。加夫利洛走到房门口，用拳头敲门，大声叫着：

“开门！”

听得见轻微的狗叫声；可是没有人答话。

“我叫你开门！”他又说一遍。

“喂，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司捷潘在下面提醒他说，“您知道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所有的人全笑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加夫利洛在上面反问道。

“啊，他房门上有一个眼，”司捷潘答道，“您可以把棍子插进去动它几下。”

加夫利洛弯下身去。

“他用了厚绒布外衣一类的东西把眼堵上了。”

“那么您把厚绒布外衣朝里推进去。”

这时候又听见了不响亮的狗叫声。

“听，听，[①] ‘她’自己泄露出来了，”人丛中有人这样说，他们又笑了。

加夫利洛搔他的耳朵后面。

“不，兄弟，”他后来接着说，“要是你愿意，你自己来把那件厚绒布外衣推进去。”

“好，我就照办。”

司捷潘就爬了上去，拿起木棍，把厚绒布外衣推进去了，他又把木棍放在洞里动了几下，接连地说：“出来罢，出来罢！”他还在拨动棍子，顶楼的门忽然一下子打开了。这一群仆人立刻连跳带滚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加夫利洛跑在最前头。尾巴叔叔关上了窗子。

“喂，喂，喂，喂，”加夫利洛在院子里嚷着，“你不要莽撞啊！”

盖拉新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那一群人就挤在楼梯脚下。盖拉新把两只胳膊轻轻地叉在腰上，从上面望着所有这些穿德国长裾外衣的渺小的人。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农人衬

① 按原文直译是“看，看”。但这里不是看，而是唤起大家注意的意思。

衫，在他们面前他简直是一个巨人。加夫利洛向前走了一步。

“当心啊，兄弟，”他说，“我不让你胡闹。”

他接着就用手势对盖拉新解释，他说：太太一定要你的狗；你得马上把“她”交出去，不然你就该倒楣。

盖拉新望着他，指了一下狗，又用手在他自己的颈项上做了一个记号，好像他在拉紧一个活结似的，然后他带着探问的脸色看了看管家。

“对，对，”管家点头答道，“对，一定要。”

盖拉新埋下了眼睛，忽然挺起身子，又指了指木木，木木一直站在他身边，天真地摇着尾巴，好奇地耸动耳朵。接着他又在自己的颈项上做了一个勒的手势，而且含有意义地拍拍自己的胸膛，好像在对大家表示，他要自己担任弄死木木的工作。

“你会骗我们，”加夫利洛摇着手答复他。

盖拉新望着他，轻蔑地笑了笑，又拍一下自己的胸膛，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大家不做声地互相望着。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加夫利洛开口说。“这是什么意思？”

“让他去罢，加夫利洛·安得列伊奇，”司捷潘说。“要是他答应了，他就会做的。他一向就是那样的。……既然他已经答应，那就算数了。在这方面他可跟我们这班人不一样，他说真就是真。是的。”

大家都点着头，跟着说：“是的。是这样的，是的。”

尾巴叔叔开了窗，他也说："是的。"

"好的，也许是这样，我们等着看罢，"加夫利洛答道。"不过，无论怎样，我们还是不要撤去守卫。喂，你，叶罗希卡！"后面这一句是对那个穿黄色粗棉布宽上衣[①] 的脸色惨白的人说的，那个人在宅子里算是一个园丁。"你可以干什么呢？你拿一根棍子，坐在这儿，要是出了事情，你马上跑来找我！"

叶罗希卡拿了一根棍子，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人散了，只剩下几个爱管闲事的人同顽皮小孩；加夫利洛也回屋去了，他叫柳包芙·柳比莫夫娜代他回禀太太说，一切都弄好了，必要的时候他会差马夫去找警察来。太太在她的手帕上打了一个结，洒了点花露水，拿着它闻了闻，擦了擦她的太阳穴，又喝了茶，因为月桂水的药性还没有消除，她又睡去了。

在这一切骚扰过去以后的一个钟头，顶楼的门开了，盖拉新出来了。他穿了那件过节穿的长裾外衣，用一根绳子牵着木木。叶罗希卡连忙避开在一边，让他走过。盖拉新朝着大门走去。那些小孩同所有正在院子里的人都静悄悄地盯着他。他连头也不掉一下，到了街上才戴上了帽子。加夫利洛就差这个叶罗希卡跟着他，执行侦探的职务。叶罗希卡远远地看见盖拉新带着狗走进一家饮食店去了，他守在外面等候他出来。

盖拉新跟店里的人很熟，他们都懂他的手势。他叫了一份带肉的白菜汤，就坐下来，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木木站

① 宽上衣：这是一种没有纽扣、直领子的哥萨克式宽上衣。

在他的椅子旁边，用“她”那对聪明的眼睛安静地望着他。“她”身上的毛在发亮；看得出“她”是最近让人梳洗过的。盖拉新叫的白菜汤端上来了。他撕碎面包放在汤里，又把肉切成小块，然后把汤盆放在地上。木木照平常那样文雅地吃着，“她”的嘴只轻轻地挨到“她”吃的东西；盖拉新把“她”看了许久；两颗大的眼泪突然从他的眼睛里落下来：一颗落在狗的倾斜的额上，另一颗落在白菜汤里面。他拿自己的手遮了脸。木木吃了半盆，就走开了，还舐舐自己的嘴唇。盖拉新站起来，付了汤钱，走出去了，茶房用了带点疑虑的眼光望着他出去。叶罗希卡看见了盖拉新，连忙躲在角落里，让他走了过去，自己却在后面跟着他。

盖拉新不慌不忙地走着，仍然用绳子牵着木木。他走到街角，就站住了，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接着他忽然迈着快步子朝克里米亚浅滩对直走去。在路上他走进一所宅子的院子，那儿正在修建厢房，他从那儿拿走两块砖挟在胳膊底下。到了克里米亚浅滩，他又拐弯儿顺着岸边走去。他走到一个地方，那儿有两只带桨的小船拴在桩上(他以前就注意到了)，他带着木木一块儿跳到一只小船上面。一个瘸腿的小老头儿从菜园角一间小屋里出来，在后面叫他。可是盖拉新只点点头，那么使劲地摇起桨来，虽说是逆流，但一会儿的工夫他就冲到一百俄丈以外去了。老头儿站着，站着，用手搔自己的背，起初用左手，后来又用右手，随后就一颠一跛地回到小屋去了。

可是盖拉新一直朝前划着。莫斯科已经落在他的后面

了。两边岸上展开了一片的草地、菜园、田地、林子，农家小屋也出现了。农村的气息也闻到了。他丢开桨朝着木木俯下头去，木木正坐在他前面一块干的坐板上(船底积满了水)，动也不动一下，他把他那两只力气很大的手交叉地放在"她"的背上。在这时候，浪渐渐地把小船朝城市的方向冲回去。后来盖拉新很快地挺起身子，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了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她"。……"她"信任地而且没有一点恐惧地回看他，轻轻地摇着尾巴。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盖拉新什么也听不见——他听不见木木落下去时候的尖声哀叫，也听不见那一下很响的溅水声；对于他，最热闹的白天也是静寂无声的，正如对于我们最清静的夜晚也并非没有声音一样。等他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微波照旧一个追一个地在水面上急急滚动；它们照旧地碰在船舷上飞溅开去，只有在后面远远地一些大的水圈逐渐在扩大，一直到了岸边。

叶罗希卡看不见盖拉新的时候，连忙赶回宅子去报告他所见到的一切。

"嗯，不错，"司捷潘说，"他要淹死'她'。现在可以放心了。要是他答应了……"

这一天整天没有人见到盖拉新。他没有在家里吃中饭。天黑了，大家在一块儿吃晚饭，只少了他一个人。

"盖拉新这个人多古怪啊！"一个肥胖的洗衣女人尖声说，"为了一条狗居然弄得这样昏头昏脑！……真是这样！"

“可是盖拉新倒回来过!”司捷潘正在拿调羹刮着粥,忽然大声说。

“怎么样?什么时候?”

“大概在两个钟头以前罢。他的确回来过。我在门口碰见他;他又走出去了,他从院子里出去的。我正想问他那条狗怎样了,可是我看得出他心里不高兴。喂,他推了我一下;他大概只是想叫我站开罢,就像在说:‘不要粘住我!’一样,——可是他在我的背脊上这么厉害地一拍,这么重的一下——哎唷,哎唷,哎唷!”司捷潘不由得笑起来,他耸了耸肩膀,摸了摸后脑勺。“不错,”他又接下去说,“他那只手多厉害啊,真是没有说的。”

大家都在笑司捷潘。他们吃过晚饭以后都散去睡觉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巨人,肩头扛了一个背包,手里捏着一根长棍,急切地、不停步地顺着特——公路走去。这就是盖拉新。他只顾急急忙忙地走着,也不朝两旁看一眼,他急急忙忙地走回家去,走回自己的村子里去,走回他的家乡去。他淹死了可怜的木木以后,连忙跑回他的顶楼上去,匆匆地收拾了一点东西用一块旧马衣包起来,弄成一个小包裹,扛在自己的肩头,就这样地准备妥当上路了。他让人带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很小心地记住了路,太太把他从那儿带走的村子离开公路有二十五俄里。他带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一种交织着绝望与快乐的决心在公路上走着。他大踏步地向前走,胸口大敞开,两只眼睛热切地对直朝前面望。他走得急急忙忙,好像他的老母亲在家乡等着他一样,好像他长期在异

乡里陌生人中间流浪以后，他的母亲现在唤他回到她跟前去一样。……刚刚来到的夏天的夜是静寂而温暖的；这一切，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天边仍旧现着白色，而且让落霞[1]染上了一抹浅红；那一边，青灰色的暮霭已经升起来了。夜就是从那儿来的。鹌鹑成百地在四周噪鸣，秧鸡竞赛似地彼此叫唤。……盖拉新听不见这些声音，他也听不见树木的极微妙的夜语（他正迈着他那结实有力的脚走过树旁），可是他闻到了他闻惯的熟了的黑麦香，这是从那些黑黑的田地上飘送过来的。他觉得迎面吹来的风——这是家乡的风——亲热地打他的脸，玩弄他的头发和胡须；他看见眼前这条闪着白光的路一直向他的家乡伸出去，直得像一支箭一样；他看见天上无数的星星照亮他的路，他好像一头雄狮，强壮地、勇敢地踏着大步走去，所以等到初升的太阳拿它那带水气的红光照着这个强壮的行人的时候，他跟莫斯科的中间已经隔了三十五俄里了。……

两天以后他已经到家，在他自己的小屋里了，这使得从前搬到那儿住下来的兵的老婆[2] 大吃一惊。他在圣像面前祷告了以后，马上就去找村长。村长起先也很惊讶；可是正巧逢着割草的季节，盖拉新又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他们马上塞了一把镰刀在他的手里；他便照从前那样地割草去了，他割得那么起劲，农人们看见他挥镰刀割草和堆草的情形，着实地吓了

① 原文是“逝去了的白天的最后的返照。”

② 当时服兵役的期限很长，所以兵士的妻子由全村照顾。不服从主人命令的农奴也常被送去服兵役。

一跳。……

可是在莫斯科，盖拉新逃走的第二天，他们才发觉了这桩事情。他们到他的顶楼上去，搜查了一通，便去报告加夫利洛。加夫利洛来了，看了一看，耸了耸肩膀，便断定那个哑巴不是逃走，就是跟他那条愚蠢的狗一块儿投河自尽了。他们通知了警察，也报告了太太。太太动了怒，气得哭起来，她吩咐他们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到，并且声明，她从没有命令他们把那条狗弄死。到后来加夫利洛让她骂得没有办法，整天不做事情，只是摇着头，说："好罢！"后来尾巴叔叔也对他说："好——罢！"这样才把他弄清醒了。最后从乡下传来了盖拉新住在那儿的消息，太太才稍微安心；起初她还发出命令，要人马上把他带回莫斯科来，可是后来她又说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对她毫无用处。而且这桩事情过去不久，她自己也去世了。她那些继承人没有工夫想到盖拉新身上去：他们把母亲留下的其余的家奴都遣散了，准许那些人缴纳年租赎回自由。

盖拉新一直活到现在，都是一个光人，住在他自己那间小屋里面；他跟从前一样地健康、力气大，跟从前一样地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而且跟从前一样地严肃、稳重。可是他的邻人们看出来：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跟女人来往，他连看她们一眼也不肯，而且他绝不养狗。农人们谈论说："他不需要女人，这倒是他的运气；可是狗呢——他要狗来做什么？你拿绳子拴在小偷的颈项上也把小偷拖不进他的院子去！"关于那个哑巴的大力士一般的力气的传说就是这样。

译 后 记

这本小书是根据英国 C. Garnett 夫人的译文，对照着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版《屠格涅夫选集》中的《木木》翻译出来的。原文在一八五二年写成，当时屠格涅夫因为一篇纪念果戈理的文章，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在彼得堡的警察局里关了一个月（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他的囚房隔壁便是"犯了罪"的农奴们受笞刑的屋子。他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写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木木》。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盖拉新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看门人哑子安得烈。太太就是瓦尔瓦拉。

《木木》发表在一八五四年的《现代人》第三册上。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加莱尔（T. Carlyre, 1795—1881）说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 Galsworthy, 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 Herzen, 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

——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1]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

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逝世,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一九五二年一月

① 汤姆叔叔:美国小说家司妥夫人(H.E.Stowe,1811—1896)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

普宁与巴布林

彼得·彼得罗维奇·布的故事

〔俄〕屠格涅夫 著

《普宁与巴布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三年三月再版。

……我现在又老又病，因而时时刻刻想到死，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灵的眼睛也极少向后回顾。只有偶尔在冬天我静静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的时候，或者在夏天我慢慢地在阴凉的林荫路上散步的时候，我才记起那些逝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事情，消失了的人物；然而当时吸引住我的思想的并不是我一生中成熟的时期，也不是我的青春时期。我的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最早的童年或者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些日子。现在我就回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自己在乡下，在我那个严厉易怒的祖母的宅子里，我只有十二岁，并且还有两个人的面貌在我的想象中现出来……

不过我要依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我的故事。

一

一八三〇年

老用人菲里培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打着蔷薇

花式的领结，紧紧闭住嘴“为了怕人闻到他的口臭”，一小簇灰白头发在前额正当中凸出来，他走进屋子，鞠了一个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他本人在吗？”她问道。

“您问的什么？”菲里培奇胆怯地说。

“糊涂虫！那个送信的人——在吗？”

“是，在，在。……他坐在帐房里面。”

我祖母拨响她那串琥珀念珠。……“叫他到这儿来。”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你呢，少爷，好好地坐着。”

其实我坐在角落里她指定我坐的矮凳上面，完全没有动过。

我祖母把我管得非常紧！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黑黝黝的皮肤，高颧骨，麻脸，钩鼻，浓眉，眉毛下面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射出来安详的、忧戚的眼光。眼睛的颜色和表情跟他那张东方人的脸不相称。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长裾外衣。他站在门口，只把头点一下行了一个礼。

“你叫巴布林吗？”我祖母问道，她马上自言自语地添上一句法国话：“看样子是一个亚美尼亚人。”

“太太，正是这样，”那个人用低沉的平板的声音回答道。他刚听到我祖母说的那个不客气的“你”字的时候，眉毛微微颤动了两下。难道他还想祖母会客气地称呼他“您”吗？

“你是俄国人吗？是正教派[1]？”

“太太，正是这样。”

祖母取下眼镜把巴布林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将双手抄在背后。使我最感到兴趣的倒是他的胡子；胡子已经剃光了，可是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青的脸颊和下巴！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他的信里非常夸奖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为什么又离开了他那儿呢？”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格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另一种性格的……人？我不懂这个意思。”祖母又拨响她的念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信上又说，你有两种怪脾气。什么怪脾气呢？”

巴布林微微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怪脾气。要不是说我……不让用体刑。”

祖母感到惊奇了：

“难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用鞭子打你吗？”

巴布林的发黑的脸变得通红。

“太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定下一种规矩对待农人……不得用体刑。”

祖母更加惊奇了；她甚至举起两只手来。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把头稍微偏在一边，又注意地将

---

① 正教派：指属于东方神圣天主教教会的教徒。

巴布林看了一会儿。"那是你的规矩吗？嗯，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帐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你的字写得怎么样？"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不会有拼音的错误。"

"我倒不在乎这个。我以为要紧的是：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写现在那些带尾巴的新字体，我不喜欢那种字体。你还有一种怪脾气是什么呢？"

巴布林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咳嗽起来。

"也许……那位老爷说我不是一个人住着的吧。"

"你结过婚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

祖母皱了皱眉。

"有一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一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跟他就没有分开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他是你的亲戚？"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他对我的工作绝不会有妨碍，"巴布林连忙添了一句，好像他预料到会遇着我祖母的反对似的。"他花我的钱，跟我住一间屋子；他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不是恭维的话，实在是好的，并且他的道德也是可以作为模范的。"

祖母咬咬嘴唇，半闭着眼睛，听完了巴布林的话。

"他用你的钱吗？"

"用我的钱，太太。"

“你是为了慈善养他的吗?”

“这是为了公道……因为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真的吗?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是有钱人的义务。”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在我们这类人……”

“唔,得啦,得啦,很好,”祖母打断了他的话,她想了一会儿,又带着鼻音问他,这是她平日不满意时的一种表示,“那么他多大年纪,你养的那个人?”

“跟我同年,太太。”

“你那样的年纪?我以为他是你养大的呢。”

“完全不是,太太;他是我的同伴,并且……”

“得啦,”祖母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分明是一个博爱主义者。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对的;在你这样身份的人,那的确是很大的怪脾气。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我会跟你说清楚你得做些什么工作。至于工钱呢……”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掉转过来,对着我用法国话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去念你的神话学的功课去。”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并不是去念神话学,却只是到花园里去玩。

祖母庄子上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在一边的尽头处是一个活水池子,里面不仅有鲫鱼和鮈鱼,并且还出现过如今

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白鱼。在池子的上方是一丛浓密的柳林;再往高处去,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两边密密地长满了榛树、接骨木、忍冬、野茨,树下生着一簇一簇的石南和独活草。在那些灌木林中间有几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生满了碧绿的丝一样的细草,草丛中露出来各种各样的矮菌,用它们的淡红色、紫丁香色、稻草色的帽子把草地装饰得五颜六色,非常有趣,同时还有金凤花[①] 的金色小球发出来点点亮光。在那儿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山乌啸鸣,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我常常喜欢走进灌木茂林里去,在那儿有我所喜欢的隐秘的角落,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想。

我出了祖母的房间,便一直往这些角落中一个被我叫做"瑞士"的地方去,然而我还没有走到"瑞士"的时候,却从那个由半枯的枝子和鲜绿的枝叶编织成的细网里看出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找到这个地方了!这使我多么惊讶。那是一个身材很高、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人上衣,戴了一顶高的便帽,他正站在我最喜爱的那个地方!我悄悄地走近一些,仔细地看那张脸。它是我从未见过的,脸很长,而且很和善,上面生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根非常可笑的鼻子;那根鼻子拉长得像豆荚一样,垂在丰满的嘴唇上面;嘴唇时时颤动着,张开成一个圆圈,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来,同时

---

① 金凤花:俄文名"鸡盲"(куриная слепота)。是重瓣花,花朵大小及香味与黄蔷薇同。

他那双瘦得见骨的手挨近地平放在胸膛上，那些长长的指头画圆圈似地在急急转动着。有时候手不动了，嘴唇也不吹哨、不颤动了，头却向前俯下来，好像在倾听似的。我更走近一些，更加注意地凝望着。……这个陌生人的每只手里拿着一个浅口小杯，跟人们用来逗金丝雀引它们唱歌的杯子一样的东西。一根小树枝在我的脚下忽然发出声音来；陌生人吓了一跳，把他那两只昏暗不明的小眼睛掉过来，朝林子这边望一下，刚刚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碰上了一棵树，不觉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便站住了。

我走到空地里来。陌生人对我微笑。

“早安，”我说。

“早安，小少爷。”

我不高兴他叫我做“小少爷”，叫得那么亲密！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板起脸孔问道。

“啊，您看，”他仍旧带着微笑答道：“我逗小鸟儿唱歌。”他把他那两个小杯子指给我看。“燕雀们唱和得多好听！在您这样小的年纪，您一定喜欢小鸟儿的歌声吧？请您听一听；我一做声叫，它们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的——多够味儿！”

他便轻轻地碰他的小杯子，果然有一只燕雀从近处一棵山梨上回答地唱起来。陌生人不出声地笑着，向我递了一个眼色。

那种笑和那种眼色——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他那含糊的、无力的声音，他那弯曲的腿，他那瘦瘦的手，甚至他的便帽，他的农人穿的绒布长上衣——他的一切都叫人想到温和的天

性，天真与诙谐有趣的性情。

“您在这儿很久了吗?”我问道。

“今天才来。”

“那么您不是他说到的那个……”

“是巴布林先生跟太太讲过的吗？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您的同伴叫巴布林。您呢?”

“我叫普宁。普宁是我的姓；普宁。他是巴布林，我是普宁。”他又把他的小杯子弄响起来。“听，听燕雀唱歌。……它唱得多好啊!”

我突然“非常地”喜欢起这个怪人来了。我跟一般的男孩一样对陌生的人不是害怕就是骄傲，然而对这个人我却觉得好像多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似的。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那儿有一个长凳子，我们可以坐，我们还可以从那个地方望见堤。”

“好的，我们就走，”我这个新朋友用唱歌般的声音答道。

我让他在前面走。他走路时摇摇晃晃，脚擦着地，常常把头朝后仰。

我注意到他的上衣背后领子下面悬着一根小缨子。

“您那儿悬的是什么?”我问道。

“哪儿?”他反问道，一面伸手到后面领子上去摸索。“哈!这根小缨子吗？让它去吧。您知道，是缝在这儿做装饰的。并没有什么妨碍。”

我把他带到长凳那儿，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

“这儿真好！”他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真正好！你们这个花园真不错！啊，啊—啊！”

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

“您这顶帽子多古怪！”我不禁叫起来。“拿给我看看。”

“好的，小少爷，好的。”

他取下了帽子。我刚刚伸出手去接它，忽然一抬眼——就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普宁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在他那个光滑的白头皮包着的圆锥形头顶上面，简直看不见一根头发。

他伸起手在自己的头上一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他笑的时候，好像接不上气来一样，张大嘴，闭上眼睛，——并且前额上从上到下浮起了三条波浪似的皱纹。

“喂？”他终于说话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鸡蛋吗？”

“真正的，真正的鸡蛋！”我非常高兴地附和道。“您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很久了。我从前的头发多漂亮啊！——简直是金羊毛，就跟阿尔果① 的水手们跨过深海去寻找的一模一样。”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是幸亏我念过了神话学，我也知道阿尔果的水手们是些什么人；不过使我更惊奇的是听见这个穿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褴褛的人的嘴里吐出那个名字来。

---

① 阿尔果：据希腊神话，这是青年英雄耶松的船名。耶松带了五十名水手(都是古希腊英雄)乘阿尔果船航海去取金羊毛。

"我想,您念过神话学吧?"我问道,一面把他那顶便帽在我的手里翻来扭去。他的帽子是垫棉花的,镶边的皮子已经脱了毛,作帽檐的纸板也坏了。

"我研究过那个科目,我亲爱的小少爷;我这一生中什么事都花过相当功夫的!不过现在请您把我的遮头的东西还给我,我好用它来保护我的光头。"

他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他那稍微发白的眉毛向下一动,他便问我是什么人,并且谁是我的父母。

"我是这儿女主人的孙子,"我答道。"她就只有我一个亲人。爸爸和妈妈都死了。"

普宁当胸划了一个十字。

"愿他们早升天国!那么您是个孤儿;您也是继承人了。您那贵族的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它就在您的小眼睛里跳动,而且嘶……嘶……嘶……嘶地在发火花……"他用手指头做了个血在发火花的样子。"喂,我的贵公子,请问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伴跟您祖母谈好了没有,他是不是得到了那个讲过要给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

普宁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多好!就是住一个短时期也好!不然我们又得飘来荡去,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生活的焦愁烦虑无止息,灵魂也在受苦不安……"

"告诉我,"我插嘴说,"您是做教士的吗?"

普宁掉过脸望我,眯了一下眼睛。

“您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我的好少爷？”

“您讲的话——跟人家在教堂里念的完全一样。”

“是说我用了古经文的句子吗？不过您也不必惊奇。固然在寻常的谈话中不便常常用这种句子；可是当一个人的灵魂受到鼓舞在飞扬的时候，高尚的文句立刻就会出现了。不用说，您的先生——教俄国文学的教师——一定教过您这个了。他一定跟您解释过这个吧，是吗？”

“没有；他不解释，”我答道。“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是没有先生的。在莫斯科我倒有很多的先生。”

“您要在乡下住很久吗？”

“两个月吧，不会再多的；祖母说我在乡下给惯坏了。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女家庭教师。”

“一个法国女人吗？”

“一个法国女人。”

普宁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那么是一个小姐吗？”

“是的，她叫做佛利格小姐。”我突然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没有一个男先生，却只有一个女家庭教师，完全跟一般的小姑娘一样，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听她的话，”我轻蔑地加了一句。“我干吗去理她？”

普宁摇摇头。

“哈，这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你们太喜欢外国人了！凡是俄国的东西你们都轻视，外国的东西你们都崇拜。凡是从外国来的人你们都倾心……”

“你说什么？你在讲诗吗？”我问道。

“您以为怎样呢？我随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它来得非常自然……”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花园里响起了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声音是从我们背后发出来的。这个跟我谈话的人连忙站起来。

“再会，小少爷；我那个同伴在唤我，在找我啦。……他有什么话告诉我呢？再会，原谅我……”

他钻进了矮树林子里去不见了；我还在长凳上多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当愉快的感觉。……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从未跟这样的一个人谈过话。我渐渐地进到沉思中去了……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神话学，便只好动身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知道祖母已经跟巴布林把事情谈妥了：他被派定住在靠近马房的用人宿舍中一间小屋子里面。他立刻就跟他的同伴一块儿在那儿住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喝完了早茶，也没有向佛利格小姐告假，便跑到用人宿舍去。我想找昨天看见的那个怪人再谈谈。我没有敲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习惯——便一直走进屋子里去。我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普宁，却是那个养他的人，博爱主义者巴布林。他站在窗前，没有穿上衣，两腿分开地站着，正在用一幅长毛巾仔细地擦他的头和颈项。

“您要什么?”他说,并不放下手来,却只是皱了皱眉毛。

“普宁不在家吗?”我没有取下帽子,却随随便便地问道。

“普宁先生,尼康德尔·瓦维雷奇现在的确不在家,”巴布林从容地答道。“不过请您听我一句话,年轻人:不请求许可就这样跑进别人的屋子里来,这算是有礼貌吗?”

我! ……“年轻人!”……他怎么敢!? ……我气得一张脸通红。

“您大概不认得我,”我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地随便了,却带了一种傲慢的调子。“我是这儿太太的孙少爷。”

“对我都是一样的,”巴布林答道,他又用他的毛巾去擦头和颈项了。“即使您就是孙少爷,您也没有随便走进别人屋子的权利。”

“怎么能说是别人的屋子?您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无论在哪儿——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不,对不起:这儿——是我的家;因为讲定了这间屋子给我住,是用我的工作交换来的。”

“请您不要教训我,”我打岔地说:“我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您应当受到教训,”他也抢着说,“因为您现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知道我自己的义务,可是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权利,倘使您再要像这样地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得不请您出去……”

要不是普宁在这个时候脚擦着地一歪一倒地走进房来,那么我们的争论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大概从我们

脸上的表情猜到我们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马上露出最殷勤的快乐表情向我走来。

“呀，小少爷！ 小少爷！”他乱舞着两只手叫起来，一面又在干笑。“我的好少爷！ 来看我的吧！ 你真的来了，我的好少爷！”(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难道他真的用“你”字来称呼我吗？)“喂，那么跟我来，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件东西。……还坐在这个气闷的屋子里干吗呢？ 我们去吧。”

我跟着普宁走了，可是走到门口，我认为应当回过头去用挑战的眼光看看巴布林，好像在说：我并不怕你！

他也同样地回答我的挑战，他并且拿毛巾蒙住鼻子大大地哼了一声——大概他要让我知道他多么瞧不起我！

“您那个朋友多么不讲礼啊！”我们背后的房门刚刚关上，我就对普宁说。

普宁吃了一惊，马上掉过他那张肥肿的脸来看我。

“您在讲谁？”他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问道。

“啊，自然是讲……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巴布林。”

“您指巴拉蒙·谢美诺维奇吗？”

“嗯，是的；就是那个……浅黑皮肤的人。”

“呃……呃……呃……！”普宁带着慈爱的责备的调子说。“小少爷，小少爷，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 巴拉蒙·谢美雷奇[1] 是个极可尊敬的人，他坚守着极严格的规则，非常认真，

① 谢米雷奇：即谢美诺维奇，巴布林的父名。

是个出色的人物！嗯，不用说，他不肯让旁人侮辱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价值。这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并不是做这种差使的人呢！好少爷，您得很客气地对待他；您知道，他是……”说到这儿普宁埋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个共和主义者。”

我睁大眼睛望着普宁。这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料想到的。我从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和别的历史书上，早知道从前在古时候也有着共和主义者，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总想象他们是一些头戴盔、手拿圆盾、露出一双粗大的光腿的人；然而就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特别在俄罗斯，在这一个省里，居然真的可以遇见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弄昏了我的脑子，简直叫我莫名其妙了！

“是的，我的好少爷，是的！巴拉蒙·谢美雷奇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普宁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您知道以后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吧。您想象看，我在那儿找着了什么！在红尾鸲的窝里面找着了一个杜鹃下的蛋！真妙！”

我跟普宁一块儿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怪不得他有那种蓝胡子！”我最后断定道。

我对这两个人，普宁和巴布林的态度从那一天起就完全有区别了。巴布林激起了我的一种仇恨的情感，可是不要多大的功夫，这种敌意里又混进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感情。我竟

然害怕他！就是在他当初对我的那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之后，我仍旧对他存着畏惧心。不用说，我并不害怕普宁；我甚至于并不尊敬他；坦白地说，我把他当作一个丑角看待，然而我却全心全意地爱他！跟他在一块儿过几个钟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在我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我祖母对我跟一个"普通人"（用法文说，是 du common）交朋友① 的事非常不高兴；可是我只要有脱身的机会，我就马上跑去找我那个古怪、有趣、可爱的朋友。而且在佛利格小姐离开以后，我和他会面的机会更多了。佛利格小姐因为跟一位过路的军官（一位二级陆军上尉）谈话，抱怨我们家中充满了沉闷无聊的空气，被我祖母辞退送回莫斯科去了。至于普宁呢，他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谈好久的闲话，却并不感到厌倦；好像他自己还在找这样的机会似的。我不知道听他讲了多少故事，在那些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坐在发香的树荫里，干而柔滑的草上，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白杨；或者我们坐在池畔芦苇丛中，倾斜的岸边潮湿的粗沙上，从那个地方突出来一些多节的树根，它们古怪地交缠在一块儿，仿佛是一些黑的血管，仿佛是一些蛇，又像是一些从地下国土里钻出来的怪物！普宁详细地对我叙述他的生平，讲他所遭逢的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事情，我总是怀着真诚的同情在听着。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堂的执事；——"他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喝了酒以后就变得极其粗暴了。"

① 交朋友：作者在这里用了法语 intimite（亲近）。

普宁自己也在神学校里念过书。可是他受不了那厉害的“笞刑”，并且对于神父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后来他便还俗了，因此他受尽了种种的磨炼，最后成了一个流浪人。“倘使我没有遇到我的恩人巴拉蒙·谢美雷奇的话，”普宁常常这样地解释道(他谈起巴布林时总是这样讲法)，“我一定会掉进贫穷和罪恶的泥坑里去了!”普宁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句子——虽然他不是有意说谎，他却非常高兴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非常喜欢用夸大的言词。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惊奇，对什么事都欢喜得不得了。……我因为摹仿他，也学会了那种夸张，那种欢喜了。“看你变成怎样的疯子了——快划个十字，你怎么啦!”我的老保姆常常这样对我说。

普宁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然而我更喜欢我常常跟他在一块儿念的书。我无法描写下来我当时经验到的那种情感；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那样在我面前出现，胳膊底下夹了一本大书，用他那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指着园中隐秘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等着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等着我们平安地到了一个我们的秘密的角落；等着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等着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来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和陈旧的气味，当时的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形容不出的芳香！我带着怎样的一种颤动，怀着怎样的一种默默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普宁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

来！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我四周的一切全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只是像一阵一阵的雾似地远远地飞走了，只留下一点友好和慈爱的印象！——那些树木、绿叶、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陶醉在诗里面，我们还感到有一种庄严、伟大、神秘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近旁。……普宁特别喜欢诗，有音乐性的铿锵的诗；他准备为它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在念诗，他却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一个女巫[①]那样，庄严地，流畅地，带鼻音地高声叫出它们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起先他把诗轻轻地念了一遍，声音很低，就像念给他自己听的一样。……他叫这个读法做试读；然后他就把同样的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自己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带着半祈祷半命令的样子举起他的手。……用这样一种读法，我们不仅念完了罗蒙诺索夫[②]、苏马罗科夫和康捷米尔的诗(越是古老的诗，越合普宁的胃口)，——连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我们也全读了。说实在话，《罗西亚达》使我特别满意。别的不说，那里面还有一个有丈夫气概的鞑靼女人，一个巨人般

① 女巫：原文指古希腊德耳非地方阿波罗神殿的女巫。

②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渊博的学者，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诗人。以下的亚·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罗斯古典主义的诗人、剧作家；安·季·康捷米尔(1708—1744)：俄罗斯讽刺作家，善写讽刺诗；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罗斯古典主义作家，《罗西亚达》(叙事诗)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讲伊凡四世征服喀山的故事。

的女英雄；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可是当时只要提到她的名字，我的手脚马上就变冷了！“是的，”普宁常常这样说，一面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赫拉斯科夫，他是不肯轻易把人放过的。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行来——简直会碰痛你……你得提防啊！……你想抓住他，……可是他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吹起喇叭来，吹起喇叭来，发出了类似铙钹的破铜声。他的名字真起得好！这个字：赫拉斯科夫！”普宁不满意罗蒙诺索夫的诗，觉得它们太简单，体裁太自由，对于杰尔查文[①]，他却抱着差不多是仇视的态度，他说，与其说杰尔查文是诗人，不如说他是忠心的侍臣更妥当些。在我们家里，不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文学，注意过诗，而且甚至认为诗歌，尤其是俄罗斯的诗歌，都是鄙陋粗俗的东西；我的祖母甚至不称它们做诗歌，只叫它们做“唱曲”[②]；她以为这些“唱曲”的作者不是酒鬼，就是大傻瓜。我是在这一类的观念中长大的，所以我必须在下面两条路中拣一条走：或者带着厌恶地离开普宁，——而且他是那样脏，那样懒散，跟我那贵族的习惯不相容——不然，就让自己被他引动，受他征服，学他的榜样，也染上他那种爱诗的热狂。……我正是走了后一条路。我也念起诗来，照祖母的说法，便是哼起唱曲来了。我自己也试着写诗，我做了一首咏小型风琴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两句：

---

①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罗斯诗人，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② “唱曲”：原文是赞美歌，指神学校中节日所唱的颂歌；到了地主太太的口里这个宗教字眼有了轻视的意思。译者索性把它译作“唱曲”。

看，粗的轴子团团地转，
它的齿轮在里头滋滋地响。

普宁称赞说这里面有一种摹仿声音的旋律，不过他不赞成这个主题，说是它本身卑下，不值得拿来写抒情诗。

唉！这一切的努力，感情与欢乐，我们的清静的读书，我们在一块儿的生活，我们的诗，——一下子全完了。灾难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祖母的脾气跟当时那班在职将军的脾气完全一样，对什么事都爱讲究清洁和有秩序，不用说，我们的花园也应当弄得很清洁，很有秩序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一班免税农人①、单身贫农和那些额外家仆，或者失宠的用人都“赶”到花园里去，要他们打扫小路，拔除花坛上的草，挖松并且弄细花床上的土。有一天这种工作正在乱糟糟地进行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到花园里来了。在树丛中，在草地上，到处都看得见白的、红的、灰蓝的衬衫；到处都听得见铲子声和它们铲地的声音，土块倒进筛子里去的声音，以及筛子筛土的声音。祖母从那些劳动的人身边走过，她用她那一双老鹰眼似的眼睛立刻看出

① 免税农人：指免除义务劳役或缴纳代役金的徭役的农人。他们通常是些残废者、没有耕地的贫农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下文的“额外家仆”指有病或因长期工作而衰老的家仆，他们得到自由后，仍住在主人家里。

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不及别人勤快，而且好像不高兴似地脱下了帽子。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有一张瘦脸和一对凹进去的无光的眼睛，他那件棉布长衫完全破了，到处都是补钉，并且连他那窄小的肩头也盖不住。

"这是谁？"祖母掉过头向那个踮起脚跟在她后面的菲里培奇问道。

"您……指的……是谁？"菲里培奇结结巴巴地说。

"哦，傻瓜！我是指那个像狼一样地望着我的人。他站在那儿，没有在做工。"

"这个，太太！是的，太太。……这……这……这是……叶尔米尔，那个死了的巴威尔·阿法拉西耶夫的儿子。"

这个巴威尔·阿法拉西耶夫十年前在我祖母家当总管，很得我祖母的欢心；可是他忽然失宠了，就这样突然降为照料家畜的工人，而且不久连这个位置也丢掉了，他越降越低，栽一个大跟斗，掉到远远的村子里去了，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屋里，每月靠一普特面粉的口粮，勉强地过日子，后来得疯瘫病死了，留下一家人，穷得毫无办法。

"哈哈！"我祖母大声说："真不错，苹果落地离树不远！① 好吧，我们也会给这个人想个办法。我不高兴我这儿的人对我皱眉头。"

祖母回房里去了——她安排好了事情。过了三个钟头，叶尔米尔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被人带到她的书房的窗下

① "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意思。

来。这个不幸的少年要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1]。离他不过几步的光景，墙外停着一辆装载他那简单行李的农家小车。在当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叶尔米尔站在那儿，头埋着，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着两只脚。一双靴子用绳子拴着挂在他的背后；他的脸朝着太太的宅子，脸上没有绝望、悲痛、甚至惊愕的表情；只有一种愚蠢的冷笑冻结在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面。他那一对干燥的、半闭着的眼睛固执地望着地面。有人来报告祖母说，他已经来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她的绸衣一路上发出了轻微的窸窣声。她又把那副长柄金边的双眼镜架在鼻梁上，望了望那个新的充军犯人。当时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个人：总管、巴布林、值日的听差和我。

祖母把她的头朝下动了动……

"太太，"忽然响起来一个哑的、差不多是挤出来的声音。

我向四周一看，巴布林的脸变得通红……成了深红色；在他那对皱起的眉毛下面现出来小小的强烈的光点……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巴布林，是他发出这一声"太太"来的。

祖母也朝四周看了看，把她的长柄眼镜从叶尔米尔掉向巴布林。

"谁在……讲话？"她慢吞吞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来。

① 当时地主有权把他们不喜欢的农人充军去西伯利亚。

巴布林稍微向前移动一下。

"太太,"他说,"是我……我很冒昧。我想……我斗胆报告您,像您现在这样做法是……不大妥当的。"

"什么?"祖母说,还是一样的语调,并不拿开她的眼镜。

"我有幸跟您……"巴布林继续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念出来,明明是费了劲说出来的,"我要跟您说明那个少年的事情,他就要给送到远方充军去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一点错。像这种办法,我斗胆说,只会引起不满的……并且会产生别的——上帝不许的!——后果,而且这不外乎是滥用地主的权力。"

"你……在哪儿念过书?"祖母停了一会儿,取下眼镜问道。

巴布林吃了一惊。

"太太,您问什么呢?"他讷讷地说。

"我问你:你在哪儿念过书的?你用了这样高深的句子。"

"我……我的教育……"巴布林说。

祖母轻蔑地耸了耸肩。

"看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处置不合你的意吧。这对我是毫无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下人中间,我有着绝对的权力,谁也不能过问;只是我不习惯让人在我面前批评我,并且干预跟他们无关的事情。我这儿用不着平民出身的有学问的博爱主义者;我需要的是那些唯命是听的用人。你来以前我

就是这样地生活，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这样地生活。你不合我的意思，我把你开除了。”祖母又掉转头对总管说：“尼可拉·安托诺夫，把这个人的工钱算给他；让他在今天午饭前走！你听见吗？不要引我生气。而且另外一个……那个跟他住在一块儿的傻瓜也得跟他一路走。——叶尔米尔还在等什么呢？”她朝窗外望了望，添了一句话，“我已经看见他了。还有什么呢？”祖母对着窗挥她的手帕，好像在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随后她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对着我们严厉地吩咐道：“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除了那个值日的听差以外，我们全退出去了，祖母的话对那个听差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祖母的命令切实地执行了。在午饭之前巴布林和我的朋友普宁便离开了我们的庄园。我现在不想来描写我的悲痛和我的真挚的、孩子的绝望。我当时的悲痛和绝望的确是很强烈的，本来那个共和主义者巴布林的英勇行为已经引起了我敬畏的赞叹，可是连这情感也被我那种悲痛和绝望压倒了。巴布林跟我祖母谈过话以后，马上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虽然我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是在普宁的身边，转来转去，他却始终不跟我讲一句话，也不望我一眼。普宁完全弄糊涂了，他也不说什么；不过他一直不停地望着我，眼里装满了泪水……老是那几滴眼泪：不掉下来，也不干去。他不敢批评他的“恩人”：——巴拉蒙·谢美雷奇不会错的，——可是他很悲伤，难过。普宁跟我两个设法再念了一次《罗西亚达》中的

某一段，作为告别；我们为了这个便把自己锁在贮藏室里——不用想到花园里去了，然而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行，两个人就都念不下去了，虽说我已经有十二岁，而且平日爱夸口说自己是个大人，可是现在我却像一头小牛似地狂叫起来。

巴布林坐进了那辆有一半篷的旅行马车以后，他终于掉过头来望着我，他脸上平日那种严厉的表情现在温和了些，他说："少爷，这对您倒是一个教训；您记住这件事情吧，等您将来长大了时，您不要再让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您的心肠是好的，您的天性也还没有败坏。……注意，当心；照这样做下去是不成的！"我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流到我的鼻头，流到我的嘴唇，流到我的下巴，我一边流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我会记住，我答应……我做……一定……一定……

然而在这个时候普宁，我已经跟他拥抱过二十次了（他那未剃的胡须刺得我的脸上发烧，我的身上染满了他那种臭味），——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他跳到马车的座位上，高高地举起两只手，用了响雷般的声音（他从哪儿得来的呢！）朗诵杰尔查文翻译的大卫的《诗篇》[①]，这一次杰尔查文不是一个侍臣，他是一个诗人了。

万能的上帝起来了，
他要在尘世众王的集会中审判他们！……

---

① 《诗篇》：收入圣经《旧约全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以色列国王大卫作。杰尔查文的译诗见于他的《统治者和裁判官》。

他说，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呢，
你们纵容了邪恶与不义，你们，有罪的人？
你们的职务是维护法律……

“坐下来！”巴布林对他说。

普宁坐下了，然而还在朗诵：

你们的职务是使无辜的人免去困苦，
使不幸的人得着庇护，
使弱者不受有势力者的欺负。

普宁说到“有势力者”的时候，他指着我们的宅子，随后又用指头点了一下马车夫的背。

去解除穷人的束缚！
他们并不注意！他们看见却不知道……

尼可拉·安托诺夫从宅子里跑出来，用尽力气大声向马车夫叫道：“快走，笨蛋！快走；不要发呆啊！”马车便转动了。然而远远地还听得见普宁的声音：

起来啊上帝，正直的上帝！……
请您来裁判，处罚邪恶与不义——
只有您啊，应当由您来做尘世的唯一的国君！

“这个小丑！”尼可拉·安托诺夫说。

“他年轻时候没有挨够鞭子，”那个教堂执事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他是来问太太高兴在什么时候举行夜祷的。

就在那天我知道叶尔米尔还在村子里，他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人送进城去办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本来是订下来限制地主们的专横的，可是它们却只成了有关的负责官员们额外收入的来源。那天我找到了他，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我给了他一个包袱，在那里面我放了两条手帕、一双破鞋、一把梳子、一件旧睡衣和一条全新的绸领带。叶尔米尔睡在后院里，车子旁边，一堆稻草上面，我唤醒了他，他相当冷淡地，而且还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向我道谢，马上就把头埋在稻草上睡着了。我只好走回家去，多少有点扫兴。我原先想象着他看见我去找他，一定又惊讶又高兴，并且他在这里面会看出来我的未来的宽大主张的一个保证——谁知他却……

“无论怎样说，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道。

在这个极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的祖母为了某种原因居然给了我一个整天的自由，可是等我吃了晚饭向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却带了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你的眼睛红了，”她用法国话对我说，“你身上有一股农人茅屋的气味。我不想调查你有什么样的感情和你干过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弄到非处罚你不可的地步——不过我希望你去掉所有你那些傻气，再做一个有礼貌、懂规矩的孩子。我们不久就要回莫斯科去，我要给你请一个男教师，因为我知道，应当由一位男先生来管你才成。你去吧。”

真的，这以后不多久我们就回莫斯科去了。

二

一八三七年

七年过去了。我们仍旧住在莫斯科，然而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的祖母在最近几年中间显得很衰老，我也不再受她严厉的管束了。在同学中我跟塔尔霍夫最熟，他是一个又爽快又温和的年轻人。我们两人的习惯和趣味完全一样。塔尔霍夫非常爱好诗，他自己也写诗；而在我这一方面，普宁撒下的种子也并非完全不长东西。像一般知己的年轻朋友一样，我们毫不隐瞒彼此的秘密。然而在这几天里面我却注意到塔尔霍夫有一种兴奋不宁的神情。……有一次一连几个钟头我都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像这样的事以前是没有过的。我正要用友谊的名义要求他坦白地把事情讲出来。……他却先对我说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他的屋子里。……他突然快活地红了脸，两只眼睛直望着我的面孔，对我说："彼嘉[1]，我一定要介绍我的穆莎[2] 给你。"

"介绍你的穆莎！ 你说得多奇怪！ 简直像一个古典派！"（当时，一八三七年，正是浪漫主义的全盛时代。）"好像我这么

① 彼嘉：彼得的爱称。

② 穆莎：也译作缪司，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的女神。这里的穆莎是女人名。

些时候就不认识她——你那位穆莎似的！是不是你又写了一首新诗？"

"你不懂我的意思，"塔尔霍夫仍旧红着脸带笑回答道。"我要介绍给你一个活的穆莎。"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为什么她是你的呢？"

"那，那是因为……啊，等一等，我想她到这儿来了。"

果然听见了走得快的小鞋跟轻轻挨地的声音，接着房门大开了，门口现出来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布衫子，肩上再披了一件黑呢的短斗篷，她那一头稍微蓬松的金丝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草帽。她看见我在这间屋子里，不觉吃了一惊，露出一点窘相，朝后退了一步……可是塔尔霍夫马上跑过去迎接她。

"请，请，穆莎·巴夫洛夫娜，请进来！这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出色的人，很稳静，实在很稳静的。……您用不着怕他。"他又掉头对我说："彼嘉，让我介绍我的穆莎——穆莎·巴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我的极好的朋友给你。"

我鞠了一个躬。

"怎么会这样……穆莎？"我说……

塔尔霍夫大声笑起来。——"你不知道在教堂历书上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吗？朋友，我见到这位亲爱的小姐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穆莎！这个名字多可爱！而且跟她恰恰配得上！"

我给我这个朋友的好友再点一个头。她从门口向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的确很可爱，然而我不能够赞成塔尔霍夫

的意见，我甚至在心里想："嘿，她是怎样的一种穆莎啊！"

她有一张稍带圆形的玫瑰色的脸，容貌是纤细、秀美的；从她整个苗条而玲珑的身子里发出一种新鲜活泼的青春的气息；然而说到穆莎，说到穆莎的化身，当时的我——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我们这般年轻人都认为穆莎的相貌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一，穆莎一定得有黑头发和苍白色的皮肤！此外，轻蔑、高傲的表情，讽刺的微笑，充满灵感的眼光，还有一种神秘的、恶魔的、宿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穆莎的特点，那就是当时支配着一般男人心灵的、拜伦的穆莎。可是在刚才进来的那位少女的脸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类的特征。倘使当时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的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话，我或者会更留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皮稍微厚一点，可是眼珠黑得像玛瑙一样，明亮而灵活——这倒是金发的人所不常有的。要是我在这对眼睛流动的而且躲躲闪闪的眼光里找不到诗的倾向，那么我也应当看出一个热情的灵魂（并且热情到了不顾自己的程度）的一些光芒来的。……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了。

我把手伸给穆莎·巴夫洛夫娜，——她不曾把手伸给我，——可是她没有注意我的动作。她坐在塔尔霍夫给她放好的那把椅子上，但是她并没有把帽子和短斗篷脱下来。

她明明感到局促不安；我在这儿使她很窘。她呼吸失常，而且过一阵吐一口长气，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

"我到您这儿来只能待一分钟，符拉季米尔·尼可拉依奇，"她开口说，她的声音很轻而低；这样的声音，由她那深红

的、差不多是孩子样的嘴唇里吐出来，倒使人觉得奇怪。"不过我们太太只准我出外半个钟头。……前天您不大舒服……所以我想……"

她口吃起来，把头埋下了。她那对黑眼睛在浓而低的眉毛下面，躲躲闪闪地不住往左右眨动。它们就像那些在炎热的夏天里，干草丛中，飞来飞去的活泼而闪光的黑色甲虫。

"您多好啊，穆莎，穆左奇加！"塔尔霍夫大声嚷起来。"不过您待下吧，您坐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就准备茶炊。"

"啊，不行，符拉季米尔·尼可拉依奇！怎么可能呢！我马上就得走的。"

"您歇歇吧，歇一会儿也成。您还在喘气……您太疲倦了。"

"我不疲倦。我……不是因为那个……只是……请您给我换一本书；这一本我已经读完了。"她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莫斯科版的灰色小书。

"好的，好的。不过您觉得它怎样？您喜欢它吗？"他说到这儿又掉过头来对我说一句："《罗斯拉夫列夫》[1]。"

"是的。只是我觉得《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2] 好得多。我们太太对书管得很严。她说书妨碍工作。因为照她想

---

① 《罗斯拉夫列夫》：全名为《罗斯拉夫列夫或一六一二年的俄国人》，是俄罗斯作家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的并不怎么成功的小说。

② 《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扎戈斯金的第一部小说(历史小说)。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在我一生中头一部使我深受感动的文学作品便是他的《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但这部小说充满了把生活理想化的倾向和君主主义的思想。

来……"

"可是，连《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也比不上普希金的《茨冈》不是吗？ 咦？ 穆莎·巴夫洛夫娜？"塔尔霍夫带笑地插嘴说。

"当然啊！《茨冈》……"她慢慢地说。"啊，是的，还有一件事，符拉季米尔·尼可拉依奇；明天不要来……您知道是指哪儿……"

"为什么呢？"

"不行。"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少女耸了耸肩，她突然离开椅子站起来，好像谁在后面推了她一把似的。

"您到哪儿去，穆莎，穆左奇加，"塔尔霍夫痛苦地唤道。"再坐一会儿！"

"不，不，不行。"她很快地走到门口，握着门上的把手。……

"那么，至少把书拿去吧！"

"下次再来拿。"

塔尔霍夫向着少女跑过去，可是她一下子就走出门外去了。他差一点把鼻子碰在门上。

"一个怎样的女孩子啊！ 简直是一只小蜥蜴！"他带了点烦恼地说，然后就沉在深思里去了。

我就待在塔尔霍夫的屋子里。我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塔尔霍夫也不想对我隐瞒什么。他告诉我，这个

少女是属于小市民阶级的，是一个女裁缝；他三个星期以前在一家时装店里第一次看见她，他到那儿去替一个住在外省的妹妹买一顶帽子；他见第一面就爱上了她，到第二天他居然跟她在街上讲起话来了；她好像也中意他似的。

"请你不要以为，"他热烈地解释道，"你不应当想她坏。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中间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坏！"我插嘴说。"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也不会以为你会后悔这回事的，好朋友，你得忍耐一下——往后事情会顺利的。"

"我希望这样！"塔尔霍夫答道，他虽然笑了一下，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很低。"不过，朋友，的确那个女孩子……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典型。你没有机会好好地看她一下。她怕羞；唔，她多怕羞！而且多么固执！就是这种脾气！然而我就喜欢她那种害羞的脾气。这是独立的征候。我是死心地爱上她了，好朋友！"

塔尔霍夫热心地谈起他的"对象"来，他甚至把他写的一首叫做《我的穆莎》的诗的第一节念给我听。他的这种感情的流露并不合我的胃口。我暗暗地妒忌他。我不久便离开他走了。

过了几天，我偶然走进戈斯季尼商场①，正在场内一条小道上走着。这天是星期六；买东西的人非常多；在喧嚷拥挤中，只听见从四面八方送过来的店员们的叫卖声。我已经买

① 按原文字面直译，应是"客场"，"客"字的古义是"上等商人"，特别指从外国来的。这地方颇像北京的东安市场。

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想尽可能地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嘈杂声——我突然不自觉地……站住了；我看见我那朋友的熟人在一家水果店里面，穆莎，穆莎·巴夫洛夫娜！她的侧面正对着我，她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待什么。我迟疑了片刻，便决定走过去跟她谈话。可是我刚刚走进店门，揭下我的帽子，她惊惶地往后退了两步，连忙走到一个穿粗呢外套的老年人身边去，抓住他的胳膊，好像逃去求他保护似的。那个老年人正看着店员在给他秤一磅葡萄干，这时也转过脸来朝着她——你想我当时是多么惊奇！我看出来他是谁呢？普宁！

不错，是他；还是他的那双红肿的小眼睛，他的厚嘴唇，他的柔软的下垂的鼻子。这七年中间他简直没有大的改变；也许脸上肌肉有一点点松弛。

"尼康德尔·瓦维雷奇！"我叫起来，"您不认识我吗？"

普宁吃了一惊，张大嘴，注意地望着我……

"我没有荣幸……"他刚刚开头说，突然尖声叫起来："特罗伊茨基的小少爷！"（我祖母的领地叫做特罗伊茨基。①）"真的是特罗伊茨基的小少爷吗？"——那一磅葡萄干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的确是的，"我答道；我从地上拾起了他买的葡萄干，然后跟他抱吻起来。

他欢喜、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快要流眼泪了，他脱下他

① 特罗伊茨基：即三位一体村。以宗教的字眼起镇名、村名、街名，在当时的俄国很普遍。

那顶便帽(这让我亲眼看见,在他那个“鸡蛋”上面,连最后的几根头发也完全绝迹了)。从帽底拉出一张手帕,用它来擤了鼻涕,把帽子跟葡萄干一块儿放到怀里去,然后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葡萄干又掉下来了。……我不知道穆莎这一阵子在做些什么,我竭力不要去看她。我并不以为普宁的激动是由于他对我个人的极端的喜爱;这只是因为他的天性忍受不了任何一个意外的刺激。这些穷人的神经衰弱!

“到我们那儿去,到我们那儿去,好少爷,”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您大概不会不高兴到我们那个简陋的小窝去吧?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学生……”

“哪儿的话!正相反,我非常高兴去。”

“您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吗?”

“一点儿事也没有。”

“好极了!巴拉蒙·谢美雷奇会多高兴啊!今天他会比平日回家早些;而她的女主人每个星期六也放她出来。不过,对不起,我简直弄糊涂了。不用说,您还不认识我们的侄女吧?”

我连忙接嘴说,我还没有得到这种愉快……

“当然啦!您能够在哪儿遇到她呢?穆左奇加……亲爱的先生,请您注意;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名字是穆莎——这不是一个绰号,这是她的真名字。……这不是前定吗?穆左奇加,我给你介绍这位……这位……”

“布——”我提醒他道。

“布——先生,”他跟着说。“穆左奇加!你注意!你面前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和气的年轻人。还是在他小

的时候,命运就让我跟他碰到一块儿了!我求你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

我弯下身子鞠了一躬。穆莎的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她偷偷地望了我一眼,马上又把眼睛埋下去了。

"啊!"我想道,"你是一个受窘的时候脸色不变苍白、却变得通红的女人;我得留心这个!"

"请您不要见怪。我们这个女孩不是一个时髦的女子,"普宁说,就走出水果店到街上去了;穆莎和我跟在他后面。

普宁住在花园街(沙多瓦街),离戈斯季尼商场相当远。在到那儿去的路上,我从前那位教诗的先生便有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他的生活情形。自从我们分别以后,他和巴布林两人各处流浪,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一直到不久以前——不过一年半前——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住家。巴布林居然在一个有钱的商人兼工业家的事务所里面找到了一个秘书主任的位置。

"这不是一个好差使,"普宁叹口气说:"工作多,薪金有限……不过还有什么事可做?连找这个差使也得感谢上帝!我也想找点抄写和教书的工作来挣几个钱;可是总有困难。您也许还记得,我的字体是老式的,不合现代人的胃口;至于教书,最大的难关便是我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而且我害怕教到俄罗斯文学这门功课,我也不合现代人的胃口;所以我只好坐着挨饿。"(普宁笑了起来,还是他那沉滞的哑声的笑。他还保

留着他从前那种夸大的口吻，和他从前那种爱押韵的习惯。）“什么都朝新的方面，朝新的方面走！我敢说，您也不再崇拜旧的神，却在新的偶像面前低头？”

“您呢，尼康德尔·瓦维雷奇？您仍然崇拜赫拉斯科夫吗？”

普宁站住不动了，马上挥舞起双手来。

“最高的程度，先生！最—高—的—程—度！”

“您不念普希金的诗吗？您不喜欢普希金吗？”

普宁又把他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高过了他的头。

“普希金？普希金是一条隐在绿枝中间的蛇，他却有夜莺的歌喉！”

普宁和我两人一面谈着话，一面在那所谓“白石的”莫斯科①（这个莫斯科其实没有一块石头，而且一点也不白）的崎岖不平的砖砌的人行道上小心地下着步子，——穆莎静静地在我们旁边走着，不过离我远些。我讲到她的时候，我称她做“您的侄女”。普宁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他的后脑勺，压低声音对我说，他称她作侄女……只是为了一种方便；她并不是他的亲属；她是一个孤女，是巴布林在沃龙涅什城拾来养大的；不过他，普宁，也可以叫她做他的女儿，因为他爱她，并不比爱一个亲生的女儿差。我相信，普宁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可是穆莎却也能够完全听得明白；她同时又气，又羞，又窘；在她的脸上红一阵又暗一阵，那张脸上所有的东

① 那句有名的成语全文是：“白石头、金屋顶的神圣母亲莫斯科”。

西,眼皮啦,眉毛啦,嘴唇啦,窄小的鼻子啦,全在微微地颤动。这一切都很动人,很有趣,而且很古怪。

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简陋的小窝”了。那个小窝的确是很简陋的。这是一栋单层的小屋,木板的屋顶是倾斜的,正面有四扇阴暗的窗户,整个房屋看起来就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一样。屋子里的家具坏极了,而且也不十分干净。窗间墙上都挂满了小小的木鸟笼,数目约有一打的光景,里面关着一些百灵鸟、金丝鸟、金翅雀和黄雀。“我的部下!”普宁指着它们得意地说。我们还没来得及走进屋子,向四面看看,普宁还没来得及把穆莎差出去准备沙莫瓦尔的时候,巴布林本人就出现了。他看来比普宁老了许多,虽说他走起路来还是一样地坚定,而且就大体说,他脸上的表情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却瘦了,背也显得微驼了,他的脸颊陷进去了,在他那蓬乱的浓密的黑发中间“白发增多了”。他认不得我了,等到普宁说出了我的名字,他也不曾表示特别高兴;连他的眼睛里也不露一丝笑意;他只点了点头;他问我——很随便很冷淡地问——我祖母① 是不是还活着,就再没有讲别的话了。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并不欢迎你这个贵族的拜访,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共和主义者到底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穆莎回来了;一个衰老的小老太婆跟在她后面,端了一个

① 巴布林简单地用了“祖母”这个字,没有加上习惯用的尊敬的或亲爱的形容词,这表示他对客人非常冷淡。

擦得不干净的茶炊。普宁开始忙乱起来，逼着我吃东西；巴布林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支着头，用他那疲乏的眼睛朝四面看。可是喝茶的时候，他却谈起话来了。他对他的位置并不满意。他这样谈到他的老板：“他是个吝啬鬼，不是人；他雇用的人在他的眼睛里不过是废物罢了，一点儿也不算什么；可是他自己不久以前还不是穿着农人的粗呢外衣？他就只有残忍，贪心。在他下面做事比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还要坏！所有他这儿的生意就完全靠着欺诈和吹牛，再没有别的！”普宁听见这种不愉快的话，痛苦地长叹一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头不停地在动着，时而上下地动，时而左右两边地动。……穆莎固执地不做声。……明明有一个疑问在折磨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谨慎的呢，还是一个多嘴的？而且要是我故意做出谨慎的样子，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她那双灵活的、不安的黑眼睛在半垂的眼皮下面闪动着。只有一次她射过眼光来望我，那是多么好奇，多么敏锐，而且差不多带恶意的眼光。……简直叫我大吃一惊。巴布林就很少跟她讲话；不过他每次对她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总带了一种忧郁的、并不像父亲的慈爱的调子。

普宁跟他正相反，普宁不停地跟穆莎开玩笑；然而她总是不情愿地回答他。他称她做“白雪姑娘”，“小雪花”。

“您为什么给穆莎·巴夫洛夫娜起这样的名字呢？”我问道。

普宁笑了起来。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最冷的。”

"她聪明解事,"巴布林插嘴说,"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应当这样。"

"我们也可以叫她做这一家的主妇,"普宁大声说。"怎么? 巴拉蒙·谢美雷奇?"

巴布林皱起眉头来;穆莎把脸掉开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里面含的意思。

我们这样地过了两个钟头……虽说普宁用尽力气来"招待贵宾",可是我们的谈话还是显不出多大的生气来。说到他的招待,例如,他蹲在一只金丝鸟的笼子前面,打开门,吩咐金丝鸟说:"飞到圆屋顶上去! 开个演奏会!"——金丝鸟便飞出去了,站在那个圆屋顶上,就是说,在普宁的秃头上,不停地向左右两边转动,展扑它的小翅膀,然后卖力地唱了起来。在金丝鸟唱的时候,普宁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眯起眼睛,用手指轻轻地在指挥。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可是巴布林和穆莎两人连一声也没有笑过。

在我正要告辞的时候,巴布林突然拿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来问我。他因为我正在大学里念书,所以想要我告诉他,柔诺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柔诺是怎样的看法。

"什么柔诺?"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道。

"柔诺,古代的大贤。您不会不知道他吧?"

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柔诺这个名字,他是斯多噶学派的

① 柔诺(前 342—270 或 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这一派的学说宣传理性生活、禁欲、克己和勇于受苦的精神。

创立者；可是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的，他是一个哲学家，”我后来就这样回答了。

“柔诺就是说过下面一些话的那个贤人，”巴布林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他说受苦并不是恶，因为忍耐可以战胜一切，世界上只有一个善，那就是正义；而德性本身也就只是正义。”

普宁恭恭敬敬地听着。

“这段话是一个住在这儿收藏了很多古书的人告诉我的，”巴布林继续往下说：“我很喜欢这段话。可是我看您对这种题目并不发生兴趣。”

巴布林说得不错。对那种题目我实在没有一点儿兴趣。自从我进了大学以后，我也就变成了一个像巴布林那样的共和主义者了。我倒很高兴去谈论米拉波① 和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的确多了不起啊！……在我的写字台上面还挂着福基叶—丹维尔② 和夏立叶的石印像！然而柔诺！！从哪儿来的柔诺呢？

我告别的时候，普宁很殷切地要求我第二天（那是星期日）再去看他们；巴布林倒并不邀请我，他甚至低声说，我不会

---

① 翁·加·里·德·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拥护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家。下文的玛·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领袖。

② 安·盖·福基叶—丹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法庭的检查官。下文的马·约·夏立叶（1747—179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里昂著名雅各宾派的领袖，主张把王室的财产充公，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恐怖手段。

高兴跟他们那种普通人，那种平民谈话，而且我祖母也可能会不满意。……然而他说到这儿，我便打断了他的话，我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再受祖母的管束了。

"可是您还没有得到产业吧？"巴布林问道。

"没有，我并没有，"我答道。

"啊，那么……"巴布林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我替他接下去了："那么我还是个小孩子。"

"再见，"我高声说了一句，便走了。

我已经走出院子到了街上了。……穆莎突然从那栋房屋里跑出来，把一小张摺皱了的纸条塞在我的手里，马上就不见了。我等着走到第一根灯柱前面便站住，打开纸条来看。那是一个字条。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认出那些颜色很浅的铅笔字来。穆莎这样写着：

>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明天午饭以后到库塔非雅塔①旁边的亚历山大公园来我等着您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不快活我一定得跟您见面

字条上没有一个错字，可是也没有加上一个标点。我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回了家。

第二天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一刻钟，我就走近了库塔非

① 库塔非雅塔：克里姆林宫城内诸塔之一，是一个大的白塔；下文的亚历山大公园在它西边，在宫城外面。

雅塔(这时候是四月初,树木正在发芽,草也在发绿,麻雀在没有叶子的丁香枝上吱吱喳喳地叫嚷争吵),但是我隐约地看见穆莎已经在离栅栏不远的路旁了,这倒使我大吃一惊。她比我还到得早,我正要向她走过去;可是她已经迎着我走来了。

"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墙去吧,"她埋下眼睛朝地上看了一转,着急地小声说:"这儿有人。"

我们沿着上山坡的路走去。

"穆莎·巴夫洛夫娜,"我开始说。……可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

"请您不要批评我,"她还是用她那种急促而压低的声音说,"不要当我有什么坏事情。我给您写信,约您会一次面,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昨天,——您好像一直在暗笑。您听着,"她突然用劲地添了这一句,马上站住了,转过脸向着我:"请听着,倘使您讲出来我跟谁……倘使您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我是指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遇着的那个人,我就会跳下水去,我会淹死自己,我会自杀!"

她说到这儿,才第一次用她那我已经熟悉了的锐敏的、探索的眼光望我。

"我看她大概会做的,真的……还有更妥当的办法吗?"我暗想道。

"啊哟,穆莎·巴夫洛夫娜!"我连忙说。"您怎么这样看轻我啦?您想我能够出卖我的朋友,害您吗?并且拿我所知道的来说,你们的关系也是没有可以指责的……看在上帝的面

上，请您放心吧。”

穆莎静静地听我讲话，她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也不再望我一眼。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您，”她说，又继续往前面走了，“否则您会以为我发疯了！我得告诉您，那个老头儿想跟我结婚呢！”

“什么老头儿？那个秃头吗？普宁？”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巴拉蒙·谢美雷奇。”

“巴布林吗？”

“就是他。”

“可能吗？他向您求婚没有？”

“他求婚了。”

“然而不用说，您没有答应他吧？”

“不，我答应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现在——完全两样了。”

我惊讶得拍起手来。

“巴布林——同您！他快到五十岁了吧。”

“他自己说是四十三。不过那倒没有关系。他就是二十五岁，我也不肯嫁给他。那会有什么快乐呢？他可以整整一个星期不笑一次。巴拉蒙·谢美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受过他的大恩；他抚养我，教育我；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完了；我理应尊敬他像一个父亲。……可是做他的妻子！我宁愿死！我宁愿睡到我的棺材里去！”

“为什么您老是讲到死呢，穆莎·巴夫洛夫娜？……”

穆莎又站住了。

“难道生命就是那么美好吗？我可以说，连您那位朋友符拉季米尔·尼可拉依奇，我也是由于自己的痛苦和烦闷，才爱上他的，——可是巴拉蒙·谢美雷奇却向我求婚了。……普宁虽然常常拿他的诗歌来麻烦我，可是他至少不叫人害怕；在晚上我倦得头要从肩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并不逼我念卡拉姆辛① 的作品。这两个老头儿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说我冷。我能够对他们——热吗？要是他们来强迫我——我就跑开。然而巴拉蒙·谢美雷奇自己老是说着：自由啊！自由啊！不错，我也要自由。否则这算什么呢？所有别的人全有自由，单单把我一个人关在牢里吗？我自己会去跟他讲。然而要是您出卖我，或者泄漏一点消息的话——请您记住：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

穆莎站在路中间。

“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她厉声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不抬起眼睛来看我；她好像知道要是有什么人正面望着她的脸，她就会马上出卖她自己——就会把她的心事完全讲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不抬起眼睛来，除非在她动怒或者烦恼的时候——在那种时候她反而正眼望着那个听她讲话的人。……然而她那张可爱的玫瑰色的小脸上却露出了不能变更的决心。

①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罗斯作家和历史家，他的最出名的著作是十二卷的《俄国史》。他也写诗，且有相当的成就。

"唔,塔尔霍夫说得不错,"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

"您用不着害怕我,"我终于明白地说了。

"真的? 纵然……要是您讲出一句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的话……就是在某一种……"她忽然闭口不讲了。

"就是在那种场合里面,您也不用害怕,穆莎·巴夫洛夫娜。我不是您的裁判官。您的秘密是埋在——这儿的。"我指着我的胸膛。"请您相信我,我知道怎样尊重……"

"您带着我的信吗?"穆莎突然问道。

"带着的。"

"在哪儿?"

"在口袋里。"

"给我……快,快!"

我把昨天的那张纸条掏出来。穆莎用她那小而粗的手抓过去了,她还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好像要感谢我似的;可是她突然露出惊惶的神情,望了望四周,也不招呼一声,就很快地跑下坡去了。

我朝着她走的方向望过去。在离塔不远处我看见一个人影,裹着一件叫做"阿尔马威瓦"① 的西班牙式斗篷("阿尔马威瓦"在当时非常流行),我马上认出来这是塔尔霍夫。

"啊哈,老兄,"我想道,"要是你在监视着她的话,那么你

① "阿尔马威瓦":一种宽大的斗篷。这名称是从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两个剧本(《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阿尔马威瓦伯爵来的。

一定早就注意到了。……”

我轻轻地吹着口哨，动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刚喝完茶，普宁来拜访我了。他走进我屋子里来，带了一脸窘相，客气地鞠躬行礼，朝四周望望，又道歉说他随便闯进来并不合礼。我连忙安慰他。我真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还以为普宁是来借钱的。可是他只向我要一杯搀甜酒的茶喝，幸而那个时候茶炊还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到这儿来看您，总不免有点提心吊胆，”他嚼着一块方糖说。“我并不是怕您；不过对您那位可敬的祖母我倒害怕！而且我早就跟您说过，我那身衣服也使我显得很寒伧。”普宁用手指头顺着他那件旧外套的磨损的边摸了一下。“在家里我并不在乎，到街上也没有害处；可是一旦走进了镀金的宫殿，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贫穷在你面前望着你，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住的是中二楼① 的两间小屋子，绝没有人会想到叫它们做宫殿，更不会说它们是镀金的；那么普宁显然是指我祖母的整个宅子，不过这个宅子也并不怎么华丽。他又责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去看他们；他说：“巴拉蒙·谢美雷奇虽然明说您一定不会来，可是他还是在盼望您。穆左奇加也在望您。”

“什么？穆莎·巴夫洛夫娜也望我吗？”我问道。

“她也望您。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不是吗？您以为怎样？”

---

① 中二楼：一层和二层之间的阁楼，有一些天花板很低的住房。

“很可爱，”我同意地说。

普宁很快地摸了一下他的秃头。

“她是个美人，先生，是一颗珍珠，还是一粒金刚钻呢！——我说的是真话，”他俯下头在我耳边说。“她也是贵族的血统，”他小声说，“不过——您懂我的话吧——是私婚呢：吃过了禁果①。后来她父母一死，亲戚们不照顾她，让她去受命运的颠簸！这就是说，绝望饿死！然而在这关头，巴拉蒙·谢美雷奇，像有名的古代的救主一样，出现了！他收留她，给她衣服穿，照顾她，抚养着这只小鸟儿；现在我们的宝贝儿开花了！我告诉您。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普宁靠在那把扶手椅的靠背上，举起他的两只手来，随后他又把身子向前俯下，比先前更神秘地小声对我说：“至于巴拉蒙·谢美雷奇本人呢……您不知道吗？他的出身也是高贵的——也是私婚。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势力的格鲁吉亚的公爵，并且还是建国者大卫王② 的后裔。……您怎么想呢？简单地讲——可是这不是很不错的吗？大卫王的血统啊！您以为怎样呢？然而据别的说法，巴拉蒙·谢美雷奇的祖先是一位叫做白骨巴布尔的印度王。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嗯？”

“什么？”我问道，“巴布林也受着命运的颠簸吗？”

---

① 禁果：意思是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欢乐。

② 建国者大卫王：1089—1125年间格鲁吉亚的国王，在他的时代格鲁吉亚文化极发达。

普宁又摸摸他的秃头。

“当然是这样！他的遭遇比我们那位小姐的还要惨！从最小的时候起他就只有吃苦受罪！的确，我承认我受了鲁班[1] 的影响，写过四行诗题巴拉蒙·谢美雷奇的像，就讲到这件事情。等一下……您看怎样？是的！”

从婴儿时期起残酷的迫害就不曾把他放松，
命运无情地将巴布林赶到深渊的边缘！
然而火光在雾中闪亮，脓水上照着阳光，
看啊，胜利的桂冠戴在他的额上！

普宁照着平常朗诵诗的办法，用抑扬顿挫的铿锵的音调，给我背出这几行诗来。

“啊，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就是这个缘故吧！”我大声说。

“不，不是这样，”普宁直率地答道。“他早已宽恕了他的父亲；可是他绝不能忍受不公平的事情；别人的痛苦折磨着他，使他苦闷不安！”

我很想把话题转到我昨天从穆莎那儿听来的，就是巴布林求婚的事情上面去，——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谈起来。幸而普宁自己给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吗？”他突然问道，狡猾地眯起眼睛来。“您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什么吗？没有什么

① 瓦·格·鲁班(1742—1795)：俄罗斯二流诗人。他的诗中庄严的颂词深为同时代人赞赏。

特别的事情吗?”

“那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我反问道。

普宁掉过头去朝他背后望了一下,好像害怕有人在后面偷听似的。

“我们那位小美人儿,穆左奇加,不久便要做太太了!”

“怎样呢?”

“巴布林太太,”普宁用力地说,把手掌在膝上拍了几下,接着就像一个中国磁人似地摇起头来。

“这不可能!”我故意做出惊讶的神情说。

普宁的头慢慢地停止摇晃了,他的手也不动了。

“请让我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巴拉蒙·谢美雷奇年纪大得可以做你们那位小姐的父亲了;因为年纪相差这么远,在新娘方面——是不能发生爱情的。”

“不能发生爱情?”普宁激动地重复说。“可是感激又怎样呢? 还有心地纯洁呢? 温柔的感情呢? 不能发生爱情! 您得仔细想想看:我们承认穆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得到巴拉蒙·谢美雷奇的爱,成为他的安慰,他的支持——一句话说完,他的妻子! 就是拿她这样的女孩子来说,这不也是最高的幸福吗? 她很了解这一点! 您得看看,您得留意一下! 在巴拉蒙·谢美雷奇面前,穆左奇加是充满了尊敬,而且是战战兢兢,满心欢喜的啊!”

“毛病就在这儿,尼康德尔·瓦维雷奇,就在您所说的,她是战战兢兢的啊。一个人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是不会战战兢

兢的。”

“您这种说法，我不同意！现在就拿我作例子吧；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爱巴拉蒙·谢美雷奇的了，然而我……我在他面前总是提心吊胆的。”

“啊，您——那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呢？为什么？为什么？”普宁插嘴说。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很激昂，认真，而且几乎要动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用他平日那种押韵的铿锵的音调了。“不，”他固执地说：“我看出来您的眼光并不锐敏！不！您看不透人们的心！”

我不再反驳他……我想把话题引到另一方面去，便提议我们一块儿念点诗来纪念旧日的友情。

普宁沉默了一会儿。

“从前的诗人的东西？真正的诗人的东西？”他后来问道。

“不；新的诗人的东西。”

“新的诗人的东西？”普宁不相信地重说了一遍。

“普希金的，”我答道。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的《茨冈》，塔尔霍夫在不久以前还提到过的。它正是歌咏老丈夫的诗。普宁叽咕了一会儿，可是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样他可以听得更舒适些，于是我念起普希金的诗来。后来我念到了“老丈夫，可怕的丈夫”；普宁把这首长诗听完了，他立刻冲动地站了起来。

“我受不了，”他十分激动地说（对他这样的激动连我也吃

了一惊)；“原谅我，我不能够再听那个作家的东西了。他是一个不道德的造谣中伤的人；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把我弄糊涂了。我受不了！请让我现在就告辞吧。”

我极力劝普宁不要走；可是他带着一种愚蠢而可怕的固执谢绝了我的挽留；他进了好几次：他弄糊涂了，想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些时候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地颤动，他的眼睛老是躲开我的视线，好像我伤害了他似的。他就这样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家，到塔尔霍夫那儿去。

我依照我们一班大学生不讲礼节的习惯，什么人也不问一声，就一直走进塔尔霍夫的住处去了。第一间屋子里没有人。我唤塔尔霍夫的名字，也不见人答应，我打算走了；然而隔壁屋子的门打开了，我的朋友走了出来。他带了点古怪的神情望着我，默默地跟我握了手。我来看塔尔霍夫，是打算把我从普宁那儿听来的话全部告诉他的；虽然我马上就觉察到我来得不是时候，可是谈过了几句闲话以后，仍旧把巴布林对穆莎存的那份心思告诉他了。他对这个消息显然并不十分惊异；他安静地坐在桌子旁边，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我，仍旧像先前那样地不说话，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好像在说：“好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好的，把你的意思都讲出来吧。”我更加注意地望着他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出来急切的、略带嘲讽的、甚至有点傲慢的表情。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说出我的意见。而且恰恰相反。“你在装模作

样,”我想道,“那么我也不会给你留点面子!”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讲起一个人顺从一时突发的激情的害处,讲起每个人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和人格——总之,我向他进了有益的、实际的忠告。我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么一来我可以显得从容一点。塔尔霍夫并不打岔我,也不在他的椅子上动一下;他只是用手指头摸弄他的下巴。

“我知道,”我说……(我这样说话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大概是妒忌吧;不过绝不是在维护道德!)“我知道,”我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我相信你爱穆莎,而且穆莎也爱你——在你这一方面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姑且假定!”(说到这儿我把两只胳膊交叉地放在胸前。)“我们姑且假定,你的爱情得到满足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不用说,你不会跟她结婚吧?而同时你却在破坏一个诚实的好人,她的恩人的幸福——而且——谁知道呢?”(我说到这里我的脸上同时现出有远见和悲哀的表情)“也许还有她自己的幸福……”

我就这样地一直说下去,说下去!!!

我讲了一刻钟的光景。塔尔霍夫仍旧不作声。这沉默倒使我有点狼狈了。我时时望着他,并不是想知道我的话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我倒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不答话,也不表示同意,只是像一个聋哑人似地默默坐在那儿。然而最后我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是的,他的脸上的确起了一个变化。他的脸开始露出不安、激动、痛苦的激动的表情。……然而,说也奇怪,我先前最初看见塔尔霍夫所注意到的那种兴奋、愉

快、嬉笑的表情现在仍旧留在这张激动的、苦恼的脸上！我正在决不定我是不是应该庆祝我说教的成功的时候，塔尔霍夫忽然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两只手，急急地说："谢谢你，谢谢你。不用说，你是对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来，别人也可以发表意见。……你所恭维的那位巴布林究竟是个什么呢？一个老实的傻瓜——再没有别的了！你尊称他做一个共和主义者，然而他只是一个笨蛋！哼！他就是这个！他的共和主义就是这一句话：他到处都跟人搞不好。"

"啊！这就是你的意见吗？一个笨蛋！跟人搞不好！！然而让我告诉你，"我突然热烈地说，"让我告诉你吧，我亲爱的符拉季米尔·尼可拉依奇，在目前这种时代，所谓到处都搞不好，不就是好的、崇高的天性的证据吗？只有无聊的人——坏人——才是到处都搞得好，而且对什么事都可以迁就的！你说巴布林是一个老实的傻瓜！那么照你看来，还是做一个不老实的聪明人好些吗？"

"你把我的话曲解了！"塔尔霍夫大声说。"我不过向你说明我对那个人是怎样的看法罢了。你真以为他是那样一种罕见的人物吗？一点也不是！像他这一类的人我倒也遇见过的。一个人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不声不响，很顽固，瞪着一对眼睛。……啊哈，哈！看起来好像他有满肚皮的才学！可是在他的肚皮里空无所有，在他的脑子里连一点点思想也没有，——除了他自己的尊严外什么也没有了。"

"单单这一点——也就值得尊敬了，"我插嘴说。"不过让我问你一句，你从哪儿学会把他研究得这么仔细的呢？你不

认识他吧，是吗？或者你这样形容他……是根据穆莎的话吧？”

塔尔霍夫耸了耸肩。

“穆莎跟我……不谈他的事情。听我说，”他添了一句，整个身子都急躁地颤动了。“听我说：倘使巴布林真有那么崇高、那么老实的天性，那么他怎么会看不出来穆莎并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呢？二者必居其一：也许他知道他假借着感激或者这一类的名义在做一种侵犯别人的行为……倘使是这样，那么他怎么算得老实呢？也许他并不了解这一层，……那么他不叫傻瓜又叫什么呢？”

我正要回答，可是塔尔霍夫又紧紧抓住我的手，匆匆地对我讲起来。“虽然……不用说……我承认你是对的，一千次对的。……你是我的真心朋友……不过现在请你离开我，请。”

我吃了一惊。

“离开你？”

“是的，你瞧，我得把你刚才说的那一切的话好好地想一番。……我相信你是对的……不过现在离开我吧！”

“你激动到这样的地步……”我说。

“激动？我？”塔尔霍夫笑起来，但是他马上又停止了。“是的，当然啦！我怎么能够不激动呢？你自己说过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不错，我得好好地想一下……单独地想一下。”他仍然捏紧我的手。“再见，好弟兄，再见！”

“再见，”我跟着他说。“再见，好弟兄！”

我出去的时候，我还看了塔尔霍夫最后的一眼。他现出

高兴的样子。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按照真心朋友和同学的本份，给他指出了他所走的路危险吗？还是因为我离开他吗？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整天转来转去，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我走进普宁和巴布林住的房子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一天我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得承认塔尔霍夫的某一些话已经钻进了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响着。……事实上，难道巴布林……难道他真看不出来她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吗？

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巴布林，那个牺牲自己的巴布林——会是一个老实的傻瓜！！

普宁来看我的时候对我说过，昨天晚上他们盼望着我去。这是可能的事；然而今天一定没有人在盼望着我了。……他们全在家，每个人看见我去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巴布林和普宁两人都不舒服；普宁头痛，蜷曲着身子躺在炉凳[①]上面，头上缠了一条五颜六色的手帕，两边太阳角上各贴了一片黄瓜。巴布林正害着胆病。脸色完全变黄了，差不多成了深褐色，眼睛的四周现出了黑圈，前额紧蹙着，胡子也没有剃了，——看起来他实在不像一个新郎！我想走开。……可是他们不让我走，而且还煮茶来款待我。这个夜晚我过得非常不愉快。穆莎倒的确没有病。她甚至不像平日那样地怕羞了，不过她显

① 炉凳：旧式的俄国砖炉有一块类似长凳的突出物，人可以在那上面睡觉。

然很烦恼，并且在生气。……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端一杯茶给我的时候，就急匆匆地在我的耳边小声说：

“不管您说什么，不管您怎样努力，您总做不出什么来。……就是这样！”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后来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也小声地问她：

“您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她答道，她的黑眼睛在我的脸上盯了一下，马上又掉开了，她那对眼睛在皱紧了的眉毛下面带怒地闪着光，“是这个意思，您今天在那儿讲的话我全听见了，我没有感谢的理由，不过事情绝不会像您所想的那样。”

“您在那儿！”我无意地漏出了这句话。……

然而这个时候巴布林在注意我们了，他的眼光朝我们这面望过来。穆莎便离开了我。

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又设法走到我身边来。她似乎倒高兴跟我讲那些大胆的和危险的事情，而且高兴在她的保护人面前，在他的监视下面，在只要不致引起他疑心的小心安排中讲那些事情。人都知道在悬崖绝壁的边缘上走路，是女人喜欢的一种消遣。

“是的，我在那儿，”穆莎轻轻地说，她的面容并没有改变，只是鼻孔在微微颤抖，嘴唇也在扭动罢了。“是的，要是巴拉蒙·谢美雷奇问我在跟您悄悄讲些什么，我立刻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还管什么呢！”

“请您小心点，”我求她。“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注意

了。……”

“我告诉您，我准备把所有的事全对他们讲出来。您说谁在注意呢？一个像一只病小鸭似地从炉凳上伸起他的颈项，可是他什么也不会听见；另外一个正泡在哲学里面。您不用害怕！”穆莎说，她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脸颊上渐渐地现出一种恶意的暗红色；这颜色对她倒非常适合，她从来没有像这样漂亮过。她抹干净桌子，把杯子碟子收拾好了，便轻快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那种安闲自在的动作和脚步中含得有挑战的意思。她好像在说：“随您怎样批评我，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是不怕您的。”

我不能不承认，我觉得这天晚上穆莎真是可爱极了。“不错，”我暗暗地想道，“这个脾气不好的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她美极了。我敢说，她那双手是可以打人的！……好吧！也没有什么害处！”

“巴拉蒙·谢美雷奇！”她突然嚷了起来：“共和国是不是一个人们在里面可以随意自由行动的国家？”

“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巴布林抬起头来，皱着眉毛答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那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面的。”

“那么，”穆莎接着说，“在共和国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压迫强制别人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完全自由！”

"啊！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你想知道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我需要您亲口告诉我这个。"

"我们这位小姐求学的心很切，"普宁从炉凳上送过来这么一句话。

我走出屋子进了前厅，穆莎陪我出来，不用说，她并不是对我表示礼貌，她是存着先前的那种恶意来送我的。我告辞的时候，问她道：

"您真是那么热烈地爱他吗？"

"我爱他，或者不爱他，那是我自己的事，"她答道。"应当发生的事总归要发生的。"

"小心点；不要去玩火，……您会给烧伤的。"

"烧伤总比冻坏好。至于您……谢谢您那些好忠告！您怎么知道他不跟我结婚呢？您怎么知道我是那样地想结婚呢？要是我毁了……跟您又有什么相干呢？"

我刚走出去，她就砰的一声用力关上了门。

我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我的朋友符拉季米尔·塔尔霍夫要吃点苦头……对，对，对，从他的这个"新的典型"那儿，我倒有点高兴。……他应当为他的幸福付出一点代价！

至于他会得到幸福，这一点我倒毫不怀疑，虽然我因此感到不愉快。

三天过去了。我正坐在我的屋子里写字台前面，与其说是在用功，还不如是说在等着吃早饭。……我听见了沙沙的

声音，连忙抬起头来，我吓呆了。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幽灵，一动也不动，带着恐怖的样子，脸白得跟粉笔一样……这是普宁。他那对半闭的小眼睛望着我，慢慢地在闪动；它们露出一种茫然的恐怖，一只受惊的野兔有的那种恐怖，他的两只胳膊像鞭子似地垂在腰间。

“尼康德尔·瓦维雷奇？您怎么了？您怎样到这儿来的？没有人看见您吗？出了什么事情？您快说！”

“她跑掉了，”普宁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哑嗓吃力地说。

“您在说什么？”

“她跑掉了，”他又说了一遍。

“谁？”

“穆莎。她是在夜里走的，还留了一个字条。”

“一个字条？”

“是的，她说：‘我感谢你们，可是我不回来了。请你们不要找我。’我们到处跑来跑去；我们问厨娘，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说得响一点；请您原谅我。我的嗓子哑了。”

“穆莎·巴夫洛夫娜离开你们了！”我大声嚷起来。“您说的！巴布林先生一定很难过吧。他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想跑到总督那儿去；他不答应。我想去报告警察局；他也不答应，而且对我发起脾气。他说：‘她是自由的。’又说：‘我不要压迫她。’他甚至于照常到他的事务所去办公。可是，不用说，他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活人了。他爱她爱得厉害。……啊，啊，我们两个人都爱她啊！”

普宁说到这儿，才第一次表现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偶像，他也是一个活人；他把两只拳头高高地举起，随后又放下来，放在他那个象牙般发亮的秃头上面。

"忘恩的女孩子！"他呻吟起来；"是谁给你吃，给你喝，救了你，给你衣穿，把你养大的呢？是谁照顾你，关心你，把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灵魂都给了你呢？……你把这一切都忘掉了！你丢开我自然是不要紧的，可是巴拉蒙·谢美雷奇，巴拉蒙……"

我请他坐下休息一会儿。

普宁拒绝地摇摇头。

"不，我不要坐。我到您这儿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像一个疯子似的；要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那太可怕了；我躲到哪儿去好呢？我站在屋子当中，闭了眼睛在唤：'穆莎！穆左奇加！'像这样下去我真会发疯呢。可是，不，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来找您的。您知道，那一天您给我念了那首万分倒楣的歌……您该记得，那里面讲到一个老丈夫的事情吧？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个时候您就知道……或者猜到什么事情吗？"普宁看了我一眼。他突然浑身发战地叫起来："彼得·彼得罗维奇，也许您知道她在哪儿吧？小父亲[①]，她到什么人那儿去了呢？"

我窘得讲不出话来，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

"她在信里大概对你们讲了什么吧，"我说。

---

① 小父亲：一种十分尊敬的称呼，当时适用于任何身份的男人。

"她说她离开我们，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小父亲，好朋友，您一定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吧？打救她，让我们到她那儿去；我们会劝好她的。对不起，请您想想看她要把什么样的一个人杀死了。"普宁突然脸色通红，好像他全身的血都涌到他的头上来了，他扑通一声朝着我跪了下来。"打救吧，父亲，让我们到她那儿去！"

我的听差在门口出现了，他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站在那儿。

我费了不少力气才使得普宁站起来，又费了不少力气对他说明即使我疑心到什么事情，也不可以像这样仓卒地做去，尤其是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办，否则只有把事情弄糟；我又说我准备尽我的力去做，不过我不能够保证有什么结果。普宁并不反驳我，可是他也不听我讲话，他只是用他那悲痛的声音时时嚷着同样的话：

"打救她，打救她和巴拉蒙·谢美雷奇吧。"最后他哭起来了。"至少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恳求道，"……他漂亮，年轻吗？"

"他年轻，"我答道。

"他年轻，"普宁跟着我念了一遍，两边脸颊都是眼泪；"她也年轻。……这儿就是整个祸事的根！"

这个押韵的句子是偶然地吐出来的；可怜的普宁现在没有心情做诗了。我倒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再听一次他那滔滔不绝的美丽辞藻，不然就是再听一次他那几乎没有声音的笑声也好。……唉！他那些美丽辞藻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听不

到他的笑声了。

我跟他约好只要我得到一点确实的消息，我马上就去告诉他。……不过我始终没有提到塔尔霍夫。普宁突然地变得十分衰弱了。

“很好，很好，您先生，谢谢您，”他带着可怜相地说，他用了他从来没有说过的“您先生”这个称呼。“不过，您知道，您先生，您一定不要跟巴拉蒙·谢美雷奇讲什么话，您先生……不然他要动怒的。一句话说完，他不许人跟他讲。再见吧，您先生。”

普宁站起来，背朝着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他显得多么衰老可怜，我不觉吃了一惊；他拖着两只腿往外走，走一步就蹲下去一次……

“事情弄糟了！这就是所谓 finis[①] 吧，”我这样想。

我虽然答应了普宁去探寻穆莎的踪迹，可是就在这一天我到塔尔霍夫那儿去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打听出什么消息来，因为我相信要不是他不在家，就是他不肯接见我。然而我的假定却是完全错误的。塔尔霍夫在家，他也接见了我，而且我甚至知道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事情；可是这对我并没有一点好处。我刚刚跨进塔尔霍夫的门限，他就迈着坚定的快步子来迎接我，他的眼睛燃烧着，闪着亮光，他的脸显得漂亮多了，而且露出得意的神情，他坚决地、兴致很好地

① 拉丁文：完结。

说：

“听着，彼嘉兄弟！我猜得出来你是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而且你要跟我谈什么话；可是我警告你，倘使你有一个字牵涉到她，或者牵涉到她的行动，或者牵涉到你认为一般的常识所要求我做的什么事，那么我们就从此绝交，不说朋友，连普通的相识也不算，我要请你把我看作一个陌生人。”

我望着塔尔霍夫；他整个身子隐隐地在打颤，仿佛一根拉紧了的琴弦似的，他全身都在玎珰地响了，他几乎抑制不住他那汹涌的青春热血的浪潮；强烈的、欢快的幸福钻进了他的灵魂，把他完全占有了——而且他也占有了它。

“这是你的永远不变的决心吗？”我忧愁地说。

“是的，彼嘉兄弟；我的永远不变的决心。”

“这样说来，我只好对你说再见了。”

塔尔霍夫微微眯起眼睛来。……那个时候他太幸福了。

“再见，彼嘉兄弟，”他稍微带点鼻音地说，他坦然微笑了，愉快地露出他全部洁白的牙齿来。

我怎么办呢？我只有让他去享受他的“幸福”了。

我走出房来把门用力一关，那间屋子的另一道门也是砰然一声给关上了，那个声音我是听见了的。

第二天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拖着艰难的脚步去看我那两位不幸的朋友。我暗暗地盼望着（这是人类的弱点）他们不在家，这次我又错了。他们两人都在家。最近三天中在他们

身上发生的变化，不论谁看见都会吃惊的。普宁的脸浮肿，而且脸色惨白得像一个鬼。他从前那种有说有笑的习惯完全消失了。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讲着话，不过仍旧用他从前那种哑嗓，他看起来好像迷魂失魄似的。巴布林刚刚相反，他似乎收敛起来不往外露，而且比从前更黑了；他以前就不爱讲话，现在他只是偶尔发出几个不相连贯的声音；一种呆板的严肃表情好像冻结在他的面容上一样。

我觉得我不能不讲话；可是我应当说些什么呢？我仅仅在普宁的耳边小声地说："我没有探听出什么来，而且我只有一个忠告贡献给您——请您断了念吧。"普宁用他那一对红肿的小眼睛望着我(那是现在还留在他脸上的唯一的红色)，喃喃地说了一些听不清楚的话，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一边去了。巴布林大概猜到了我在和普宁谈论什么事情，他张开了那两片好像给胶水粘住了一样的紧紧闭住的嘴唇，用慎重的声音对我说："亲爱的先生，您那次来看过我们以后，我们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个受我们监护的女孩子穆莎·巴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不愿意再跟我们一块儿住下去，她决定离开我们，她给了我们一个书面通知就走了。我们并不以为我们有权阻止她，所以我们答应她，照她自己的意思做去。我们希望她过得好，"这一句是他费了劲加上去的，"我恭恭敬敬地请求您不要谈这件事情，因为谈起来不但无益，反而叫人感到痛苦。"

"现在这个人跟塔尔霍夫一样，也不许我讲穆莎的事，"我这样想道，然而我不能不暗暗地感到奇怪了。无怪乎他把柔

诺捧得那么高。我想讲几件这位大贤的事情给他听，可是我的舌头讲不出话来，其实不讲反而好些。

我不久便离开这儿，去料理我自己的事。我们分别的时候，普宁和巴布林都不对我说"再见！"他们两人却齐声说："别了，先生！"普宁甚至把我从前带给他的那一期《电信》退还给我，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再也用不着这种东西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有了一个奇遇。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早，而且很突然；正午时候的温度到了十八度[①]。万物都在变绿，从松软、潮湿的土地里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嫩苗。我在骑术学校那儿雇了一匹马，骑出城外，朝麻雀山驰去，在路上我遇见一辆由两匹倔强的维雅特卡马[②]拉的轻便马车，泥水一直溅到马的耳朵，马尾巴打成了辫子，马鬃和额毛上都系得有红带。马具是那种挂铜牌子带缨子的漂亮马具。驾车的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穿了一件青色的斗篷和一件黄色网衬衫，戴了一顶低毡帽，帽顶上插了一圈孔雀毛[③]。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小市民或者商人阶级的少女，穿了一件颜色鲜艳的锦缎短衫[④]，头上包了一方大的蓝色头帕——她一直快活地笑着。车夫也在笑。我把我的马赶到一边，让路给这一对飞也似地跑过去的欢笑的男女，可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们。突然间那个年轻人大声唤起他的马来。……怎么，明明是塔尔霍夫

① 摄氏寒暑表上的十八度，等于华氏表上的七十二度半。

② 维雅特卡马：这种马身小而圆，性倔犟，通常作黄色或浅灰色。

③ 出租马车的车夫在夏天喜欢在帽子上像这样地插些孔雀毛。

④ 一种女人穿的毛皮镶边的敞胸短上衣。

的声音！我朝四周一望。……不错，的确是他；无疑地是他，他穿着车夫的装束，而且坐在他身边的不就是穆莎吗？

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两匹维雅特卡马跑了起来，只有一会儿的工夫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我想打着我的马追上去，然而我骑的是一匹骑术学校的老马，它走着所谓“将军的步伐”，一路上摇摇摆摆的；而且它跑起来比走更慢。

“痛快地玩吧，亲爱的朋友！”我小声地喃喃说。

我得说明，那一个星期里面我虽然去找过塔尔霍夫三次，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他。他一直不在家。我也没有看见普宁和巴布林。……我就没有去找过他们。

我那天骑马受了寒；虽说天气很暖和，可是风也厉害。我害了一场大病——等到我的病一好，我便听从医生的劝告，跟祖母一块儿到乡下“吃青草”去。我就再没有去莫斯科；这年秋天我转学到彼得堡大学了。

三

一八四九年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办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了；他进了军队，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

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

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加罗霍沃依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副不好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尼康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对我的教师致这最后的敬意。……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巴拉蒙·谢美雷奇？"

"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送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同伴一路上不开口，也不抬起眼睛。跟我上次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比起来，他现在完全是老头子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铜色脸跟他满头的白发成了一个很显著的对照。在巴布林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出一种辛劳受苦的生活和不断的斗争的痕迹来；困苦和贫穷把他

折磨得太厉害了。

一切事情都已经做完，普宁的遗体永远埋在那阴湿的……不错，在司摩棱斯克公墓的阴湿的土里的时候，巴布林在那个砂土堆成的新坟前面，埋下他那个没有戴上帽子的光头，站了两分钟，然后把他那张仿佛已经变成冷酷无情的瘦脸和他那对干瘪的下陷的眼睛掉过来向着我，粗声地给我道谢，就准备动身走了；然而我阻止了他。

“您住在哪儿，巴拉蒙·谢美雷奇？让我到您那儿去看看吧。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您就住在彼得堡。我们可以谈谈从前的事情，还可以谈起我们亡友的事。”

巴布林并不马上回答我。

“我来到彼得堡这是第三年了，”他后来说；“我就住在城边上，倘使您真的想来看我，就请来吧。”他把他的住址给了我。“晚上来；我们晚上总在家……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

“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今天不大舒服；所以她今天没有来送丧。其实举行这种虚礼——这种仪式，一个人也就够了。谁会相信这种事呢？”

巴布林的最后两句话使我感到一点点惊奇，可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雇了一辆马车，要送巴布林回家，然而他谢绝了。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他。一路上我老是想着普宁。我记起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是多么快活，多么有趣；

后来在莫斯科他却变得多么柔顺了，——特别是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现在呢，他跟人生的这笔账算是结清了。看来，人生是不会开玩笑的！巴布林住在维包尔格区[1]一栋小房屋里面，这栋小屋叫我想起他那个莫斯科的"小窝"来了；彼得堡的"小窝"看起来还更卑陋。我走进他的屋子，他正坐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头上面；一枝快燃完的牛油烛发出来昏暗的光，照着他那个低垂的白头。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跳了起来，而且出乎意外热烈地欢迎我。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进来了；我立刻认出来她是穆莎——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巴布林请我到他家来的缘故；他想让我看见无论如何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了。

穆莎变得厉害——面貌、声音和举动都变了；可是改变最大的还是她的一对眼睛。以前这对带恶意的美丽的眼睛就像鲦鱼似地窜来窜去；它们老是偷偷地然而光辉地闪动着；眼光好像针尖一样地刺人。……现在它们却正面地、安静地、坚定地在望着人了；那对黑黑的眼珠失去了它们的光泽了。"我毁了，我驯了，我善良了！"她那平静无光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她那不断的柔顺的微笑似乎也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服装也朴素了；她穿了一件带小点子的褐色衫子。她向我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认识她。她显然不带一点儿窘相，这并不是因为她失掉了羞耻心和记忆力，却只是因为她已经摆脱了她的虚荣心。

---

① 维包尔格区：彼得堡最穷的地区。

穆莎谈了不少普宁的事情，她说话的声音是平平稳稳的，她的声音也变冷了。我知道他在晚年非常衰弱，他的脾气差不多变得跟小孩子一样，倘使他没有玩具消遣，他就会觉得寂寞无聊；他们倒的确劝过他用破烂东西做成玩具拿出去卖……可是他做好了却留给他自己玩。然而他对于诗的热情一直没有消失，他把什么事都忘掉了，只有诗句他始终记得。在他临死前几天他还背出《罗西亚达》中的一节来；不过他却害怕普希金，就像小孩子害怕妖怪似的。他对巴布林的忠诚也是一点儿没有减少；他仍然像从前那样地崇拜他；就是在最后他已经被死的寒冷与黑暗包住了的时候，他还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含糊地说："恩人！"

我又从穆莎的话里，知道在莫斯科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多久，巴布林又不得不离开那儿，另求职业，到处奔波，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在彼得堡他又在一家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个位置，可是因为他跟他的老板处不好，不得不在几天以前离开了：巴布林敢于袒护工人！……穆莎讲话的时候一直浮在她脸上的笑容，反而引起了我的悒郁的沉思；她丈夫的外貌所给我的印象，现在由她这笑容来绘完了最后的一笔。他们两个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苦——这是无可疑惑的。他很少参加我们的谈话；他不像是在悲伤，倒像是在焦虑。……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耽心。

"巴拉蒙·谢美雷奇，请到这儿来，"厨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她说。

"什么事？要什么？"他惊恐地问道。

“请到这儿来，”厨娘有意思地、坚持地再说了一遍。

巴布林扣好他的上衣的纽扣，出去了。

屋子里剩下穆莎和我两个人，她用了一种跟先前稍微有点不同的眼光望我，她说起话来，声音也变了，笑容也没有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不知道您现在对我的看法怎样，不过我想您一定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从前是一个自信的、快乐的人，……然而却不是善良的；我只想自己过得快活。可是我现在要告诉您的是这样：我被遗弃以后，我又变成无路可走的了，我只有两个办法：不是等着上帝来带我去，就是自己拿出勇气来自尽，——就跟上次在沃龙涅什的情形一样，我又碰到巴拉蒙·谢美雷奇了——他又打救了我。……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可以伤害我的话，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他要求的；可是他爱我……我做了他的妻子。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没有能够死，也没有能够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我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也是可感谢的恩惠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她不说了，把头掉开了一会儿……先前那种柔顺的微笑又回到她的嘴唇上来了。“请不要问我，我是不是过得舒适，”我以为我现在在她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我们又谈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穆莎告诉我，普宁留下了一只猫；那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他死了以后猫就跑到顶楼

上去，留在那儿不肯下来，只是咪呜咪呜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唤什么人似的。……邻居们都害怕得不得了，以为普宁的鬼魂附在猫的身上了。

“巴拉蒙·谢美雷奇耽心着什么事情吗？”我终于说了出来。

“您注意到了吗？”穆莎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耽心呢。巴拉蒙·谢美雷奇对他的信仰一直是很忠实的，这个我倒用不着对您说。……目前的情形只有加强他的信仰。”（穆莎讲话的口气跟她从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话里面添了一种学问的和书本的气味。）“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您，而且您怎样看……”

“为什么您以为您不能相信我呢？”

“啊，您在政府机关里办事，您是一位官员。”

“那又怎么样呢？”

“因此，您是忠于政府的。”

我暗暗地惊奇……穆莎的天真。

“政府连我这个人的存在也不知道，我更不想细说我对它的态度了，”我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我同情您丈夫的信仰……超过了您所预料的程度。”

穆莎摇了摇头。

“是的，是这样的，”她毫不迟疑地说：“可是问题在这儿：巴拉蒙·谢美雷奇的信仰也许不久就要用行动来表现了。它们不能够再隐藏起来了。我们有一些同志，我们不能够抛弃他们……”

穆莎突然闭了嘴，好像她咬着了自己的舌头似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乎我的意外的，并且使我感到了一点惊恐。大概是我的脸把我这感觉泄露了出来，——而且穆莎也注意到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次的会面是在一八四九年。不少的人仍然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怎样的骚扰和苦难的时期[①]，而且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事件[②]吧。我在巴布林的举动上，在他的整个态度上看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两次他带着那么深的怨愤和憎恨，带着那么深的厌恶谈起政府的措施，谈起那班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这使我大为吃惊。……

"那么？"他突然问我道，"您解放了您的农人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

"我想您的祖母大概死了吧，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死了。

"你们这班贵族先生们就是这样，"巴布林低声抱怨道。"用别人的手……给你们从火中取栗……你们就高兴这种事情。"

在他的屋子里最惹眼的地方就挂着别林斯基[③] 的出名

---

① 一八四八年是欧洲各国普遍地发生革命骚动的时期。

②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在一八四九年被破获、审讯、判罪的事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集团，它的成员分两派：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

③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的石印肖像。桌子上面放了一本别斯土热夫编的老的《北极星》①。

巴布林被厨娘叫出去以后，许久都不见回来。穆莎有好几次用了不安的眼光望着他走出去的那道门。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向我道了歉，便也从那道门出去了。过了一刻钟她同她丈夫一块儿回来了；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的表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巴布林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现在换上了一种顽强的、差不多是狂热的表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突然用了一种急颤的、呜咽的声音说，跟他平日讲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了，同时他那对变野了的眼睛不停地朝四面张望。“一个人活着，一天一天活下去，总希望活得好一点，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一点——可是，恰恰跟这个相反，事情只有朝坏的方面走，而且越来越坏！——他们已经把我们紧紧挤到墙边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忍受了一切；他们甚至……大概……打过我……是的，有过的！”他断断续续地加了这一句，一面站住脚后跟把身子猛然一转，好像要扑到我身上来似的；“我已经成年了，还受过体刑……是

① 《北极星》：十二月党人康·费·雷列耶夫和亚·亚·别斯土热夫所出版的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十二月党人的机关刊物。从一八二三到二五年每年一册，共出三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康·费·雷列耶夫被处绞刑，亚·亚·别斯土热夫被流放到高加索。后来别斯土热夫用马尔林斯基的笔名发表了一些小说。一八五五年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岑又在伦敦创办新的《北极星》期刊，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的；——别的不公道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难道我们还得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吗？——他们现在怎样在对付年轻人呢！——是的，一切的忍耐终于有个完结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对！稍微等一下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巴布林现出这个样子。——穆莎的脸色也完全变白了。……巴布林突然咳起嗽来，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面。我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使他和穆莎两个人感到不方便，决定离开他们，我正在向他们告辞的时候，那扇通隔壁屋子的门突然又打开了，现出一个头来。……然而这不是厨娘的头，——这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受了惊的年轻人的头。

“出了祸事了，巴布林，出了祸事了！”他急匆匆地小声说，他看见我这陌生的面貌，马上就退出去了。

巴布林跑出屋子去追那个年轻人。我紧紧地握了穆莎的手，心里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开了她。

“明天来，”她焦急地小声说。

“我一定来，”我答道。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听差便送进来一封穆莎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先生！

巴拉蒙·谢美雷奇今天晚上给宪兵们逮捕，送到要塞里去了，或者是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把我们的文件全检查过，封好一大包带走了。

书和信也是这样处置的。他们说在城里逮捕了很多的人。您可以想到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幸好尼康德尔·瓦维雷奇没有活到今天看见这个！他死得正是时候。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并不为我自己害怕——我不会饿死——然而一想到巴拉蒙·谢美雷奇，我就耽心了。要是您不怕访问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人，那么请您来看看我。

您的忠诚的

穆莎·巴布林娜

半点钟以后我到了穆莎那儿。她看见我，便伸出她的手来，她虽然不说一句话，可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感谢的表情。她仍旧穿着昨天穿的那一身衣服；我从许多地方看出来她整夜都没有上床睡过觉。她的眼睛是红的，不过这是由于缺少睡眠，并不是由于哭泣。她不曾哭过。她并不想哭。她要行动，她要跟那个落到她头上来的灾祸战斗。从前那个倔强的、固执的穆莎复活了。她虽然恼怒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她连恼怒的功夫也没有了。她怎样去帮助巴布林呢，她向谁去诉冤好减轻他的刑罚呢？——她只是在想这个，她不能够再想别的了。她想立刻就去，……去请愿，……去要求。……可是她到哪儿去呢？她向谁请愿呢？她要求什么呢？——这就是她要我告诉她的事，这就是她要跟我商量的事。

我劝她……忍耐。起初，只好等一下，并且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去打听消息。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弄个明白，现在就采

取决定的步骤，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欠斟酌的。即使我是一位更重要、更有势力的大官，也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况且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又能够做什么呢？至于她呢，她本人又是完全没有靠山的……

要把这一切对她解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后来她终于了解了我的理由；并且她也明白，我对她说一切的努力在目前都没有用处，并不是因为我存了自私的心思。

“不过请您告诉我，穆莎·巴夫洛夫娜，”等到她终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以后（在这时以前她一直是站着的，好像她马上就要出去援救巴布林一般），我又说，“巴拉蒙·谢美雷奇怎么在他这样的年纪会参加了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只有年轻人，就像昨天晚上来警告你们的那样的人，才会牵连在这种事情里面……”

“那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穆莎大声说，她的眼睛开始像从前那样地发亮，闪动了。好像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有力的东西正在从她的灵魂深处升起来。……我忽然记起塔尔霍夫从前用来批评她的一句话——“新的典型”了。“在政治的信仰上说，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穆莎说到“政治的信仰”这几个字的时候，她是特别用了劲的。我有点感觉到，她心里虽然充满了悲痛，可是她也并非不愿意在我眼前露出她这个新的意外的面目——一个配得上做共和主义者妻子的有教养的、成熟的妇人的面目！……“有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年轻，”她接着说下去，“而且更能够牺牲自己。……不过问题可不是在这儿。”

“我觉得，穆莎·巴夫洛夫娜，”我说，“您的话未免有点夸张。我知道巴拉蒙·谢美雷奇的性格，我早就相信对于一切……真诚的冲动他都会表同情；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把他看做一个有见识的人。……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在俄国结党谋叛是绝不可能而且完全荒谬的事吗？在他的地位，在他的职业……”

“自然，”穆莎带了点痛苦地插嘴说，“他是个小市民；在俄国只许可贵族们结党谋叛的，例如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①。……您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

“既然这样，那么您还抱怨什么呢?”我几乎要这样说出来了，……不过我控制了自己。

“您以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的结果可以鼓励其他同类的事情吗?”我大声说。

穆莎皱了一下眉毛。“跟您谈这种事情是没有用处的，”我在她埋下去的脸上看出了这个意思。

“巴拉蒙·谢美雷奇的案情重大吗?”后来我又冒昧地说了。穆莎不回答。……一声饥饿的、野性的猫叫从顶楼上送了出来。

穆莎给吓了一跳。

“唉！幸而尼康德尔·瓦维雷奇看不到这一切的事情！”她

① 指一八二五年尼古拉一世即位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参加者大都是贵族军官。起义失败后，五个领袖被处绞刑，许多参加革命的贵族被充军去西伯利亚作苦工。“十二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却拥护君主立宪政体。

差不多绝望地呻吟起来。"他看不到他的恩人，我们的恩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好最忠实的人，让人在夜里凶暴地抓去，——他看不到他们怎样对付这个高贵的老年人，怎样不客气地'你'呀'你'地叫他，……他们怎样地威胁他并且用什么样的话威胁他！……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市民呢！那个年轻的军官一定也是那种没有良心、没有灵魂的人，跟我从前认识的那个人正是一类……"

穆莎的声音断了。她像一张树叶似地浑身颤抖起来。

她那压抑了好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她的灵魂的大骚乱搅动了她那些过去的记忆，并且把它们带了出来，现在它们在她的内部活动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完全相信"新的典型"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那个热情的、爱冲动的天性。……不过现在叫穆莎动心的不再是她青春时期喜欢的那些事情了。我第一次到这儿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所认为是柔顺、温和的那种表情，还有实际上原本是那样的，像平静无光的眼光，冷静的声音，安静和朴素的态度——这一切只有跟"过去"，跟永远不会回来的往事连在一块儿才有意义……

如今是"现在"来讲话了。

我竭力安慰穆莎，我竭力想把话题转到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上面去。有些步骤是我们必须采取，不能再拖延的；我们必须确实探听出来巴布林究竟关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和穆莎两个人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这一切办起来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最需要的还不是找钱，倒是找工作，然而谁都知道，找工作

却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我离开穆莎的时候，脑子里装了整整一大堆的想法。

我不久就知道巴布林是关在要塞[1] 里面的……

审问开始了……而且一直拖延下去。我每个星期里面都要看见穆莎几次。她也跟她的丈夫见过几次面。可是整个不幸的事件到了决定关头的时候，我恰恰不在彼得堡。我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奉派到俄罗斯南部去了。在我离开彼得堡的期间，我听说巴布林被法庭释放了；他的罪名就只有这一点：那班年轻人认为他是一个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人，偶尔在他家里开过几次会，他本人也在场；然而行政当局却下令把他送到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省份去。穆莎跟他一块儿去了。

她写信给我说：

……巴拉蒙·谢美雷奇并不愿意这样：因为他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为着别人牺牲自己——也没有权利为着事业牺牲；不过我对他说，这并不是牺牲。当初我在莫斯科对他说我愿意做他妻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过："永不分离，永不变心！"所以一直到最后的日子都应当永不变心……

---

① 要塞：指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堡涅瓦河右岸，十八世纪起它就成了一座非常严酷的政治监狱，许多政治犯在审判前都曾被关在这里面。

四

一八六一年

又是十二年过去了。……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六一年这十二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每个俄罗斯人都知道而且会永远记得的。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过许多的变化，只是不值得在这儿细说罢了。在这些变化中间自然有不少使我发生兴趣、引起我关心的新的事情。……因此巴布林夫妇的面影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去，随后就完全地消失了。然而我同穆莎的通信却没有断过——虽然事实上我们的信件来往是非常地少；有时候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得到她和她丈夫的任何消息。我听说在一八五五年以后不多久政府便允许巴布林回到俄罗斯本土来；可是他不肯离开那个西伯利亚的小城，命运把他丢在那个地方，他却在那儿给自己造了一个窝，找到了一个养息的地方和一个活动的圈子。……

可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底我接到了从穆莎那儿来的这样一封信：

我这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最尊敬的彼·彼，所以连您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您还活着，您大概没有忘记我们这两个人吧？可是这并没有关系；我今天还是要给您写信。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情形还是像从前

那样，没有什么变化；巴拉蒙·谢美雷奇和我两人照常为我们学校的事情忙着，学校渐渐地有了进步了。此外巴拉蒙·谢美雷奇还忙着念书，写信，并且照常地跟旧信仰者①、教会的人士和波兰的流放人辩论种种的问题；他的健康非常好……我也很强健。可是昨天，二月十九日的文告② 到了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很早就盼望着它，因为好久以前我们就听到了谣言，说在彼得堡你们那儿正在进行着什么大事情。……可是我仍然没法描写我们昨天的那种情形！您很知道我的丈夫；苦难并不曾把他改变一点儿，他反倒比从前更强壮、更有劲了。（我不能不指出穆莎把"有劲"写成"有精"了。）他的意志自来是像铁一般坚强的，可是这一回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读它的时候，两只手一直在颤抖；随后他跟我接连地拥抱了三次，吻了我三次，他还想说什么话，——可是不，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淌眼泪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突然间他大声叫起来："好呀！好呀！上帝保佑沙皇！③"——是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这是他亲口说的话！随后他又加上一句："主啊，赦免您的仆人吧。"……又说："这是第一步；以后还得有其他的步骤"；他就照他在家里的样子，仍旧光

① 一六五四年俄国正教教会中发生分裂，一班守旧派不赞成教长尼康的改革，脱离教会，称为"旧信仰者"；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两百多年来备受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② 文告：指解放农奴的文告。

③ "上帝保佑沙皇"：帝俄时代俄国国歌的第一句。

着头，跑出去找我们那些朋友，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天气非常冷，外面甚至起了大风雪。我劝他不要出去，可是他不听我的话。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全身、头发上、脸上、胡子上（他现在有一部一直垂到胸前的胡子了），都盖满了雪，连眼泪都冻结在他的脸颊上了！可是他很有精神，很快乐，他还叫我开一瓶顿河崔姆良斯克产的香槟酒，我们跟他邀来的那几个朋友一块儿，为沙皇的健康①，为俄国，为俄国全体自由人干杯；他又举起酒杯，两只眼睛望着地下，说："尼康德尔，尼康德尔，你听见没有？在俄国再没有一个奴隶了！你在坟墓里欢笑吧，老朋友！"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例如："我的期望已经实现了！"等等。他又说现在不可能往后退了；又说这个文告本身便是一种保证或是一种诺言。……他的话我记不完全，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像这样地快乐了。所以我决定写信给您，让您知道我们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是多么地快乐、多么地高兴，让您也跟我们一块儿欢笑吧……

这封信是三月底收到的；五月初我又接到了穆莎寄来的另一封很简短的信。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巴拉蒙·谢美雷奇·巴

---

① 那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骗得了人民的同情。他每次出来，群众便跟在他的马车后面跑。所以两年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反动面目完全显露的时候，赫尔岑便写道："亚历山大·尼古拉维奇，你为什么不死在那一天？否则你将被视为英雄而垂名万世了。"

布林就在接到文告的那一天受了凉，后来转成了肺炎，在四月十二日去世了，他活了六十七岁。她又说，她要留在她丈夫埋骨的地方，继续进行他遗留给她的工作，因为这是巴拉蒙·谢美雷奇的最后的愿望，——因此便是她的唯一的法律。

这以后我就再没有得到穆莎的消息了。

译后记

《普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一八七四年脱稿，发表在《欧洲导报》① 上，这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彼嘉很像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祖母便是作者的生母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写照。斯巴司科叶的家园生活跟特洛伊茨基乡居生活也颇相似。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在乡间认识了自然界，认识了诗。有一个仆人（一个年轻的农奴）是一个诗的爱好者，做了他的先生，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念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彼嘉也有过这样愉快的经验。但是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开始认识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奴生活的惨苦。后来他回到他的故乡，有一回他指着一扇窗户给他的朋友们看，一面说："这是我母亲在那儿坐着的窗户，是在夏天，那扇窗开着，我亲眼看见两个人在流放的前一天，垂着光头走来跟她辞行。"《猎人日记》的作者日后的辉煌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斯巴司科叶开始的！

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是"照着活人摹写的"，他和他的

---

① 《欧洲导报》：一八五六至一九〇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杂志。这里指一八七四年出版的第四期。

年轻朋友们的审判应该是一八四九年彼得拉雪夫斯基团的审判。作者把普宁写得非常出色。英国爱德华·加尔奈特甚至赞美说，理想主义者普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至于纯洁善良的穆莎和轻浮的贵公子塔尔霍夫，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俄国，倒是常常见到的了。

巴　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门　槛

〔俄〕屠格涅夫 等著

《门槛》，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三六年六月再版；一九三九年五月改订三版。

门　　槛*

俄国 I. Turgenev 作

这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散文诗中的一首，但英译本的散文诗里却不曾把它收进去。只有几年前在美国出版的一本《革命诗选》中有这诗的韵文的翻译，题目却改作了《革命者》。我这次是依据一九二〇年柏林版《屠格涅夫集》第八卷(《俄国文库》第四十六卷)内的原文译出的。据该书编者说，一八八二年在《欧罗巴通报》上发表的散文诗内，《门槛》一诗没有能够印入，后来也不曾收入全集。这诗于一八八三年在圣彼得堡秘密印行，是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民意社的刊物上发表的。

有人说这诗是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写的，这当然有理。但我以为使屠格涅夫感动的俄罗斯女性决不只柏洛夫斯加亚一人。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子在当时的确不少。而且以前和以后也有很多。譬如尼克拉索夫就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写了题作《俄罗斯女人》的长诗。我们知道，远在西欧的老屠格涅夫虽然不能够充分了解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但一直到死他对这运动都非常关心。他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学生》杂志第五六号。

还想为一九三人审判中的米席根写一部小说，他读了苏菲·巴尔亭在法庭的演说辞，甚至俯下头去吻那张报纸(另一个俄国诗人为这个年轻女子写过一首诗)。只可惜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了。

译　　者　一九三五年五月

我看见一座大楼。

正面一道窄门敞开。门里一片阴森的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位姑娘……一位俄罗斯的姑娘。

望不透的黑暗中散发着寒气，随着寒气从大厦里传出来一个慢吞吞的、并不响亮的声音：

“啊，你要跨进这道门槛来，想做什么？你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

“我知道，”姑娘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

“这些痛苦，这些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来自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也要忍受。”

“好，那么你准备牺牲？”

“是。”

“你准备无名的牺牲吗？你会灭亡——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尊敬地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名声。”

“你还准备犯罪？”

姑娘埋下了头。……

“我也准备犯罪。”

声音停了一会，然后又问下去。

“你知道吗，将来你会不再相信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认为自己受了骗，白白地浪费了你的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然而我还是要进来。”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厚厚的门帘放下来遮住了她。

“傻瓜！”有人在后面咬牙切齿地咒骂。

“一位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这一声回答。

一八七八年五月原作
一九八四年十月重译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英国 J. Prelooker 作

这篇《虚无主义者的婚姻之真实的故事》，是蒲列鲁克尔的《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面的一章。我一九二八年在伦敦友人 T. H. Keell 处借到这书，读后就抽暇把其中我喜欢的几章译了出来。这一章是那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法国译成的，后来曾印过一本小册子，最近重读，把它修改了一遍，但手边已没有原文来参照了。

蒲列鲁克尔的生平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英俄月报》的编辑，还出版了几本关于俄国的书。《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有作者的一篇长序，从那里我们也许可以知道一点作者的事情，然而可惜我已经不能够记忆起什么了。

译　者 一九三六年三月译者

绪　言

克里米亚战争的灾祸引起了俄国政治上的大觉醒，结果产生了亚历山大二世早年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以及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同时又产生了社会上各阶级精神的激动，这样的激动在俄国以及全世界的历史上找不出一个相同的例子。俄国平民差不多是全不识字的，初等学校的数目又很少，于是

在贵族和中等阶级中间的一代新青年就生出了崇高的感情，明白了他们对于他们那般处在黑暗与无知的状态中的无产阶级弟兄们所应尽的义务。然而要去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必先要自己有知识才行。这就成了当时俄国青年的口号；这一代的青年抱着如此纯洁，如此崇高的见解，具有追求知识与自由的目的，开始以蔑视一切社会的、经济的障碍与束缚之决心和热诚，向着生活的路上出发。许多贫苦的青年，或是乡村牧师之子，或是最低级官吏之儿，常常不带一文钱大胆地从僻远的省份，跑到有大学的城市里，跑到求学问的地方，坚定地相信他们可以由各种方法去做律师、医生、教师、土木工程师、文人等等，以便来尽力帮助那般愚昧无知的平民。在许多情形中这些年轻的英雄居然勇敢地、凯旋地奋斗到底；现今许多知名的学者、著作家可以骄傲地回顾他们早年和贫穷、艰苦、患难的不息的苦斗了，这些东西不知熄灭了多少平常人的热情的火焰，然而却被他们征服了。

追求知识的欲望像传染病一样抓住了当时的俄国青年，自然那些同样希望过着独立生活而且帮助被践踏的人类的年轻姑娘，也不能是例外。但是男人在路上遇到的唯一障碍只是贫穷；而在年轻女人呢，到处都有障碍物，社会的、道德的和习俗的观念，以及各时代各国家束缚妇女的家庭专制制度把她们的成功之门完全关闭了。无怪乎那些做父母的人听说他们的毫无经验的年轻女儿要离开家到远方去先求生活，然后求学问，去追求父母们所视为怪想幻象的理想的时候，会猛烈地反对了。他们和所有做父母的人一样，以为做女儿的应该

和父母们所赞许甚至选择的女婿结婚，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我的儿子，可以由他去东奔西跑，然而我的女儿呢，她却必须留在家中，做家里的事务，一直到她出嫁的时候，我们才放她走。”这便是做父母的人的判决，自然这也是由真诚的爱和对于女儿的幸福的关心而来的。

但是女儿关于她们的生活目标也渐渐地有了她们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她们开始拚命企图从沉闷的、压制的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那些最高贵的“新妇女”便出现了。俄国的“新妇女”第一力求获得她们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其次力求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并不是为着她的自私与个人自己的安乐，而是为着便于献身给俄国、给人类、给一般的自由与进步的事业。这样的“新妇女”自从第一次露面以来，就充分地表现出她对于她所信仰的事业的真挚、热心、忠诚、自我牺牲，甚至于献出生命，这样的妇女是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所少有的。我们等着未来的历史家来公平地描写她，尊敬她罢！但在当时她却被许多人误解了，有些人的误解是好意，有些人的却是恶意的。她的父母尤其不能了解她，他们的误解常常产生悲惨的结果，因为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新的生活，更不能顺从新的方式。然而她的年轻弟兄却很看重而且尊敬她；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进步与改革的先锋，他认出她是一个和他同等的人，她是他的一个自愿的、能干的、而且分担着他的爱与舍己利人的工作的伴侣；而且当他带着创伤躺在激烈的战场上的时候，她又是他的鼓舞的、指导的、救助的天使了。在所有的人中，只有他才决意伸出手来援助她，拯救她；而且

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使她脱离父母的专制，他竟然采取非常的手段，和她实行假婚，承认她为他的名义上的妻子，并不向她要求任何权利，只是使她获得自由，可以随意选择她自己的生活。

这便是世界闻名的“虚无主义者的婚姻”的这个俄国特有的社会现象的起源和实质。有时候这一对假婚夫妇事前并不认识，婚礼完毕、离开父母之后，就分开，并没有一点关系，再见时也像平常的朋友一样。他们不会想到他们所经过的可笑的婚礼，也不管那个承认他们为一对夫妻的法律。因为沙皇的教会和沙皇的法律都是他们所极其轻蔑的东西。有时候，这一对青年会觉得彼此性情投合，思想一致，那么，便渐渐地落进了情网，最初他们都隐瞒着自己的感情，害怕暴露出这个弱点，后来“再也忍不住了”，便表白出彼此的爱情，最后会互相了解，互相接受的。

这样，无怪乎小说家和戏剧家们从这时候起就利用“虚无主义者的婚姻”做题目，创造出了他们动人的作品，而且常常添了许多他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发明出来的插话和特别的事迹来粉饰这段轶事。我们现在所说的关于这类婚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有两倍甚至三倍的趣味的。第一，它说明了初期虚无主义的政治的信条与工作；第二，它是两个为俄国的自由奋斗的高贵的先驱者和殉道者真正纯洁的恋爱的故事；第三，它又有一幅俄国乡村牧师家庭生活的写真。主人翁辛奈加布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卓越的领袖，在彼得保罗要塞及其他监狱中被囚禁了多年，最近才被释放出来。他的精神和对于革

命事业的胜利的信仰还是同样地坚强，和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样。他现在在巴黎的《过去杂志》[1] 上写了几篇连续的论文，叙述他青年时代的轶事，他的文章写得极其朴素，极其真实，使读者没有一点怀疑的余地，纵然我们不知道主人公的崇高的人格，我们也会完全相信他的话。然而他的自述过于详细，在俄国人读起来很有兴趣，而对于别国的读者，恐怕会使他们感到不耐烦。因此我们把故事稍微缩短一点，在必要的时候，才引用辛奈加布本人的话，同时还把我们和辛奈加布夫人私人通信时所知道的某一些详情一并补入。

一　牧师和他逃亡的女儿

一八七一年在欧俄东部维亚特卡省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住得有一家人：父亲名叫华西里·齐莫达洛夫，是一个本地教会的牧师。他的长女，那个又美丽，又聪明的松尼亚，刚刚在维亚特卡的教会女学校毕了业，成绩很好。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感染了当时流行的新思想，明白知识阶级对平民所负的责任，以及女人应有和男人一样受高等教育、过着服务社会的独立生活的权利。松尼亚的这些思想，和她的许多女同学的一样都是从学校里的一位教师嘉新加亚女士那里得来的。嘉新加亚已成为那般女学生的偶像，她也曾尽力帮助过许多

① 《过去杂志》(Builoe)：社会革命党人蒲尔切夫(Bourtsev)在巴黎发行的刊物，专门注重俄国革命运动的史料，上面发表过不少革命党人的回忆录。

学生去实现她们的追求高等教育的欲望。当华西里牧师到维亚特卡去看他女儿的时候，松尼亚热诚地向他叙说农民的贫困与无知，以及把一个人的一生专门用来教导他们的神圣的义务。她父亲当时被她的话感动了，对她表示很大的同情。松尼亚以为她到圣彼得堡去读书的事不成问题了。她预备到那里去进新近为妇女开办的医药专门学校。

然而回到家里，松尼亚便发觉她父亲毫无允许她到圣彼得堡去的意思。她父母所梦想的她的幸福和她自己所想的完全不同。这时候本地一个保安官开始注意到松尼亚，对她很有意思。他虽是一个中年人，却富有家财，在她父母的眼里看来，他便是最合意的丈夫。在这种情形下面，松尼亚决心逃出家庭，不管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有一天松尼亚的父母带他们的儿女到约有十二英里远近的邻村去看朋友，只留下松尼亚和年纪较她小一岁的妹子柳巴两人在家，松尼亚把逃走的计划告诉了柳巴，得到了柳巴的同情的帮助。①

松尼亚连忙收拾了几件必需的用品，雇了一辆农家马车，向离此地有七十英里远的 N 小城出发。到了 N 城，她付了车夫十二个卢布以后，自己就不剩一文钱了。幸好在 N 城里她遇见了她的同学安娜·阿夫秦尼可瓦②，和其他的朋友，她们

① 后来柳巴也从家里逃了出来，装成一个男孩，用一个男子的护照到了莫斯科。

② 安娜·阿夫秦尼可瓦后来成了著名的女医生。

帮助她供给旅费，使她能够继续往前走。

她和她的朋友们自然没有多的时间畅谈一切，因为她应该赶快渡过维亚特卡河，在对岸的一个驿站上雇马匹，到喀山去。

这是十一月的天气，河里有不少的冰块，渡船是不能经过的，过往的旅客们只得雇渔人们用他们的独木舟把他们载过去。松尼亚来到河边，天已黑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驾一只小小的独木舟过河，这太危险了。松尼亚没办法，只得找了一个地方过夜。她寄宿在一个渔人的茅屋里，渔人和他的妻儿们睡在灶上，让她在一个粗木的长凳上面睡。她拿包袱做枕头，皮大衣做被盖。灯灭了，不久灶上起了鼾声，表示所有的人都睡熟了。然而松尼亚的神经激动得很厉害，她总不能够熟睡。她不断地想这一天的事情，和她前面的不可知的将来。最后疲倦终于占了上风，松尼亚渐渐地睡熟了。忽然有人在外面高声敲着窗户，这已是中夜了。松尼亚惊醒起来，她静听着，一面骇得发抖。外面又敲了一下，有人大声叫了：

"主人，开门！"

这是她父亲华西里的声音，在惊惧中，她畏缩地藏在皮大衣下面，好像这样会逃避掉她父亲的眼光似的。

外面继续地敲着；后来渔人起来，开了门。立刻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牧师，使得那个惊慌的渔人莫知所措。

华西里借着燃烧的松木片的微光，向屋子里四周望了一下，立刻注意到屋子的一角，他女儿正缩成一团睡在那里，好像堆着一些衣服似的。

他走近她面前，用激动的，然而又温柔的音调说：

“松涅其加[1]，起来，我们一块儿回家去吧。”

松尼亚坐了起来，半昏迷地望着她的父亲。

“来，最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啊，天呀，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爱儿，你究竟怎样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牧师温和地握着她女儿的手，想拉她下来。

松尼亚明白了这样的情形，她完全绝望了。她高声哭着，她跪在她父亲面前，抱着他，吻他的双手，哀求他允许她到圣彼得堡去。她说她不能够再在家里住下去了，她以为与其过这种不自由的生活，不如死。

然而她的哀求是没有用的。牧师温和地、爱怜地、但同时又坚决地继续说道：

“不，不，我不能允许你走。回去吧！”

不用说茅屋中的这个景象是异乎寻常的，屋子里的主人静静地观看着，像迷惑不解的观众一样。

松尼亚最后明白她的逃走失败了。她站起来，沉吟了几分钟，然后以决断的声调说：“好，那么我们回去吧。”

一个这么年轻的牧师的女儿，从家里逃出去，又被父亲追了回来。这件事就足以使那些好事的人编造出种种的传说。自然并不要多少时间，松尼亚的“丑事”就传遍了全村。她回到家以后，在最初的几天她的父母还很温和、很小心地看待她，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他们便渐渐地采用压制手段了。他们

① 松涅其加：松尼亚的爱称。

常常责备她不该私逃，特别在有客人来，尽量地喝伏特加的时候。华西里牧师就滔滔不绝地讥笑那般剪发的"下流的"女虚无主义者，他说，他女儿就想加入这样的团体里去。而且说到嘉新加亚女士的时候，牧师更用了许多轻侮的字眼，他知道这样可以伤害松尼亚的心。因为他从前就私拆了嘉新加亚女士写给松尼亚的信件，明白她对于松尼亚有很大的影响。松尼亚的母亲自然是和他一般见识的，她也时常责备、抱怨她女儿。牧师和他的妻子这样做还不甘心，他们又叫用人和松尼亚的弟妹们不断地监视着松尼亚的行动，时时向他们详细报告。这一切更使这个可怜的受压迫的少女感到生活真是受罪了。然而她还有什么办法逃走呢？

有一天牧师夫妇又到邻村去看朋友，这一次却把松尼亚带去了，他们恐怕她又乘着他们离家的机会逃去。他们还派松尼亚的弟弟（一个中学学生）一路监视着她。然而在路上她居然有机会躲开她弟弟的注意，和嘉新加亚女士见了一面。她把她在家里的痛苦全告诉了她所崇拜的先生。到后来她们两个商量好采用假婚的办法，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使松尼亚获得她所珍爱的自由，而且到彼得堡去求宝贵的知识。嘉新加亚女士答应在她的虚无主义者的朋友中间去找一个适合的新郎来。

松尼亚怀着这个希望，回到了家。从此以后，她的行动完全改变了，在她的父母的眼里看来，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自然他们现在是很满意的，因为依他们的主张，一个好女儿正应该如此行为。她现在热心家务，按时到教堂去，接待客

人很有礼貌。她对待那个保安官也很和气，因此她的父母开始希望她到底会答应他的婚约了。然而松尼亚有时却也暗暗地表示说，如果她要结婚，她自己心目中还另有一个人，她并不是没有一个她自己选择的爱人。这样渐渐地又使得她的父母疑心她之所以逃走除了读书之外，还另有一个目的，大概就是去会她的情人。总之松尼亚坚决地相信依靠嘉新加亚的帮助，那个完全陌生的假新郎一定会来救她，所以她在他未来之前，就暗暗地为他准备了路，使她父母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免得后来他的突然的出现会使他们起疑心。

我们现在暂且离开这个在沉静的维亚特卡河畔、沉醉在玫瑰色前途的好梦中的年轻姑娘，把我们的眼光转过来看那急流的涅瓦河。在涅瓦河岸上，就是在这圣彼得堡城内，有一群热心的青年虚无主义者，他们开始下决心，要用种种方法把俄国人民从沙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努力在各方面去寻求帮助的人，并不管那些人的信条、种族、性别，只要是同情于他们的运动的，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同志。

二　圣彼得堡的初期虚无主义者

在一八七二年虚无主义者的密谋在俄国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这一切密谋都是以推翻这可恶的贵族政治为目的的；然而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以及将来建设中政治的与社会的形式却是各不相同。

这种骚动的实际的结果，便是在圣彼得堡和其他有大学

的城市里某一类自由地组织起来的“公社”① 的形式。这些“公社”并无严格的规律，组织很松弛，在其中，许多青年男女学生住在一起，依照自由社会主义的原理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自然在这些“公社”中总是热心与演说多过于坚实的、实际的布置，而且没有一个像能够维持久远的。不过在当时这些“公社”也有一种用处，它们还是那般改革的先驱者会议的地方，那般热诚的青年改革者在这里练习他们的演说口才，讨论各种问题，协商各种工作计划，想出传播秘密书报，和他处同志互通消息等等的办法。

在这时候圣彼得堡的I区的一个“公社”里有三个男学生(各人住一间屋子)和两个女学生(同住在一间屋子里)。这三个男学生中间有一个是塞尔该·辛奈加布。他是E省一个世袭的贵族与地主的儿子，年纪只有二十岁。有一天晚上辛奈加布正在向他的两个女同伴高声诵读席德林的小说《某城市的历史》，其中有几段滑稽的地方，使得她们忍不住大笑起来。忽然进来了一个有“聪明的前额与神秘的蓝眼睛”的红发青年。这是卡鲁新，他也是“公社”里的一个同伴。他一来就把他们的笑谈打断了，因为他们从他的面部的表情，猜出他一定带来了什么重要的消息。他们的猜想是不错的，他来向他们报告，他接到了他的好友嘉新加亚女士的信，她是维亚特卡城的一个女教师，她已经使她的许多女学生接受了她的思想，愿

① 公社：当时有新思想的学生实行一种“共同居住”制度，一些青年住在一处，所有物品都共同使用，不为个人私有，他们称这种“共同居住”为“公社”。

意参加解放人民的运动。他接着就把嘉新加亚来信中所述关于松尼亚的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嘉新加亚推荐松尼亚为“我们运动的一个最优秀、最有希望的候补人”，因此盼望卡鲁新设法在他的团体中找一个同志去充当假新郎，用假婚的办法把松尼亚救出家庭，到圣彼得堡来读书，而且愈快愈好。

他的三个同伴很细心地听他讲完了这个故事。卡鲁新又说他本人和他为着这件事商谈过的那些友人都自知不适宜去执行这个又精细又危险的工作。这个时候，辛奈加布便坦然地接受这个任务；他在当时和其他的同伴一样，不但不认识松尼亚，连她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见。我们且引用他自己的话吧：

“我们团体的一个工作就是去救助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压迫的人，帮助他们从监狱或流放地逃出来，也要帮助他们从家庭的专制中逃走，因为家庭的专制也同样地阻止被压迫的人去为解放人民的事业服务。我因此毫不迟疑地立刻表示，愿意做现在的这件事。卡鲁新万想不到会得到这样迅速的解决，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随后我们商量好卡鲁新写信把这种情形告诉嘉新加亚，只要她的回信一到，我便开始出发到战场上去实现这个计划。”

这件事就这样地决定了。然而松尼亚住的那个乡村离圣彼得堡很远，要等嘉新加亚把一切消息传达给松尼亚，和松尼亚商量好详细的办法，一定要经过长久的时间。所以辛奈加布不能在彼得堡静静地等候，他又出发到 T 城和 R 城等处，

在顿河哥萨克族中作游历宣传。他和他的哥哥屋拉得米尔[①]一起又去帮助E省的一个年轻姑娘私逃，然而事到垂成的时候，那个少女爱上了人，答应了那个人的婚约，改变了主意，不肯逃走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乌拉省E地皇家中学的学生起了风潮，反对校长，甚至把校长打了一顿。彼得堡的“团体”得到这个消息，就叫辛奈加布到那个地方去，借这个机会宣传革命。辛奈加布到了E地，什么都完了，宪兵早已“镇压了这次叛乱”，辛奈加布本人也不得不跑到乌拉岭一个铁工场里的朋友处躲避一时。在那里他便把他随身带来的秘密印刷品四处散播，并且时常向工人宣传。不久这个新来的煽动者，就引起了本地军警的注意。他们把辛奈加布叫了去，要他说明他的意见和信仰，以及他居留本地的目的。辛奈加布的回答不能十分使他们满意，他便得着限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本地的命令。

一八七二年八月底辛奈加布回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又立刻用全力来从事工厂中的宣传工作。有一次在一家纺纱厂里参观了两个小时，“昏迷的，带着头痛的”走了出来，他写作了一首又美丽又动人的诗《纺织工人的渴望》，这首诗不久就被人谱了曲，到处传唱，后来辛奈加布本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时候，听见在极北地方的流放者和工人唱着他的诗，他很受感动。

他几乎把他在本年三月里答应卡鲁新的事情完全忘记

① 他已做过政治犯，在基辅监狱里住了两年。

了，而且那时以后也就没有人向他提过这件事。忽然有一天卡鲁新来访屋拉德米尔，遇见了辛奈加布，便叫道：

“你在这里！我为了一件大事正在各处找你呢！”

原来嘉新加亚在八月里就到了彼得堡，进了女子医药专门学校。她最近接到松尼亚一封信，请求她赶快把约定了的新郎送来。卡鲁新便问辛奈加布现在是不是准备动身。

辛奈加布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自然，我准备就走，因为现在决没有理由推掉这件事情了。”

三　一幕空前的爱情剧

辛奈加布在出发以前和他的朋友们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商量好下面的一个办法。

辛奈加布假装是松尼亚的情人，当她在维亚特卡教会女学读书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她，而且向她求过婚，已经得到她的允诺。他本来就是贵族与地主的儿子，这时候也不必说假话，只要她的父亲知道他的家境很好，并且前途很有希望就行了；总之要处处表现出他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丈夫。安排好辛奈加布正在向牧师讲他的事情的时候，松尼亚便走进房里来，故意立刻投在辛奈加布的怀里叫道：“塞尔该，你到底来了！”于是他们俩便热烈地，动情地互相拥抱。然而这样的一幕喜剧，只有在这间屋子或者隔壁厅堂里有外人的时候才照样扮演，意思是叫外人出去宣传，松尼亚的未婚夫来了，使得华西里牧师不得不屈服。如果那时候华西里家里没有外人，那么，

松尼亚就不必这样表演，只等辛奈加布向牧师求婚就行了。然而辛奈加布却缺少一样东西，就是钱。因为路程既远，辛奈加布又应该打扮得像一个富家子弟，还要带点少不了的送给新娘的礼物，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们且读辛奈加布的自述吧：

“在我们的团体里，除了我哥哥而外，没有一个人穿过浆过的衬衫、时新的皮靴、流行的衣裤。我们不得不去向有钱的朋友借这些东西。我们的团体里的女士们又借了一个金表和表链给我，作为送与新娘的礼物（自然事后要物归原主的，不过如果事情被人发觉我不得不急忙逃跑时，便有失落的危险了）。准备完毕后，在动身的那一天嘉新加亚又把松尼亚的照片交给我，她说本人还要比照片上面的美丽。我又找到维亚特卡城的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因为既然假装说在那里住过，而且在那里认识了松尼亚，那么便应该知道那地方的情形，免得在谈话的时候被人问起来回答不出，露了马脚。所需要的各物似乎齐备了，我便开始了这浪漫的旅程。”

这一切的详情自然都由嘉新加亚转告了松尼亚。华西里一家所住的那个U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华西里是教堂里的正牧师，另外还有两个副牧师。华西里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很聪明，爱音乐，又好断是非。他的教区内的居民，把他视作一个权威，就是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他也有同样的势力，有人打官司的时候，也要来征求他的意见。维亚特卡主教也很信任他，他又是顾问团的一个成员。

辛奈加布到了U村，住在一家乡村旅店内。依照俄国乡村的风俗，店主把“茶炊”放在桌上，让辛奈加布喝了两大碗茶

之后，店主夫妇便来唠唠叨叨地问他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情。辛奈加布回答说，他就到这里，此行的目的是和华西里牧师商量一件大事。

“呀！”这两夫妇齐声叫道：“我们猜到了你所说的那件大事是什么。你是来做新郎的！”

辛奈加布怎么回答呢？我们且引用他自己的话：

“我不说明他们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因为更要引起他们的好奇心，我便微笑地说：‘好，我们且看罢，谁要做新郎？’”

店主夫妇看见辛奈加布高兴，更有了兴致，不停地向他说长说短，把他们所知道的华西里一家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他们又说牧师的长女如何从家里私逃，如何又被追回来，自然其中夹杂了不少的流言。

出乎店主夫妇意料之外，辛奈加布告诉他们说，这一切他都已知道了；他更知道那位姑娘为什么要私逃而且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层，他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

“哈！”店主妇叫道，“现在更明白了，你一定是新郎，我们现在也猜着她想私逃到什么人那里去了。”

“什么事都是可能的，”这就是辛奈加布的巧妙的回答。他心中暗暗欢喜，他想在他尚未会见华西里的时候，这件新闻一定会像野火一般快地传遍全村了；那么，那位顽固的牧师也不得不看重这件事情。

辛奈加布自述道：“我预备去会牧师的时间是下午六点钟，现在快到了，我换好最阔气的衣服，要求店主引我到那个人家去，我不能说一路上我心里没有一点骚动。实在，我的心

跳动得很厉害。那时间愈加逼近了，它一到也许会生出一件大的祸事来。据各方面关于华西里牧师的批评看来，他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对付的人，谁做了一件侮辱他的家庭的事，会得到他的无情的报复。然而命运已定，我只有破釜沉舟般地前进了。在我的前面，立着华西里家的两层的楼房。我走上几级石阶便进了厅堂，站在会客室的门口，我看见了牧师。他注视着我，在他的智慧的眼睛里现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是华西里·齐莫达洛夫神父么?"

"是，请问有何见教。"

"容我来报告我的姓名——塞尔该·西利奇·辛奈加布，一个世袭的贵族，E省地主的儿子，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学生。"

"我很愿意和你认识，"牧师回答说，一面和他握手，把他请进客厅，让他坐下。

他们靠着一张桌子，对面坐下，牧师动手卷一支烟，说道：

"你抽烟么? 请等一等，我过一刻就弄好了。"

"那么，让我来把我的烟敬你一支吧。"

辛奈加布取出他的精美的银烟盒，这自然也是从朋友处借来的。他们开始谈话了，最初只是闲谈点关于旅行和天气的话。过后辛奈加布说，他愿意和牧师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此来的真正目的，然而牧师主张，先用了茶点，然后再谈正事。以下我们再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说来奇怪，我一进厅堂看见华西里神父，我的神经的激动就平静了，我觉得我是如此镇静，好像我是在做一件日常生

活中最平常最自然的事情。我只看了牧师一眼，我们就有说有笑，不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厅堂里还有一位牧师坐在躺椅上，他看见我进来半起身向我点头行礼。旅店主人也留在厅堂里，自然还有几个用人也聚集在厅堂中，为的是想偷看这个不速之客。这一切情形对于我的计划，都是很有利的。客厅里有一扇门通内室，从内室里传来了一阵私语和走动的声音。门突然开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姑娘走进来，她的身材颇高，举止动人，有一对奇妙的眼睛，然而面色微带青白。我连忙站起来，这个可爱的少女叫了一声：'塞尔该，你到底来了！'就跑过来抱着我的颈项，我们的嘴唇碰在一起，接了一个如此动情的吻，这样的接吻在平常的情形中是很少见的。效验大得很！

"华西里牧师不禁惊惶地跳了起来，退到屋角里，目瞪口呆，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似的。另一个牧师是一个身长六尺以上的长人，也跳起来，昏乱到不知所措，他的态度表示出来好像他是在准备逃命。一些人无目的地在厅堂里动着，似乎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隔壁那间屋子里又送出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这是牧师的妻子的声音，她正打算跟随她女儿进客厅里来。

"同时松尼亚握着我的膀子，爱怜地靠在我的身上，然后把我引到她母亲的房里去，她母亲倒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哭着。我举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请她镇静自己，来听我解释。然而她只是惶惑地、惊惧地注视着我，反复地叫道：'你是谁？你是谁？'

“这位太太终于逐渐恢复了常态，看见松尼亚很亲热地依傍着我，便一把拉开了松尼亚，生气地叫道：‘现在你们应该分开了，我请求你们。’”

辛奈加布转过身来，看见华西里牧师站在门口，颜色青白，眼里现出迷惑的表情。

“上帝呀！”那可怜的牧师叫道，“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这是什么？”

“我立刻就要解释给你听，”辛奈加布回答道：“但看着上帝的面子，请你安静吧。你就会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毫不可怕的。”

华西里和辛奈加布二人重回到客厅里，开始了谈判，辛奈加布把他自己的事情向牧师一一叙说，而且说得很完满。他说，约在一年前他住在维亚特卡的时候便认识了松尼亚，渐渐地彼此有了爱情，后来私自订了婚约，宣誓至死不渝。松尼亚前次的出走也就是为了想去和他结婚的缘故。辛奈加布又说他的哥哥们都在本地政府里服务，他是他父亲的最小的儿子，他父亲还在圣彼得堡等候他把他的年轻的妻子带去，然后一起回到E省的田庄上去，在那里辛奈加布就要接管家产了。

这个故事说得十分圆满，十分好听，好像全是真的事实。然而牧师还是异常小心，他便冒昧地回答道：

“如果这故事是真的，那么就完全不错。不过，你知道，我害怕你是在实行什么假婚的办法。”

我们再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这时候需要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够隐藏我内心里正激起来的惊惶。幸而我还有这种力量，我不但不曾露出我内心的惊惶，还以一种仿效不出来的愤怒的表情叫道：

“‘你在侮辱我，华西里神父；你晓得你说的话有什么样的意思，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天知道！’”

好像嘉新加亚致松尼亚的信中，有一封被华西里牧师私拆了，他读出了暗示假婚的隐语，不过时间过了很久，他记不完全原信的内容了。然而这一个要点还留在他的心上，所以他这时候还起疑心。这全靠辛奈加布善于临机应变，他的举止和言谈又给了牧师一个很好的印象，牧师居然逐渐信任他，听从他了。不久松尼亚的母亲的歇斯底里症不发作了，也到客厅里来，参加他们的谈判。她很细心地考验辛奈加布，一点也不遗漏地询问一切详情。然后牧师夫妇离开了客厅，到里面去开一次家庭会议，把辛奈加布一个人留在客厅里。

“松尼亚进来了，面色仍带青白，却有一点得意的样子。我们靠着窗户坐下，开始低声谈判我们的事。松尼亚眼睛近视，却有一对很美丽的眼睛，据福列洛斯基后来批评说，‘这一对眼睛，是为他人而生的。’她很仔细地看我。我完全无须，只有一点初生的柔软的髭。虽然我已有二十一岁了，我的相貌看来只有十八岁的光景。松尼亚满了十六岁。她向我耳语道：‘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看来我们会成功。’

“自然我们彼此用最亲热的称呼，一切举动都和一般的情人没有分别。说老实话，这第一晚上我不能够饱看松尼亚。我万想不到我的假新娘会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她的照片

不能把她的实在的美表现出万分之一。狄科米洛夫[1]（他从前是我的亲密的友人，但后来改变了他的政治主张）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松尼亚道：‘要单说松尼亚美丽，这是不够的。她是稀有的美人，她出生在那个把旧斯拉夫人的典型保存得极好的俄国北部的尊贵的种族之中，可说无愧！她的聪明的面貌是十分端正，而且还表现着一种恬静的、不屈服的精神，这种精神常是那些非常动人的女子的特点。同时她的一对眼睛，以它们的孩子般天真的表情，使见到的人不得不同声赞美！’

“在这一个整月之内，我算做了这个美丽姑娘的情人，我正在开始的青春时代，我又不得不时时去和她拥抱，和她接吻。任何人都会承认做这种脚色不是没有危险的；而且，呀！那狡猾的情魔居然渐渐地把这个可怜的假新郎的心占有了。”

所谓家庭会议并没有经过许久。牧师夫妇又回到客厅，说他们还不能够立刻决定婚姻的问题，预备明天去请他们的近亲米海尔牧师来。米海尔牧师是华西里太太的妹夫，他们请他来一同解决这件婚姻大事。这时已很迟了，松尼亚和她母亲便进去安睡了。然而华西里牧师还伴着辛奈加布，他还要详细地考问这青年。他们一直谈到早晨三点钟。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很觉疲乏，辛奈加布又是很饿，因为这个令人激动的场面使得主人忘记拿饮食待客了。

---

① 狄科米洛夫原为民意社的老将，苏菲亚等人的同志，著有几本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书，后来变成了一个反动人物，任一家反动报纸的主笔。

辛奈加布便告辞回旅店去，分别的时候，自然是很亲热的。牧师又派了一个人陪着辛奈加布回去，临别时，除了说声“再见”外，还说：

“明天早晨，自然你要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和我们同住。”

第二天早晨辛奈加布九点钟起床，华西里牧师的用人已经在旅店等候着来搬他的行李了。照这样看来，事情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不过主要的事还没有来，这主要的事会伴着许多困难而来的，也许一件小小的困难就会使得全局失败。在俄国准备结婚本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何况这又是一位牧师的女儿！然而辛奈加布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忍耐地等着，焦急地守着更进的发展了。

四 婚礼前

辛奈加布住到牧师家中后，立刻变成了全家喜欢的一个人物，松尼亚的四个妹子和最小的兄弟都爱和他玩，他也处处使他们高兴，而且他还得到了华西里太太的欢心。第三天米海尔牧师带了他的年轻的妻子伊利沙白来了。家族会议立刻开始，结果是：三天以后，把这一对情人叫到客厅里来，站在一张地毡上，前面就放着神像，全家的人（用人也在内）都聚齐了，米海尔牧师站在这一对情人面前，庄严地诵读一篇订婚的祷告辞，宣告这对青年订婚了。

华西里全家便开始热心地作婚礼的准备。在这之间华西里牧师又坚持地要辛奈加布做了两件事：第一，他要引他的未

来的女婿到维亚特卡城去见主教，希望得到主教对这次结婚的祝福，因为松尼亚从前在教会女校读书的时候，曾得到主教的津贴；第二，如果婚礼要即时举行，应该先得到辛奈加布的父亲的祝福的电报。维亚特卡之行确实有莫大的危险。几年前辛奈加布的哥哥曾以政治犯资格被流放到这个城市，后来和本城知事的女儿结了婚，恰巧那位知事又是华西里牧师的相识。要是这两个人遇见了，华西里自然要把他女儿和辛奈加布结婚的事情告诉他的朋友，这样一来辛奈加布想隐瞒的事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事实上，他并不曾把他的哥哥和维亚特卡知事女儿结婚的事告诉过牧师。并且在维亚特卡城也许还有华西里的其他的相识知道辛奈加布的哥哥是一个流放的政治犯。然而这个年轻的新郎不能自由行动了，只好跟着华西里一家旅行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不过希望不要遇着这类的困难罢了。

第二个困难就是他父亲的祝福。这一件事，他们在圣彼得堡商定计划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父亲是在E省的家中，自然关于他儿子的这一段浪漫的冒险史，他一点也不知道。然而辛奈加布却向华西里说过，他的父亲现在住在圣彼得堡焦急地等候着这一对新婚夫妇的到来。这时候辛奈加布无法，只得依照牧师所说给他的父亲打了一个电报去，地址却是圣彼得堡城内他哥哥的住处，他差不多确信他哥哥接到这封电报后会懂得这情形，而且会假冒他父亲的名字回电祝福的。

牧师夫妇、松尼亚、辛奈加布一行四人，便向维亚特卡出

发了。辛奈加布自述道：

“在路上华西里神父对我十分亲热，把所有他一家的秘密以及他和那些阴谋陷害他的牧师们间的争端等等全都告诉我了。至于华西里太太呢，她也以真正母亲般的慈爱看待我，时而问暖问寒，使我在车子里坐得舒适，穿得温暖，到了每一个休息的地方，便劝我多吃多喝，真叫我的肚皮容纳不下。这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已得着了她的欢心，而在我一方面，我也渐渐真诚地敬爱她了。这自然而然地使我感到良心的痛苦，当我觉得对于他们夫妇，我不但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而且还是他们的一个无情的仇敌的时候。”

到了维亚特卡，这一家人立刻得到主教的接待，这个非宗教的辛奈加布也不得不依照正教的习惯去亲主教的肥大的手。主教并邀请他们在辛奈加布的父亲的祝福送到后立即再来他家。然而过了三天，还不见有电报来，这使他们大为焦急，自然各人的心事是不同的。第四天电报来了：“我祝福你，——你的父亲西拉·辛奈加布。”不消说，这是他哥哥从圣彼得堡发出的。

于是这一家人又去谒见主教，主教把这一对新人带进他私人的礼拜堂中，叫他们跪在祭坛前，他拿圣苏非的神像来祝福松尼亚，又拿寻常牧师的信条来祝福辛奈加布。分别以前主教又送了十个俄国古金钱① 给松尼亚。主教又劝辛奈加

① 古金钱：指 Tcherronetz，每一金钱原值三卢布，因是古钱，这时的价值就更高了。

布以后叫松尼亚的小名为“苏非”，他说：“苏非的意思就是智慧。”以后果然一般人都称松尼亚为“苏非”，不过辛奈加布总喜欢称呼她的教名——拉利沙(Larissa)。

华西里太太便开始订购松尼亚的妆奁，买了大批婚礼需用的物品。牧师提议他的妻子和女儿先回家去动手备办饮食(烘面包，做菜)，打扫房屋，进行婚礼上的一切布置，而他和辛奈加布两人留在维亚特卡城内，等候一切物品购置完备，再回家来。然而牧师太太觉得把她的丈夫留在这里，没有她亲身监督，他会去找老朋友们喝酒，喝个痛快，结果会带病回家，因此她很不放心。辛奈加布和松尼亚更希望早日离开维亚特卡，恐怕在这里会露出马脚，弄得全盘失败。他们俩也帮助牧师太太主张四个人一同回家，牧师也不得不让步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村子里的另一个牧师因事来维亚特卡，他在这里停留两星期，他答应回村时把一切的物品给他们带回来。

五　婚礼和以后的事

我们又引用辛奈加布的自述：

“我们回到村里，我就不得不穿华西里牧师送给我的一件长袍，过着整天没有趣味的生活。女人们忙着缝新娘的衣服，准备其他的她们认为是必要的东西。我从彼得堡带来了极华丽的新娘用的面纱，还有极美丽的假花，预备装饰新娘的花冠用的。我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华西里太太在维亚特卡城里也买了同样的东西，不过质量比较我买

的差得太远，因此她很懊悔冤枉花了钱。我又把从朋友处借来的金表和表链送给松尼亚，这些东西都让所有的女人满意，她们更相信我是一个有资财的新郎了。华西里发出了许多份请帖，凡是这一家的亲戚和多少有点关系的人（大部分都是做牧师的人的家族），散处在维亚特卡省各区的，都被邀请了。不久牧师们便带了他们的家眷接连地来了。

“华西里牧师又教两个执事学唱结婚时用的赞美诗，他自己也加入唱男高音。有时候一个高大的人，教堂中读圣诗者也加入唱一角。至少在整整一个星期里面，每天从早晨到晚上都听得见唱《以赛亚，欢喜罢》、《出来吧，你利巴嫩的新娘啊！》、《花冠放在他们的头上》等等的歌声。自然这歌声里面还混杂得有吃一块点心和拿着伏特加酒瓶吸一口酒的声音，那些不曾加入唱诗班的牧师都热心地来参加这种娱乐。从早晨起我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便是可以读书的话，我也无书可读。松尼亚渐渐地有时候也忘记她是在做我的情人了，她有几个小时不曾理过我，华西里太太不只一次地提醒她说：‘松尼亚，你不去和你未婚夫谈话？大清早起你还不曾向他说过一句话呢！’”

在十一月十二日这一天，婚礼算是举行了。

“在晚间五点钟的时候，那个美丽的乡村教堂里灯烛辉煌，和过节的日子一样。全村居民以及许多从邻近各村来的人齐集到教堂里。我穿上大礼服（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的一次），又穿上一件白色衬衣和项巾。脱下了我的丝的礼帽，我却戴上了一顶阿斯多拉罕地方的羊皮小帽。

我和米海尔牧师二人同坐马车最先离开屋子到教堂去。

“在教堂里看热闹的人群,分开两行,让出了一条路,给我们过去,我听见有人在私语:‘啊! 多漂亮的少年!’我有点惊惶起来了,然而我又尽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戏剧的最后一幕现在开始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在我的不能忍耐的焦虑之际,我觉得新娘来得那样迟,真正把人急煞!

“同时在牧师家里,正在举行装饰新娘与祝福新娘的典礼。从前向新娘求过婚遭到拒绝的那位保安官今天被请来做伴新娘者。他眼睁睁地望着这个十分美丽的少女,特别因为她现在穿上了新娘的服装,加以又是异常激动,看起来更是迷人,这时候他不禁在暗中垂泪了。

“最后新娘同着那个伴新娘者以及她的侍女们来了。她的脸色很惨白,她的手又冰凉,我害怕她会晕倒。她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到那指定的地点。

“唱诗班立刻像雷声一般地唱起来了:《出来吧,你利巴嫩的新娘啊!》接着一个牧师(华西里牧师的兄弟)便来举行结婚仪式,最后他叫我与松尼亚交换戒指,婚礼这样完毕了。我听见人丛中有人在说:‘现在他们配合了!’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没有一刻不觉得难过。我的头上的花冠太大了,时时滑下来,盖了我的眼睛。幸好后来有人(我想这是米海尔牧师)拿他的手巾把花冠衬垫着。我费了大力才鼓起勇气,支持下去,一直到这苦刑完毕的时候。

“我们回到家里,客人们开始大吃大喝。每一桌都唱起了《许多幸福的年代》的歌,那保安官特别地拚命高叫,有说有

笑，使人开心作乐。有许多次客人高声叫起来：Gorko[①]！于是我和拉利沙两个人便不得不依照正教的习惯互相接吻一回来回答他们。

“酒宴完毕后，华西里夫妇把我们俩引进新房。我们锁了门，只有我们两人面对面地留在房里了，大家都是在不能忍受的惊惶之中。我先灭了灯，拉利沙才脱了衣服睡进她的又漂亮、又温暖的床里；至于我呢，我把她的放物件的大柜子临时整理了一下，就睡在这里面。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把一切都收拾得齐齐整整，免得使人起一点疑心。我们这样地一连过了三夜。

“拉利沙和我又依照习俗去拜访了本地的重要人物。最后在十一月十五日我们便离家向彼得堡出发了。

“分别的一幕是很悲痛的。我的岳母哭着，做十字记号来祝福我们，把我们吻了不知多少次。我热诚地吻她的手，这一双手以如此温柔的爱怜拥抱了我。

“那可爱的乡村终于在我们的后面隐去不见了。我伸出手给拉利沙，说道：

“‘现在，我祝贺你已经得到自由了！’

“她不说一句话，只是热烈地握着我的手。

“‘那么，你对我满意么？’

“‘是，是，我深切地感谢你，’这是她的回答。

“我们到了圣彼得堡已是十一月尾。我把我的假新娘安

① Gorko：“苦啊”，或“难堪”的意思。

置在B巷‘女子公社’里，把她‘交给’嘉新加亚女士。我们的成功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在一个时期中我居然成了各团体里谈话的题目和主人公了。

“我现在有两个顾虑：一个是关系个人的，一个是关系公众的。我的假新娘真正使我动了心，我真正爱上了她，然而要向她承认我的爱情，我以为差不多是一件罪过。我应该想法去掉我的弱点，我不得不求助于公众事业。我必须将自己完全献给我们的运动，那么无聊的思想便不会来到我的头脑中了。”

六　“到民间去”——爱情的自白

辛奈加布和松尼亚在圣彼得堡并没有住多久。

这时候虚无主义的运动正进入了“到民间去”的时代，目的是在人民中间宣传新的政治思想。热心的男女青年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庭，成群结队地跑到乡村里去做田庄劳动者，做工匠，做乡村公社的书记，做医生，做教员，做接产妇等等。辛奈加布与松尼亚也在这个运动的先锋队里面，他们俩同在特威尔省的顾宾武各村中一个小学里服务。

这个学校是本村一个农民马梯洛夫创办的，经费也由他负担。马梯洛夫靠做皮靴生意发了大财，在彼得堡开设了一家大商店，他在那里居然得到尼古拉大公爵的特别关照，大公爵有时还向他借钱。这情形就使得马梯洛夫在他的家乡里成了一个霸王，他时常回到家乡，在家里放荡饮酒，招请乡民去

赴他的宴会，把自己比成王侯一般。自然全乡的人都阿谀他，不过有时他做事也颇宽厚。他待学校教师也还不错，他规定男教师年薪二十镑，女教师十二镑，另外还有一所住宅是不缴租钱的，共有两间屋子，一间厨房。在别的地方做教师是得不着这样的待遇的！

这所学校里教师就只有辛奈加布和松尼亚两个人，学生倒也不少。乡民看见他们的孩子们上了三四个星期的学，便可以高声朗读成年人所视为神秘的印字的篇页，于是大为惊奇，不绝地称赞这两位男女教师。不久学生的家属在空闲的时候，特别在过节的日子里便来请求辛奈加布教他们读书写字。自然他们的要求是得到满足的，而且这两个青年教师还组织通俗读书会，选择了关于各种题目的故事、小说，向乡民高声朗读。在聚会的时候这两个教师把人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描写得异常动人，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这两个教师也十分满意，兴致勃勃。他们虽然在表面上维持着夫妻的名义，而且往来接触又是异常亲密，晚间没有功课的时候又常在一处谈话或工作，平日甘苦共尝，患难相共（这所谓“甘苦”、“患难”都是由他们的这种教育开导无知农民的艰苦的工作而来的），但实际上只是两个亲密的友人和同志而已，并无夫妻或情人的关系。然而后来情形却改变了。辛奈加布在日记里写道：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转到了道德的和社会的题目上来，又由思想的结合而谈到爱情问题，最后拉利沙竟突然自白说她爱我，而且她没有力量再把她的感情隐藏起来了。那个

晚上我几乎高兴得发狂。我的舌头决不敢告诉她，我是何等痴狂地爱她，因为我以为这样的行为不过是我的犯罪，一方面剥夺了她的自由，另一方面又犯渎了我的假丈夫(法律上的丈夫)的身份。然而现在她自己先承认了，于是那个阻止我热烈感情爆发的障碍就立刻被打倒了。……不错，那个时候的确会使得一个人欢喜得发狂的！……"

但是他们两人的个人的幸福不久就被毁坏了，这是由于和学校主人马梯洛夫冲突的缘故。

马梯洛夫有一次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命令全村的男人和女孩都要在早晨一点钟起来，教男人点着灯在湖滨钓鱼，女孩组织唱歌舞蹈队去迎接他。其次他送了辛奈加布和松尼亚每人一匹衣料(给辛奈加布做大衣，松尼亚做上衣的)，辛奈加布夫妇本想把东西退回去，但为了免得和马梯洛夫决裂起见，只得收受了。然而更有忍受不下去的事情。有一天马梯洛夫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睡衣、拖鞋，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他的情妇)，跑到学校里来。辛奈加布不能够把他们驱逐出去，只得立刻遣散了男学生，松尼亚恐怕马梯洛夫跑到她的教室来，便把女学生也遣散了。马梯洛夫恼羞成怒，就大声辱骂辛奈加布。辛奈加布第二天便离开了学校，和松尼亚一起寄宿在一个农家里，把他们的行李也搬走了。

马梯洛夫请了村长来，第二天又请了区警察局局长来判断是非。区警察局局长动手拟一张呈文的草稿，这呈文是送到总督处去的。然而他先和辛奈加布商量，劝他道：

"你知道，辛奈加布先生，我希望你进屋去和马梯洛夫握

手，向他谢罪。生活的规则教训我们，弱者应该服从强者。”

“我自己没有一点过错，我相信马梯洛夫先生应该向我谢罪。”这就是辛奈加布的回答。

区警察局局长写好了呈文，交给辛奈加布，要他签名。辛奈加布又写出他自己的叙述，签了名。区警察局局长便和辛奈加布进屋去，把呈文交给马梯洛夫签名，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是做见证人，有的是来旁听的，大家静悄悄地坐着。辛奈加布和马梯洛夫对面而坐，中间隔着一张桌子。马梯洛夫拿着呈文，突然站了起来，向辛奈加布说：

“好，我们算了吧，塞尔该·西利奇，现在我们和解好了。你情愿么?”他把手向辛奈加布伸出来。辛奈加布回答道：

“好，那么，就此了结；你知道这争端并不是由我先发动的。”

“科尔可夫，”① 马梯洛夫看见区警察局局长撕了呈文，便叫道，“快点把伏特加和点心拿来，啤酒，快点。在我的寝室里把枪拿出来。我要从窗里放一枪，好叫人人知道我和教师讲和了。”

枪声引来了一群人，都受着马梯洛夫的酒食的款待。这件事发生在晚间，辛奈加布夫妇不久就回去了，然而里面的客人还留着在马梯洛夫家里又吃又喝，一直到天明的时候。

① 科尔可夫：仆人的名字。

七　监狱生活——奇妙的通信法

这件事发生后辛奈加布和松尼亚就决心离开顾宾武各，不久，他们俩便同回到圣彼得堡，在那里又开始在工人中作政治的宣传，一直到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辛奈加布被捕的时候。

辛奈加布被捕后，先在第三处[①]的监狱里拘留了三个星期，然后被囚到彼得保罗要塞中，在那里又被单独禁锢了两年。过后他又被囚禁在第一拘留所里过了两年，然后在一八七七年又被送回彼得保罗要塞。松尼亚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也被捕过一次，但不久就得到了自由。在一八七四年三月末她得许可每星期五到监狱里去看她的丈夫，这对于辛奈加布是莫大的欢喜。他自叙道：

"啊，天呀！我等候着每个星期五到来等得多么不耐烦啊！每一次会见她以后走回监房，心中感到说不出的痛苦，我明白此后又要整整过一个星期，我才能够和我如此热爱着的'她'相见。每个星期五早晨起来，心里实在不能安静，在监房里踱来踱去，跳上椅子，数那监狱里的大钟的节奏，想尽了各种方法来消耗这长久的等待时间。我想拿书来读，然而读不进脑里去，我的听觉总是在门那一面，静听门外的脚步，辨别这些脚步究竟是否向着我的监房走来。最后我到底被带到会客室去了，在那里如我所愿地我把她抱着，紧靠着我的胸膛，

① 第三处：即秘密警察局。

我吻她，抚摩她的手。”

自然在他们两人相会的时候，有宪兵在旁边监视着，然而松尼亚也设法给他通过简短的消息。她把消息写在纸条上，然后揉成纸团藏在口里，在接吻的时候，就由她的口传到他的嘴里了。虽然宪兵监视得很严，也被他们巧妙地瞒过了。不过这究竟也不是容易的事，照例和囚人会见时是不许耳语的，只许大声谈话，如果口里含了一个纸团，发音就有点不同，这在那般虎视眈眈的宪兵也不难辨别出来的。幸而松尼亚的方法使用得很巧妙，她不仅能和他通消息，而且还把纸条和一段铅笔也传了给他。那么辛奈加布也可以写信了。自然纸团外面是要包着铅纸的，由此才不致损坏字迹。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整整通了一年的信。后来另一个囚犯也用这个方法和他的家族通消息，一时不小心，被宪兵当场发觉。以后囚犯和家属会见时就应该隔着一张桌子对坐。辛奈加布说：“从此我只可以摸我的妻子伸过桌子这面来的手了。”

那时候的要塞司令官波各洛斯基上校还不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据辛奈加布说，他时常到辛奈加布的囚室来坐，很客气地和他闲谈，鼓舞他，安慰他，要他快活起来。几年以后波各洛斯基的儿子（一个青年军官）帮助狱中的革命党人和外面的同志通信，被发觉了。儿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父亲的官职也被革斥了。

狱中向例，要塞的守兵和狱卒是不许和囚犯谈话的；然而据辛奈加布自述，他也曾遇到几个有同情心的士兵，在他们的看守时间，他们居然设法通过监房门上的小窗洞和他谈话。

但是第二个看守人的脚步声一旦逼近，知道换班的时候已到，谈话便停止了，那个同情的士兵也就不见了。这时候辛奈加布只得暗暗叫道："啊，我何等不情愿地跟门和人离开了！"

八　狱中的骚动

辛奈加布在监狱里整整受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单独禁锢以后，才受审判。在这年代中监狱里发生过几件骚乱的事，我们在这里只能略述其大概。彼得保罗要塞的狱卒里面有几个人同情囚犯，并且作囚犯们的邮差，还使他们能够和他们的外面同志通消息。狱卒巴拉洛夫甚至设法帮助囚犯逃狱，把监狱内的钥匙交给囚犯。他们逃狱的计划商量好了。有一天狱卒拿麻醉药把典狱麻醉了，囚犯便准备逃走。不料动身的时候，典狱醒了起来，全盘计划便归失败。典狱得了五百卢布的贿赂，答应不告诉他人，囚犯们却不得不回到监房里去。这次逃狱的囚犯中有两个人在几年以后终于逃了出去，安全地住在英国。这两个人就是克鲁泡特金和瓦科夫斯基。

第二次逃狱计划也同样地失败了。囚犯们已走出狱墙，却被一个军官看见了。这个军官有着新的思想，他后来才知道逃狱的囚犯是政治犯，而且其中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朋友，他很后悔。

然而辛奈加布在狱中所经历过的一件最大的骚乱，却是学生波哥留波夫被打的事件。波哥留波夫因参加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彼得堡喀山礼拜堂前学生示威运动，被判罪作苦

工十五年。他先被囚在第一拘留所里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辛奈加布那时也由彼得保罗要塞被转移到第一拘留所。当时全拘留所的囚犯共有三百余人，其中政治犯每人都有一间单独的监房。每天在一定的散步的时间里，他们才单独地、间或成群地被带到天井内散步。不过在大半的监房里，人可以从窗里望见天井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三日警察总监特列颇夫将军参观监狱，看见波哥留波夫站在天井里不向他脱帽。他走近波哥留波夫的面前，叱骂道：

“你站在我面前敢于不脱帽吗？”

说了这样的话，特列颇夫立刻举手把波哥留波夫的小帽抓了下来，抛在地上。在监房里的人从窗里看见这件事，以为特列颇夫在打波哥留波夫了，便大叫：

“恶棍，刽子手！特列颇夫，滚开！”

其他的犯人听见这叫声，知道他们的同伴受辱的事情，也齐声叫骂，猛烈地敲击着门，震摇着窗格子，全监狱立刻变成了大骚乱的地方。特列颇夫立在天井里，听见这些闹声，看见六层楼的监狱里每个监房的窗户里露出来的威吓的面孔，他勃然大怒，指着波哥留波夫向管狱官说：

“把他带去，鞭打一顿。”

在半个小时以后管狱官骄傲地告诉政治犯：波哥留波夫挨了十三下棍棒。

全监狱的政治犯便鼓噪起来，破坏监房里的东西。特列颇夫派了一队警察来帮同狱卒压迫囚犯。鼓噪的人不消说是挨了打，又被拖进特别的惩戒室里去。有罪和无罪的人受到

一样的处罚。瓦科夫斯基本不知道波哥留波夫的事，所以一点表示也没有，然而也受着剧烈的鞭打，他正患头痛，但是现在特别是头部挨到狱卒的棍棒。辛奈加布是当时最激烈的鼓噪者之一，不过因为他毁坏尽了他的监房内的东西，用尽了力气，便静悄悄地睡着了。禁子们走过他的监房的时候，不曾听见他的声音，便不留心地走了过去，因此他免掉了此次的体刑。

这一天从早晨起囚犯们就未进饮食，其中有许多人都得了病，应该进监狱医院，或者受到病人的待遇才行，然而监狱里的办事人却置之不理。这一天本来是囚犯接见亲友的日子，但是管狱官现在不许囚犯的亲友们进狱里来。囚犯的亲友在外面听见了狱中的鼓噪，不久也就明白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消息很快地轰动全城，外面的朋友们和同志们设法通信到监狱里，劝他们停止鼓噪，应许不久就替他们报复特列颇夫的行凶。果然一个从来不认识波哥留波夫的年轻姑娘竟然从南俄跑到圣彼得堡，以向特列颇夫呈递禀帖为名，开枪打伤了特列颇夫。特列颇夫的伤势不轻，据最初验来，说有生命的危险，但特列颇夫并不曾死。那个向特列颇夫复仇的女子便是薇娜·沙苏利奇，这一枪可算是一个信号，一代的青年被惊醒起来了。至于沙苏利奇的生平，她的审判，她的无罪的释放，还需要专门留下一章来描写。在这里我们暂且和这位女革命家告别吧！

九　一九三人的审判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三人案”开审了，辛奈加布也在这一案中。这次是公开的审判，由元老院特别部组织法庭来审理。最初一百九十三个被告一起出席受审，然而一份长篇讼词宣读完毕以后，元老院又决定把被告分为十七组，分别审判。这个决定激起了被告的愤怒，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个秘密团体，其目的在推翻贵族专制的基本法律与秩序，罪名既然相同，那么为什么又要分别审判呢？这种做法明明是使他们不能够参与和了解诉讼的全部。于是他们商定对法庭的决定表示抗议，并推举辛奈加布下次开庭时代表全体被告宣言：法庭既然侵害了他们全体同时出席受审之权利，那么他们便不承认法庭的权威，所以他们要求法庭把他们全体赶出去，在他们缺席的时候，开庭审判就行了。庭长元老院议员彼得士听见这样的宣言，便向宪兵们大叫：“把他带出去！”宪兵正要带辛奈加布出去的时候，庭长彼得士又问他道：“你到底愿不愿意回答法庭的审问？”辛奈加布傲然答道：“不，在这样的法庭上我不愿意开口。”起初几天被告真是被强迫来受审的，兵士捉住他们的手把他们拖进来，然而在法庭上他们又百般辱骂法官，于是又被驱逐出去，到底还是“他们不在场的时候开庭审判”的。不过其中有一部分被告也自愿出庭受审，并且得到其余的同志的允许。如米席根和所谓“俄国革命的祖母”布列席科夫斯加亚都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一八七八年三月尾，正式的判决向被告们宣布了。在一百九十三个被告中有十二个人的罪名最大，辛奈加布便是其中之一。辛奈加布被判决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九年，其余各被告的判罪轻重不等，大部分是在西伯利亚作苦工，或单是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几年的徒刑。法庭在宣告了判决后，又照例玩一套把戏：所谓要求沙皇减刑。法官的意思是请求沙皇把苦役罪改为简单的流放罪。然而结果亚历山大二世对于那所谓十二个“最勇敢最能干的人”的刑罚，绝对不肯减轻。这十二个人的刑罚是在西伯利亚作苦工四年至二十五年不等，还有一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囚禁在要塞里，其余的人赦免。辛奈加布的九年苦役罪除去了在监中候审的四年八个月以及到西伯利亚去的途中所费去的一个月外，也只剩四年多了。

罪名既定，并不立刻执行，在判决后辛奈加布和他的同志们又被移到彼得保罗要塞里，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在这时期中监狱内发生了一次“同盟绝食”，这是由那般在狱中候审的政治犯发起的。他们的目的是在要求和已经判罪的政治犯一样，不受那种严酷不近人情的狱中待遇。辛奈加布们也加入了，他们的意思只是在援助他们的候审的同志们。整整有三天他们不曾进一点饮食，他们的亲友知道了这个消息，便成群结队地向宪兵司令麦孙采夫将军请愿，哀恳他略为答应囚犯们的要求，免得他们饿死。麦孙采夫的回答是：“让他们饿死好了，我已经给他们大家订购棺材去了。”他傲然地向那般痛苦地哀求着的可怜的囚犯们的父母、妻子、姊妹、情人说

出这样的话。

幸而麦孙采夫不能够随他的意思去做。第二天政府方面觉得看着两百多个政治犯活活饿死，究竟也不是好事，恐怕他们的亲友们会来向负责的官吏复仇。政府终于稍微让了步，允许把对于候审的政治犯的待遇放宽一点，绝食的囚犯们便进食了。然而在一两天以后他们便发觉是受了政府的欺骗。政府把他们迁移到这个要塞的另一部分就算完事，以前的允许都是假的。于是囚犯们又商量举行第二次的同盟绝食，不过这次却不曾实行，因为不久他们接着通知说外面的同志们在作暗杀麦孙采夫将军的准备了。

担任暗杀麦孙采夫将军的人乃是年轻的炮队军官克拉夫秦斯基，这个人后来逃到英国，写了不少关于俄国问题的名著，在著作界中名盛一时，一般人只知道他的假名：塞尔该·司特普尼亚克。他是辛奈加布的好友，辛奈加布知道了他预备暗杀麦孙采夫的事，曾写过一封长信给他表示反对，然而司特普尼亚克并不赞同辛奈加布的议论，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匕首刺死了麦孙采夫，而自己却奇妙地逃走了。

一〇 悲惨的收场

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辛奈加布终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在那里他过满了作苦工的年限，后来得着回到欧俄的允许，然而他却愿意住在西伯利亚，最近六年间他和他的家眷同住在托木斯克，他在该地的国立储蓄银行里充当查帐员，

在闲暇时候则从事文学。他的健康完全坏了,未到老年就显出了老态。监狱与苦役的生活,把一个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病夫。他这时候预备安静地休息一下,以便恢复他的健康。然而一九〇五年十月沙皇的《立宪宣言》出现了。这宣言虽说允许人民有宗教的和公民的自由,却使得辛奈加布更加沦于苦境。第一届“杜马”(俄国国会)选举的准备时期中,托木斯克的当局也和其他地方的当局一样,便开始“扫除”本城中所有“政治上不稳的分子”,因此在一九〇六年三月,正在患病就医的辛奈加布又被逮捕,投入监狱。过了四天,托木斯克当局便释放了他,却命令他“立刻”离开西伯利亚,不但不给他时间料理家事,而且也不许他到储蓄银行去办交代。于是辛奈加布又以政治犯的身份从西伯利亚被流放到欧俄来了!

在这一年夏季几个月之内,辛奈加布到处飘流,没有一定的住家。他不知道犯的是什么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托木斯克,和他的家属相见。后来在这年九月托木斯克总督才在辛奈加布家属的呈文上批道:“我以为辛奈加布并无不可回到托木斯克及服务原职之事。”

辛奈加布便回去了,然而储蓄银行的管辖权在西伯利亚铁道监督伊凡诺夫斯基的手里,他不许辛奈加布回到原职,他的理由是他不要“政治上不稳的”官吏。

辛奈加布夫人最近给我们的信,还报告她的家庭中痛心的悲剧。她的儿子安拉多利在赤塔联队里做军官,这个联队因近来日俄战争发生,被派到辽阳去攻击日本军队。安拉多

利反对战争，而且并不要求什么国家的利益，然而也不得不去杀人。在一个夜里和敌人冲突之后，安拉多利就不曾回到营里来。他没有被敌人擒去，那么大概是和许多士兵一样，受了重伤，被抛弃在田里，无人照顾，便死在那里了。

她的女儿娜达霞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少女，在十七岁就自杀了，在她年轻的一生中她看见的在自己家庭中和朋友中间不断地发生的惨剧，使她感到生活的不幸，把她的神经弄得异常衰弱，才有这个结局。她的二儿塞尔该，一个十六岁的青年，也因为忧郁的缘故自杀了。他是俄国专制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俄国自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时期开始以来，以至尼古拉二世的时代，所有中学校和大学校采行了极其严厉、专制的教育制度。据说学生在课余爱看革命书报和讨论政治，这是功课时间太少的缘故。于是教育大臣便改订了学校的章程，一方面增加了课程的科目，使学生没有余暇，一方面又实行严格管理。特别是中学生刚在发育的时期，一方面受着繁重的功课的压迫，一方面又无时不害怕责罚，在这种情形里生活下去，自然会向着失望、忧郁之路上走去，结果便以“自杀”来了结此生，年轻的中学生塞尔该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辛奈加布夫人以下面的令人伤感的句子结束了她的信函：

“我的其余的两个儿子虽是如此年轻，却已经享受到一个俄国人应当享受的苦刑，受着一般学生所受的迫害，甚至连流放和监禁也经验过了。现在我们还有四个孩子是活着的；然

而你知道在俄国做父母的人谁不以为他们的孩子们一出世就被判定了罪呢？我的孩子们都是属神经质而且特别善感的人，而俄国的生活情形却不允许他们的健全的器官和无所偏倚的心理的发展。我的孩子们会免掉放逐、监狱、枪弹和绞刑台而活到他们的盛时么？我多么羡慕英国的青年！他们好像享受着何等幸福的儿时，何等幸福的学校生涯！”

要结束这篇故事，我们就拿松尼亚的妹子柳巴的命运来作收场吧。柳巴在她的青春时期中也是一个极能干的女子。当她的姊姊松尼亚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从家里逃走时，她曾帮助过她的姊姊，她自己后来也为着这同样的目的，从家里逃了出来。她做了一个女教师，又做过看护妇。妃格念尔案件中牵连着她，被判罪流放到西伯利亚。她设法逃走了，然而又被捕，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的一个较远的地方去。在那里，她和一个政治流放人启尔席勒结了婚。启尔席勒后来在B地发行《阿穆尔报》，自任主笔，报纸销行甚广。启尔席勒死后，柳巴继续出版该报，然而在《立宪宣言》发布后便被当局禁止，她的印刷部和她的住宅也被没收了。她的身体在西伯利亚流放生活中逐渐衰弱，此后更无恢复健康的希望。她现在异常忧郁，精神很感痛苦，和她的两个孩子在赤塔过着贫困和悲惨的日子。

我们的故事就如此悲惨地收场了。谁读了这样忧愁的故事能不感到深切的痛苦？谁能够不拿他们的不自私的眼泪来为这篇真实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而流？他们——我们的英雄和女杰——在青春时代充满着何等美妙的希望，然而为了替他

们的同胞们谋幸福的缘故，竟毅然决然地把他们的一切个人的幸福牺牲了。他们的一切牺牲只造成了自己的如此悲惨的结局。实在这样的结局太悲惨了，也许会使得某一些读者灰心，然而事实是如此，我们也无法改变它。不过我亲爱的读者啊，你们要记着：就在这样的痛苦生活中，他们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悔恨。在他们，除了这样生活外，也没有更好的路了，如果他们能够再生一次，以充满希望的青春再来走一次生活的路，我相信他们也一定重走这同样的道路！事实上难道我们能够说世间还有人比较他们更忠实地尽过了做人的义务么？……

三 十 九 号

俄国 S. Stepniak 作

这小说是从司特普尼亚克的《沙皇治下的俄罗斯》里面译出的。这是旧的译稿，但最近曾照英文原书修改过一次。

司特普尼亚克（意思是"草原之子"）本名S. M. Kravtchinsky。是旧俄虚无主义者中卓绝的人物，又是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报" Zemlia i Voria"（《土地与自由》）的编辑。一八七八年他在彼得堡大街上刺杀了麦孙采夫将军后，便逃到西欧去过亡命者的生活，著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经历》（小说），《地底下的俄罗斯》等书，都曾风行一时。

司特普尼亚克生于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伦敦附近被火车辗死。

译　　者 一九三六年三月

一　深夜的搜查

地点是在圣彼得堡，正是一八七三年的某一夜。时钟敲着两下；全城都睡熟了，一个深沉的静寂统治着沙皇的都城。那些宽阔的荒凉的街道被摇曳的煤气灯光半明半昧地照着。

一盏一盏的煤气的街灯排成了一直行，如此挺直，恰似一排兵士。在长日的喧闹与激动之后，街道好像也感着疲倦，在休息了。还有那无数的小马车同驾车的小马，本是这个大城市里一个最使人注目的景象，它们所过之处，街道就成了车轮、马蹄、人头等等川流不息之区。这时候它们也不见了，只剩下几个空等生意上门的车夫熟睡在他们自己的四轮矮车上。高楼大厦的看门人因为这时候再没有来拜访的客人，也没有想闯入的可疑者，便在他们的岗位亭里酣睡。偶尔经过的寂寞的行人，听见踏在街石上面的他自己的沉重的脚步声，便自然地感觉到时间已经不早了。在L街与B街的街口，站着一个守卫的警士。这是他的公务时间，所以别人总以为他是醒着的。而且当他把制帽深压在额上，身子靠着墙壁的时候，便是最厉害的巡查员也很难分辨出来，究竟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暂时闭着眼睛，便于来深思这个世界的险恶，想出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来对付那般破坏社会安宁秩序者的奸计？这个好人现在可以放胆地沉溺在这些孤独的思想里；因为黑夜的催眠剂已经把他周围的人海中的斗争、贪心、情欲等等暂时地催睡了。圣彼得堡已经睡熟了。一切都是静寂的。

在黑暗、深奥的运河上，横着一道悬桥。从靠近悬桥的一所大屋里涌现出一群奇怪的东西，他们的出现是如此神奇，而且如此静悄无声。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到街心，大约到有了十五个的时候，一个轻声的命令下来了，他们便轻快地溜进那些冷落的街道中去。这一队人中半数是穿便服，半数穿制服。要是穿便服的人走在中间，前后都有穿

制服的人拥着，那么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一队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了。然而穿便服的人在前面领路，穿制服的人却在后面跟着。这一队奇怪的人走进了L街，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带的军器的响声，似乎使听见的人心惊胆战。那个好梦正酣的警士陡然一惊，便醒了过来，掀起他的制帽，挺直地站着，向这一队的首领行军礼。这首领并不理睬他。一个四轮矮车上的车夫从梦中惊醒起来，用手揩他的眼睛，惊惧地看着这一群可怕的幽灵。一个深夜的行人看见这个景象，连忙躲入旁边一条小巷子里，等候这一群人走过；然后，他从方才藏身的地方走出来望着这一群人的背影，心里很奇怪究竟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又可怜那个快要做他们的捕获物的人，这个人比他自己还要不幸，无法脱逃出他们的爪牙了。……

我们且跟随着他们。

他们经过了几条街的守望后，便转入右边的一条小街；大家都站住了，其中有三个人另走到一边，交头接耳地谈着。过后，他们又分散了，这几个人又轻声地把命令传给其他的人，说定在不远的一所大屋旁集合。这所大屋里住得有许多人家，在朦胧中看来，它好像是一个灰色的巨人；窗户都关闭着，正像一个睡在安全地方，不怕什么灾祸的人的眼睛一般。这一群人的目的便是攻入这所大屋。他们又分成了两队，一队人绕道街角，去袭大屋的后面，而另一队人则勇敢地打前线，叫醒那个酣睡着的看门人。看门人突然受了惊，跳起来，口里喃喃地说出几个不连接的字，便被一个穿便服的人制止了。于是他并不询问，也不停留，便领着这些专横的客人到他所保

卫的房子里去。他燃了一个灯笼照着路,衣服没有穿齐,帽子也不戴,他的长须在寒风里飘荡着。这一群检察官、警察、侦探等等好像等着捕鼠的猫一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宪兵们举起他们的军刀轻步走着,穿便服的人轻声地在交谈。他们正像一群盗匪,强迫着一个良民做他们的同谋者,来给他们引路一样。

后来看门人指着一家的门说道:"就是这里了。"

听见这句话,首领便做手势叫他的手下人"冲上去!",立刻所有的人都上去了,聚集在门前。首领又向他的手下人看了一眼,知道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各人守着自己的地位,他便轻声地和看门人说了几句话,并严厉地问他"懂得么?",看门人点头答应了,便走到门边,用力按了一下门铃。过后他又按了一次,几分钟后,里面的脚步声便听得见了。

"谁?"一个妇人的声音问道。

"这是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有一个电报要交给主人。"

里面的人听见这句话,便把钥匙放在锁孔里,一瞬间,门开了。外面这一群人便冲了进去,把那个披着衣服的女仆推开在一边。

这一群拥护秩序者现在把"要塞"占据了。他们的第二步的工作便是驻防。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熟了,他们便跑进寝室里,并不顾受惊的女人们的叫声和抗议,以及突然从梦中惊醒起来的小孩们的哭声。

第一次的惊骇过了以后,这个家庭的父亲便问那个看来像是首领的人,他究竟是谁,深夜闯入人家有何用意。

“我是巡察员,这位先生是检察官;我们是来搜查的。”这便是回答。

“我并不认识你,我想你是有公事的?”

“那自然。否则我不会来这里了。”

“请你把它拿给我看看。”

“用不着这样。并且我不曾把它带来。我把它放在办公室里了。然而这是不会错的。你一定是N先生。你的女儿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她就睡在那间寝室里。我们并没有别的事。我们是为着她来的。”

“然而至少也要请你把你的手下人叫出去,我的妻子和女儿不能够在他们面前穿衣服。”

“她们应该这样做,而且……”警官狞笑道。“你想我会让她们自由地活动,不用人来监视么?她们会隐藏或者毁掉那些不利于她们的证据。”

父亲在一再抗议之后,明白他完全没有力量阻止这就要发生的凌辱。他要求把他的抗议记录在报告里面。

“一定的,只要你愿意,”警官轻蔑地说道。“然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母亲和女儿便不得不从床上起来,在那一群占据她们的房屋的人面前 穿好衣服。在这种情形之下,搜查队的指挥官本有权力把他的手下人叫出去等候几分钟;他这样做,也可以表示他是有礼貌的,法律和他的上司都不会加以阻止。

后来全家的人都起床而且穿好了衣服。每一个警察监视一个成年的人。另一个警官监守着小孩们,禁止他们和大人

们通消息。于是搜查开始了。最初，房屋被搜索遍了，被褥拉乱了，抽屉打开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倾倒在地板上，一切都被精细地检查过。第二步是搜查顶楼，一孔一隅，都搜查遍了。书籍、报纸、私人通信(特别是私人通信)都被这般人极力搜寻，严密查看。俄国的警察向来是不尊重什么的。这位年轻的姑娘虽是他们的目的物，劳他们来这样地麻烦，她却站在旁边，动也不动，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好像她确信着这次搜查并不会发现什么。然而不幸对于她，这种信心未免是太早了。一个警察把她平日放个人特别信件的小橱的抽屉打开了，他摸索着那些信件，这时候她晓得了里面有一张纸条，她从前以为是已经毁掉了的。这张纸条使她异常激动，她感觉到莫大的不安和痛苦。虽然在这张纸条上并没有什么不利于她的话，但这是一个人的姓名和住址，一旦被警察拿了去，他们会拿来做证据判决那个人的徒刑和流放罪。这都是她的过失！那个警察将纸条匆匆看了一下，便另放在旁边，又继续翻阅其他的信件，他这样做就提醒那个可怜的少女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行动。她略为移动，就到了小橱旁边，一把抓起了纸条，放在她的口里。立刻两只野蛮的手便叉在她的喉咙旁边。她的父亲看见了这种情形，便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喊，连忙冲去保护她的女儿。这是没有用的！他还没有到她的面前，就有人把他推了回去，按倒在一把椅子里。一面三个恶棍过来对付那个年轻女子。一个握住她的双手，一个捏住她的喉咙，第三个便来启她的口，把他的污秽的手指头放进她的口里，要夺出她所想吞下去的那张纸条来。她被扭成一团，喘着

气，断绝了希望，还尽力来达她的目的；然而她的对手的力气太大了。在一个短期的争斗之后，那个野蛮的警察取出了一片白的软牙，上面还粘着狼藉的血肉；他把它放在桌子上。他们三个人放开手时，那个可怜的少女便晕倒在地上了①。

以后，搜查更为认真，更为热心了。许多的信件立刻被诵读了，其他的又被他们带回去预备在闲暇时间翻阅。这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在警察的支配之下，碗碟、首饰、金钱都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被搜查者不仅丧失了他的自由，而且还失掉了金钱或者值钱的东西。然而很少有人诉苦，这很有理由，因为纵使把盗窃的人认了出来，失窃者也得不到偿金，而且此后他更有了一群凶恶的仇敌，他们迟早会来向他报复的。

一直到天明的时候，搜查才停止了。什么地方都查遍了；躺椅的垫子和靠背也都被撕开来看过。年轻姑娘的寝室里的地板都被掘开了，说是下面可能藏得有违禁的书报。因为在俄国凡私藏政府所认为有害的书报，都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事情完毕了，悲惨的时候来了。那些人严厉地强迫这个年轻姑娘诀别她的家人。他们并不曾流下一滴眼泪，因为他们是极其自尊，极其愤怒，不肯在敌人的面前示弱。当她的父母抱着女儿的时候，他们的外表极其安静，然而他们的安静的

① 这不是一段想象的描写，这是真的事实。警察们对于 Varvara Battushkoff女士的举动便是这样。他们要从她的口里取出一张纸条，竟把她的牙齿打落了一颗，还有许多年轻女子也受过同样的虐待。

外表下面隐藏着无限的忧愁，无限的恐惧，无限的痛苦。她的结局怎样？那般人带去的是活泼的她，将来会放出这同样活泼的她么？那般人会使她生还到她的亲爱的人的身边么？他们还能够再见着她么？她的命运和其他许多的人的命运相同。……母亲无可奈何地尽力忍住她的呜咽，她的心为悲哀撕碎了，她再吻着她的女儿，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女儿悲痛过度，不能说出一句话来，她突然从母亲的怀里挣出来，跑到门口。

五分钟过后，辘辘的车轮声响了起来。这车轮把那个从母亲的怀里被夺走的女儿送到沙皇的地牢里去了。从此，一层黑云便压在这三个生命之上，也许要经过几年，也许要经过他们的一生。一个是在青春，昨天还充满生命和精力，现在被判定去忍受莫名的痛苦了。其他的两个是做父母的人，他们早已度过了青春；他们的暗地偷落的眼泪，他们的静寂的悲哀是更大更苦，因为他们并没有殉道者的勇气，也没有英雄的希望，他们只是平常的人。

二 拘 留 所

她坐在马车里一个角上，从掩着的百叶窗缝里，看得见街中的情景。时候虽是很早，街中已有了不少的行人。这个少女看起来像是很安静，能忍受一切的，然而她的车子走过每一条街道，她的眼光留恋着所有的东西，好像此后她便永远不能再见着它们了。外表上她很镇静，实际上她却激动得很厉害。

在半点钟以后，或者在几分钟后，监狱的门便要关住了她。自然她要经过一番审讯的手续。那是一定的。然而警察们有什么罪名可以加在她的身上呢！马车在石路上辘辘地响着，她的眼光仍旧停留在车外的什么东西上面，而同时她的心灵之眼却看穿她的内心，她在她的良心的裁判所前审讯她自己。她只有十八岁，为了继续求学的缘故，才住在圣彼得堡，而且不过几个月。时间固然不久，但已经够她去犯几件大罪了，可怜的孩子！第一，她和一位X君有亲密的友谊。这位X君从前是学生，现在却是农民中间最成功最热烈的革命的传道者。他是她的儿时的友伴。他们住在乡间的时候，他时常写信给她，她这次要毁掉的便是一封他的来信。在圣彼得堡时，他们有时也会面，他又介绍了几个和他的主张相同的朋友给她。有一个是密斯Z，她们彼此都曾帮过忙。有一次密斯Z预料到警察要来拜访，曾把一包禁书寄藏在她的家里。又有一次，她转交了一本小册子给她的一个同学。她并且允许密斯Z通信时借用她的住址。这都是严重的罪名，假若警察知道，那可不得了！然而他们不能够完全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了一点，——或者起了一点疑心。究竟他们知道了多少？知道些什么事呢？问题便在这里了。

马车的突然的停止打断了她的幻想；从车窗里看见前面是一所华丽的四层楼房，建筑的形式在从前是很精美、很庄严的。这是新的“异教审讯所”的宫殿——拘留所。这所建筑和它的长排美丽而高大的弯拱窗户好像在刑场上的兵士的方阵一般，它隐藏了人们在里面所做的一切罪恶！有许多次她曾

停留在这所两面的建筑前，她有悲哀和赞美交错的感觉，她赞美那些憔悴在这半旧的围墙内的不幸的人，同时又为他们悲哀。谁能想到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她也会落在这同样的命运里面！她下了马车，以庄重的、沉思的面容走近那高大、壮丽的拱门，于是她又和那些把她从家里抢出来的人坐上了囚车，进去了。这拱门好像一所华丽的庙宇的大门，而且恰恰能够容囚车过去。褐色的大门旁的一扇侧门静静地开了；守卫兵是一个高大有力的人，他持着笨重的枪就像持着一根竹杖。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起来好像他只是一块界石。门闩声一响，侧门便关上了。谁能说这侧门会为她而再开呢？

他们把她引到办公室去，记录下她的姓名、年岁、相貌等等。在下面有人叫着："带进三十九号去！"

"是！"上面答应了一声。

于是一个禁卒把她押送上楼，后来他又把她交给另一个禁卒，再由那个禁卒领她到三十九号的监房里。

从此这个监房便是她的世界了。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只箱子，有四步宽五步长。一张有轮脚的床，一张钉在墙壁上的小桌，一只小凳子，一只煤气管，一个水管：囚室里的陈设就是这些。她好奇地而且多少还有点惊喜地检查这些物件。这毕竟不及她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突然一阵奇异的闹声使她吃了一惊，——这神秘的叩壁声似乎是从墙里面出来的。她把耳朵贴在墙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叩声虽是微弱，却也是十分清晰的。这并不是胡乱的敲声，也不是机械般的叩声，这是有节奏的，似乎被一个有智慧的人用了来传达什么秘密的思想。究

竟这些神奇的声音能够输入些什么给她呢？啊！她懂得了！她听说过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靠叩壁声来传达消息，——他们是按照电报字母的号码叩壁的。那么，这声音一定来自邻室，一个在不幸中的同囚者有什么话要和她交谈。她也就回答了几下叩壁声，表示她的感谢和同情。接着，使她大为惊奇的，四面的墙壁都响起来了。她的正对面的一堵墙壁特别发出一串尖锐的、沉重的叩声，好像那个叩壁人已经不能忍耐，甚或发怒了。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受着苦，需要着同情！她再举起手来回答。这时候又有一阵更响亮的叩声从下面来了。这次的传声器是水管。随后从上面又起了这同样的响声，好像只是方才下面叩声的回响一般。这时候，整个监房都充满着这种小声音，恰像许多蟋蟀在叫着，跳着。

她最初只感觉到恐惧。难道在她的监房的上面、下面、四周都住着囚犯么？难道她只是那一群不幸者中的一个么？于是她感到了敏锐的悔恨和烦恼：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监狱里的字母学会呢？她不能听懂叩壁声，只使她觉得惭愧。叩壁声还是照样地继续着，她呢——差不多全然绝望了。那些叩声究竟是什么意义？她的不可见的邻人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她既然不知道叩声的意义，她怎么能回答呢？四面的叩声相继地停止了。监房里又回复到先前那样难堪的沉寂。然而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个人继续敲了起来。大概这个人怜悯她的无知，自愿来教她，这一次的叩声要轻了许多，而且格外分明，好像他是要使她能够计算叩声的次数，也不像先前那样时叩时停。她静听着，尽力想明白出叩声的意义，一个幸福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

中。她想:每一次的叩声,无论有若干下,一定是按照字母的次序,代表着一个字母的。这样说来,叩声便是很容易明瞭的了。她且等着第一次的停顿,在叩声再起的时候,她便拿字母来代入,一下代表第一个字母,二下代表第二个字母,其余类推。叩声停顿后,接着又起了许多下的叩声。她恳切地听着,极其注意地计算着,她认出了一个字母,两个字母,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拼成了一个字(Kto)。第二次的叩声代表两个字母(vy)。一句话成功了。她的邻人问道:“你是谁呢?”

她将如何回答呢? 自然是依着这同样的方法。她先叩出了她的姓名,随后彼此交换了几句话。她的邻人又教她懂得叩壁的规则,这是很简单而又很便利的,一经熟习之后再稍加练习,便能很容易地、迅速地交谈了。

靠着这种谈话方法那许多富于智慧、富于感情的人虽然被隔离着永久不能相见,却能够彼此自由交谈。他们被残酷的同类活生生地剥夺去了自由生活的权利,投在人间地狱里过着死一般静寂的生活。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孤寂,只有那无言的墙壁知道;而且就靠着这无言的墙壁,他们才能够交换他们的思想,诉说他们的悲哀。这石壁,这废铁是比人还要慈悲些,它们肯忠实地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同样不幸的人们。自然,叩壁的举动一旦被禁卒看见了,叩壁人是要受重罚的。然而墙壁是他们的极忠诚、极良善的朋友,永远不会出卖朋友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它们都准备好做他们的传话人,消他们的寂寞,减轻他们的悲哀。

而且罚也是罚不尽的;地牢里容不下这许多人。犯的人

也太多了，所以有时狱卒只好装出不看见的样子。叩壁的方法在沙皇的监狱里普遍存在，没有一处没有，特别在拘留所中更为普遍。

三十九号不久便熟习了这监狱的一切情形，而且和周围的同囚者结了亲密的友谊。因为他们的处境相同，又是共患难者，所以由此产生的友谊是很深刻的，这种友谊常常是继续到一生之久的。铁门关不住爱情，狱吏也是压不住爱情的，就靠着这叩壁传语的方法，爱情也在监狱里发生了。人们常常由此而坠入恋爱的情网里面。

三十九号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她到了拘留所以后便渐渐地对于这个新的世界发生了一种同情，最后她竟完全具有了她的同囚者们的热诚、理想和感情。她应该感激沙皇的警察，这个新世界是他们给她发现的！这个年轻女子从来不曾过着如此充实的生活。她以前专心研究学问，对于为自由奋斗的运动仅仅表示静默的同情，而且她的思想还是多少有点飘浮不定的。现在她明白一切了。她听见了同囚者的痛史，她又深知道他们的性格。她知道他们是如此忠实，如此热烈，如此真诚；现在她充满着新的改信宗教的人所常有的热心，她很快乐地觉得她还有力量来受苦，来从事工作。

然而同时她又感到悲哀，因为她的这些看不见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世，已经一一地展现在她的眼前，这些都是充满痛苦和忧愁的。他们的罪名是有等级的，从单纯的嫌疑犯一直到确定的革命党和著名的宣传家。

她的紧邻四十号是一个重罪的囚犯。他假装作农人，伪

造假护照，从事革命的宣传，因此当场被捕。他本来是一个富裕的地主，而且做过县长，大概会得着长期苦役罪的判决。六十八号的判决也不会轻。这是一个年轻女人。她出身贵族，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回国后她却到莫斯科某纱厂里做女工。警察疑心她是革命党方面的间谍，便把她逮捕了；在她的箱子里他们找出了几本查禁的小册子，他们并且恐吓着一个工人，要他供出来他曾听见她向同伴们宣读过其中的一本。这并不是什么大罪，然而在这里已经够得上长期的苦役罪了。这些还算是幸运的人呢！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的命运，而别的人连这个机会也没有的。例如十九号吧，这是住在她的监房下层的一个囚犯。他并没有什么罪。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去的小册子，是很平常的东西，不是禁书，更不能据以判罪的。然而他们说他是四十号的朋友，便把他囚禁在这里，已经有两年半了。六十三号也没有什么罪名。他去访问过一个革命宣传家的田庄，那个人不久就被定了罪。但是他所遇见的农民没有一个能证明他有罪的。不过执法官“自己心里相信六十三号是有罪的”，他就被囚禁起来，到现在已有三年之久了。[①]他的年纪虽轻，但监禁的生活完全毁坏了他的健康。住在她的监房上层的囚犯二十一号的情形更要坏些。他得了肺病，而且病势一天一天地厉害。他的罪名呢？他认识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曾有几次参加过讨论政治问题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集会。这两年来他天天都盼望着被释出狱。然而只有在他要

① 这是指 N. Morozoff（一八七三年在铁威尔省被捕）的事情。

进那更窄狭的囚禁地——坟墓的时候,他才能够脱离这窄狭的监房:坟墓![1] 她整夜都听见那个人的不停的、沉重的咳声,她的心里充满了怜悯和悲哀。

但住在她的右边的囚犯,三十八号,给她的痛苦还更大,不仅是痛苦,而且还使她感着恐怖与惊惶。这也是一个女子;她的叩壁声是如此迅速,如此奇怪(甚至还不连贯),使得三十九号费了一些时间才能够听懂她的意思。她说:

"不要相信四十号,他是一个侦探。二十一号也是的。警察放他们在这里来探听我们的秘密。每晚上我睡熟了,他们便跑进我的监房里来。他们放了一根管子在我的耳朵里,把我的思想抽出去拿给执法官看。"

这个女人疯了。她的罪名是传播社会主义的福音。她在一所纱厂里做工,和六十八号相同。她只作了几天的工,还来不及做犯法的事,便被逮捕了。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去做女工,这便是犯罪的证据。在这种无期的拘禁中过了十八个月她就疯了,但他们仍然关住她;不去找医生为她治疗,也不放她出去。在这所大的拘留所里面,四面八方都响着这合拍的叩壁声,它们带来了同样令人断肠的痛史。

三　可怜的三十九号

就在被捕的那一天,三十九号曾被带到检察官面前。从

① 这是指 Voinoiasezky 的事情。

他的问话里，她知道她偶尔和X会面的事已经被警察探到了；而且他们搜去的X给她的信函更可证明他们俩并非泛泛之交。那晚上她企图毁掉纸条的举动愈加证实了他们的疑心。她的罪名不过如此，她倒放了心。检察官又空泛地指出她是X所指导的一个秘密团体的会员，这个团体的目的在"推翻现社会秩序，毁灭财产、宗教、家庭等等"。这个罪名，她自然不承认。同时检察官又指出几个其他的罪名，问过许多事情，想探出她和革命运动的关系，对于这一切，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好吧，"检察官最后说，"你得回去反省一下。禁卒，把三十九号带回监房去。"

三十九号回到监房里异常高兴，在这次审问中她的回答很妥当，所以结果很好，况且警察又没有拿什么大的罪名加在她身上。她想不久她便会被释放出狱的。她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对于将来，她充满大的希望。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又过去了。一个整月又过去了，仍然没有再审的消息。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半年又过去了。这半年来没有一点消息来打破她的生活的单调；这样悠长的岁月，就是在那个"小箱子"里面度过去的，每天照例她有几分钟的时间在另外一个"箱子"里散步，不过这个"箱子"没有完全盖上，她还可以看见一段天空罢了。原来在这拘留所里，有一部分的天井是被隔离成许多小方块的，每个方块的四周都有高的墙壁围绕着，为的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也不要囚犯们彼此看见。她开始厌倦生活了，这样单调

的刻板生活，她实在不能忍受下去；她时常焦急地自问：到底结局怎样呢？

在第七个月末尾，她差不多已经完全把希望抛掉了的时候，她又被带到检察官面前受第二次审问。她想，他们一定会释放她了！无论如何，他们总不能够把她长久拘留在这里。

“你反省过了没有？”

“是。我已经反省过了。”

“你有什么话要加在前次的供词上面吗？”

“没有。”

“真的？那么，回到你的监房去！我要叫你朽腐在这里。”

“我要叫你朽腐在这里。”这句刻板的话几乎没有一个政治犯不听过多少次。

这一次三十九号回到监房里就不像前次那样了。前次审问后回来时她是心旷神怡，满面光彩。现在呢，一种恐怖的和失望的令人痛楚的感觉压倒了她，使她的心碎成了片片；起初她还不能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也不能了解它。这是什么呢？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那个可怕的检察官！他那毒蛇一般的语言！这时候，她记起了他打发她回监房时候说过的话。他要叫她朽腐在这里！他的话并不是用来徒然威吓她的，在她的周围，那许多人都是很好的证据。

三十八号那个疯女人又在狂暴地叩壁了。

“你可恶的叛徒，你一定告发了我。我这里有一个人，他养了一袋饿鼠，他会叫它们来吞你的！胆小鬼！胆小鬼！你就是胆小鬼！”

那个可怜的疯子又在发狂了。

一种绝大的恐惧占据了她的心。她叫道:“可怕啊! 可怕啊! 我有一天也会变成像她这样的么?”

岁月往复地交替着;四季照例地循环着。她失掉自由的时候,是在秋天,第二个秋天来了又去了,现在第三个秋天又过去了,——然而失去的自由仍旧不曾归来;它好像是永不归来的了。可怜的三十九号仍然在监房里憔悴着,孤寂的囚禁生活使她的形容日渐枯瘦,即使她自己的母亲能到这里来看她,她也很难认出这个憔悴的女子便是警察们从她的怀抱中夺走的爱女了。

在第二年末,一个可怕的危机来到了她的身上。这种无变化、无事做、无交际、单调的刻板生活,她实在不能忍耐下去。她渴望空气,渴望运动,渴望自由;这种欲望日益强烈,差不多要使她疯狂了。有一天早晨她醒来时,觉得要是她在这一天不被释放,她一定会死在监房里面。在她的前面没有别的,只有监狱——永远是监狱!

她写了许多封信给检察官,请求他把她判决流放罪,遣送她到西伯利亚的矿坑里去,判决她去做苦工。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做什么苦的工作她都愿意,只要能够逃出这个活葬的坟墓。

检察官几次来到她的监房里。

“你有什么话要加在前次的供词上吗?”这是他的不变的刻板的问话。

“没有。”

“好，我还要叫你去反省一下。”

她哀求她的母亲设法把她保释出狱，静候审讯。然而她的父母也无法援救她。所有他们的申请书都得着同样的回答：“你们的女儿异常顽固，不肯悔罪。你们可以劝劝她改变主意。我们无法可想。”

至是她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中了。自杀的念头开始来到她的脑里。有几次她以为她已经疯狂了。幸而她的身体的衰弱，减少了她的生活的精力，麻木了她对于痛苦的感受力。因此她才得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

缺乏空气，缺乏运动，饮食不良，饮食不足，这些对于这个发育未全的青年女子自然有了很坏的影响。她的双颊曾一度是如此美丽，如此少壮，但如今健康之花不再开在它们上面了。她的脸上已染了那些病的植物所特有的绿黄色。但她并不曾消瘦；她的脸反而肿大发胖了。不活动与幽囚的生活软弱了她的细胞组织，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她的一切行动都是迟缓的，怠惰的，机械的。她看起来好像长了六岁。她可以停住不动，眼睛定在一个物件上面过半点钟之久，好像她在沉思一般。其实她并不是在沉思，因为她的脑筋，和她的筋肉一样，也已经迟钝了。起初她拚命地诵读狱吏所允许她的母亲送进来的一切书籍。现在她很难使她的思想集中，因此她接连读不到两页，便感到了异常的疲倦。她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一种麻木的催眠状态中，身心两方面都非常疲乏。她不再愿意谈话或计划将来了。一个人失掉了希望的时候，谈谈空话，侈说将来，这有什么益处呢？她从前的好友——墙

壁，现在和她疏远了。那些墙壁曾经一度把她的最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现在她不再亲近它们了。她的邻居仍然保持着对她的忠诚的友谊，他们了解她的静寂的原因，他们为着她的悲哀与失望而焦虑。他们常常温柔地送了一些安慰的话来。因为没有得着她的回答，他们便不再叩壁了；他们恐怕在她的绝望的情形中他们的话也许会被误解为近于讥讽而伤害她的心。然而他们仍旧不断地想念她，怀着爱怜的关心静候着她的消息。

"三十九号病了"，一堵墙壁向另一堵墙壁说。

一堵墙壁传给一堵墙壁，一块石头传给一块石头，转瞬间，这个恶消息就传遍了全监狱。整个建筑都忧愁地响着这同样的回声："应该为可怜的三十九号想点法子才好。"

石头的声音最后变成了人声。囚犯们要求禁卒去请一个医生来为三十九号诊病。

一个医生伴着一个警察来了。他诊了三十九号的病。病症是很平常的，——监狱里的血枯病，肺受了很严重的影响，神经系统完全错乱了。总之，她患的是监狱病，完全是由监狱的生活而得来的。

这个医生做了狱医时间还不久，所以他还有一点慈悲心；他还多少怜悯别人。然而这种情形他已看得不少了，也就习以为常；况且对一个政治犯表示过多的怜悯，会使别人疑惑他自己是她的一个秘密的同情者，那么自己的地位倒危险了。

"并没有什么要紧的病，"医生这样说。

这些墙壁在悲伤的沉寂里静听着这个判决。啊，这痛苦

是何等地可怕！这悲哀是何等地难言！只有这些墙壁知道！只有它们来作证了！然而它们还是有感觉的，当它们听见了这样的判决后，它们发出叹声道：

“可怜的三十九号！可怜的三十九号！她的结果怎样呢？”

薇　娜

波兰 L. Kampf 作

《薇娜》是廖玻德·抗夫二十七岁时的作品。抗夫便是剧本《夜未央》的作者，这剧本在中国有过大的影响。

抗夫的生平，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波兰克拉科夫。他自小便爱好戏剧，从六岁起，就常到本城的戏园里看戏。以后他加入了波兰的社会党，是一个活动分子，后来在国内站不住脚，便亡命到德国去。《夜未央》是在德国写成的，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这剧本次年（一九〇七）被译成法文，在巴黎艺术剧院上演，轰动一时，两年中间连演百余次，夜夜满座。

《薇娜》似乎是一篇自传的小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抗夫写《夜未央》的动机和经过。

这是我八年前的旧译稿，从法文译本重译出来的。现在编进这集子时，曾参照法文本改动了一些字句。

译　者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

我一到柏林，便去会我的朋友弗列德·波痕。我们的年纪

相同，自小就同在本乡的小学和中学里读书，随后又一道游学维也纳。在大学里听讲时，我们又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他是研究化学的，我是法科学生。

在第三年，第五学期中间，我因事回到家里住了几个月。等我重到维也纳时，弗列德已经不在那里了。过了几年，我们都不曾见面。他当时多半在日内瓦，后来我听说他在伦敦。再后又听说他在巴黎。他这样地旅行，究竟有着什么目的，沿着什么路线，却没有人知道，后来我从报上知道在柏林有一个化学家制造出一种曲颈蒸馏瓶，因而得名，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和一个女伶结了婚……这就是我的老友波痕。我很高兴和他再见，所以一到柏林，便先去看他。

我们亲热地拥抱着。

他正要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雪茄烟给我，邻室里电话的铃声响了。

“你自己取吧，在右边的抽屉里，”他说罢，便急忙地出去了。

然而右边的抽屉共有三个。我打开了第一个：里面尽是些文稿，我立刻起了一种畏惧和尊重，连忙关上了。在第二个抽屉里有一个大匣子。这实在不像他放雪茄烟的匣子，不过为了免掉我的疑心，我便揭开了盖子来看。

啊！这是一束头发，一半编成了辫子，一半是散开的。

我害怕起来了。恰巧近来在弗立特齐街上，有几个年轻姑娘在一阵拥挤之际，一个不当心被人把她们的辫子剪去了。现在警察正在缉拿那个偷剪辫子的人。

弗列德·波痕回来了。

“原来你就是那个偷剪辫子的人?”我惊惶地问道。

他惊异地望着我:他看见我手里拿着的那盖子,他便明白了我的问话。

“不,不是。你不要惊慌!”说着,他向我微微一笑,这是叫我安静的意思。过后,他沉思着。

我们点燃了雪茄烟;大家都不开口。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何以在我的办公室里会有这一根辫子?”

“我不愿意做一个轻率的人。”

他拍我的肩,一面说:“轻率的人? 在像我们这样的老朋友中间,还有什么轻率不轻率! 现在还有一件同样奇怪的事:就是,在久别之后,刚刚见面,我便向你叙述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那么,就请你听着吧!”

二

你该记得,那时我们都在第五学期,假期以后你便不曾再到学校,我一个人回去了。离开了你,我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真正的相识,因此,我便过着最寂寞单调的生活。星期天午后的忧郁尤其难受。有一天,因为闲着无事,我出去散步,走到郊外的大路。温和的秋天的太阳快落下去了,风吹着,割得人脸痛,而且还戏玩着妇女们的裙子,吹落了男子们的帽。我逆风而行,借着和风相斗以取乐。

一个影子在我的面前溜过。起初我只辨别出这是一个女

子：一对发亮的眼睛。我停住脚，转过头看。“她”飘然地走了，好像被风载去了一般。在她的英国式的便帽下面，露出了丰富的带黄色的棕色头发；围着她的颈项的那条长围巾，被风吹得摺叠成各种样式，陪衬出她那可爱的婷婷倩影。

我多么愿意再看见那一对眼睛！我便跟随着她。不久我们两个都到了大学的附近；她转入大学路，然后走在一带拱廊之下，瞬息间，她推开一道门进去了。

这是一所最朴素的咖啡店。我也进去了。两间屋子里都充满了闹声和烟雾。我一进门便感到一种奇异的畏怯。我好像跑进一个秘密结社，其中所有的人都是互相熟识的，只有我一个人是闯入的生客。然而，不久，我的眼睛也就和这种环境熟习了，我开始从烟雾中分辨出这屋子里的人和物。我发现“她”坐在一个角上。我在寻找一个座位。所有的椅子都被客人和报纸占据了；不过，一会儿，侍者搬开了一堆印刷品，让出一把椅子，我便坐下了。

我为什么进来的呢？我几乎忘记了，我愈观察这种新环境，我愈感觉到不安。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连极小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的。这便是我的那种时候了。

邻桌上有人在叫：

“弗南兹，开帐来。”

“呢！”弗南兹连忙跑了过来。

“一杯纯咖啡。”

“八个。”①

“一块软面包。”

“十一。”

“八小块白面包。”

“二十七。再没有别的东西吗？谢谢。”

一个人在五点钟喝咖啡的时候，居然能够吃完九块小面包，这是很奇怪的事；我觉得有趣，便向着那张桌子一望。我立刻惊诧异常，因为我看见一个麻面的青年，他有凹进的肚腹，瘦弱的面颊，深长的头发和幻想的眼睛。他很阔气地，丢了两个“克罗侧”② 在盛“薄酒”的杯子里，然后扯起上衣的领子走了，他在晚间的寒风中行路，连一件大衣也没有。

每张桌子上放满了无数杯的水，人们正在激烈地辩论。其中许多人的相貌我好像是认识的；我记起曾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候，看见过这些人。他们是属于各阶级的，不全是学生。在一张桌子旁，我看见了那个在化学实验室里和我邻近的同学。

这时，我便知道这里的客人都是俄国人。

我的同学看见了我，向我的桌子这面走来。他说：

“亲爱的同学，你好吗？你在这里干什么？谁把你带到这里，带进这个洞里来？”

“我偶然走过这里，便进来了。这里的空气倒很适

① 指钱的数目。

② 克罗侧：德国货币名。

意，……"

"不过有一点喧闹，不是吗？"

"是，这倒好。请你告诉我，右边那些先生们争论得这么激烈，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问题？"

"俄国的土地问题。天天都是这同样的问题。这个咖啡店是我们的中心点；我们大家都到这里来。"他答道，现出一点疲倦的样子。

我问道："自然都是些激进派？"

"是的，"他带着厌倦的微笑说，"保守派是用不着离开俄国的：他们能够在国内读书。只有我们，我们应该出来，应该离开本国。因此，这个咖啡店就是我们的第二祖国了。不仅我们住在维也纳的人要到这里来，便是我们朋友路过维也纳的，也要到这里来。譬如你看见那个戴蓝眼镜的人吗？你知道那是谁？那是马拉诺夫。"

"马拉诺夫？那是什么人？"我一点也不明白地问道。

"你不知道马拉诺夫是什么人？这是我们在外国的大领袖中的一个。他近来秘密地回到了俄国，住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他是在那里，却不能够捉到他。然而到后来他毕竟不能够住下去了。明天他便要往伦敦去。"

其实，我对于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我喜欢我的同学谈话的神气。我若用一点巧妙的方法，便可以把话题引到"她"上面，她这时正在喝一杯可可。因为不愿意让他知道我的心思，我便先指着坐在离"她"不远的桌子旁边的一个金发少年，问他这是什么人？

“研究语言学的，一个侦探，”他附着我的耳朵轻声说道。

“怎么？你们里面还会有侦探？”

“这自然。他毫不疑心我们已经认出他了，他还自以为我们都被他监视着呢，这狗……”他笑了。

我装出偶然的神气，掉过我的头，望着“她”和两个青年女子，几个男子所在的那一桌。

“那一个人，须发剃得光光的，靠近那些女士们，他是谁？”

“他已经在席吕塞尔堡里面住了四年，而且还不仅此，他暂时出来休息，换换空气；但他在外国不能久住，不久便要回俄国去。”

“请你不要见怪，亲爱的同学，我这样唠唠叨叨地问，你不觉得讨厌吗？”

“不要紧，请你只管问，请你只管问，我明白你对于那些事情有兴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侦探，”他笑着说。

“假若你高兴，请告诉我，那同桌的女士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那个剪发的女子是研究医学的。那个有红黄色头发的是画家。那第三个，就是最可爱的那一个。你不看见，那个坐在她的旁边、说话带着哑声的男子正在向她要钱呢！”

“你怎么会知道他在向她要钱呢？我们连一个字也听不见。”

“啊，哑喉咙（我们因为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便这样叫他）是我们侨民里面最老的一个。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了，他是离不开我们的。他是几家俄国报馆的通信员。然而现在他

的情形很不好，自然我们都肯帮助他。不过人总喜欢向薇娜要求。”他这样地回答我。

“为什么呢？”我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

“她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而且她自己会答应多给一点。她从她的父母那里每月收到二百卢布，她自己只用三十个卢布；其余的钱她尽拿来帮助别人，或者捐作事业的用费。”

我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身上，不能够离开片刻。她的一切都使我着迷，而且愈来愈迷惑。我的同学继续着说：

“你知道，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已经给判了在西伯利亚作十五年苦工的刑罚吗？”

“究竟为了什么？”我惊惶地问。

“因为她参加了一个暗杀事件。她被人押送到西伯利亚的‘天堂’去，但在路上，离乌拉尔不远的地方，她和两个同伴居然逃了出来。”

“那么，她不能够回到俄国去？”我尽力做出一种冷淡的调子。

“她随时都可以回去，”他讥笑地说，“不过假若她被人认出，她便要受绞刑。”

“她在上学吗？”

“是，她进医科，现在是第七学期了。她在这里还不久：她从日内瓦来。她还在巴黎大学听过六个月的课。”

“她叫什么名字？”

“薇娜。”

“就只有简单的薇娜这个名字吗？”

“不，薇娜·帕沙敏。不过在我们，姓是常常改变的；我们

常常改换我们的姓，就像我们时时改换住处那样，"他说。

"只要你高兴，我倒很愿意给你介绍她，"他又加了一句，我这时完全为想念薇娜的思想迷住了。你猜我如何答复？

"那么，就有劳你了，亲爱的同学。假若你很愿意，下一次来吧，你天天都到这里来，是不是？"

"是的，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后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我。"

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手，便急急走出去了。我本来很想立刻和薇娜认识，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畏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便谢绝了这样的好机会。我看见薇娜，觉得异常快乐，可是我竟然慌忙地离开了咖啡店，连自己也不知道为的什么。

沿途有一个不可解释的东西在后面追赶我，我不能够跑得很快。

我并不来向你描写一个方生的爱情的一切表征。我当时觉得这一次是真实的，人一生只能有一次的爱情。

第二天我去学校听讲，连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便缺了其余的课，也不到实验室去实习，专心等着晚间的到来。

大约在七点钟的光景我进了咖啡店，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许多张桌子都空着。"她"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人占了一张桌子，在读报。虽然二十四小时以来我都只想着"她"一个人，而且"她"的面貌无时不在我的眼前，但我仍然装着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她"的样子。

她放下一张报纸，又取了第二张来读。这时候我受了一个突然的冲动，鼓起我的勇气，向她走去，要了一张报纸来读。

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做的。不过是问一句，答一句，就这样地交谈起来了。……我把我的名字告诉她。……她要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的同学恰恰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他便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看见我已经认识她了，并不惊奇；我们三个人兴高采烈地谈着，好像熟习了很久似的。我从来不曾尝过和青年女子交友的如此甜蜜的滋味。我们彼此已不用“您”的称呼，而直接称“你”，仿佛我和她相识已久。

三

过了几个星期，正是一月十二日，我的这些新交的朋友趁着俄国的圣西尔威斯脱节举行一个晚会，目的是在筹款援助革命运动。自然我也到会的。晚会上有音乐，而使我大为惊异的就是节目单上有薇娜的名字。她用斯拉夫人的忧郁的调子，唱萧邦的《夜曲》。你相信不相信都随你，不过请你听我说：纵使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薇娜的面，就在那天晚上我听了她的歌声的一瞬间，也就足以知道她是唯一的，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了。

一群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乐队奏起乐来，小小的跳舞会开始了。

薇娜答应和我跳一次华尔兹；我的手从她的腰间滑开了，我轻声向她说：

“薇娜，你跳得这么优雅，这么轻快，我真想不到。”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医科的吗？”她高兴地回答道。

"不是这样;不过你们那般人的生活都是异常刻苦的。"

"波痕,你不要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任何国家青年的更悲惨,免得拿我们的事情搅乱你的个人生活。"

跳舞不停地进行着,我们沉迷在华尔兹的步调里面。

突然一个强烈的欲望占有了我,我竟然想当着这许多到会者的面前,而且在一对一对的跳舞者的目光之下,大胆地把她抱在我的怀里,不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她一定已经觉察到了这个使我激动的困恼的感觉,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她投过来一瞥惊诧的眼光,而且……我还有自制的力量。

然而现在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久便吐露真情。薇娜会明白的。

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日子一天一天地坏起来了:俄国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地严重;我把我的决定一晚延迟一晚。……在跳舞会过后的第十晚,便是"血星期日"的晚上。

在圣彼得堡,这一天早晨,有二十万人被一个神父领着游行到冬宫去,要见他们的"小父亲"。而在冬宫的周围已围着三重哥萨克兵和大炮,预备来欢迎群众。

这天下午我到咖啡店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一如往常的星期日;然而这一天却是异常沉静,好像在教堂里一样。我看见了薇娜,她埋下头,在沉思。

哑喉咙忽然冲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这是最近的消息,刚刚从报馆的编辑部得来的。"他跳上一张桌子。一瞬间,所

有的人，好像都被他的话引动了，全都向着他拥挤过来。他们一声不响地凝神听他说话，然后又沉默地各回原位。每一次新的消息传到，这样的景象又重现一回。不过所有的消息都是一样：人民有秩序地进行着，渐渐逼近冬宫，满心希望沙皇会听从他们的要求。

他们呢，他们在这里，而他们的思想却远在北方，伴随着他们的圣彼得堡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开口。他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这里等候消息时，群众早已到达冬宫了。在圣彼得堡一定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了；然而还没有消息来。他们等候着奇迹。……

……啊！灾祸来了。大炮向着那些信任“小父亲”的游行群众开放了，……哥萨克兵也在屠杀人民。……冬宫附近的雪地被鲜血染红了。……

星期一这一天，我不曾见着一个俄国朋友，连薇娜也看不见了。我的同学午后也不曾到实验室实习。我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一定在开秘密会议。

星期二，咖啡店稍微热闹起来。薇娜在那里，然而许多每天必到的人都不见来。薇娜并不开口。她坐了一会便起身出去，并且邀我作伴。我认识她以来她邀我作伴，这是第一次。

我们走到大街上，她站住了：

“今晚上这么美，这么亮。我喜欢多走一点路。你愿意陪我走走吗？”

“一定，”我狂喜地答道。

"然而有一个条件:谁都不许开腔。只让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脚步自由自在地去跑。这就是我的条件。"她微笑着。

我答应了。

"那么,走吧!"

我们动身了。我们走过城里僻静的、窄狭的街道,到了多瑙河,随后又到布拉特尔的荫路。

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冬夜。

这条大的荫路浴在月光里,成了白色,在我们前面伸长出去,好像深入了无穷之境,我们也要跟着它走到那无尽处。

城里的钟在报道中夜了。

我们便转身回来,我们又走过泰该荷夫纪念碑、电灯、夜晚的咖啡店、贫民的音乐。不久,我们到了我们的大学区域;我们转入席洛塞巷,到了薇娜的门前。

薇娜按门铃,她默默无言,深深地看入我的眼睛,而且像她从来不曾做过的,放一个手指头在嘴上,意思是叫我不要做声;她又捧着我的头,在我的颊上吻了两次。我们听见门后有脚步声,门开了:那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看门人提着一个灯笼。她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一转身走过灯笼后面,走入黑暗的走廊,就不见了。门重新关上。

一阵昏迷侵袭着我。我好像在抵抗什么东西,我又不知道什么。我应该跟随着她,再见她!我敲门;没有用。我又按门铃,尖起耳朵静听看门人的脚步声。我有什么事?我要怎样做呢?看门人开了门,我给了他一点酒钱,说我认错地方,便走开了。

我回到家里。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焦急地等候着晚上的到来，好去咖啡店会薇娜。然而她并不在那里。我向哑喉咙询问她的消息。他迟疑地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感到异常不安；不过我又拿下面的话来安慰自己："星期一她也不曾在这里；一定是她没有多的时间，不能够每晚都到咖啡店来；明天，她一定会来的。……"

星期四从晚上六点起我便在咖啡店里面了。……我等候着：挂钟敲了七下，八下。……哑喉咙走进来，交了一个匣子给我：

"这是薇娜叫我转交给你的。"

"她在什么地方？"

"这个匣子会告诉你。"

我兴奋地拉断了绳索；然而他把手放在匣子上，说：

"不要在这里开，到你的家里去。"

我一口气跑回家，我连蜡烛也不点一支，就在那黑暗的屋子里，揭开盖子，把手伸了进去。……这是一根辫子。我好像摸着一个尸体。

我的指头摸着这头发，是如此柔软，我好像在抚抱薇娜一般；随后我的指头又摸着一张纸：这是一封信。我连忙点燃了蜡烛。我读这信。我读了又读，直到我记熟了为止！

亲爱的波痕：

这封信到了你的眼前时，我已经在俄国了。你爱我，

我是知道的。女人的心并不是如此地盲目，连这个也看不透。不过你从没有向我说过，这倒很好；我很感激你不曾说，不然，分别时，我们更不知道是如何难堪。

至于我的去处，我们的战斗要我到哪里去，我便到哪里。我应该把我的相貌稍为改变一下，因此，我剪了我的头发。我把这一束头发送给你，作为一件纪念品，也表示我对你的谢意。我不能够把我的照片送你一张，因为我没有；然而，你可以在所有俄国的罪犯图形簿里找到的。以后，我要用一个新的名字。我求你不要去找我，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你不会找着我的。就是我自己，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去华沙，或者去敖德萨，或者去莫斯科。

当你读到这几行的时候，我一定已经到了那边了。……恕我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一切；不过这样倒好一点。……不要来找我了。……我们在俄国的战斗一旦完结了，假若我那时还活着，……那么，我会再来，我要来找你。

别了！　　　　　　　　　　　　　　薇　娜

我的心乱了。

我要立刻去见哑喉咙。十点钟一过，在维也纳，家家都关了门。哑喉咙住在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家里，他的房间在第四层楼，算是最高的一层，上面便是屋顶了。我敲门，敲了很久。后来他自己下来开了门。他见我深夜来访，颇为惊异，

他让了我进去。

“薇娜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向他叫道。

“在俄国,”他极其安静地答道。

“她什么时候把这匣子交给你的?”

“昨天早晨,到车站去的时候。”

“你一直等到今晚上才交给我?”

“我不能够再早一点交给你。”

“昨晚我向你问起薇娜的消息时,你骗了我。你不是明明说你不知道吗?”我气愤地叫道。

“是不是我应该预先告诉你,好叫你来留住她?你的自私的爱情,果然值得这个吗?”

接着他又嘲笑地说:“你们其他的人,德国人也好,奥国人也好,或者你高兴用其他的名称也好,你们对于责任的观念又是怎样的呢?”

“朋友。我要见她,懂得吗?就是她走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随她;就是她去赴汤蹈火,我也要跟随她。你要求什么,我便给你什么,——你说呢!告诉我她现在用的什么名字?现在,她在什么地方?”

他一边打量我,一边说: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的话得罪了他。我知道再要求也没有用。我便告个罪,走了。回到家里,我忙着收拾行李;我预备第二天就到俄国去。随后我异常疲倦,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四

第二天我醒来时，已是正午将近。我看见我的箱子在屋子中央，很惊奇。后来我记起了昨晚的事；我明白去俄国的计划是疯狂的举动。然而，再要留在维也纳，我也受不下去，我便去日内瓦。去日内瓦有什么目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在那里又做什么事呢？我便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后来又去伦敦。我在各处打听薇娜的消息，一点结果也没有。在布鲁塞尔，我遇见一个很和蔼的人，他对我表示很大的同情。他向我说：

“你问薇娜的消息？然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薇娜，多少苏菲亚，多少安娜已经到那里去了？有多少薇娜、苏菲亚、安娜已经死在那里了？而且还有多少快要死在那里？你还要问薇娜的消息？”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

> 敖德萨省总督遇刺身死。刺客为一青年女子，当场被捕，判处死刑，即于是夜上绞刑架。

“这是她，这是她！”我用颤抖的声音低语着。

自然那个少女的名字不是薇娜；然而她也会是薇娜的。一种焦虑折磨着我，不久这焦虑竟然变成了可怕的确信。

这天晚上，我在梦中看见了一个大天井，周围有一圈灰色的垣墙；天井中间建立着一个绞刑架，上面吊着一个青年女子。我逼近去看：这是一个剪发的青年女子。这是薇娜！薇

娜！ 薇娜！

我的房东太太站在我的床前："博士先生，你怎么了？你叫得这样地悲惨，我应当来唤醒你。你的声音，在下面，而且差不多在天井里，人都可以听见了。"

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

在莫斯科，一青年女子为一宪兵队军官强奸。

这天夜里，在梦中，我听见在墙壁后面的指挥刀的响声、叫声、哭声。我静听着。这是薇娜的声音。我要穿过墙壁；然而，墙壁一动也不动！……我醒来时，房东太太又站在我的床前。

"天呀！你又做了这样的噩梦！博士先生。"

我的手指出了血；我的指甲昨夜一夜不息地抓着床边的墙壁。

我应该帮助在那边奋斗的人，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然而，我怎样去帮助他们呢？……许多矛盾的计划经过了我的头脑，很快地学习俄文，跑到那边去，混在他们队伍里，……不然，就简单地在柏林或在维也纳，或者其他的地方，组织一所实验室，制好炸弹给他们送去。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我的痛苦是很大的。然而最使我激怒的却是那些一边喝咖啡一边读俄国新闻的人的冷淡态度。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一面跑马似地浏览着利加的新闻，一面尖起耳朵静听邻座一个人的笑谈。我恨不得把这个人痛打一顿。

到处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巴黎也好，柏

林也好，或者欧洲的其他地方也好，到处我都看见这同样的对于俄国大悲剧的可恶的冷淡态度。而且报纸上的俄国消息也一天一天地少起来了。不停的排枪、不断的炸弹、绞刑架、西伯利亚等等渐渐地都使人讨厌了。

这时我明白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应该投一个炸弹在所有欧洲人的眼前，这个炸弹要他们大家都能够亲眼看见，而且它的爆炸声会使他们都抛弃他们的可耻的冷淡态度！……啊，朋友……

五

波痕沉溺在思索里，过了一会。

我吐了一口气，问他道：“那么，又怎样呢？”

“我写了一个剧本。”

“不用说，这样，就使你安静了一点吗？”

“谁这样说？”他惊异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结了婚吗？”

“是的。我的剧本写成，只能在很少的城市里上演；大多数的地方都禁止它。就在一个不曾禁止它的城市里，我有一次去看这剧本的上演。那个饰女主角的女伶表演得极好；她有一种奇特的动人处，我觉得几乎和薇娜的一样。因此，后来我便娶了这个女伶。”

“你不是没有一点儿后悔吗？我最近经过家乡时，你的父母告诉我说，你们夫妇感情很好。”

“不错，我爱我的妻子。”

“这根辫子呢？你永远放在你的抽屉里面吗？”

“这也是奇怪的事，”他叹了一口气说。

他用双手把这根辫子紧紧贴在他的脸上，他的手指捻着这一丝一丝的紫色细发，好像还想再闻到已经消失了的香气。

我受了感动，问他道：“要是她再来呢？”

“要是她再来呢？……”他也应声说。

他的眼里燃起了一线希望的微光。我们可以说他的眼睛差不多在笑了。

“要是她再来呢……”一会儿他的面貌又阴沉起来了。他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再说道：“要是她再来呢……”

随后，他又慢慢地摇着头，放弃似地说：

“我不相信什么奇迹。”

我们听见了邻室里的脚步声，他把装辫子的匣子放回在抽屉里，在门槛上现出了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他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给我介绍道：

“我的妻子黑达。”

后　记

收在这集子里的三篇文章是我在一九二八年译成的。因为它们都是描写旧俄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这次就把它们编在一起印行了。《门槛》是去年旅居东京时，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里译出来的。它可以被看作这集子的序言，所以就放在前面。

这次付印时，每篇译文我都校阅过，而且补写了前记，不过这次的校阅仍是很粗率的。反正这些并不是文学上的名著，它们的价值也并不在它们的文字，却在所描写，所叙述的事实。而这事实却是不死的东西，所以文章也就能够活下去了。

别的话我在前记里面说过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巴　金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代　跋

树基：

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

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

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

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失约了。

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挥手。

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

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

《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

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

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

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①] 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

巴　金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① 两个中篇：指《木木》、《普宁与巴布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金译文全集 第二卷
作者＝［俄］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
页数＝５４２
ＳＳ号＝１０４４８０４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６月第１版